

总第 27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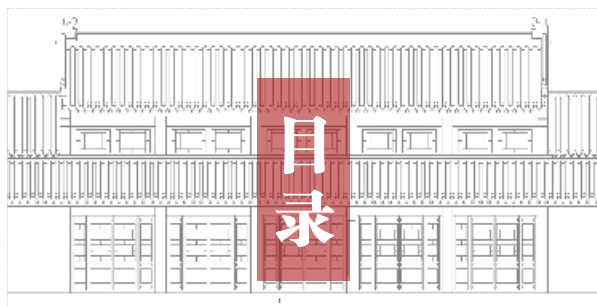
2022

第 6 期

文 研 通 讯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纪念

怀念我们的朋友周绍明教授 ····· 005

文研学术

· 文研讲座

John Hunt: 不列颠想象中的意大利园林 ····· 019

李孝聪: 寻觅古城址: 田野考察的方法与实践 ····· 025

朱苏力: 齐家——农耕文明的基础制度和制度基础 ····· 032

周雪光: 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田野研究: 田野与理论的互动 ····· 037

· 未名学者讲座

陈沐阳: 中国与全球发展治理 ····· 045

许立言: 城市史的书写方式——多维度的生活方式与交织的智识传统 ····· 049

· 文研论坛

多视角看基层社会 ····· 055

· 邀请学者论坛

Enrique Stephanus Dussel: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在拉丁美洲
与加勒比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 (截至2021年) ····· 061

徐欣: “活态的历史”与“关联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编纂的视角与个案 064

潘光哲: 蔡元培学术的日本渊源: 以《中国伦理学史》为中心 ····· 066

张小刚: 添枝加叶的历史传说——历史政治和宗教传播视野下的刘萨诃故事的演变 · 068

· 书志学与书籍史

写刻转换与文集生成 ····· 073

· 文研读书

王裕华：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 ····· 080

· 文研经典阅读

王权中的正统论与神秘论 ····· 085

· 北大文科创新讲坛

贺桂梅：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与创新 ····· 088

文研回望

沉吟师友谊，犹眷草木心——文研院举办第十三期邀请学者欢送会 ····· 097

文研院承办第十九届北京论坛分论坛“文明的交界面：生态与族群的历史反思” ····· 102

文研院举办南亚研究知名学者布莱恩·奥尔教授系列讲学活动 ····· 105

专题论文

· 教育与现代中国：从科举制到考试社会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
——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 ····· 108

应 星：科场场域——1895-1905年的湖南 ····· 128

刘云杉等：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
——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 ·····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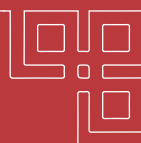
陆 一：学业竞争大众化与高考改革 ····· 182

学者报道 ·····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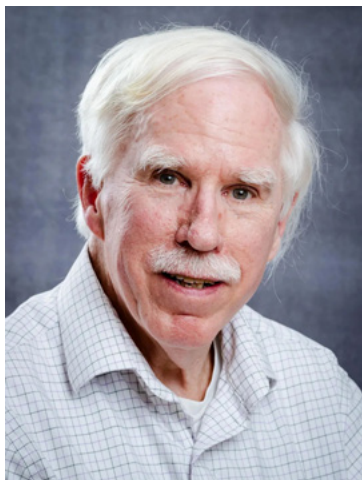
文研纪事 ····· 202

照片墙 ····· 216

纪念



怀念我们的朋友周绍明教授



Joseph P. McDermott
(1945-2022)

据剑桥大学发布的消息，著名历史学家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教授因病于2022年10月31日去世。

周绍明教授，1945年生，1978年于剑桥大学获得中国史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纽约圣约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等高校任教。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著有《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2）：1500-1700年徽州的商人、宗族和商业组织》（2020）、《东亚和欧洲的书籍世界》（2015）、《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1）：900-1600年徽州的乡村、土地和宗族》（2013）、《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2006），主编《中国的国家与宫廷礼仪》（1999）、《东亚的文化与政治》（1990）等。

2019年9-12月，周绍明教授在文研院担任驻访教授。他在例行报告中，以徽州祠堂与宋元时代的乡村组织为个案，介绍了他关于华南乡村秩序形成的两卷本巨著的构思。在公开讲座中，他解释了中国经济史上商业合作伙伴关系的流变。他还积极参与邀访学者群体内部每周例行的学术讨论。相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带给大家的不仅有思想上的激发，更有许多欢笑……疫情的阻隔，病魔的无情，让我们永远失去了重逢的机会，失去了这位可敬可爱的师长与朋友。文研院的学术共同体，特别是和周绍明教授同期驻访的学人，陆续获知周绍明教授离世的消息后，纷纷写下他们的追忆。

陆 扬：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两天前，刚从落地北京隔离中解封出来的我突然收到韩琦兄的微信，说周绍明教授已于昨日逝去。近两月以来每日萦绕于心之担忧，正是 Joe 迅速恶化的病情。随后便接到张玲教授发给大家的唁函。这样一位令我热爱的前辈的逝去，在北京此刻的氛围里，更让人难以承受。

Joe 给我第一个印象，也是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九〇年代末期与他的首次见面。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剑桥。麦大维教授在圣约翰学院为我安排了一个正式的餐后甜点会（其实是品酒与奶酪之类）。Joe 也是参加者，觥筹交错间谈到撒切尔政府政策对英国大学造成的戕害，Joe 讲到激动处竟然流泪，这让我为之动容。Joe 的这份率真不仅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以为英国学者都很 reserve 的印象（其实他是地道美国纽约人，只是那时不了解而已），而且也很很快让我对他产生敬意和亲近感。若干年后，Joe 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邀请学人，我和他有更多交流的机会。Joe 擅长的领域为宋明社会史与书籍文化，但实际他对中古文化也很留意，尤其很早就倡导古代礼制的研究。他在普镇的那年岁末，同为书籍史家和善本收藏家的艾思仁博士在家举办祭书之会，邀请 Joe 和我参加。那时 Joe 的书籍史专著也刚出版。我为此写了小文，一时在朋友小圈子内流传，其实当时我于书籍版本之学所知皮毛而已，但因此而得缘接近他的学术世界。

真正让我感受到 Joe 为人为学之美的，是二〇一七年我在剑桥度过的那个学期。当时我获选成为剑桥圣约翰学院的 Beaufort 学人。这是圣约翰声望最为卓著之邀请学人项目，以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主、圣约翰的奠基赞助者 Margaret Beaufort 命名。在此之前，我虽曾数度访问剑桥，但印象是浮泛的，而这一次却沉浸其间，从而成为圣约翰乃至剑桥的绝对热爱者，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loyalist。之所以如此，主要还不是因为剑桥传统与学术之美，而是作为圣约翰学院重要成员的 Joe 和麦大维先生的人格魅力。在那几个月中，我看到了此前完全不知的 Joe 的另一面，即对学院生活的积极参与和与圣约翰传统的融合无间。让我认识到剑桥的灵魂在于学院，学人的身份认同由学院而至大学，由近及远，学术的独立性才得以更好保存。Joe 对我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因为他和 Hiroko 的好客，每每让我感觉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剑桥也可以是一个美食天堂（其实圣约翰每日午晚餐不仅充满仪式感，食物也甚佳）。圣约翰因其历史悠久，赞助者又是统治核心人物，在英国政治宗教许多重大事件中介入甚深。在圣约翰的那一学期，我对麦教授和 Joe 说要完全放下与中国史有关之研究，专心学习英国史，因为我觉得没有比这种具有临场感的地方更适合拓宽史学眼界了。Joe 对我的想法大表支持。当我感叹剑桥与英国统治者关联之深时，Joe 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一所大学受到统治者的过多关注绝非幸事，只有当他对你失去兴趣时，才有真正独立的生命。

我和 Joe 最后一次欢聚是 2019 年秋他来北大文研院驻访，这对于我而言是期待已久的尽地主之谊的机会。近些年来我对宋明以来的徽州社会的兴趣大增，这使我终于能在 Joe 最擅长的研究中获得养分。他的两部关于徽州的大著都是我爱读的。我喜欢他书中英文 prose 的明晰。那次正好碰到俞孔坚教授在西溪南组织有关徽州人文景观的讲座，我立刻推荐了 Joe，结果他精彩的介绍令该次活动大为增色。Joe 充满幽默的谈话和开阔的学术趣味也使他在文研院度过快乐的时光。原来预计我来年又可以在剑桥与 Joe 见面，因为我和两位美国同行组织年度的中古碑铭工作坊，每年选欧美不同地点举办，而二〇二〇年则会在剑桥圣约翰举办，Joe 是承办方最主要的协调人。向来周全细致的他甚至把学院里最好的住宿都替参加者安排好了，不料疫情爆发，使得这一美好的安排迄今难以实现。我记得很清楚，二〇年初疫情在中国出现时，Joe 以为我人在北京，特地写邮件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因为曾担任过圣约翰的 Beaufort 学人，而这一资格最诱人的附带特权便是可以每年在圣约翰住上几天，吃住由学院承担，而且是终身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每年都会有机会和 Joe 在剑桥的草坪散步谈话，却未料向来精神矍铄的他会过早地离开。这是此次疫情留给我的一个巨大的遗憾。Joe 曾数次领我到圣约翰的巨大的善本图书馆，那里平日并不开放，当他带我从狭小的旋转楼梯走上去时，展现在眼前的是 16 世纪宏大的藏书楼和雕刻精细的书架，他会抽出善本来给我讲解，此刻的他犹如中世纪的学问僧。如今他本人也成为了剑桥优美传统的一部分。



周绍明教授（第一排左一）与同期邀请学者合影

王振忠：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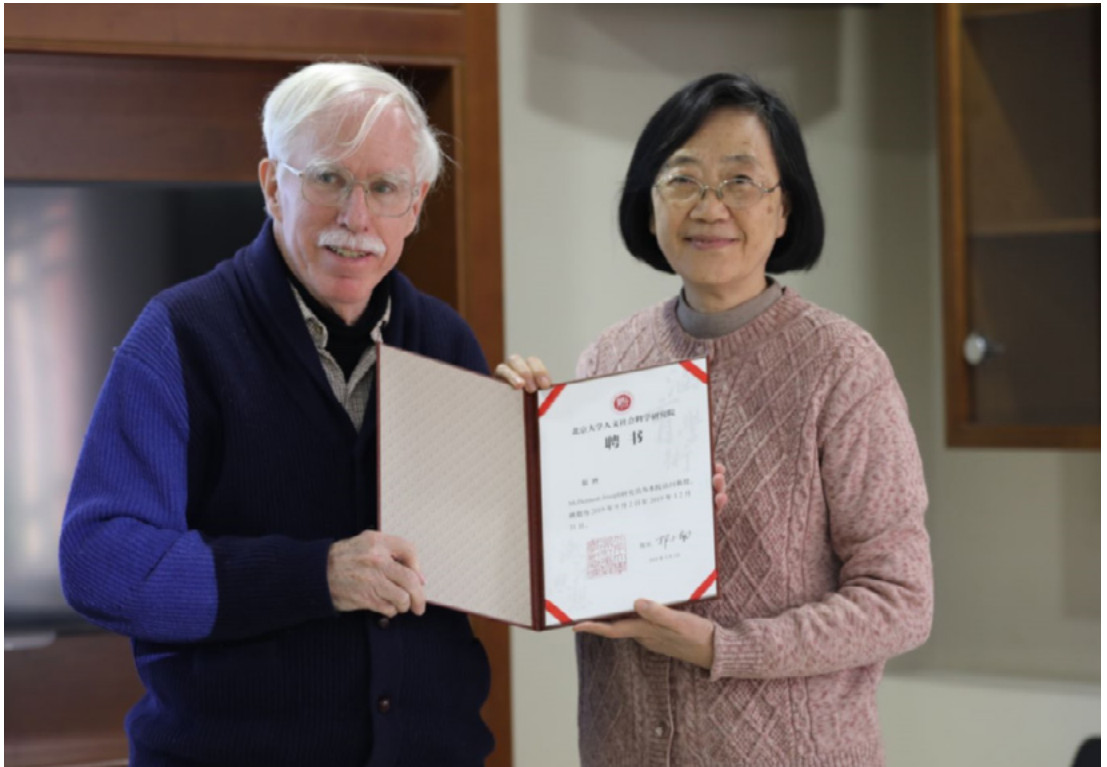
十月的最后一天，一大早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凌晨收到远东学院朋友的 email，告知剑桥大学 Joseph McDermott（周绍明）教授昨天逝世。McDermott 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著作颇多，其中，1990 年《徽学通讯》上曾刊载译文，其中提及徽州文书作为第一手的原始文献，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此一说法为学界所熟知。2013 年他出版《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 1）：900—1600 年徽州的乡村、土地和宗族》一书，中译本已交三联书店有年，遗憾未能在其生前出版。McDermott 教授与中国学界同人有着密切的交流，疫情前夕的那个秋季，他曾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如今，在文研院走廊墙上还贴有他的照片……斯人已逝，哀悼！”

我与周先生认识较早，大概是在 1990 年代中叶，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就曾与他邂逅，当时有过简单的交流，我的第一印象是，周先生思路敏捷，说话风趣且充满活力。当然，与他较为密切的交往，则是在疫情之前的数年间。当时，法国国家科学中心的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教授主持欧亚经济史会议（Eurasia Trajeco Conference），每年定期在欧洲各地召开研讨会，周先生时常与会，2020 年之前我也连续数年都受邀参加。我们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西班牙塞维利亚、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聚会，切磋交流。另外，法国远东学院华澜（Alain Arrault）教授、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博士与周先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近年来他们致力于在欧洲推动中国地方史的研究，曾在英国组织过徽州文献读书班，那些年也不止一次在巴黎举办与中国地方史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也经常能碰到周先生，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颇有如沐春风之感。2017 年，荷兰莱顿大学荣休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é）与我在上海合作主持第一届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周先生正好途经上海，他曾专程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小礼堂旁听会议，并于会间的交流中，将自己的专著及中译本赠送于我，我则受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之委托，出面邀请他前来黄山市参加“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顺道前往合肥演讲。周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并于后来出任徽州研究的专业期刊《徽学》杂志之编委。

周先生为人热情，在与我的交流中，他每次都会写很长的 email，畅谈自己最新的研究及心得。2020 年复旦有位硕士生希望毕业后出国深造，她试着写信与周先生联系。没有想到周先生很快就回了一封很长的 email，在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函中，周先生虽然表示自己已从剑桥退休，不再有什么学术资源可以招收英国或海外的研究生，但仍然细致地指点这位同学，勉励她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深入探讨……

周先生是位非常勤奋的学者，他到中国时常到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有几次约我在上图附近见面，交流最近的研究心得。2013 年，他出版《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 1）：

900—1600 年徽州的乡村、土地和宗族》一书，此书是继荷兰学者宋汉理（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所著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 800 to 1800* 之后，欧美学界第二部聚焦于黄山白岳之间、比较系统研究徽州的学术专著，颇具学术价值。我一直希望该书能尽早译成中文出版，也曾为之物色、推荐翻译人选，但因周先生对译者有着极高的要求，此事一波三折。后来在 2018 年的黄山会议上，安徽大学历史系董乾坤博士（他曾在刘永华教授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来成为我的博士生，以徽州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毛遂自荐，对此，周先生曾来信慎重地向我打听他的具体情况。后因董乾坤所译样稿得到他的赞许，遂由前者负责翻译全书。此书译稿此前已交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目前正由编辑认真校勘、处理，相信该书的早日面世，一定会告慰周先生的在天之灵。



邓小南院长为周绍明教授颁发聘书

韩琦：文研院第九期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前天接到意大利朋友米盖拉的信，惊悉周绍明先生逝世的消息，不胜哀悼！

虽然早就听闻先生的大名，但与先生首次相见是2008年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的时候。周先生十分儒雅博学，爱好书籍史、明清史，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在剑桥时多承关照，先生不仅热心向我介绍剑桥中文收藏的来历，亲自陪我参观圣约翰学院的藏书，还给我讲述他在牛津师从龙彼得的故事。先生常带我到圣约翰学院去吃晚餐，享用学院自备的醇香浓郁的葡萄酒，跟一些不同领域的学者和 fellow 交流，得益颇多。我们全家回国之前，先生还盛情邀请我们欣赏圣约翰学院的音乐晚会和烟火，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先生对舅父的《中国印刷史》推崇备至，2009年，当此书的英文版出版时，受浙江古籍出版社之邀，先生特意到法兰克福书展，为此书作宣传。2014年再访剑桥，他盛情邀请我参加剑桥的年度大宴，行前带我到他家，穿上礼服，为我佩戴领结，这也是我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在那次聚会上，还巧遇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罗森教授和她的客人德国著名中国艺术史家雷德侯先生。先生做事严谨，知我正在准备国际数学家大会45分钟报告，就为我悉心修改论文，字斟句酌，润色文字，为拙文增色不少。经他批改的拙文，我还珍藏，已成为我们友谊的重要物证。先生受龙彼得先生影响，不仅精研书籍史，后来转向徽州史的研究，出版了两卷本厚重的学术专著。2016年，先生写完徽州史的专著，想放松一下，顺道访问北京，我请他吃饭，同时还邀请了研究书籍史的翁连溪先生和三联书店的张龙陪同，介绍他们认识，商谈他的大作徽州史的汉译工作。欣闻第一卷已经翻译完成，期待不久能够面世。

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与先生聊天，谈论的都是学术的话题，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精神的享受。2018年9月，我再次访问英国，得知我将入住 Wadham College 时，先生无比的兴奋，因为先生当年在牛津求学时，住的就是同一个学院，他还告诉我，当时学院的院长 Bowra，在中国出生，其父亲是海关工作人员，曾参加袁世凯的葬礼。中英历史的交往，时空的交集，好像都是冥冥中的缘分。

最后见到周先生是在2019年秋，彼时先生受邀到北大文研院访问，期间我们多次见面，并有幸聆听他的讲座。回国前，陆扬兄请客，先生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Tim Barret 教授、荣新江、朱玉麒、游自勇、王颂、雷闻诸兄和我等参加，那次相聚，畅谈甚欢，不意这次聚会竟是与先生的永别。2020年秋，我也有幸至北京大学文研院访学，能与先生同为文研院的一员，于我来说也算是与先生难得的学术之缘，聊作对先生的永恒怀念吧！

李放春：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

昨晚在杭州胡庆余堂附近与接风的朋友一起吃饭闲聊，我跟他们提到认识一位研究徽商的洋教授：周绍明。今天惊闻他刚刚离开了我们。那些短暂相处的场景顿时浮现眼前……

2019年9月到北大文研院后不久，我在内部交流会上汇报了关于韦伯传承尼采谱系学方法的初步研究思路。第二天早餐时碰到了周教授，便聊起来。他很礼貌地道歉说昨天在会上没有发言，今天补上。接着，就对尼采批判英国谱系学家的观点进行了一番文化解剖：德国人是在抽象的观念中处理世界的关系。英国人则不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人类学：要了解他者，就去实地去看，去听他们怎么说。这和其帝国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国人没有类似的历史经验，所以往往是抽象地看世界。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钟头，饶有趣味。此后，很快熟络起来，便经常凑在一起聊天。听他聊剑桥与牛津的风格差异，聊达尔文、凯恩斯的伟大，聊莎士比亚戏剧的真实作者，聊如何借鉴赫希曼的《情感与利益》来研究明清商人，聊他关于中国社会的四要素（村社、寺／观、家／族、民间宗教信仰）论及南北差异，聊儒家（宗族）与民间宗教的持续斗争……特别是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他提炼出的“村庄四重奏”（village quartet）说，那兴致勃勃的劲头就像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自然进化的秘密。

周教授虽然在英国教书，但身上还是典型的美国人气质，喜欢让人叫他 Joe。他在文研院的内部报告排在 11 月初，邀我为他主持。作为一位社会经济史家，Joe 特别注重发明宋代以来徽州社会中宗祠发挥的经济功能：它实际是农村商业与金融生活中的重要信用机构。这种从最基层的社会经济组织着手来考察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长线视野，是我十分诚心钦佩的。忐忑之余，我欣然应允。周教授还赠送了我一本他的大作《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第一卷，并说正在完成第二卷。他的努力，让我这个晚辈很感惭愧。

在文研院驻访同仁眼中，Joe 是个认真、快乐而乐于助人的长者。交流会上，时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记得他生日的时候，文研院精心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party。大家一起为他庆祝，老人家高兴地像个孩子。

元旦前临别一起吃饭，他很严肃地告诫我一定要坚持每天写作……

周先生千古！

刘永华：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请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第一次见周绍明先生，是2019年北京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上午。在此之前，我们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年左右的通信。还记得走进他在静园二院的办公室时，地上洒满了阳光，在这个令人难忘的环境里，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开了。

像所有出色的学者一样，周先生对自身研究提出很高的标准乃至有些苛求，不肯轻易发表东西。他的论著在刊出之前，往往经过了长达十几二十年的长期思考，力图做到精益求精，所以他的论著不多。印象中周先生对探索新领域、新课题表现出很强的好奇心。他早年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史，发表过很有影响的成果，后进入明清史研究，对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特别是书籍史）领域的不少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生前印行的两部著作，就是这种好奇心的见证。我想这种强烈的好奇心，也是一位出色学者必备的重要素养，是他学术上之所以能够孜孜以求的基本动力。

在那次文研院见面和后来在复旦的交流中，听周先生谈了不少话题，最核心的一个，是一位“70后”对自己未来几年的学术规划。当时，他在估价、解读长期为学界忽视的17世纪20年代一位西班牙传教士撰写的《中国纪行》，试图对前近代中欧民众生活水平的比较提出新认识，所幸这个研究在他去世前已经刊出。也是在文研院驻访那年，他利用前来东亚访问的机会，致力于开展明清徽州女祠的研究，这是他计划撰写的一本新书的主题。如今，斯人已逝，我们不会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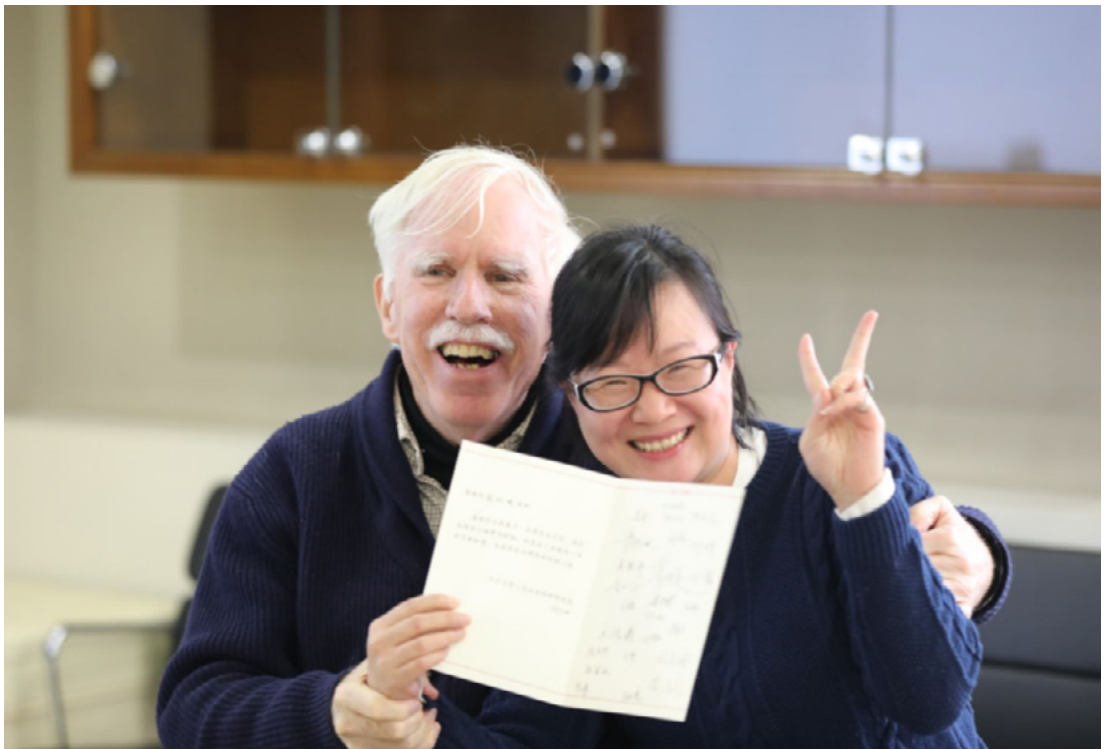
在人生的历程中，三年的时间不算长。在将近三年之后的今日，那次静园会面如同昨昔。但其间发生了多少事！现在，先生又离我们而去。终其一生积聚的知识，一夜之间化为云烟。这些，都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路国权：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9年金秋，受益于在北大文研院同期访学的机缘，我有幸认识周绍明先生——一位睿智的长者。因为同住在中关新园9号楼，每天早晨到7号楼用餐，我们经常有机会遇到一起餐叙，交流的问题从初识时的初步了解，到生活经历、研究专业、徽州山水、人生哲理……周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很像圣诞老爷爷，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从内而外洋溢着乐观的精神，在专业领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真探索执着钻研的精神。访学结束之后的世界，发生很大变化，周先生分享给我的那些人生经验和智慧，给我很多启迪。永远怀念他。

Bertram Schefold: 文研院第七期访问学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

2019年夏末秋初，我正好在文研院做访问学者，与 Joseph McDermott 同期。我印象中的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中国的历史，有关现代和过去、当地情况、还有发展前景和政治风向。作为一名汉学家，他拥有全面的视野：他对经济史和艺术都有兴趣，关心古老风俗和现代转变。他了解工业发展前中国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知道欧洲的旅行家在几个世纪前对中国的全部描写。他试图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层面对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访问的那几个月，在北大的多语言环境中充斥着生动的交流，现在看来是一段田园诗般的时光，因为之后便经历了疫情，国际局势也变得紧张。后来他指导了我的学生，慷慨地给出建议，同时坚持学术的高标准。他还答应带我参观剑桥，五十多年前我曾在那里读书。但我们在文研院之后就没再见面，只有邮件往来，也不知他的病情。他的离世令人十分难过。



周绍明教授在生日会上与黄盈盈合影

肖 铁：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

很想念鹤发童颜的周先生。想念周先生作报告时专注的眼神，深秋，静园二院敞亮的会议厅，下午的阳光斜射在先生白得透明的头发上，徽州祠堂和宋元的乡村被先生的目光照亮，总觉得先生在看我，看我有没有认真听讲，看我有没有记好笔记，看得我战战兢兢，生怕漏掉一句话，先生一边讲，一边用左手在空中画着象形文字，仿佛这样能帮我听懂一样，可惜外行的我对先生的学术一窍不通，使劲想问个高明的问题，却只会半张着嘴给先生一个谜的微笑。想念周先生常常让人措手不及的大笑，二院的楼道、楼外的草坪，周先生的笑声不挑地点不挑时间也不管听众是否准备好，洪亮得让人怀疑是从这个被略显邈远又过于宽大的毛衣外套裹住的不够健壮的身体里传出来的，脆得让迟到的听众遗憾自己错过了怎样的好戏。想念在静园花园里的那次聚餐，西式自助，我端了满满一碟菜，周先生也端了满满一碟菜，我问他八十年代去合肥图书馆找书的经历，他问我现在在美国大学里工作的压力，先生很耐心地听，一边听，一边用他空出来的手拍了拍我没端盘子的胳膊，没给我讲什么大道理。

关 雪：文研院邀访项目事务主管

半年前听闻先生身体欠佳，后又接到消息请我们整理先生驻访期间的账目，心里多少是有些铺垫的，但收到先生离去的消息，还是很难过。这几日，翻看先生19年秋在二院的照片、视频、寄语还有往来邮件，脑海里都是他慈祥、睿智的模样，还有他的开怀大笑。我有些记不清当时是刻意还是凑巧把先生的报告会安排在他生日当天，那天会前我们一起庆生，还有二院的红果助兴，先生笑得非常灿烂，大家其乐融融。很巧的是，在第二年的11月5日，我的宝宝诞生了。

先生送过我两样东西，一套茶具和一套香皂。先生喜欢喝茶，人缘还好，他驻访时有好多朋友送他茶和茶具，他与我分享，还向我介绍各地茶的特色。先生是美国人，他太太是日本人，生活在英国，做汉学研究。他把多文化的学问和生活都融合得很好。离院前他把从太太家乡带来的一套铸铁茶具送与我留作纪念。另一套香皂，先生说是太太托他带给我的，谢谢我这段时间对他的照顾。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因为先生不用微信，更因为先生待人亲切，我时不时就跑先生研究室去传达消息或聊闲天。

先生离院前，我有幸跟先生做了个简单的采访，他说我们这儿非常友爱，像家一样。文研院正是有先生这样温暖的长者，才更像一个完整的家。文研院成立五周年时，先生从英国为我们送来了视频祝福，他举杯笑着祝我们生日快乐，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就很感动，感觉在他眼里，文研院和我们，都是孩子，他慈爱地看着我们成长。

我真的很怀念他慈爱的眼神，他开怀的笑。愿先生一路走好！

吴雅婷：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台湾清华大学通识中心

2019年秋天，文研院七期的讨论会席间，总有一位白发长者专注地听着论说，投入地与我们讨论。甚在生日那天给我们最棒的笑容和拥抱。

文研院的同期伙伴们来自各地，来自各领域，而周教授的研究难得地与我关注的中国近世社会有所交集。他给了我建议，提供了我尚未读过的研究，也促使我多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当时国家图书馆正有大展，他兴致高昂地约我去看展。以中国书籍史研究的周先生在珍本古籍面前的专注神情，让我见到仿若历史消去时空隔阂的那一瞬灵光。

这几年的世界虽然种种身不由己，我总抱着再会之时可期的信念与心情。如今周先生离世之讯传来，我一方面格外怀念起当年北京的院落、形影、笑语；却也因为这天人永隔，对人的移动性有了另一层的体会，而这似乎是周先生对我再一次的身教。

姜南：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未及重聚乐，便尝别离苦。八月惊闻周绍明老师癌症晚期的噩耗，短短两月，先生就走了，真的难过至极。作为文研七期的晚辈加外行，虽对周老师的学术一窍不通，但先生慈祥的面容、睿智的目光、毫无杂质的爽朗笑声，活脱脱一位圣诞老爷爷的形象，深深烙印心间，时时浮现眼前。生日会上闻着山楂熟透的馨香，一齐享用先生的糖果和蛋糕，其乐融融；同爬水关长城，老先生步履矫健，时不时拿出拍立得为大家拍下可爱的袖珍合影；特别是报告会中，先生总是情不自禁从前台走近坐在最后的肖铁小朋友，深情凝望，忘我讲演，搞得我们有如陪太子读书之感，忍俊不禁，欢乐无比。有周老师在内的文研七期，更有一种气质高贵、和睦团结的大家风范。天国无热恼，愿先生一路走好。

叶晔：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

因对书籍史有着共同的兴趣，在文研院期间，于周绍明先生多有请益。先生风趣的言止，睿智的思考，让人感佩不已。印象尤深的，是同期访问学者一起游览水关长城，老先生坚持一个人爬完了全程，不要任何人的帮扶。望着他在高处的身影，长者的韧性深深印在心中。“分别已三载，寂淹无分音”，又是一个静园的秋天，忽闻先生离世的消息，不禁恻然。“留世苦不幸，惕惕恒怀悲。”想念先生！遥悼先生！

黄盈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今天得知周绍明老师走了，很难过。在19年的驻访文档里回翻照片，看着合影时笑得如此开心，更是泪目。周老师博学却丝毫没有架子。文研院周四下午的交流会，我有幸跟周老师在一个组。记得开始之前的一个下午，周老师来敲我的办公室门，非常谦逊地跟一个晚辈交流他会讲的内容，探讨中国的妇女议题。不久，还专门从英国给我带回来一沓民国妓女的影印资料。音容笑貌宛如昨日。很是想念，一路走好。

李伯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990年在东京与周绍明兄相识，遂成道义至交。三十余年中，在剑桥，在波士顿，在香港，在北京，我们多次相聚，得促膝长谈，说古论今。其情其景，一幕幕犹在眼前，恍如昨日。如今他溘然长逝，令我五内茫然。想写点东西为亡友送行，但临文涕零，不知所云。他生前精心撰写的学术专著，是他留给我们、留给国际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一代学人周绍明，也将在这些著作中得到永生。

景跃进：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周先生在文研院做学术报告的模样，印象特别深刻。那天（2019年11月5日）恰逢先生74岁生日，文研院的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一个简短朴素的祝贺仪式，为那次讲座增添了不少学人的气息。如今，“徽州的祠堂”还在，将“徽州的祠堂”故事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那位老者走了。相当意外，亦不胜感慨。愿周先生的笑声在天堂一样响亮。

李开元：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

在这大千世界，我与周绍明先生是同代人。在文研院，我与周绍明先生是邻屋。先生的夫人是名古屋人，我刚迁居名古屋，自然多了些冬冷夏热的异国乡里话题。隔离三年，先生远去不再回来，尚在藩篱中的吾辈，遥祭怀念。



田 雷：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我有幸认识周绍明先生，起因于2019年秋季学期在文研院的驻访，在那个疫情发生前的最后一个完整学期，我们同属文研院七期。专业领域的关系，我和周先生交流不算多，不过我微信表情包里一直保留着一张周先生开怀大笑的表情，那张照片也许是我拍下的，也可能来自于其他同期。应该是在我们按惯例周三下午的研讨会上，周先生坐在拍摄者的对面，面前摊开着他的著作《书籍的社会史》，渠敬东老师站在左侧，右侧目测是李开元先生，席间应当是谁讲了一个笑话，宾主双方笑得开心灿烂。斯人已去，音容长存，周先生一路走好！

周月峰：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9年秋，有幸与周绍明老师结识于燕园二院。在每周的讨论会中，满头白发的周老师时时做探出脖子状，充满好奇心地专注于他人发言，生怕错过细节；而一旦捕捉到有趣的信息，又会立刻爽朗大笑。可能因为语言关系，周老师在讨论会中发言都较简短，但在我报告后的第二天，他特意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提示我有几种日本的研究值得注意——这样的纸条我想会有不少小伙伴曾收到。而周老师自己在报告徽州祠堂的“金融”属性时，似乎就身处徽州那个世界，沉醉其中。在那些瞬间，我常常在想周老师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与世俗远离，他在乎、专注，又赤忱，那便是“赤子之心”吧，让人神往。怀念周绍明老师，怀念三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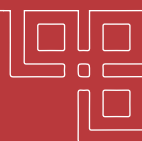
叶 晔：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

2019年下半年在北大文研院认识了周绍明先生。访问结束，先生归国，互道珍重。紧接着，疫情爆发。近三年来，经历了太多的无常、离别、无可奈何……又是秋去冬来，竟惊闻先生噩耗，心情跌落谷底。记忆中的周先生，风趣幽默、博学睿智，兼具东西方的绅士风度。静园二院众声喧哗中仍能分明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那个让人无限向往的昨日的世界。

周绍明先生千古！



文研学术



文研讲座

262

John Dixon Hunt | 不列颠想象中的意大利园林



【编者按】近 2022 年 10 月 14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 262 期在线举行，主题为“不列颠想象中的意大利园林”。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荣休教授 John Dixon Hunt 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张剑葳主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晨，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溪，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与谈。

讲座伊始，亨特教授首先展示了四张图，前两张为保罗·布里尔（Paul Brill）于 1598 年所绘制，其中的建筑让人想起罗马的美第奇别墅，以及园林建筑与农业活动的交织；第三幅为贝蒂兰利（Batty Langley）《园艺新原理》（*New Principles of Gardening*）的卷

首图，效仿了 17 世纪晚期罗马多利亚·帕姆菲利别墅（Villa Doria Pamphili）的雕刻，仅仅将巴洛克式喷泉换成了“英式”废墟。以上两个例子皆反映了英国艺术家和园林设计师对意大利建筑的借鉴和模仿。亨特教授由此引入讲座的核心议题：英国为何要向意大利寻求园林的灵感？他们

是如何做到的？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园林的独特性在于集中了诸如看、听、闻、触摸乃至品尝等多种知觉体验：园林是人工的，也是自然的；是时间、空间等多角度的集合；是“外部的”，但在形式和使用上也是“内部”的延伸；既是冥想的场所，也是各种社交聚会的场



Figure 26 Paul Brill, The month of May, walking on the terrace, drawing of 1598.



Figure 97 Florissiana in Batty Langley, *New Principles of Gardening* (1728). Compare it with Figure 96.



Figure 98 View in the garden of the Villa Doria Pamphili, engraving from D. Borelli, *Villa*

左上、下：保罗·布里尔的绘画
右上：贝蒂兰利《园艺新原理》卷首图
右下：罗马多利亚·帕姆菲利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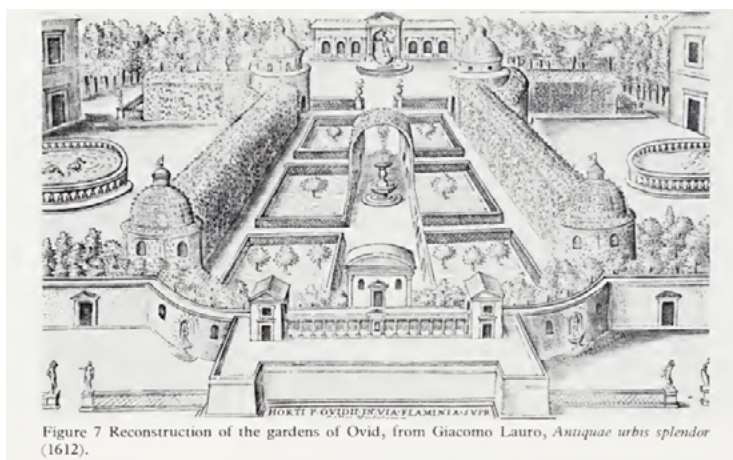
域；是伊甸园式的天堂，也是世俗意义上的享乐之所。而由于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意大利园林中所具有的宫殿遗址和别墅也被视为古典的象征，无论是其中的奇特景观还是造园艺术，皆为英国人带来新奇的体验，并由此成为他们模仿和学习的对象。而从英国人对意大利园林的探索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们作为旅行者的惊喜和兴奋，还能看出他们深层次思想和态度结构。

英国人对意大利园林的模仿和灵感汲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是实地访问。英国人对意大利的探索是随着欧陆旅行（The Grand Tour）展开的，许多旅行者试图通过访问这个以其悠久历史文化以及古典罗马遗址而闻名的国家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古典修养。从身份上看，他们以贵族或绅士为主，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有尤为浓厚的兴趣。如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参访意大利城市热那亚的园林后写下的著作《至乐之境不列颠》（*Elysium Britannicum, or the Royal Gardens*），回顾了古典园林和罗马的园林，并展示了其意大利旅行中所抵达园林的不同特点。

英国人向意大利寻求园林灵感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文学、历史及旅行著作以及版画等获得对于意大利园林的知识。意大利是古典主义的发源地。无论是否具备有关历史的专业知识，旅行者几乎无法忽视古罗马在意大利园林中留下的印记。对于大多数旅行者来说，通过接触意大利园林中的古典历史的遗迹或纪念碑，再结合拉丁文读物或旅行指南，最终会在他们的想象中让历史和现实完成联结。在所有的拉丁文本中，内容最广

泛，因此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是小普林尼（The younger Pliny）在公元100年到105年书写的两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在托斯卡纳（Tuscany）和奥斯蒂亚（Ostia）附近的劳伦特姆（Laurentum）的别墅，并讲述了别墅建筑和园林的相互关系；他强调了宜人的散步、凉亭或柱廊在设计中的地位，并强调了进入周围乡村景观的重要性。在劳伦的别墅里，海景、山川和乡村风景尽收眼底。在托斯卡纳，场地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这只能是大自然的杰作”，包括山脉、森林、田野、葡萄园、草地。小普林尼还提到了梯田，坚持园林的设计和功能的多样性，并关注艺术和自然对园林各自贡献的永恒主题。有一些元素，如我们现在认为与园林有关的寺庙和石窟，普林尼在这两封信中没有提到；但除此之外，他的描述在后世读者的脑海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罗马别墅园林的概念。

这种认知方式的影响在于，许多旅行者只是根据他们所读到的东西来看待古典遗迹。而在没有系统进行考古挖掘的情况下，英国文艺复兴者们有时会根据各种各样、甚至与园林无必然联系的建筑遗迹和当代花园建筑样貌来构设他们想象中的意大利园林。他们从阅读中了解古典园林，并期待和怀疑在自己旅行中所及之处正是历史和文学著作中所载记的古迹。比如蓬佩奥·萨内利（Pompeo Sarnelli）的《森林指南》（*Guida de Forestieri*），提醒游客注意那些所谓的古典花园和别墅。大量的罗马旅游指南都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古典花园的位置上，有时引用文学资料，有时索引古典花园，有时在雕刻中重新寻觅那些曾经存在的景观。



奥维德花园的重建，来自 Giacomo Lauro, *Antiquae urbis splendor*

旅游指南中还充满了对其他著名罗马花园的想象，比如奥维德（Ovid）和萨罗斯特（Sallust）的花园——后者在 1627 年和 1750 年的书中重建的内容基本相同。因此，不同年代的游客在购买旅游指南时，出版商只是在其中重复了早期的删节，从而导致游客们想象的古典花园更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而不是真正得到考古挖掘印证的。这也造成了一种情况：古代花园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当代的文艺复兴倡导者的实践来进行可视化的。

英国旅行者在“壮游”中见证了意大利园林和乡村景观的奇妙结合，而这对英国的园林设计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亲见或耳闻意大利园林风物后，英国人还试图在自己的庄园别墅中复刻意大利园林。如园林艺术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回到英国后设计的沃顿庄园，可以见出其意大利旅行的回忆。从其所处的位置四望，既能看到带有中央盆地的花坛，又能看到远处广阔的田野

全景。这与他在意大利时的生活经历重合：梯田山坡、拱门斜坡、神庙和洞穴，这些都是能引起共鸣的意大利元素；而与此同时，园林一侧的房子周围的护城河被移除，代之以梯田山坡，则体现出了英式庄园向意大利式别墅的有效转换。即使未能真正去往意大利旅行，通过研究游记、雕刻和速写以及与那些有幸出国旅行的人

交谈也能够使人们获得意大利园林风格的认知，并付诸园林设计和营造的实践。因此普林尼所描写的有关意大利园林的元素，得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设计中反复出现；又如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他于 1669 年绘制的花园草图和规划保存至今。手稿的扉页突出了 VILLA 这个词，周围引用了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贺拉斯对乡村的赞美。

在奥布里绘制的草图中，露台墙内外的楼梯、喷泉和第三个露台左边的一个洞穴相连有三个梯田；另一页提供的场地的横截面则展示了一条小溪、一个喷泉和“飞天墨丘利”（Volant Mercury）的位置。“飞天墨丘利”是一尊带翅膀的信使雕像，主导着这些经典的意大利式空间。手稿的其他几页是关于石窟的规划和邻近乡村的前景。奥布里勾勒了一些为洞穴绘制的人物和机械图，试图用具体的元素来实现他关于一座兼具古典和现代意大利风格的别墅的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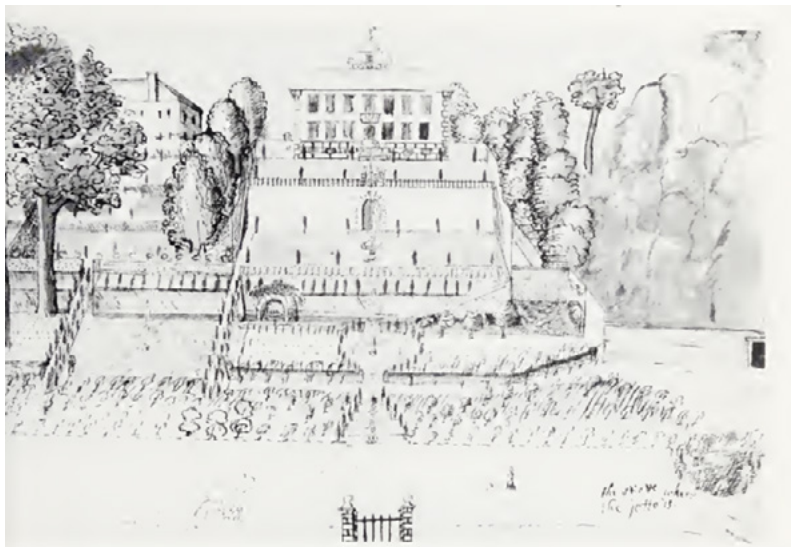
曾在意大利旅居近十年的园林设计师威

廉·肯特 (William Kent) 则偏爱在树林中设置雕像、寺庙或石窟, 注重将意大利元素纳入其设计之中, 并通过这种方式将被意大利文艺复兴调和后的古典园艺传统移植到英国的土地上。在他的设计中, 河流、古典建筑、雕塑和铭文都是意大利建筑元素的缩影, 如山坡上的神庙使人联想到蒂沃利的西比尔神庙 (Sybil's Temple at Tivoli)。

此外, 英国园林设计者们还有意复原和接近历史中的废墟景象。如波西利波 (Posilippo) 最主要的古典遗迹是所谓的“维吉尔 (Virgil) 之墓”, 以及被认为是这位诗人的“艺术魔法 (art magick)” 在山丘中凿出的隧道。约翰·伊夫林在设计阿尔伯里 (Albury) 的景观时, 将这两种风格并行不悖地纳入其中。旅行者会以某种方式将坟墓和隧道视作园林或景观的元素——这一点从约翰·雷蒙德 (John Raymond) “维吉尔墓矗立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 的描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见。坟墓 (“建在圆形大厅里”) 是景观的一部分。为了到达坟墓, 他要经过一个园林——因此, 古典废墟明确地与现代园林的设置相联系。而实际上, 许多园林的建造都在废墟附近, 它们的拱顶提供了一种长廊或洞穴的效果——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花园的特色之一, 从而使古典遗

迹与现代园林的创造性相混合。

评议阶段, 唐克扬老师指出, 此次讲座最重要的不在于讲意大利园林或是英国园林, 而是作为文化上后来者的英国人对于意大利园林的想象。所谓的“想象” 实则包含了从文本到空间的转换, 比如, 普林尼等作家所写的园林文学与考古发现的园林无法完全对应。这实际上展现了从图像到经验的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误差, 中间其实就是想象。此外, 图像与空间知识的传播之关系也值得注意。亲临时地的游历与基于素描和图纸的想象, 其中产生的误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一方面, 英国人基于此时此地进行了具体的构思, 同时又将过去的古典遗产的文本层面的内容转换成空间层面的实存, 其中包含着非常复杂的过程。然而, 或许这种“误差” 恰恰是形成园林之魅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园林的价值在于它是变化的, 其意义不来自于就着图纸照搬



约翰·奥布里 (John Aubrey) 所绘制的 Easton-Piercy 中的住宅和园林, 1669

照抄，而是在不断造园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古典与传统的延续即后人对前人的承传与改造，所谓“承前启后”，也意味着改变与创新。

李溪老师反思了在看待园林问题的过程中，概念与具体的辩证关系。英国人解读和接受意大利园林，恰恰是“自然”地从概念中走出，进入到意大利的空气中的微光、河流的蜿蜒乃至远方的广阔视野当中。而正是这些与我们的感知息息相关的东西，才能够进入到人们的记忆当中，后来又在英国的风景园林实践中得以呈现。其实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园林也会有启发：中国人并非是从一个“自然”或“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去营建园林的。此外，关于“废墟”的问题，意大利人对废墟的保留，不只是一个复原性的想象，同时可能也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废墟本身也是自然存在的证明，它证明了自然对于人类历史中曾经非常辉煌的存在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中国传统的“造—化”观念。由此来看，中西文化之间有时并不存在绝对的裂隙，如果仅就概念而比对，反而会产生隔膜；但回到历史的细节和具体的对人的经验的表述当中，可能反而会发现可以相互了解的东西。

刘晨老师结合其在欧洲的游历经验，指出亨特教授以《园林与洞窟：英国想象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Garden and Grove: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Garden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50*）为代表的著述，整体特点是非常关注风景园林的内容——不仅关注外在的形式，且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园林这种特殊的艺术的内在生命和灵魂。刘晨老师指出，如果将园林看作是一种艺术形

式，那么这种艺术其实有它自己的图像质和图像史的，因而内容极为丰富而多元。由于英国人对意大利园林的接受和感知是在欧陆壮游时发生的，因此旅行史也同样值得关注——这也是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国人对风景园林的重建，实则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重建古代世界的渴望：他们对古代的园林具有乌托邦式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往往是通过古罗马著作的手抄本而得到的；他们试图重新创造罗马学者描述的园林……所有这些最终都指向古典文学一个最核心理念——乐园。但是，这样的乐园显然在现实里是找不到的，所以园林乐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失乐园”。

在当时的英国人眼中，意大利园林其实是最接近“乐园”的处所，符合他们对古典园林的种种想象。意大利园林里有剧场等丰富元素，而剧场实际上是连接着自然与艺术、情感与记忆的场所；此外还如洞穴，再加上错落的地形和水景，模糊了自然和艺术的界限。这些元素经过种种组合，使意大利的园林创造出了一个微缩的世界。英国人彼时游历意大利园林，很可能是游园惊梦般的体验，会联想到神话和古典叙事。然而，园林不仅有古典叙事和情感内涵，更包含着很多功能，比如它有可以耕种的农场，有摆放古代绘画和书籍的房屋……人们可以在此过一种耕读似的生活。园林是愉悦感官且净化心灵的，创造了一种令时人心驰神往的生活方式，并为自在优雅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舞台。

同时，刘晨老师还阐释了亨特教授著作中有关园林概念移植到英国语境下所发生的

变化——园林已经不再是一个修养身心接近自然的场所，而具备了愈发复杂的内涵和功能。那么，它本身就成了一个剧场，成了英伦贵族精英们展示自己权利、思想和文化的一个舞台。亨特教授的观点引人深思，且部分观点带有强烈的政治哲学色彩。他认为，18世纪的英式园林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辉格党的政治符号——辉格党认为实现社会进步的方式，就是重新找回古代的秩序，具体来说就是古罗马共和这样一种秩序。最有意思的是，亨特教授在其著作末尾告诉我们，英式园林其实是发生这些罗马故事的真正场所。现代游园人只能看到这些背景，却看不到藏在背景底下的种种映射：园林历史的映射，

古典文学的映射，还有政治哲学的园林映射。

张剑葳老师最后作结。他指出，观者需要有深厚的积累，才能理解园林所凝聚的文化内容以及相关的异域想象和历史想象。同时，园林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会变化、会生长，是一个很复杂的对象。因而，我们需要不断寻找合适的视角、模式与方法，以更引人深思的方式，传递、呈现、实践出园林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

（撰稿：隋雪纯）



263

李孝聪 | 寻觅古城址——田野考察的方法与实践



【编者按】2022年10月19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6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寻觅古城址：田野考察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主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靖国评议。本次讲座为“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第三场。



然环境的变化必然造成古代城址的盛衰。因此，古城址的寻觅可以与古代道路互为前提，即从古道的走向，追寻沿途的城址；或从古城址的分布探求古代道路。具体而言，可以将寻觅古城址的工作方法分为以下四步：第一，梳理典籍、古地图、文物地图集、考古调查和前人研究成果，根据既有成果，判断古城方位；第二，利用天地图、奥维或谷歌地球卫星影像寻找古城址、定位和辨认形制；第三，进行田野实地考察，确定古城址的位置；第四，分析古城址的选址条件及周围地理环境，阐释古城址的功能及其兴衰。

李孝聪老师对古代城址的调查，缘起于对谭其骧先生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问题的发现。1987年，李孝聪老师随陈传康教授在白银地区考察，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代的新泉军、神威军、绥和守捉，第六册辽宋金元时期的会川城、新泉寨、怀和寨等城址脱标或位置

讲座伊始，李孝聪老师介绍了寻找、定位古城址的基本方法。古城址往往沿着古代道路而分布，古道的通塞或迁改，政治与自

有误。《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将新泉寨、会川城址位置标在祖厉河西岸的黄土塬上。

《甘肃省考古调查资料》认为新泉寨就是“黑城子”古城，在靖远县大芦乡。经实地调查，李老师说认为此一城址为宋之新泉寨，但其面积较小，似不是唐代新泉军。重新定位的会川城则在会宁县郭城驿镇新堡子村西北 1.2 公里的郭蛤蟆城。由于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主要采用的材料是《大清一统志》和十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形图，《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一些城址的定位上会出现疏漏。由此出发，李老师说进行田野考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古城址的准确位置，补《中国历史地图集》之空阙，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时的某些错误认识。

一、寻觅古代道路

古道与古城紧密相关。古地图上聚落密集成线状，反映了古道路的分布。古道与今天的公路选线有别，昔日村落暗示古道所经，可能与后世公路有一定的距离。官道驿路与乡间小路有别，官道沿途带有铺、驿、堡、亭、塘、店名称后缀的村落和烽燧。

李孝聪老师分享了他寻找古代道路的几则实例。2003 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老师、李新峰老师与李孝聪老师一同寻找河北省涿源和蔚县之间的飞狐道。沿着今人修建的公路到达的地点并非原飞狐道隘口。于是，李老师说顺着河滩地的碎石路，找到了大型村庄。经当地人指点，飞狐道关口应在山顶。在山顶的实际考察中，发现了建在关口的黑石岭堡遗址（见下图左下，右下），黑

石岭堡下可见石板路（见下图左上），此条即为飞狐道，在道路之旁还发现有明代碑刻。

“润盐古道”的发现则是通过对摩崖石刻等遗迹的考察。润盐古道是明代四川自盐井卫（今盐源县）至四川行都司建昌卫（今西昌市）运盐的道路，修筑于山腰，而今人所修公路选在溪谷下。考察时队员们攀上山崖，发现古道遗迹和万历年间的摩崖石刻“润盐古道”，才确定了古道的位置。山西泽州冶底古道也与现代公路相离甚远，如今已经很少人行。李老师说带领考察队老师从天井关进入古道，经犁川—冶底—周村—阳城—沁水一线进行调查。考察发现，古道皆用石板铺路，沿途各村镇均建有东岳庙，供奉东岳天齐仁圣大帝，此道为晋商去中原之路。

2019 年的丝绸之路东段北线考察则主要涵盖了陇东地区和宁南地区，其中重要古道有石道坡古道。据考古工作者考证，“石道坡古道”属于西汉至北魏时期使用的古道，向东经今肖金镇三不同村入宁县境，又经焦村、坳马、杜家岷岷等村，下至马莲河谷，过河入宁县城，向西下至蒲河川，过河则沿着茹河上溯，经彭阳古城西去固原。当考察队站在石道坡古道定位时，判定古道东南应是维系马莲河、泾河下游至西汉长安城的交通，西北连接西汉安定郡彭阳、高平的交通，属于“丝绸之路”东段北侧的另一条古代长安去西域的交通线。

古城址与石窟寺是考订此路为“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证据之一。在石道坡古道两侧的彭阳城、东山寨、平安寨附近均发现有石窟寺遗存，大小各异。沿路亦有众多古城址，现将古城址及其基本信息介绍如下：平

安寨，今彭阳县城东 24 里，城址有南北两座，相距 40 米，先筑临河城，后筑连山城。彭阳城，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置，位于今彭阳县城南，半城据于山上，半城临川，城址内散布大量砖瓦及宋代瓷片，曾出土大灰陶瓮、唐开元钱币和“彭阳口口中新修石路记”碑等；东山寨，咸平二年（公元 999 年）置。今彭阳县古城镇内，在城址内曾出土陶制下水管道、云纹半瓦当和铜鼎。

二、西北、青藏古城的调查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李孝聪老师指出，调查城址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需注意考古工作的成果。早期城址调研必须仰仗考古文物部门的发掘报告，汉代城址除了西北干旱地区外，城垣现状保存不完整亦不够清晰，但是集中的汉墓群往往能够提示附近存在郡县一级城址，比如山西左云县的汉代雁门郡武州县城、河北怀安县的头百户镇旧怀安村均有大规模的汉代墓葬群。其次，利用无人机辅助城址调查。2018 年，李孝聪老师、刘未老师等一同前往汉代三封古城进行调查，通过无人机航拍发现，汉三封城城垣的基本轮廓保存尚好，与侯仁之先生当年所见的“长、宽均约 118 米的方形内城”并无太大差异，李孝聪老师推测该城址东城墙凸出处原本可能是城门所在。古代城址的调查在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错误的同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人地关系、古代城市选址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018 年，李孝聪老师重新进入青藏高原考察，发现了唐代的神威军城。该城址位于

倒淌河乡蒙古村东南约 100 米，城址呈长方形，南北 150 米，东西 100 米，残高 2 米，城角各筑墩台，东西各开一门。该城主要是唐朝为防御吐蕃自大非川入犯而建。神威军城的定位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标注错误。而位于尕让乡查曲昂村尕让粮站西 150 米的怀和寨也是此次考察的发现之一，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第六册将此城址位置误标在溪流东岸，田野考察确定的古城址的实际位置，应是尕让溪流西侧台地，而非东岸。考察发现怀和寨城址适宜农业耕垦，能够起到扼守顺溪谷北逾拉脊山通湟水河谷之道的的作用。这次考察也发现了北宋的临松堡，该遗址位于今青海尖扎县格日吉哈垭口下方东南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虽然标记临松堡城，但是位置偏西北。据考察，临松堡不适宜农业耕垦，其修筑驻军设防主要是为了防备青唐羌番众下山，袭扰临黄河的道路。

紧接着，李孝聪老师按照上述模式，沿着考察路径又依次介绍了考察中发现的唐代米川旧县故城、宋代来同堡、河州踏白城以及明代起台堡的地理位置，以及古城功能、选址和其兴衰的历史。此外还介绍有一些未能探明的古城，如宁夏同心县西北的井家口子，甘肃马蹄寺石窟东北口的城址等。

三、中亚三国考察纪实

讲座的第三部分，李孝聪老师分享了他 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发现古代城址的考察经历。李孝聪老师首先介绍的是玄奘所走过的天山热海古道及古



临松寨，今青海尖扎县格日吉哈垭口下方东南坡

道沿途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古城。从历史的角度上看，热海古道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汉初，河西走廊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武帝击败匈奴，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公元前 60 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确保西域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敦煌因胡商的聚集而逐渐成为丝路咽喉重地。由于经陇西郡、河西走廊的道路常被北方游牧部族阻隔，南朝人多选择经由四川西北、陇南、青海地区的道路。这条偏南方的线路又称为“河南道”、“羌中道”或“吐谷浑道”。此外，唐朝在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高昌）、庭州（今吉木萨尔）设立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怛刺斯战后以焉耆代碎叶），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今库车）管辖；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摩州府，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

从地理空间上讲，热海古道可以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的通道是唐代的庭州道：从伊吾（今哈密）到庭州（今吉木萨尔）、

轮台（今乌鲁木齐南乌拉泊故城）、伊犁河谷，进入热海北岸，最后到达塔拉斯；而天山南路的通道则由白杨沟出发，到吐鲁番、焉耆铁门关、库车、天山冰岭别迭里山口，通过热海南岸，最终到达碎叶。

碎卜戍城、冻城手捉及贺猎城的发现，使李孝聪老师确认玄奘经过的天山热海道为热海的南线。《新唐书》载，唐代官道凌山道翻越天山，经过唐代军城碎卜戍城、冻城手捉。在考察中发现，碎卜戍城位于从伊塞克湖南经 Barskoon 入山，沿碎卜水上溯 10 公里，其四面城垣每边长 80 米，周回 320 米，不足一里，属于小型军城。城址使用年代从中世纪早期，直到公元 12 世纪。冻城（Tosor），位于伊塞克湖南岸靠近 Tosor 镇，遗址是方形城垣，每边长 100 米，周约 1 里，外筑马面，城址轴线偏西北—东南，东城垣开一门，筑瓮城。两座城址均有考古钻探痕迹。在此后的资料收集中，又发现了贺猎城，其位于伊塞克湖南岸两条河交汇处东侧河谷，图拉苏村向西的山嘴，北倚山梁，东临水库，当地称 Temir-Kanat，现存南城垣。

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素叶川（楚河）南岸有三座重要城址：碎叶、裴罗将军城、新城。碎叶城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Tokmak）西南 8 公里的楚河谷地南岸。1953 年至 1954 年，苏联考古学家曾对该城进行过系统调查和发掘。考古研究显示，遗址中发现有一处供奉弥勒佛（the Maitreya）的佛教寺庙建筑群。考古学家推测，该遗址应为大云寺遗迹，为唐代武则天天下令建造。在阿克—贝希姆东南 5 公里处，发现有裴罗将军城。新城则位于托克马克西 25 公里纳维

卡特（今卡拉斯拉亚雷奇卡 Krasnaya Rechka 红河村）东北。该城发现有琐罗亚斯德教火祭坛和墓地，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奉献石和两座佛教寺庙。从考古发掘所得的宗教和民用建筑材料中可以看出，突厥、印度、粟特和中国文化在此地交相融合。

中亚一些城址又是如何被废弃的呢？李孝聪老师以阿姆河下游花刺子模城市群的废弃为例进行了阐释。公元 1030 到 1220 年间，塞尔柱突厥与花刺子模曾经是中亚、西亚最强盛的政权，后被成吉思汗所灭。17—19 世纪，此地形成了中亚三大汗国，1920 年以后被苏联红军统帅伏龙芝平灭。这些城址的城墙多数采用夯筑结合、土坯垒砌，主要是因阿姆河下游丰水期河道的摆动迁改，导致城址脱离水源而被废弃。

其次，李孝聪老师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所发现的粟特人聚居古城。沿着前进的路线，李孝聪老师依次介绍了布哈拉、撒马尔罕

及泽拉夫善河沿途各城址。布哈拉为中文文献中的安国的都城。8 世纪的城址近方形，每边中央开一门，西墙另开三门，城内两条大街直交，城内西部有一城堡，内建宫殿、寺庙，到 10 世纪城址的规模扩大，外围再修一圈城墙，内设市场，城外筑堡寨、园囿。撒马尔罕，即中文文献中的康国，据考察，城址位于今撒马尔罕东北部。

最后，李孝聪老师简要地介绍了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古代城址。从铁尔梅兹到塔吉克斯坦边境，有一座砖砌拱桥，据当地人说，此桥为亚历山大东征遗迹，李孝聪老师认为此说不确，桥为小砖所砌，建筑年代为三百年前。片治肯特城址是塔吉克斯坦境内重要的粟特人城址之一，遗存的房屋中多有精美的壁画，在此城址所发现的文书中有汉文文书，证明了唐代与中亚地区的商业及文化交流。

评议环节



碎卜戍城遗址

唐晓峰老师首先总结了讲座的主要内容。丝绸之路沿途的众多古代城址是历史变化和发展的的重要见证。唐老师特别提到,李孝聪老师早年在西藏地质队工作积累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现在田野考察时的观察视角和工作方法。总的来说,李孝聪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田野工作方法有三点。第一,做好田野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在进行田野工作之前,调查者需要对所要调查的地点进行细致的文献考察。在文献阅读时,尤其要注意点面结合,不仅要考察具体地点的详细信息,更要对整个区域形成系统的理解。第二,注重现场考察工作。现场的田野考察是历史地理学者要读懂的另一部书,它比纸上文字更加细致,更加生动。要读懂这部书,就要具备地理学的思维,形成有现场感的、有关联性的思考,特别要注意道路与城市、河流与城市、墓葬与城市的关系。第三,要注重地图和现场的关系。应该掌握将平面的地图与立现场对应的方法,真正做到读懂地图的同时也能读懂现场。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评价其学生斯文·赫定时说:“他不是地理学家,而是探险家。”李希霍芬认为斯文·赫定并不具备地理学研究所需的知识储备和科学方法,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对未知地域的探索和记录。真正的科学调查,应当像李孝聪老师一样,做到以上三点。通过这样严谨的调查工作,我们能够填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空白,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错误,理解古代城址的价值和意义。

张萍老师则首先回顾了2007年与李孝聪老师一同考察时的经历。最令张老师印象

深刻的是,李老师将大量相关书籍放在考察车上,在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随时翻检文献。除此之外,张老师回顾了自己在中亚、天山地区的调查经历,指出了田野调查需要注意的三点问题。第一,判断城址所在地及其时代是调查古城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需要大量田野经验基础上的直觉与缜密的考察工作相结合,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调查结果。第二,应当适当利用卫星地图,将其作为辅助调查的工具。第三,在缺少文献资料的地区,应当注重开展考古工作,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工作的合作。

孙靖国老师首先强调了田野考察工作的重要性,其次对田野工作中的几项注意事项作了总结。第一,修改《中国历史地图集》应当谨慎。古代城址周围没有明显的参照物,因而一般很难证明前人的错误,历史地理的调查需综合历史文献、考古、地理学等多方知识与资料。第二,注意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要时刻注意考察地点的周边环境。第三,文献与田野是历史地理学必不可少的因素,卫星照片等技术手段不可代替现场的田野考察。应通过考察城市、城市位置、城市与周边道路的关系,来进一步理解人地关系、历史进程。最后,孙老师表示,野外考察的成果也需要推广总结,建议期刊开辟专栏,刊登考察报告、踏查记等。

刘未老师指出,田野调查同样是考古工作不可或缺的步骤之一。相对而言,考古调查的尺度较小,对遗址和遗物的调查研究更为细致。“上车睡觉,下车考察”,诸如此类的专门调查,实际上忽略了周围的环境因素,是一种碎片化的考察。同时,高铁高速

的发展，为我们到达目的地提供便捷途径的同时，也让我们远离了“历史道路”，破坏了整体的历史感。我们应从李老师的工作中得到启发，重新发掘道路在历史地理中的重要作用，时刻将城市与其周围环境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考察遗物和遗迹。

（撰稿：史瑀昕）



264

朱苏力 | 齐家——农耕文明的基础制度和制度基础

【编者按】2022年10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64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齐家——农耕文明的基础制度和制度基础”。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主讲，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主持。本次讲座为“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第二场。

朱苏力老师首先从文明的定义讲起。何为文明？朱老师认为，文明是在特定地理区域（空间）内，因自然地理条件与居住群体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智力、体力等因素耦合而发生的，长期或曾长期延续的，得以证明其合理性的人类生存系统。在这里，文明并非一个高大上的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意味道德意义上“最好”。因地理环境、生活人群都嵌入在特定时空之中，文明是很难移植的，只有在某些条件相似的地方才能发生。例如，中国的农耕文明，大致是从中原地带逐渐移植到南方各地，并结合山地、水网等自然环境不断衍生。同时，文明也会有突变，有下意识的“用进废退”式的自我调整，甚至是重大调整。在此意义上，朱老师展开对于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讨论。

朱苏力老师认为，家是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制度。人们通常认为，“家”是人类自然而然的产物，其实并非如此。朱老师认为，中国“家”制度的发生与世

界其他地方是不同的。例如，中国的“家”不能等同于西方语境中的 family。在西方，family 实际是“户”的概念，理论上指一对夫妻带着两个或三个孩子，形成所谓的“五口之家”。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户”并非如此，存在着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孩子，或是同性组成家庭的情况。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家”在血缘意义上是指家族，在地理意义上则是指村庄。“家”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基础的制度，同时也是国家制度的基础。



朱苏力老师在讲座现场

随后，朱苏力老师对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进行了分析。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人群高度密集的、精耕细作的，其主要作物有粟、黍、谷、小麦、大麦、水稻、豆子、麻等，这些作物最重要的特点是可以储存，以抵御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灾荒。相比而言，薯类植物所广泛分布的南美与非洲等地，其文明可以称为一种采摘文明。其实，中国最早的农业也始于采摘，但随着种植业的发展，渔猎采集的比重开始下降。同时，家畜养殖业趋于与精细作业的农业相配合，许多可能占用耕地的动物被逐渐淘汰，农业收获后的植物茎秆则用于饲养牲畜。最终，形成了种植农业为中心，其他副业服务种植农业的格局。与此同时，在东亚形成的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耕文明，可以视为某种长期形成的种植业与畜牧业的产业分工。

我国的农耕方式推动了村落的形成，塑造了人们的居住方式和家庭结构。在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垄作利于土地的休耕，行播节约了种子，加之粪肥的使用，使我国的粮食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达到了1:12。与之相比，欧洲的农业生产长期通过撒播，农具也比较差，其播种量/收获量之比到公元10世纪才提高到1:4。因此，在中国黄淮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出现了居住非常紧密的村落，人口高度聚集，其规模明显大于欧美。这些村落的规模大约在40户左右，村与村之间需要拉开足够的距离，让村落中的每个人拥有足够的土地。一方面，村落的规模不能太大，否则村民与耕地距离太远，村民间也不能相互认识。另一方面，村落对于人们亦不可或缺，人们需

要互相帮助，除了修路修桥、抗旱抗涝或抗击土匪、村落纠纷这类集体行动外，婚丧嫁娶、盖房子这类事情也需要乡亲邻里搭把手。

在此意义上，传统中国的“家”，实际上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在一起生活，需要有一套制度从内部约束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家”并不是一个道德化的概念。恰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到近代的曾国藩，都把“齐家”看作是生活最基本的事，是从血缘群体中自发产生的。

基于此，朱苏力老师提出，在村落中有三种关系最为重要。简单概括之：第一种为父子关系，是多辈人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兄弟关系，是同辈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姐妹关系等；第三种是男女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似乎母亲、女儿的角色不在其中，其原因在于，这是一种用“具象”代替“抽象”的归纳方式——因为任何“抽象”的归纳都难以涵盖每种关系中众多复杂的因素，如父子关系就包括了血缘关系、养育关系、教育关系等诸多层面，并不能简单抽象为某种层级领导关系。

所谓“齐家”，即致力于规范调整农耕家庭和村落中父子、兄弟和男女这三个典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前两种关系——垂直系统的父子关系与横向系统的兄弟关系，把村庄组织了起来，规定了每个人在村落中的位置。而村庄的延续、村落组织结构的保持，则需要依靠男女关系。男女关系是村庄中最具创造性、再生性的关系，是难以用具体话语进行规定的，而从另一个层面看，凡是具有创造性的关系，都是具有破坏性的，是对

现有关系的打破。同时，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的维持多依赖血缘关系，男女关系则不然，近亲结婚不利于繁衍，会导致后代在智力和体能上的衰退，非血缘关系使男女之间更具有吸引力，从而利于形成更大的血缘群体。如果这三种关系能够处理好，家庭（亦即地缘意义上的村落），就可以安宁。因此，这三个关系是“齐家”最重要的问题。

接下来，朱苏力老师分别对如何处理这三个关系展开具体分析。特别地，朱老师指出，儒家所强调的“父慈子孝”“兄恭弟悌”“男女有别”，皆非能自发地产生。正因为此，儒家相应地提出这三种规范，并将其神圣化为某种天然的东西。

首先是父子关系，儒家提出“父慈子孝”作为最核心的制度原则。在朱苏力老师看来，儒家之所以强调“父慈子孝”，因为这其实是违背人的天性的。从生物学上来看，相比母亲，父亲是不大关心儿子的，因为男性有更多繁衍后代的生物资源。因而，“父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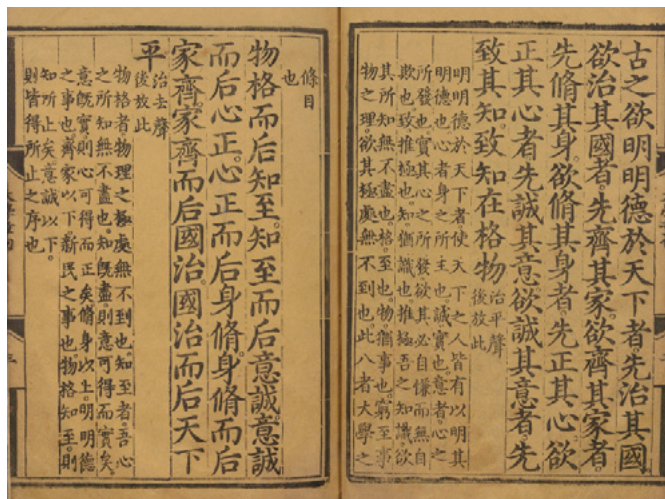
的意义在于，鼓励男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创造更多的生活资料，同时，要求父亲通过教育，向后代更有效传递生活经验和生产技能。并且，“父慈”在客观上分担了母亲抚育后代的责任，改善了女性的生活状态。

儒家鼓励“子孝”的原因同样在于，孝顺亦非子女的天性。在传统社会生活资料较为紧缺的条件下，子女往往更关心自己繁衍后代，而非孝顺父母。但子女仅仅关心后代而不养老，一旦父亲看到并理解了这种前景，会导致父亲更加不“慈”，并进一步增加母亲的负担。因此，“子孝”是传统农耕社会对儿子提出的要求。

进一步来说，“父慈子孝”可以看作是一种双向的合同关系，父亲先期履行，儿子后期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儿子不履行“子孝”的义务，就会令先期履行的父亲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却无法获得救济。因此，在历史上，“不孝”属于十恶重罪之一，是国家进行加重惩罚的对象。与此同时，母亲和女儿

的角色其实也隐藏在“父慈子孝”的论述背后。因为一般而言，母亲比父亲更关心后代，“子孝”的对象也不仅是父亲，而是对“父母”双亲；女儿则会在十多岁外嫁出去，需要承担赡养丈夫父母的义务。

其次是兄弟关系，儒家强调“兄恭弟悌”“长幼有序”。与我们一般所认识到的不同，其实在同辈之间很容易产生竞争关系，适当的竞争对群体的发展有利，但过分的竞争会对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明正统经厂本）
关于“齐家”的条目



朱苏力著《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书影

群体产生严重的危害。那么，如何保持群体内的适度竞争？朱苏力老师强调，兄弟关系中真正重要的是“长幼有序”，即按同辈男性的年龄序列来确定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位置，承担相应的责任，享有相应的权益。这源自于农村生活不可能形成平均分配，因教育资源、婚姻机会等，是不能分配的。也需要看到，“长幼有序”不仅涉及权利，也涉及义务，如在父亲早早去世的情况下，“长兄如父”，哥哥需要承担抚养弟、妹的责任而不得抱怨，因此这种规范具有很强的行动性。

最后是男女关系，在村落中，这是最复杂的关系。这里的男女关系不只是夫妻关系，因为固然所有夫妻关系都源自男女，但男女

关系却远不止夫妻，还有许多不是夫妻关系的男女关系，如恋人、婚外情、远房表兄妹关系等等。对此，儒家强调的是“男女有别”，其实践重点是防范男女间的乱伦风险。这里的乱伦，可大致分为两类：前者是生物性乱伦，即血缘上近亲男女间的性爱，这可能生育出不健康的后代，相应的规范是“同姓不婚”；后者是社会政治组织层面的“乱伦”，即社会出于秩序考量不允许的性爱，相应的规范是“授受不亲”。

对于“同姓不婚”，在中国传统农耕村落的聚居生活中，很早就出现了姓氏制度来“别婚姻”，这进一步促成了外婚制，即要求农耕村落所有成员都一律同较远的村落成员成婚。外婚制有若干优点：一是防止了男女间的乱伦风险；二是客观上促进了两个村落的联系，创造了更大的群体，“和两姓之好”；三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某些家庭内财产分配和继承的纷争，比如外嫁的女儿都只可分“财”而不可分“产”。值得注意的是，外婚制下的从夫居制，其实对于女性有着较大不利，女性需要孤身一人进入陌生村庄，要适应陌生村庄的一切，女性为此支付了更多代价。但就稳定农耕时代人们必需的村落社区制度而言，从夫居制确实比从妻居制、走婚制等婚姻制度，对整个群体都有更大制度收益。此外，朱苏力老师还专门讨论了“入赘”现象。当家庭没有儿子时，为了养老，允许女儿招女婿上门。入赘后，生育的后代会随母亲姓，不随父姓，这利于保持单姓村落既有组织架构和秩序。

对于“授受不亲”，其实亦非人的天性。就人类的生物倾向而言，是容易对异姓产生

感情的，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来进行约束。在传统农耕村落中，外婚制从夫居，年轻女性进入一个陌生村落，并在此生活一辈子，她们很可能自然地受到村落中某些男子魅力的吸引。在西方，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这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道德伦理或品格问题，但在农耕社会中会引发全体性的社会问题，把村落本来“井然有序”的格局打破。因此，儒家强调“授受不亲”等相应的禁忌来试图避免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村落或通过宣誓严惩等方式来进行预防，或潜在地鼓励违背禁忌者“私奔”来维护村落的原本秩序。

讲座的最后，朱苏力老师总结认为，“齐家”为历史上的中国提供了一系列制度：第一，“齐家”确保了社会底层的和平安定，村落内的矛盾可以解决，家族内虽然有贫富差异，但还是会相互照顾。因而，“皇权不下乡”成为我国古代长期延续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二，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父子关系延展为君臣关系 / 师生关系，兄弟关系转换为与朋友 / 同僚等同辈关系。进一步地，父子、兄弟关系制度成为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模型。第三，农村是国家赋税最主要的来源，“齐家”保障了国家财政，进而支持了官僚制度、军队等国家机器的运转。由此，“家”为“国”奠定了基础。因此，“齐家”是农耕社会的基础制度，进而也是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制度基础。

评议环节，章永乐老师指出，朱老师致力于阐发“齐家”的重要的文明意涵。在这里，“齐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修养词汇，而是一系列制度的组合。通过分析几组关系，朱老师实际上把这些关系背后的历代制度关联在了一起，我们由此得到了一个非常鲜活的“齐家”的制度形象。比如讲座里提到的作为一种类似于制度实践的“私奔”，令人印象深刻。

赵晓力老师表示，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父子关系最为重要，男女关系因其“圣人难言”，相对不太受重视。讲座中最有启发的是，朱老师把三对关系中的前两对作为村落中的某种组织性的原则，把男女关系作为某种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的关系。接下来，赵老师对他所研究的苏南、浙北地区城郊村庄中的两头婚现象进行了介绍。他认为，两头婚并不违背朱老师所阐述的三种关系，是两个家庭协商的结果，遵循着抽象的宗法制原则，影响着财产的跨代传递，且更加重视“门当户对”的要求。

最后，与会学者与现场观众就历史上游牧社会的家庭关系、“齐家”在当代语境下的学术延展性、俄狄浦斯王故事的解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赵凯欣）



265

周雪光 | 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田野研究——田野与理论的互动

【编者按】2022年11月12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65期在线举行，主题为“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田野研究——田野与理论的互动”。文研院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主持。本次讲座为“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第四场。



讲座伊始，周雪光老师首先回顾了他自己的田野研究经历。他表示，早在学术生涯的初期，他就对田野研究十分憧憬与向往。2004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任教期间，经赵树凯研究员介绍，他开始在

一个北方乡镇进行田野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持续到2015年前后。在此期间，他每年都会多次来到这个乡镇，每次停留几天或几个星期，乃至整个假期。在田野工作中，他对很多乡镇事务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如村村通修路工程、多轮的村庄选举、各类政策的执行行动以及基层干部对于民众问题的解决，等等。同时，他指导了很多学生的田野研究，如练宏对于市环保局日常工作的田野研究，艾云对于计划生育考核、农产品市场发育与成长的田野研究等。借此机会，他与学生就田野研究的问题不断沟通，并合作撰写学术论文。

此外，他也不断向其他学者的田野研究工作学习，如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又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等等。

一、田野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位置 角色

基于这些田野研究的经验与对其他田野研究作品的阅读，周雪光老师首先讨论了田野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定位问题，这是本次讲座讨论问题的前提。在周雪光老师看来，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着眼于规律性、机制性、普遍性的问题，其目标是知识的积累与发展。相对应的，其方法论在于讨论理论知识与经验研究间的相互作用问题。这项讨论限定于“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的范围内，与考古学研究、历史研究、政策研究、应用性研究等有所区别，形成了一个定义清楚、范围明晰的讨论问题。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很多经验研究方法，除田野研究外，还有量化研究、历史研究（历史角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文本研究、实验研究等等。在这些经验研究中，田野研究占据了非常独特的位置，其扮演的角色可以归纳为：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观察，澄清研究对象背后的相关联系和机制，提炼分析概念，提出此类现象的理论解释，为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和检验提供基础。是故，田野研究与理论建构密切相关。周雪光老师认为，田野研究与理论创造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田野研究有利于理论构造。在理论形成后，才能进行诸如量化研究之类的工作，通过系统的经验材料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以社会学为例，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很早就指出，人们处在意义的网络之中，社会学研究只有进入人们的意义之网，才能对社会行为或社会行动做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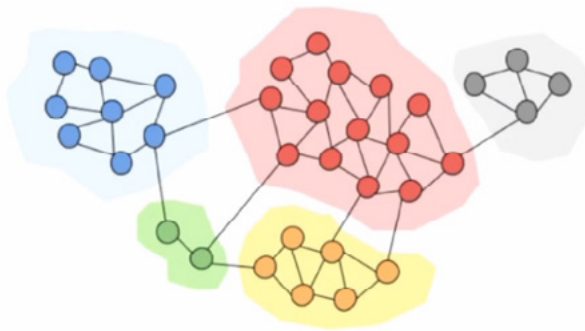
解释。田野研究的重要性即在于，我们可以借此理解当事人（行动者）如何认知其在意义之网中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好的分析概念与因果解释。

周雪光老师坦言，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田野研究的社会科学学术意义微乎其微。例如，许多田野研究是以村庄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在中国，有将近两百万个村庄，可以说是村村不同；即使是同一村庄，在不同时点也有很大变化，这样的研究价值何以体现呢？研究一个具体村庄的价值，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以及人们熟知的南街村、大邱庄、大寨村研究等，即在于从中抽象出典型的意义与普遍的道理。

二、田野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论含量

周雪光老师认为，一个田野研究的意义与其理论含量成正比。换句话说，没有理论含量的田野研究，在社会科学学术天平上的分量微乎其微。这里的理论含量，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提炼、应用或丰富好的分析概念；二是发掘研究对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三是提出独到的理论解释。对此，周雪光老师举例进行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概念是在长期日常观察和田野研究基础上的概括抽象，在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含义是，中国文化中的人际与社会关系，是在一个平面上的、以个人为中心、差异性地展开的。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与不同社会团体发生关系，随着社会距离的延长，如家庭、



亲疏各异、松紧不一的各种“社会圈子”

家族、朋友以及陌生人，其关系程度逐渐降低。

“差序格局”概念提出后，在社会学界得到了诸多讨论与应用，并进一步得到修正。如阎云翔批评这一概念及学界相关应用过于强调平面化的“亲亲”，他提示我们注意纵向的“上下尊卑”维度及由此产生的“差序人格”。在此基础上，吴飞与周飞舟通过对传统丧服制度及其背后社会关系的研究，认为“差序格局”着眼于“亲亲”，但忽略了纵向的“尊尊”关系。进而，他们提出立体的“差序格局”概念，包括横向血缘关系与纵向权威关系。此外，翟学伟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下讨论了儒学关于人际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如人情、面子等问题，可以看作是对“差序格局”概念的扩展。

周雪光老师也谈到了他近期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差序格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提炼，其核心正是强调以“自我”（ego）为中心的差异性对待，而非一种权威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概念是费先生在民国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提出

的。在相关的一系列讨论中，费先生特别强调了公域与私域、国与家之间的矛盾与紧张。由此看，费先生所使用的“差序格局”概念更强调“亲亲”而非“尊尊”。进言之，在“差序格局”下，从单一个体的角度出发，形成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亲疏有别的、固定“社会圈子”；而从整体上看，则呈现出亲疏各异、松紧不一的各种“社会圈子”。这恰能体现出，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存

在着内生的多样性机制，内聚力与排他性并存，并蕴含了“家国一体”的内在矛盾，与传统的“大一统”体制形成一种张力。以自我为中心的“亲亲”关系更符合费先生“差序格局”的原意，也更具有理论价值。

通过对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进行讨论，周雪光老师希望说明，一个好的分析概念是有生命力的，可以承载知识的积累和演变，可以不断发展、修订、争论、丰富乃至推翻。这种生命力，也体现在“差序格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比较框架（与“团体格局”）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研究原始部落社会中不同亲属居住区域下的互惠关系时，也发现了群体间类似水波纹的关系，反映出“差序格局”概念或在不同文化与社会中存在共性。其实，回顾老一代社会学家的研究，如梁漱溟、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等先生，都在研究中提出了类似于“差序格局”的思路，但相比而言，他们没有提出这样凝练有力的分析概念，因而难以得到更深化的讨论与发展。田野研究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提

炼和丰富好的分析概念。

第二个例子，是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指出，社会中的弱者，在面对来自强者的非正义行为时，常常通过其独特的方式来进行抵抗，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作为一个分析概念与理论思路，“弱者的武器”甫经提出，就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在不同领域、不同文化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中，产生了一批可资比较的研究成果。如在中国研究领域，折晓叶、郭于华等学者的研究，周雪光老师本人关于“无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研究，都对这一概念有所应用。在宋怡明（Michael Szonyi）《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一书中，也可以看到这一概念的深刻影响。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的概念，来自于他在马来西亚一个规模只有70户人家的村落的田野观察，这让我们反思，我们大规模进行田野研究的价值应该如何体现？

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解剖麻雀”方法，与理论含量之间存在关系密切。“麻雀”的典型意义，在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意即我们可以借由“解剖麻雀”，以小见大，以一见类，提炼概念与理论思路。具体研究的定位不同，但都可以与理论含量有关。不同的个案研究，可以通过不同角度，对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既可以提出新概念与新理论，也可以丰富、修订、改进已有的概念理论，还可以应用已有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个案。

三、关于增加理论含量的心得体会

那么，我们怎样在自己的田野研究工作中增加理论含量呢？周雪光老师从自身的研究经验出发，分享了关于增加理论含量的一些观察与心得体会。在田野中，学者经常会遇到如何进入田野的问题，意即：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如何进入局内人之中，获得对方信任，并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如前所述，马克斯·韦伯在讨论社会学中的“理解”

（interpretive）问题时认为，每个人都身处意义之网，通过意义的网络与他人发生关系。田野研究不是发现客观现象（objective）而是理解（intersubjective）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在田野过程中，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自然会与当地产生某种紧张关系。在周老师看来，这是一种良性的紧张，既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

格尔茨在其著名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中，讲述了他与妻子在巴厘岛的田野遭遇。在最初进入田野时，当地人对他们视而不见。后来，在一起警察查处大规模斗鸡活动（这在当地是非法的）的事件中，格尔茨夫妇与当地一起仓皇逃窜。因为这样的共同遭遇，巴厘人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格尔茨夫妇由此感觉他们进入了田野。周雪光老师也有类似的田野经历。在他最初进入田野时，人们都非常客气、谨慎，直到一次饭局中，当地乡镇的一位领导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已经观察你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你不是个骗子。”因为这个乡镇过去受到过很多“空头支票”的欺骗，而周老师来当地后并未许下任何承诺。自此以

后，周老师感觉自己成为了社区的一个分子。周老师表示，创造这种机会，对于进入田野、获得当地人的信任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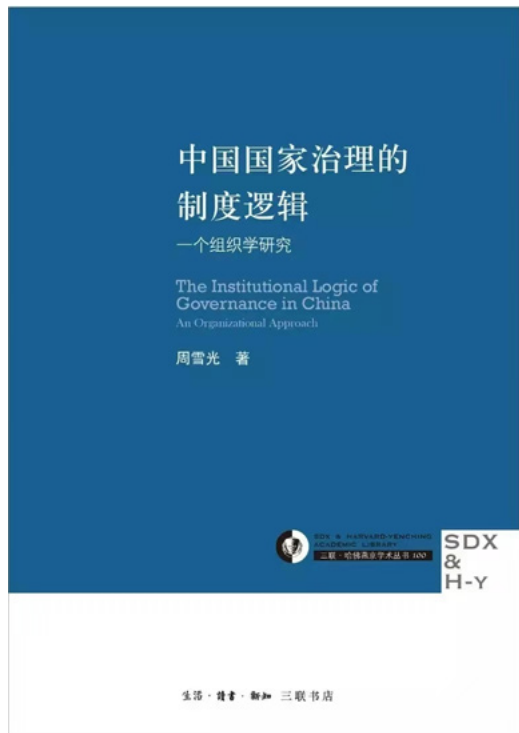
进而，我们不仅需要“进入”田野，也需要“浸入”田野，即调动所有的感官来进行田野研究。例如，格尔茨在《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一文中观察到，作为一个生理性动作的“眨眼”，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可以表达玩笑、心领神会、传递约定、调情等多种意涵。当事人如果没有“浸入”到田野场景之中，对此是难以理解的。周雪光老师也谈到两个与“眨眼”相关的个人田野经历。一是，他在与一位熟悉的村民聊天时，在谈及当地干部的营私问题时，这位村

民向他眨了一下眼，传递了某种不愿明示的信息。二是，在一次饭局中，镇上的一位年轻干部看起来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但两个外来检查团干部还在不停灌酒。在周老师前去劝阻之时，这位年轻干部在外来干部不注意时向周老师眨了一个眼。在这一瞬间，两人之间形成了某种心领神会。如果没有“浸入”田野，类似的“眨眼”经历很难出现，即使出现，也不会得到理解。

在“浸入”田野后，我们也需要“脱出”田野。其内涵在于，一方面，要以当地人视角来“理解”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要以已有文献的概念和思路来跳出“此时此地”的田野边界，以丰富的田野经验来进行归纳提炼，提出饱满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概念。

概括地说，“浸入”与“脱出”背后，是视角与视野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理解当地人的视角，也要保持局外人的视野，努力捕捉某种长时段、多侧面的演变。例如，对于基层政府“共谋”现象的研究，即是从某种经验饱满的现实问题到实质性类型与关联性认识的努力。又如，在村庄集体债务变迁与基层选举过程中，很多事件与人物关系，在不同时点意义各异。再如，每个行动者，如基层干部，在不同场合有着截然不同的“表演”。理解这些不同时间、不同侧面的丰富性，才有助于我们提出好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由此可见，理论与田野呈现出互动关系。一方面，我们通过田野研究发展分析概念与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理论文献知识来提炼田野研究的发现。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接下来，周雪光老师通过若干案例对此



周雪光著《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书影

过程进行展现。其一是对“逆向软预算约束”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契机，是对于基层政府向下摊牌、攫取资源现象的观察。周雪光老师意识到，这与通常所说的“软预算约束”（公有制企业向上索取资源的现象）有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而方向恰好相反。微观层面上，周老师利用经济学领域的信号理论讨论基层政府官员的激励与行为，这与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有所不同。其后，周老师进一步意识到，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现象，与历史上雍正朝“火耗归公”的改革历程、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产权制度（“关系产权”）及“差序格局”概念，都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关联。在把田野问题纳入理论框架之后，很多研究问题（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产权的边界问题等等）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澄清与发展。

其二是对“共谋”概念的研究。周雪光老师在初次到乡镇时，就目睹了上下级基层政府间的“数据共谋”，并在随后的田野工作中观察到大量的类似现象。周老师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将此现象归纳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并将其与经济学领域的“共谋行为”（collusion）理论加以联系。很多学者讨论了相关的现象，如“变通”、“层层加码”等。周老师进一步提出，这些现象都可以进一步被纳入“非正式制度”的分析概念中，提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互为依托、相为互补的关系，并将此问题延伸至对于“帝国逻辑”的讨论。可以看到，田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好的分析概念，从对单一现象的认识上升到对一组现象、乃至更广阔场景与理论脉络的研究。

其三是对“控制权理论”的研究，这较好地体现出经验研究与理论创新之间的互动。这项研究的经验基础，是练宏在市环保局长达三年的系统性田野工作。练宏据此整理出的大量案例显示，环保检查时紧时松、发现问题并不处理，管理方随意地、非理性地调整数据和成绩分配方案。

在寻找理论解释的过程中，周雪光老师与练宏发现，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概念强调各项要素间的匹配整合，打包给一级政府。这一特点与他们的来自田野的经验观察并不吻合。但正是在与“行政发包制”思路的碰撞中，他们得到启发，进而从经济学不完全契约理论中“剩余控制权”（以下简称“控制权”）概念出发，将组织中的控制权进行了三个维度的概念化（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实施/激励权），并讨论了它们在中国三层机构间的分配组合，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治理模式（包括行政发包制）。进一步来说，过去研究中的很多常见概念，都可以在控制权理论中转化为某种具有分析性的、条件性的命题。举例而言，行政发包制通常来说包括部署、执行与验收三个过程，借由控制权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人们通常所论的“层层加码”“变通落实”与“共谋掩盖”等不同现象，是在不同过程与条件下出现的。在这项研究中，系统详细的田野研究与良好的理论准备缺一不可。

通过以上案例，周雪光老师希望说明：一，田野观察是好的理论分析的源泉与基础；二，我们可以借由已有概念来提高分析力，如“运动式治理”概念长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与讨论，结合田野经验，周老师将其与“常

规式治理”进行对比，来探讨其边界条件与背后机制；第三，在既有文献中寻找理论概念而不得的情况下，我们或可将旧概念赋予新的意义，或可提出新的概念与理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创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且需要不断尝试与既有文献建立关系。

总结：功夫尽在田野外

关于田野与理论的双向互动，学者们已有很多讨论。周老师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心得，超越某些“老调重弹”。他特别强调，从“进入”田野到“浸入”田野，需要调动身体的各个感官（问、看、听、闻、感）参与田野，并不断进行思考来“脱出”田野。在此过程中，饱满的田野工作与充分的理论准备相得益彰。

周雪光老师坦承，在阅读其他学者的一些工作时，常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研究资料丰富，但提炼不足，让人有种“呼之欲出”“功亏一篑”之感。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是，这些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因此难以提炼与升华。可见，理论的贫瘠、理论文献训

练的不足，是好的田野研究的瓶颈口。这里的理论训练，指的并不是理论书籍的阅读与概念的拼图，而是需要真正理解这些理论概念的前提与逻辑，从而可以在研究工作中重建理论逻辑、延伸理论链条、解释理论的结果关系。

是故，好的田野研究“功夫尽在田野外”。例如，斯科特“弱者的武器”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至他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的理论关怀，其理论的逻辑一脉相承。回顾自己的过往研究，周老师认为，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与“有限理性”概念提供了自己的理论主线。

还需注意的是，在研究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与理论文献建立关系。在此，周雪光老师引用了一段政治学学者的学术评论：“[自由裁定权]这个领域在政治学研究中蓬勃发展。它展示出不同寻常的内在一致性和累积成果。这两个特点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个领域耕耘的学者表现出一种令人敬佩的自制力，他们抵制漫不经心又毫无约束的创新诱惑，而是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他人已有研究工作之上。这一点在政治学学科是少见的。”因此，这里所说的“想象”与创新，是有理论基础的想象（disciplined imagination），与在已有文献基础上的创新。

综上所述，好的研究应该保持田野与理论的平衡。杨联陞曾评论西方学者的研究，认为其“学术训练富有想象，但‘不接地气’”。容



线上讲座现场

易把远方的树木误认为是天上的浮云”。不过，周雪光老师在此强调，还有另外一种危险是：囿于狭小的田野空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想象井口之外的天空。为了克服这两种不良倾向，我们需要把饱满的田野研究与开阔的理论想象相结合。

评议环节

讲座结束后，周飞舟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与评论。第一是田野研究与理论的关系问题。这在过往对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有很多讨论，较为主流的认识是，田野研究要不断地积少成多、积薄成厚，到一定程度后再产生理论认识。相较而言，周雪光老师强调，每一个田野研究本身，都有其直接与理论挂钩的深度关怀，田野与理论自始至终不能分开。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

第二是一个村庄的田野如何与理论发生关联的问题。在讲座中，周雪光老师特别强调分析性概念、因果机制与理论建构的重要性。特别是分析性概念，是我们把田野经验进行凝练并和已有理论发生关联的一个抓手。

第三是田野研究与研究者本人的修养、形象、意志与志向之间的关系问题。周飞舟老师指出，在做具有理论关怀的田野工作时，如果田野观察与理论不一致，最容易碰到两种问题：一种是用理论切割现实，即有目的地搜集材料来证明理论；另一种是“田野崇拜”，到田野后舍弃既有理论而单纯“创新”。其实，我们应该反躬自省，是否是田野观察还不够深入，亦或对理论的理解有所偏颇，而这背后的田野工作者的形象 / 志向问题非常重要。如何避免上述两个问题，则需依靠田野工作者个人的理论修养与对田野的深入程度（沉浸深度）。我们既是在通过田野进行研究，也是在田野中学习。在这个意义上，周雪光老师的演讲，对于每一个有志于田野研究的人，都是一个激励。

问答环节，周雪光老师就线上观众所提出的如何避免用理论切割现实、田野是否可以检验理论、如何进行跨学科理论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赵凯欣）



未名学者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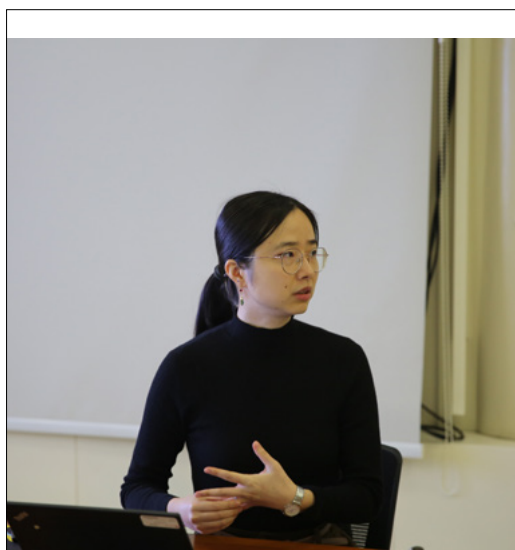
91

陈沐阳 | 中国与全球发展治理



【编者按】2022年10月19日，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支持的“未名学者讲座”第9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与全球发展治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陈沐阳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归泳涛主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评议。

讲座伊始，陈沐阳老师介绍了“中国与全球发展治理”题目的由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资金。有研究指出，仅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提供的贷款量就超过了西方背景的发展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资金的总和。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如何影响全球发展治理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陈沐阳老师在讲座现场

在发展融资领域的全球治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发展援助、出口信贷和债务治理。发展援助体现在融资领域的主要形式为官方提供的优惠性贷款。出口信贷一般指具有一定程度政府支持的、用来促进本国企业出口的金融服务，广义上属于贸易融资。

债务治理则包括对借贷出去的发展融资资金的管理。陈沐阳老师认为，中国的发展融资对既存的国际发展机制和国际出口信贷机制产生了显著影响。为理解这一影响，需要回顾既存的国际秩序形成的过程。

在去殖民化和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产生了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中心的统一的第三世界政策，即通过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引导其以美国倡导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据世界银行官方史所载，“‘经济发展’作为一项全球共同事业出现。它将除了贫穷就没有其他共同点的穷国连系在一起，也将富国和穷国通过彼此对安全的需求连系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世界银行（下文简称“世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文简称“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发展融资领域的主要国际组织发生了转向——融资目标从支持欧洲经济重建转变为了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1960年，世行的成员机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为较为贫穷的国家提供资金。1961年，经合组织旗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成立，通过制定规则决定双边发展资金的流向。两者的运行逻辑都是将资金的优惠性和受援国的欠发达程度联系在一起。

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多边融资和发展援助协会管理的双边贷款都具有利率低、期限长的特点。这减轻了受援国的还款压力，带有很强的赠予性。本质上，优惠性贷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的资金，与一般市场资金的运行逻辑相反。有研究指出，这种形式的融资并未真正有效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陈沐阳老师指出，这是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发展机制的主要运行方式，即发达国家通过提供享有政府支持的优惠性资金为欠发达国家的项目进行融资。

然而，当时并非所有的发达工业国家都严格遵照这一国际发展机制的规则实施发展融资。二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外援助具有很强的商业性，是一种“捆绑性”援助（Tied Aid），即东道国的受助项目必须由日本的企业承建，相当于日本政府通过官方资金协助本国企业获得了海外订单。

捆绑性援助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企业盈利偏好的影响下，资金不一定流入低收入地区，而可能流向中高收入地区，从而背离了支持发展的初衷。二是会导致各国争相补贴出口，陷入恶性竞争，彼此耗费额外资金在补贴上。对外援助目的是支持贫穷国家经济发展，出口信贷的目的则是支持本国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捆绑性援助和出口信贷的界线往往非常模糊。

为限制日本大规模捆绑性援助对其国际竞争者的影响，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国家在管控出口信贷方面也建立了一套国际机制。其规则之一即要求为发展援助“解绑”，允许其他国家的企业参与项目竞标，同时提高发展援助中的赠予成分比例。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使政府主导的发展援助资金和市场主导的出口信贷资金明晰地区分开来。面对“外压”，日本的海外发展融资发生了“经合组织化”，在九十年代末几乎全面“解绑”。严格二分政策的一个结果是成员国的发展援助资金和商业贷款走向了不同的地区。陈沐阳老师认为，这是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出口信贷机制的基本逻辑，也就是通过调整经合组织的规则，约束成员国政府为其企业提供官方出口补贴。

二

在回顾了既存的国际发展机制和国际出口信贷机制的演变与特点后，陈沐阳老师进一步分析中国的海外发展融资对当下全球治理的影响。与经合组织严格区分商业贷款和发展援助不同，中国（以及新兴发展合作伙伴）并不严格区分二者，而是倾向于以政府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融资。更广义上，南南合作强调互利共赢，拒绝“援助—被援助”的等级关系。中国在发展领域的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机制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发展援助方面，受中国发展融资的影响，加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财政负担逐渐加重等原因，西方工业化国家纷纷开始倡导、实践与之前截然相反的发展融资方式，强调出资国的自身利益，特别是本国的私营企业是否能在国际发展项目中获益。世行在2017年推行了“私营部门窗口”（Private

Sector Window），旨在通过提供公共资金以撬动私营资本进入以往只有国际开发协会的资金会流入的最欠发达国家。经合组织于2014年提出了“官方对可持续发展的总支持”（Total Official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SSD）这一统计概念，其统计内容除了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其他官方资金之外，还包括南南合作、三方合作资金，以及由官方干预而撬动的私人资本。

在出口信贷方面，有研究指出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信贷提供方。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并不是经合组织的成员国，欧美国家也无法通过重新制定经合组织规则来约束中国的海外投融资。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纳入既有规则体系，从而限制其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中美在2012年发起成立出口信贷国际工作组（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Export Credits），就合作的可能性进行讨论。然而，此工作组多年来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发表演讲，摄于1955年

未能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在债务治理方面，西方债权国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当下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然而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不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多为市场驱动的贷款，而非优惠性援助，因此减免债务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相应损失。既有的国际债务治理机制对债务国的非优惠性借款进行限制，从而防止市场金融机构搭多边金融机构（如世行）债务减免的“便车”。因此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看来，其免债实际上是补贴了既有债务治理框架的非参与国。

三

评议阶段，刘国恩老师就中西两种发展援助模式是否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效果上存在的差异、中国在海外发展融资项目中如何看待政治外交利益和商业风险管控的平衡、中国在未来是否会改变当前的发展融资策略等问题同与会学者展开讨论。

陈沐阳老师指出，目前虽有对援助项目的案例研究，但尚无系统性的、令人信服的数据说明中西两种发展援助模式的优劣。在

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平衡上，陈老师认为兼顾两者是后发国家具备的独特优势。随着产业升级，企业对风险的偏好会发生转变。中国的发展融资方式有可能会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转型，将服务发展的资金和服务商业的资金区分开来。

刘国恩老师补充道，考察国家对外政策的转变因素，除了“外压”之外，还应该从国内因素探析。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分权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不同，中国的政策刚性会更强。因此，未来到底是殊途同归还是形成中外两大格局尚需要细致的分析。

归泳涛老师补充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国内政商关系的演变，认为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可能促成了其海外发展融资政策的变化。

问答环节，陈沐阳老师和刘国恩老师就在场观众所提出的国家—市场关系、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困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黄嘉成）



93

许立言 | 城市史的书写方式——多维度的生活方式与交织的智识传统

【编者按】2022年11月1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支持的“未名学者讲座”第9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城市史的书写方式——多维度的生活方式与交织的智识传统”。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研究员许立言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咎涛主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和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评议。

讲座伊始，许立言老师指出，本次讲座将从副标题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切入，探索城市史叙事的新可能。讨论城市史必须先了解城市。城市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物，当今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是城市居民。许立言老师以古今中外的城市案例说明，虽然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城市依然在诸多面向上保留着异质性：物质形态多样、规模大小不一、人口多寡不等、经济结构各异、存续时间有差……正是因为城市是一个有着复杂面向的实体，所以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城市，进而有了书写城市史的不同进路。

一般而言，城市史的书写方式有三类。

“正统”的城市史是城市建筑史，诸如《世界城市史》等经典教科书均侧重于书写城市的物质空间。近些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城市史研究则注目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关注城市的社会与文化层面。第三类则是走以史代论的



文研院工作委员咎涛教授为许立言老师（右）颁发聘书

路径，通过书写城市史来建构城市（规划）理论，阐发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这一理论思考。此外，环境史等其他领域的专门史也会或多或少涉及与城市的纠葛。统而言之，许立言老师认为，在现有的关于城市史的叙

事中，至少在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个方面存在值得探究的分歧。

一

本体论方面的问题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都市具备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是，如果都市研究是希望获得关于都市的知识，那应该秉持怎样的信念去获取这一知识？

就本体论问题而言，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什么是都市有着各异的回答。考古学者戈登·柴尔德基于田野工作的经验，很大程度上从文明的构成要素出发，总结出构成都市的十个条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地区的案例出发，围绕规模、密度、经济结构和心理文化等方面给出了都市的操作化定义。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则相当诗化地对给出了都市的定义：“都市是圣地，都市是容器，都市是融合，都市是要塞。”都市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以综述的形式概述了地理学、历史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各自是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市的，如此便提供了定量研究的思路。理查德·杜威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便收集了18个作者描述都市时用的40个关键词，考察都市的定义。

在上述观念性的定义外，联合国统计局以述而不作的态度，收集汇总了世界各国在都市人口统计工作上的操作性定义，这使我们可以了解各国以何种指标定义都市。各国的操作性方案既包括行政区划、人口规模和密度、经济结构和都市功能等客观指标，也

包含诸如“社区感（sense of community）”等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指标。许立言老师认为，尽管几乎没有哪两个国家对都市有着相同的定义，但是综合上述观念性和操作性的标准，可以就都市归纳出6个维度和特征，即政治文化、建成环境、人口统计、经济产业、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基于此，可以认为都市概念的内涵（即包含的维度）是普遍的，外延（即各维度的具体表征）则因历史地理语境不同而变动不居。但在本质上，正如沃斯的名言，都市是一种区别于农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具备哪些特征，都市就包含了哪些维度。

从这一本体论出发，讲座接着考察了都市研究的认识论问题。许立言老师指出，在都市研究的认识论问题上向来缺少共识。都市究竟是应然还是实然（标识着都市研究和都市规划的分野）、是现象还是实证（决定了应该用阐释还是解释的方法）、是确定性的事物还是从复杂系统中涌现出来的不确定的现象（即还原论和复杂系统论之争）……关于都市研究应该秉持何种信念存在许多分歧，不同学科有着其特定的智识传统。

在建筑学传统方面，建筑师们自古以来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亦利用物质空间来表达社会秩序和宇宙观。例如，在早期都市中可以发现“圣界”和“凡界”在空间上的区隔；克里夫兰城在都市美化运动中将购物中心置于市中心，反映出当时被资本主义塑造的时代精神；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则较其早期同行而言更具自我表达的意味。与建筑学相匹配的是工程学传统，其代表是20世纪的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都市，其城市建设在

统一的计划经济框架下完全变成了数学优化问题。在这一传统中，城市研究与价值完全解绑，因为如果说工程学传统关涉价值的话，也仅仅是最优化的价值而已。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西方自然主义、人权思想的兴起，景观－生态学的传统融入了城市研究的范式之中。城市隔绝了人与自然，让人们产生了“分离焦虑”，所以人们会希望在城市里引入自然、发现自然。地理学传统则发生了从与价值无涉的工具地理学（如19世纪的区位论）到20世纪人文地理学的转向，更为关注人地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在特定空间的互动。与此同时，社会学传统也汇入了城市研究的脉络中，强调城市社会是不同于农村的社会，这一点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而不断凸显。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共享一块土地，相应的规制则渐渐兴起。在更加实践性的面向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各类市政立法为标志，政法传统也加入进来。此外，还存在着几乎与建

筑学传统一样悠久的历史传承，即自城市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城市，这就是乌托邦传统。

二

在回顾了城市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面向后，许立言老师提出了一种新的叙事线索：将城市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的多个维度，和城市研究作为一个智识传统的多个视角结合起来，重新构造城市史的叙事，以实践和思想两个层面共同勾勒城市的脉络。

10000BCE-2000BCE，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欧亚大陆的各个区域，出现了大型的人类聚落、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也即发生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城市革命。在此时期，以戈登·柴尔德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几乎将文明与城市等同起来。接下来的古典时代（2000BCE-400CE），中国和西方都出现



中山国墓葬发掘出土的《兆域图》

了最经典的城市，出现了“虚伪游手”等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如二里头遗址的木构技术、环地中海文化圈的希腊柱式、古罗马城的拱券与穹顶。此时，人们也形成了对营造城市的最初的思考。在中国，西周初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城市规划活动——召公卜洛，《周礼·考工记》中给出了一个儒家的理想城市模式：“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法家的《管子》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中山国墓葬发掘出的《兆域图》则表明人们已按照设计平面图来施工建设。在西方，伯利克里时代的建筑师希波丹姆提出了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方格网系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盛赞——通过城市规划的方式，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却对公民社会作出了贡献。与奥古斯都同时代的建筑师维特鲁威，则将希腊—罗马的建筑传统记载下来，写成《建筑十书》，确定了建筑的三大原则：实用、坚固、美观。

在中古时代（400CE-1400CE），中国的城建依然繁荣但创新略显乏力，里坊制在唐长安城达到了巅峰，而里坊制崩坏后，宋汴梁城出现了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现代最为熟悉的城市生活面貌。元明清三朝营建的北京城则大抵沿革至今。在国外，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城以其圆形的城市形态独树一帜，代表着中东传统的一个侧面。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则依托城堡和教堂逐渐发展起来。欧洲中世纪的晚期的城市出现了韦伯所谓的“世俗的回归”，城市得到了再发现。在思想层面，中国很早已经有了发达的地图

学（如“制图六体”）；北宋时期的《营造法式》作为竣工验收手册标定了建筑规范，标志着古典建筑学的成熟。当然，人们也从未停止思考人类的聚居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如《桃花源记》和《上帝之城》等作品即是其中的代表。

在文艺复兴与近代早期（1400CE-1800CE），城市在实践上开始复兴，如圣母百花大教堂是对古罗马大穹顶技术的复兴和再创造，格网形制再次出现，人们再次探索理想的城市方案，到了18世纪则出现了巴洛克的壮丽风格。此时，人类关于城市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新一代的建筑师构想各种各样的城市，尤其是到了17世纪诺利画出了罗马地图，这是第一幅被建筑学称为“图底关系”的空间图示，在建筑学看来非常现代，因为其在强调空间而非建筑。与此同时，人们关于理想城市的思考极大丰富，达芬奇从健康城市生活的角度设计了理想城市方案，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者也想象出乌托邦、新大西岛、太阳城、基督城等综合的理想社会。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一直到现代性的生发（1800CE-1960CE），人们在城市的实践和思想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工业城市取代中世纪的城市而兴起，资本主义支配了城市空间，出现现代格网和城市功能分区。为了预防革命，统治者打着城市美化的幌子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改造。随着人们与自然的分离焦虑，城市出现了公园。城市新基础设施（下水道、地铁等）在此时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应的，人们的思想空前地活跃起来，（工具）地理学的传统、自然—生



昌迪加尔城市规划图体现了
柯布西耶提出的“光明城市”设想

态的传统、政法传统的规制、社会学的传统纷纷兴起并影响城市。到了20世纪初，随着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涌现出了关于城市新的想象，如赖特的“广亩城市”和柯布西耶的“光明城”等。随着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一个综合纲领——《雅典宪章》，其主导了战后城市更新和大都市区/城市群的建设，推动了西方第一轮城市化的完成。在这一时期，人们同样没有放弃对理想城市的思考，既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探索，也有对百年工业革命城市的反思，更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

当前的时代，许立言老师援引地质学的流行观点，称之为人类世（1945CE至今），这既是基于地质历史分期中对人类因掌握核能而产生了真实的地层影响这一事件的考量，也反映了城市历史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折。虽然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新都营建中尚有用武之地，但西方世界的城

市尤其是老城已然出现了逆城市化和城市危机。与此同时，在思想界，随着民权的普及和环境运动，人们开始思考诸如“社区感”等让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忽略的观念，也以社区反抗运动影响着城建的实践。空间政治、人文地理学、景观生态分析、社会学的传统等等思潮不断汇聚，导致了第二个纲领性著作，即《马丘比丘宪章》的诞生。这一宪章强调人与人的连接，城市规划便

重新转向人性。但与其说这个宪章是新的综合，不如说是一个分歧的起点。19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政治日渐被身份政治所支配，关于身份政治的城市实践已经破碎至极，以至于无法分辨城市智识传统的主线何在。

基于上述的讨论，许立言老师给出了自新石器晚期城市革命以来至今乃至未来的城市史断代、分期与时代主题，展示了讲座开头提出的一种新的城市史书写方式。

三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许立言老师对城市史的书写做了展望。综观关于城市史的书写方式，以《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为代表的两次伟大综合及其之后的分歧，向未来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关于城市规划的知识究竟是走向新的综合，还是会继续开枝散叶使我们抓不住一个主流？以身份政治的支配地位来看，当前已经出现了无限细分的趋

向，再难有综合一说。与这一表面繁荣但实质沉寂的智识活动相伴的，是完全趋同的城市格局和平庸的城市景观。那么，关于城市的智识传统是否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结尾？许立言老师认为，当前的情况离令人满意尚有很大的距离，城市研究中尚有许多复杂问题有待解答。

例如，现今的城市规划智识传统，不管其如何普适，都依然是西方的传统，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哪些是世界的哪些是民族的这一问题有待回应。又例如，城市研究的主要学者们在2020年发表了一篇备忘录，列举了二十余条要关注的问题，号召建立新的城市科学，但其反复强调的“深植于历史中的城市研究”又引发了新的问题：我们追求的城市知识到底是关于历史的阐释性叙事，还是普适的（社会）物理规律？在城市的想象方面，人们曾经有勇气去想象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存在，但现在我们似乎丧失了这种勇气，这一境况亟待改善。

最后，许立言老师再次援引路易斯·沃斯的名言作结：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城市的知识，就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得以存在以及将要如何存在的知识。我们有义务去接着书写城市史。

评议阶段，唐克扬老师首先指出，城市尺度决定的问题复杂性叠加学科专业化的影响，使城市研究需要克服相当大的困难。城市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也是社会生活本身的一个部分，必然会包含行动的传统。许立言老师在梳理了不同的学科传统之外，还点出了诸如政法传统和乌托邦传统等内容，是

难能可贵的。其次，讲座用智识传统而非知识传统为切入点，提示我们在关于城市是什么的理解中孕育着知识发生学的问题，城市史研究不是在积累无穷无尽的经验，而是揭示智识传统对特定经验的反映。交织的智识传统应该是一个行动纲领，将多维的生活方式资料编织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要以知行合一的姿态，在续写城市史的意义上，将关于城市是什么的思考贯彻到城市规划中去。

唐晓峰老师谈了三点体会。一是许立言老师在梳理各学科的智识传统时加入了时间的维度，理清了每个学科在何种背景和特定节点下进入城市研究，更为细致地描绘了城市史研究的脉络。二是将实践和思想二者结合，以新的叙事方式构建了城市思想史，关注每一个历史阶段被特别追求的本质，触及了问题的历史性意涵，是一个很好的叙事。三是“人类世”的概念，点出了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系统的扩散与农村系统的萎缩，城市相对而言已不再是独特的存在，这对我们理解新的时代下的城市有很大裨益。

问答环节，许立言老师对现场听众所提出的城乡对照研究、从智识传统出发理解城市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撰稿：黄嘉成）



文研论坛

169

多视角看基层社会



【编者按】2022年10月29日至30日，“北大文研论坛”第169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多视角看基层社会”。此次论坛历时两天，十余位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与视角出发，分享了与基层社会有关的研究问题与研究心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举办。

论坛伊始，北京大学中国古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陈侃理作了主旨说明。陈侃理简要介绍了中国史研究中“基层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演变的过程，认为最近二三十年来，得益于“眼光向下”的新史学观念与各类新材料的发现，基层社会成为令人瞩目的研究热点，但受限于文献性质，目前秦汉基层社会研究仍集中在制度史方面，缺乏新的思路，因此，进行跨学科交流很有必要。

首场报告，陈侃理老师带来题为“聚落、政区与编户组织——再思秦汉国家中的乡里”的主题发言。陈老师指出，作为县以下的基层单位，秦汉国家的行政里首先以原有的城邑、聚落为基准而设置，遵循了地域性原则，其次才顾及户口规模。但邑、里的



论坛现场

地域性有其局限，无法超出单个聚落。乡从单一聚落到广域政区的转变，弥补了里以聚落为单位的局限。评议环节，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吴靖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指出，秦汉帝国和地中海地区的基层整合方式具有相似性。从古风时期开始，包括雅典、罗马在内的地中海周边区域城邦，都出现了拆散土著聚落、重新编排新部的做法，本质上也是为了打破血缘宗族，建立理想国

家，并在此情形下产生了行政成本、社会风险和暴力等挑战。

随后，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李文丹发言，主题为“格里高利九世在罗马城：13世纪教宗国的基层政治与社会”。李文丹老师从作为罗马城领主的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在位一半以上的时间不在罗马城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引申开，梳理了中世纪教宗国和罗马城市公社的相关背景，并逐年还原了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在罗马城的仪式活动与行政角色，重构了教宗、罗马贵族和城市平民在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由此，李老师进一步提出对历史中的小事件、小范围社会生活（如拆塔、清理河道、争夺烤面包权利等）的思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是国内研究韦伯的专家，他在评议时强调，教宗如何对罗马城的政治施加持续的影响是韦伯“城市”部分没有充分体现的内容，李老师报告集中讨论了教宗和罗马贵族集团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教宗与帝国皇帝的代理人战争），也充分体现了教宗对罗马公民结社的影响，因而该报告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城市社会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场报告中，田耕和丁冠兰围绕“‘不做和事佬’：18世纪中期蒙盐内输所见的‘内边疆’政治”展开论述。基于雍正末期至乾隆四十三年河东盐区由蒙盐内侵、买运蒙盐、更换运商等引起的条块互动与冲突，报告揭示了在中枢、河东盐政与山西地方的互动中，在组织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盐内输的诸多事宜和对地方官的管辖与监督等方面，晋抚逐渐从推诿走向了“一肩挑”的中心。这是自康熙以来条块关系变化的一个后果。评议环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毛亦可主张条块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向“一肩挑”的方式，二者更多时候是协同合作的，并着重对条块之间交叉协调、互相沟通的情形做了补充。与会学者还就报告内容是否涉及“内边疆”、主题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咎涛发言，题为“中国近代边疆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以清末新疆基层宗教人士为例”。借助《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土耳其总理府档案等已经刊布的资料，咎老师讨论了18世纪中期被纳入清朝统治至20世纪初辛亥革命期间，新疆宗教阶层的构成以及他们在穆斯林基层社会中扮演的司法角色，并分析了“因俗而治”和“中央集权化”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及“跨社会体系”中基层统治的复杂性。他认为，由于文化认同的因素，该时期宗教势力的影响一直比较强大，中央政府往往无法深入基层。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反思了印度史中的基层法官形象，比较了莫卧儿帝国高层、基层不同语境中的“伊斯兰话语”，随后提出清朝治理基层社区和印度穆斯林皇帝治理基层社区存在一定共性——二者都面临帝国执法人员与地方教职人员立场、情感的差异。

接下来，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吴靖远发言，题目为“从阿马斯翠城看元首制时期帝国边陲的区域间社群整合”。相关文献反映出罗马帝国在短时段内对边陲区域间社群的整合存在三种状态：中央移风易俗、驯化地方；地方佯作驯服，以维持自治；中央地方建立默契，双方保持距离。本次报



《教皇格里高利九世颁布教令》，拉斐尔绘

告，吴老师提出了第四种整合方式。报告利用田野考古发现的若干石刻史料讨论了阿马斯翠城的地理环境、聚落形态和人口流动等问题，指出位于内陆山地内的聚落早先只是名义上划归阿马斯翠之下，随后才逐步整合进阿马斯翠城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又通过比较石刻中纪年方式的差异以及标识“城籍”的现象，说明大型城镇化聚落间，存在需求驱动的人口流动和聚集所造成的、长时段下的整合效应。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助理教授杨坤提出，罗马帝国的边陲整合与西周王朝对黄河流域的行政控制具有不少相似之处，并就石刻的出土环境、帝国征服之后带来的族群聚居、融合等问题向主讲人提问。吴老师精美的PPT内容与本次报告恰到好处的配合，得到与会学

者的一致好评。

第三场报告中，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新刚就“‘氏族’？‘贵族’？——重思古风时期雅典的 *genos*”进行发言。张老师发现，既往学者将“*genos*”翻译成“氏族”是受到人类学概念和罗马“氏族”（*gens*）范式的双重影响。现有理解则主要有：认可彼此亲缘关系以及认可彼此出自同一祖先而未必真正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翻译为“家族”或“宗族”，并且强调 *genos* 在宗教崇拜以及选任祭司等方面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学界对 *genos* 意涵的不同解释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城邦形成理论范式，张老师认为有必要将 *genos* 放回到古风时期雅典（阿提卡）的政治整合过程中考察。*genos* 作为“祭祀—地方性—精英”群体要争夺在新的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从城邦的演进视角下考察 *genos* 可能是理解它作为雅典基层“社会组织”的关键。评议环节，李文丹老师指出，概念翻译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领域，例如西方中世纪的“家族”与西方古代的“家族”间有着颠覆性的差异。如果把 *genos* 类比为西周的“氏族”而非人类学概念中原始社会的“氏族”，那么“家族”和“宗族”的译法并不一定比“氏族”的译法更贴切，或许还可以参考中国史中的“世族”一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以“‘双轨制’的内部张力——湘乡曾家与地方政治”为题发言。报告借鉴费孝通先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制”来探究清末官府、士绅、民众之间的关系，引入“双轨”背后的“政统”和“道统”。其次，凌老师聚焦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元年间的湘乡曾国藩家族，通过曾

国藩与其弟曾国潢、其父曾麟书在家书中所反映的各自立场和活动，分析他们在双轨制中的不同位置与实践路径，以此探究双轨制内部的张力结构——即曾国藩具有严格分开双轨、分开政统与道统的倾向，代表了双轨制在理念层面的分离与张力；其弟曾国潢的家书则反映了双轨在实践层面得以联系起来的向心力与危险，二者最终在地方上结合为父亲曾麟书与知县朱孙诒在公事上的倾力合作。评议环节，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苗润博就平行双轨是否真实存在、曾国藩家族对于研究基层社会的典型性等方面提出质疑，特别强调了明清历史情境的复杂性。与会学者也各抒己见，交流了对双轨、道统的适用性的看法。

第四场报告中，毛亦可围绕“雍正朝的整饬士风——试论 18 世纪中国的新型基层控制”的主题首先发言。利用新发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雍正朝《学政全书》，尤其是其中关于惩治防范贡监生员日常品行的学政事例，毛亦可老师在报告中详尽梳理了雍正朝整饬士风的四项主要措施——从严从重审判贡监生员的犯罪行为，削弱贡监生员的特权地位以防范其一般劣行，就贡监生员日常行为推行定期登记汇报等档案管理制度，以及饬令士子加强学习皇帝圣训与国家律例，并指出其目的是实施集权、加强思想统治并确立学臣—地方儒学系统的“垂直式”管控，以打击绅士的“封建化”倾向，从中还可以总结出雍正朝整饬士风的特征及其体现的雍正所追求的政治秩序。评议环节，凌鹏老师认为，顾炎武、雍正与乾隆三者对士风的理解并不一致，同时询问了门簿制度的具体实



维吾尔族契约文书，
选自张世才《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译注》

施方法和程度，以及乾隆初年整饬士风措施的延废与更定情况。

随后，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陈莹雪发言，主题为“‘灵魂份额’：古代晚期基督徒的财产处置——从帝国立法到地方实践”。陈老师主要探讨了基督教的财产观念对帝国立法和地方实践的影响，包括帝国立法与地方实践之间的互动。从帝国立法角度，查士丁尼时代出台了很多规范、鼓励宗教性财产捐赠的立法，而且立法方面有一定的激进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对法尔其第份额的无视、挤占乃至废除。后者确立于古典罗马时期，旨在防止遗嘱人过度遗赠，保障家族继承人的财产权益。从地方及个体实践角度，由当时埃及纸草文书中的多份遗

嘱可知，遗嘱人会在“爱家人”和“爱灵魂”之间实现一定的平衡，并将法律作为爱灵魂的工具。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林丽娟在评议时一方面肯定了报告所选择的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题目，涉及神圣和世俗之间、国家立法和基层实践之间的持久张力，另一方面提示遗嘱中出现“不可反悔”的内容可能体现的是埃及固有的传统，抑或为了照顾东、西方传统差异而产生。

第五场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王珞发表“市井中的圣人：一个13世纪欧洲基层教士传记中的社会失序与重建”。报告通过传记材料讨论了一位公元1200年前后活跃于康布雷城（今天法国北部）的基层教士——康汀布雷的约翰的生平行迹和社会角色，由此说明中世纪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多中心、多层次权威互相交叠的复合体，完全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治理难以存在，因此地方人物在不同权威间进行选择、向上议价是中世纪地方社会运作的常态。面对中世纪盛期（12、13世纪）经济急速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失序和价值紊乱，以康汀布雷的约翰为代表的地方知识分子，发挥了斡旋于各权力中心、教化民众、重建秩序的功能。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崇明对中世纪的公共治理和国家形态、约翰的身份何以介入司法事务以及圣徒传的史料可信度与形象建构问题向主讲人发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徐冠勉围绕“从乡村到全球？——一位17世纪末巴达维亚乡村女种植园主的视角”展开论述。徐老师首先反思了微观史、全球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空间要素问题，接着结合一张巴达维亚

种植园的测量地图，以及保存在海牙档案馆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乡村档案，讲述了17世纪末一个名叫Tan Hiamtse的乡村女种植园主为保护因殖民战争而死的丈夫的遗产提起土地诉讼的故事。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及这个故事不仅限于巴达维亚的乡村，还牵涉到爪哇岛的战争与劳工、荷兰帝国的土地制度与市场 and 权力关系以及中国的移民与技术等问题。最后，徐老师强调，应该回归历史现场，把空间放在时间里，而不是把时间放在空间里。评议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史阳认为，报告运用殖民公司保存的档案史料展现一个普通女种植园主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殖民时代印尼社会生产生活的具体场景，并引入了全景式的广阔视域进行考察。报告的这一主题与目光十分新颖，可以进一步详细补充其中瓜哇人的来源、流动与定居过程。

最后一场报告中，张恣煜老师发表了题为“从佛教的灭亡到甘地的胜利——一个基于农业村社的长时段印度史假说”的演讲。张老师主张跳出东方学内部的“中印对立”叙事，以中国而非西方历史和社会为参照物，从基层社会出发重新摸索一条观察印度历史的线索。报告从父系家族主导的农耕村社生态出发，提出了一个古代印度“礼法社会”的概念，并认为稳定的村社秩序和灵活可变的上层统治集团是印度历史的基本现象之一，又进一步结合印度佛教灭亡的另一种假说（处在特定结构功能位置的佛教僧团被整体“剥离”出印度社会）、莫卧儿王朝的早期现代军事帝国基础、以农村为根据地的自下而上“脱钩”的反英去殖路径三个案例加

以印证。评议环节，徐冠勉老师就印度基层是否存在连续性、印度和中国比较的可能性等方面提出了疑惑，并建议主讲人选择印度一个具体的区域展开比较与探究。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史阳发言，主题为“菲律宾的选举与政治文化——从2022年菲律宾大选中的刻板印象和话语叙事谈起”。报告以2022年菲律宾总统大选选出小马科斯和他的高得票率为起点，分析其中长期存在的“民主橱窗”“独裁者之子”等刻板印象与上层和底层两套历史叙事、社会话语，讨论了菲律宾政治制度的缘起、发展、调整和特点。史老师指出，菲律宾政治的实质仍是传统庇护制政治文化背景下，各个政治家族由家族内的强人主导进行纵横捭阖、分配利益的家族政治。史老师继而阐释了家族政治作为这一传统政治文化核心要素，是如何深刻影响和模塑了现代菲律宾的政治制度，即以自身特色为主的菲

律宾民主政治与政治家族是如何逐步从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革命时期、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独立后演变至今的。崇明老师在评议时指出，围绕家族政治如何利用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否对家族政治具有一定现代影响，菲律宾现代化的方式与菲律宾人的自我认同等进行了全面的提问。

就此，本次论坛落下帷幕。与会学者围绕“基层社会”这一主题，发挥各自学科的特色与优势，交换意见并充分讨论，现场气氛热烈。活动结束后，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此次论坛是一次开放的、成功的跨学科尝试，实现了以文会友、委诚求当的目标，也期待未来能够继续举办更多这样的跨学科对话，延展议题的方向与学者的领域。

（撰稿：刘文滔、张俊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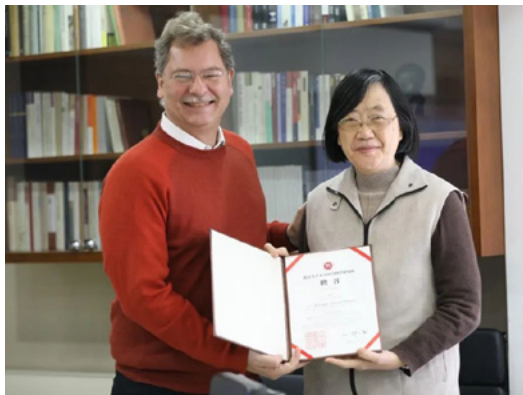


邀访学者论坛

153

Enrique Stephanus Dussel |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截至 2021 年）

【编者按】2022 年 10 月 18 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墨西哥自治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教授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Stephanus Dussel）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截至 2021 年）”。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潘光哲、唐克扬、万海松、王振忠、徐欣、张小刚、赵晓力、Keith Adam Woodward，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邓小南院长为杜塞尔教授（左）颁发聘书

一、中拉关系的主题与概念

首先，杜塞尔教授铺垫了中拉关系分析框架中的四个重要主题：贸易（trade）、资金支持（financing）、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infra-structure

projects）。他强调，学术研究须将四者区分开来，不可混为一谈。如果一篇分析中拉关系的作品时而讨论贸易，时而讨论投资，然后又谈到基建，最后往往只能得出“中国和拉美需加强双边合作”等浅显无意义的结论。杜塞尔教授呼吁中拉双方学术机构提高研究的质量，不要为了“赶时髦”而争相加入自己并不了解的讨论之中——这种做法对于学术的贡献微乎其微。

接下来，杜塞尔教授结合自身研究成果，从拉丁美洲角度提出了理解中国的三个关键概念。首先是“无处不在的公共部门”。杜塞尔教授认为，中国的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由中央政府、省、直辖市和市构成，四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彼此竞争，由此促进了创新和产量的提升。在他看来，想要

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首先要理解其公共部门，因为这种强大、充满活力与竞争的公共部门唯中国所独有。举例来说，中国公共部门直接资产大致相当于年度 GDP 的 40%，而在墨西哥，这一比例不足 1%。又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北汽集团（BAIC）资产归北京市所有（这在拉丁美洲是难以想象的），它与中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SAIC）之间存在激烈竞争。

第二个概念是“中国特色全球化”

（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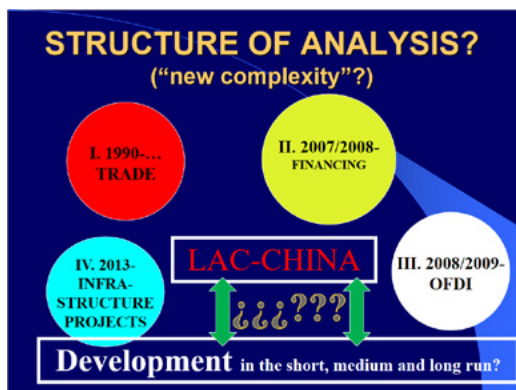
杜塞尔教授认为，中国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为蓝本，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为成百上千的政策、项目提供了平台和契机。

最后一个概念是“美国的回应”。杜塞尔教授强调，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和展望不可能忽视美国的影响。中美关系自 2017 年以来持续紧张，近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表明，双边竞争已经转变为公开的对抗。美国政策的转向，与中国尖端科技领域公司日益强大的竞争力密不可分。当下，学者应着眼于中国—拉美—美国的“新三角关系”，在聚焦中国对拉丁美洲倡议的同时，也要积极关注美国的回应。

二、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基建项目 概览与数据

杜塞尔教授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定义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客户与供应者之间通过合



中拉关系分析框架：贸易、资金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同订立的服务，且最终建成的设施归客户所有；这项服务一般通过竞标程序订立，但也可以直接指派”。“合同”与“所有权”这两个要素，是基建项目有别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

在中拉关系框架下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复杂的一类。不同于贸易、贷款和投资等活动，基建拥有复杂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规划、融资、竞标、建筑、后期检修服务等等，同时还要求承建方对本地、本国和本区域的法律、习俗、劳动力、自然环境、文化、语言等多方面拥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对中国承建公司来说，基建项目是一个不断学习与试错的过程。总体上，拉丁美洲对基础设施有大量需求，但供给严重不足。据当地机构估算，基建在拉美国家 GDP 中的占比应达到 6%，但 2010—19 年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仅为 1.2%。因此在拉美，基建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中国提供的基建项目正是为了弥补这块供给上的短板。

随后，杜塞尔教授基于统计数据指出，

中国在拉美基建项目的发展有着两大趋势。其一是增长，基建项目数量以及每个项目在当地平均创造的工作岗位数，在短、中、长期内均实现增长；其二是多元化，体现在国别、部门、承建公司的所有权、来源城市等多个方面。国别上，基建项目在2005—2009年主要集中在巴西一国，至2020—2021年已在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取得突出成效。部门上，对拉美基建项目从以往的“能源主导”转为“交通运输主导”，并覆盖了通讯等更多部门。所有权方面，民营企业在中方承建企业中的比例缓步上升，呈现多元态势。来源城市方面，来自京外其他地区——如广东、香港、上海等地的企业比例得到较大提升。

最后，杜塞尔教授为本次论坛作结。首先，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中拉关系中最复杂的部分。基建不仅仅意味着“建筑”，它还涉及当地的法律、习俗、自然环境以及一整条复杂的价值链，而建筑本身往往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环。其次，基建项目是“中国特色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拉丁美洲老百姓是否认可基建项目的质量与便利程度，是这条新全球化道路能否博得认同的关键。第三，中国在拉美的基建项目总体上十分成功、反响积极，但也因对当地情况了解不足而造成了些许失误，值得从中反思。最后，中国基建项目在国别、部门、承建公司所有权、来源城市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多元化趋势值得关注。

（撰稿：李武陶文）



154

徐欣 | “活态的历史”与“关联的历史”——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编纂的视角与个案

【编者按】2022年10月25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欣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活态的历史’与‘关联的历史’：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编纂的视角与个案”。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唐克扬、万海松、王振忠、应星、张小刚、赵晓力、潘光哲、Enrique Stephanus Dussel、Keith Adam Woodward，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齐琨、副教授萧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长聘副教授刘彦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自1922年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起，在“重雅轻俗”的反思之下，民间音乐逐渐成为中国音乐史的主要书写对象，但少数民族音乐始终被包裹在“华夷之间”的边缘叙事当中。199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音乐开始出现通史、族别史、区域史等，在其主体性愈发显见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史料的局限。因此，“用什么样的材料、写什么样的少数民族音乐史”是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徐欣老师围绕少数民族乐器，以“活态的历史与关联的历史”（Living history & Related history）为题，从史料和视角两个方面为我们呈现了正在思考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的研究思路与个案。

对口传与表演材料的强调，是扩展史料范畴并确立双重史料观（即他表述史料与自表述史料）的关键。以少数民族乐器起源传

说为例，经过对78篇（涉及28个民族的46种乐器）传说进行收集与文本分析后可提炼出四个关键情节母题：启发（inspiration）、神予（given）、失去（lost）、难题（difficulty）。如启发（化声）母题的故事结构链中可以看到自然启发下“自然力—自然物—自然声”向“人造力—人造声—人造物”转化，或经动物声启发为乐器的底层逻辑；在失去（化



邓小南院长为徐欣老师（左）颁发聘书



伊朗乌德的复弦

生)母题中又可见生死循环中人与动物情感的再生,让我们重审乐器如何构成不同文化中生命意义系统的一部分。无论是经验性的“声音转化”表述,还是超验性的“生命转化”表述,它们都呈现了一种声音生态与地理生态、声音观、乐器观甚至世界观的关系,这种材料在历史与文化的阐释力方面仍然可以进一步探索。

音乐历史的媒介是被观看的,同时也是被聆听的。徐欣老师以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弓弦乐器潮尔与马头琴分别演奏的《诺恩吉亚》为例,以聆听的方式讨论了“声音能否自现历史”这一问题。对科尔沁草原上的牧民而言,潮尔与马头琴的声音分别属于“古老”和“当代”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范畴,隐喻了少数民族乐器改革的历史与声音审美经验的变迁,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会将我们导向传统游牧社会整体声景与声音观的追问。

“关联的历史”意味着从乐器/器乐出发发展开关系史的写作,对丝绸之路沿线抱弹乐器“弦”的研究便是从文化通道视角进行关系史考察的一种视角。波斯语中的Abrisham既指丝绸,也指代弦乐器,在西亚、中亚、印度或是中原地区都能看到关于丝弦的历史记录。因此,丝绸之路也可以被

理解为“丝弦之路”,这似乎也隐喻着乐器中的弦材同流动的丝绸之路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弦材不仅体现着乐器本身的音色、风格、手感、演奏法,更能让我们窥见弦乐器历史存在方式。从清中期的《皇朝礼器图式》到清晚期的《新疆图志》,关于回部乐器弦材和弦功能彼此对应的表述逐渐变化,“丝弦五、铁弦二”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铜弦二/四”;“以木拨弹丝弦,应铁弦取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无纯用铜弦者”。在新疆图志“古乐器不可见矣”的叹息里,可以看出曾以丝弦(软弦)作旋律弦、钢弦(硬弦)作共鸣弦的对应关系被打破、单件乐器上存在多种弦材的混弦制度随之消失,而其弦功能依然保留。至近当代时,软弦中的丝弦均演化为动物弦,与此相关的乐器演奏方式、技术、声音风格、作乐体验与审美经验改变的同时,更意味着从流动性到本土性的变化。

除弦材外,用弦制度也是让我们理解这条沿线的另一重要视角。从两河流域的乌德琴,到我国新疆的多种抱弹乐器,再到日本正仓院中的唐代琵琶,“复弦”制度贯穿于整个丝绸之路的抱弹乐器中。当代中国专业琵琶的复弦传统已不复存在,而是下沉到民间,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分层。从西亚、到新疆少数民族、中原地区再到整个东亚弹拨乐器弦材、弦制等问题进行当代田野与历史意识的整体贯通式考察,是丝绸之路沿线乐器历史呈现一种能够真正“流动”起来的视角之一。

(撰稿:徐欣)



155

潘光哲 | 蔡元培学术的日本渊源：以《中国伦理学史》为中心

【编者按】2022年11月1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蔡元培学术的日本渊源：以《中国伦理学史》为中心”。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琬点评，第十三期邀请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唐克扬、万海松、王振忠、徐欣、应星、张小刚、赵晓力、Enrique Stephanus Dussel、Keith Adam Woodward，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出席并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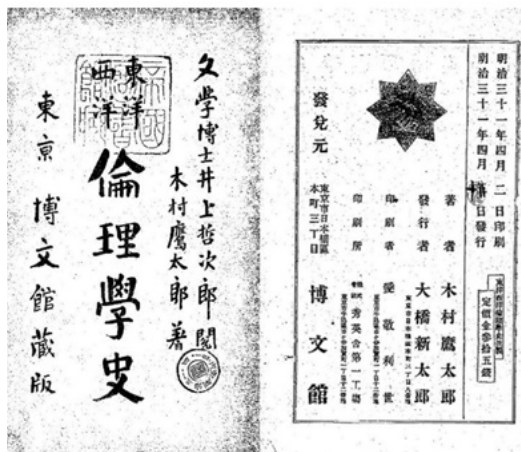
潘光哲老师

论坛伊始，潘老师即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日本脱离不了关系，双方对西方知识学术的汲引各有脉络，但日本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中国通过日本为自身建立现代知识学术体制奠定基础。

本次报告，潘老师以蔡元培为具体例证，以显示其间的场景脉络。潘老师指出，蔡元培早年即以日本为视窗，问学求知。如他在1903年，将德国的科培尔（Raphael von

Koerber）任教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东京大学）的讲义，由日语译成《哲学要领》，译稿售于商务印书馆，同年出版。蔡元培又翻译了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总论）》，1906年问世。同样的，蔡元培之《中国伦理学史》（完稿于1910年春天），也是参照东瀛学者木村鹰太郎的《东洋西洋伦理学史》（1898）与久保得二的《东洋伦理史要》（1901）的研究，贡献给中国读者的成果。

潘老师透过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与其参照依据对象之文本的对比分析，论证这部书的渊源，认为这部著作与久保得二的《东洋伦理史要》关系密切。初步比较《中国伦理学史》与《东洋伦理史要》的先秦部分，可以得知，蔡元培是遵循《东洋伦理史要》的基本架构而自有去取。例如，前者述及“农家”而后者无之；后者论及“列子”“杨家”



木村鷹太郎著《东洋西洋伦理学史》

而前者皆未述之。就内容言，比较两书的“孟子”“荀子”二章，可以得知，蔡元培的述说，往往立足于久保得二，略予增删；抑或不客气地说，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是对于《东洋伦理史要》进行了自我创造的翻译。

潘老师认为，《中国伦理学史》之问世，固然与日本关系密切，却也可以看成是 20 世纪初叶一位知识人的思想成果。特别是“伦理学”与“中国伦理学史”都是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所未有的领域；蔡元培也透过历史的叙述，表达他对于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蔡元培指出，来自于西方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席卷中国，俨然带来了伦理思想世界的冲突矛盾。如果不能透过历史的叙述，将中国“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将旁皇于歧路”。潘老师认为，凡此诸论，具体彰显了这部《中国伦理学史》，企图从传统中国的伦理学说挖掘出可以回应现实需求的思想素质。

潘老师表示，《中国伦理学史》对各家学说的叙述与评价，也积蕴丰厚的弦外之音。

例如，蔡元培特别指称“尊重妇女人格，实为男子之义务”，因此标举俞理初（正燮）对于女子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处境的思索与意见，这正是他注意“女权”问题的思想反映。所以，潘老师认为，阅读《中国伦理学史》，既是对于蔡元培叙述中国伦理学发展历程的“一家之言”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我们理解蔡元培思想世界的过程。

杨琥博士点评时表示，从总体认识言之，当下对蔡元培形象的认知，往往定位于教育家，而忽略了在 20 世纪创建现代学科与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里，他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潘老师的研究，具有这样的提醒作用；所以应该重视除了哲学与伦理学领域之外，蔡元培其他方面的贡献。渠敬东教授则点评，潘老师的研究，建构了时代思想潮流之间的互动关系。

最后，潘老师回应，确实应该注意蔡元培对民族学、美学等方面的贡献与知识，及其思想渊源，这是日后应该持续深入的课题；至于《中国伦理学史》，也应该视为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人昌言“道德革命”的努力轨迹之一。因此，透过研究相关知识人的类似著述与言论，应可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思想与知识世界的理解。

（撰稿：潘光哲）



158

张小刚 | 添枝加叶的历史传说——历史政治和宗教传播视野下的刘萨诃故事的演变

【编者按】2022年11月22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小刚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添枝加叶的历史传说——历史政治和宗教传播视野下的刘萨诃故事的演变”。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唐克扬、万海松、王振忠、徐欣、应星、赵晓力、潘光哲、Enrique Stephanus Dussel、Keith Adam Woodward，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张小刚老师介绍道，刘萨诃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高僧，主要生活在东晋十六国的后期至南北朝的前期，也就是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上半叶。从南朝梁开始，刘萨诃的事迹被记入《高僧传》等传世文献和出土碑刻、文书之中，在唐宋时期经过多次附会，不断被编造和增添新的内容，形成了层累的传说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背景、编造者的政治态度、佛教观点以及地方需求等因素对于中国佛教传播具体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据慧皎《高僧传》“释慧达传”记载，刘萨诃姓刘，本名萨诃，是并州西河离石人（今山西吕梁市），少好田猎，年三十一，暴病假死，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得一道人（和尚）点化，苏醒后出家，法号慧达，曾往丹



张小刚老师

阳（今江苏镇江丹阳）、会稽（今浙江绍兴）、吴县（今江苏苏州）巡礼阿育王塔像，于东晋京师（今江苏南京）长干寺三层塔下掘得阿育王所布佛舍利，又深加礼敬长干寺金像，后东游吴县，礼拜通玄寺石像，顷之，进适会稽，礼拜鄞塔。后不知所踪。

王琰《冥祥记》所记载的刘萨诃姓名（此作萨荷）、法名、籍贯和生平等情况与慧皎

的记载基本一致，但重点内容是刘萨诃进入地狱的过程和在地狱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受观世音菩萨点化，获得灭罪修福的具体方法。

《冥祥记》还提到了这样的典故：他因造杀孽而受镬汤之苦后被放还人间，出家前往南京等地礼拜，后往许昌，不知所终。

道宣《续高僧传》“释慧达传”则记载，刘萨诃姓刘，名宰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今陕西延安宜川县）稽胡，先不信佛，目不识字，为人凶顽，乐行猎射，曾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母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间，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山西临汾市吉县）。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文章一笔带过刘萨诃曾往吴越的事迹，重点讲述了元魏太武太延元年（435）刘萨诃西行至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预言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后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状如葵子的事迹。最后还详细叙述了正光（520—525）初御谷山崖挺出无头石像，北周元年（557）距离二百余里处发现佛头，保定元年（561）置为瑞像寺，建德（572—578）初年像首频落，开皇（581—600）之始更崇寺宇，大业五年（609），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改旧额为感通寺，令模写传形，致令发信弥增日新。道宣以贞观之初历游关表，故谒达之本庙，黄河左右慈（今山西临汾市吉县）、隰（今山西临汾市隰县）、岚（今山西吕梁市岚县）、石（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丹（今陕西延安宜川县）、延（今陕西延安）、绥（今陕西榆中市绥德县）、银



莫高窟第237窟主室龕内东披
凉州瑞像图 中唐



(今陕西榆林市米脂县、佳县一带)八州之地图写供养其造像,号为刘师佛等情况。

道宣《神州三宝感通录》除了记载《高僧传》和《续高僧传》中的故事以外,又记载刘萨诃是文成郡高平原上人,入冥时受观世音点化,苏醒后出家在黄河左右八州弘扬佛法,昼在高塔,为众说法;夜入茧中,以自沈隐;旦从茧出,初不宁舍,故俗名为苏何圣。慈州(今山西临汾市吉县)郭下安仁寺西有刘萨何师庙,每年正月巡像预示一年的吉凶。又简述了在丹阳礼塔,凉州番禾礼山出像,死后碎骨如葵子,得之凶亡,不得吉丧。

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则记载刘萨诃的前身原是迦叶佛时的利宾菩萨,为杀生的众人建立寺院,由大梵天王手造凉州西番和县山裂像的像身,经三百年大火焚烧寺舍及彼聚落,寺破以后,在石室安置供养。年月既久,石生室灭,至刘萨何礼山,方才示现其像。

正如巫鸿等学者指出的,慧皎(497-554)是南朝梁代会稽嘉祥寺的沙门,他编写的《高僧传·慧达传》中主要记述刘萨诃在南方巡礼圣迹、发现圣物等宗教活动,认为只有在南方才能找到年代最久远和最为珍贵的佛教遗物,明确地代表了一个南方观点,为确立南方宗教与政治的正统地位提供证据。

道宣(596-667)是唐代西明寺的僧人,是初唐时期长安僧团的领袖。道宣着重记述刘萨诃在北方的活动,他预言的凉州瑞像目睹了北魏灭亡,随后由于北周武帝灭佛而拒绝承认北周王朝的天命,最终以其瑞应颂扬了隋唐帝国的胜利。道宣又强调自己曾经在

贞观年间去过刘萨诃本庙,亲眼见到北方八州供养刘师佛的情况,说明《续高僧传·慧达传》所代表的是当时(初唐)一种特殊的政治、宗教观点。刘萨诃预言的凉州番禾县圣容瑞像是一尊具有极强烈政治意义的佛像,它的形象的完整和受尊崇就意味着国家的统一与人民的安居乐业,是统一国家中央政权的象征。另一方面,刘萨诃是中国北方的胡人,在中国出家为僧,到中国南方寻觅阿育王塔寺,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见证者。他还预言了在河西走廊出现的一尊瑞像,这身造像不是来自古印度,而是产生于中国本土,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观念。

1979年在武威城墙角下出土的《凉州御山石佛瑞佛因缘记》碑为天宝元年壬午(742)徽士天柱山逸人杨播记。碑文中提到李师仁逐鹿遇僧,见证佛像出现的情景,周保定元年(561)造佛寺,周建德三年(574)灭法毁像时显灵验,开皇九年(589)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大唐贞观十年(636)凤鸟栖息,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指出寺内有像本从印度来,神龙(705-707)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曾诣寺礼谒,获得护佑,所以后来能够在大雪之日降服娑葛,中宗令御史霍嗣光送绣袈裟等诣寺供养,大云寺僧元明住彼寺,常闻钟响,投地礼拜供养,御山谷中清流奇异,山中鸠鸽不入佛殿,开元间郭知运、杜宾客共诣此地,又追述此处原有白马寺,北周灭法后复为感通下寺。碑文中补充了不少关于凉州瑞像的新资料,尤其是李师仁逐鹿和隋唐时期不同年代经过此地名人供养礼拜的事迹以及寺内的灵异现象。



莫高窟晚唐第72窟主室西壁刘萨诃和尚像

从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来看，刘萨诃信仰在归义军时期有了新发展。法国巴黎藏三件《刘萨诃因缘记》（P.3570、P.2680、P.3727）大致写成于这个时期。文中记载了刘萨诃在地狱中见到了友人王对谈等在兹受罪，嘱咐刘萨诃请其亲人为其设斋造像，又见亡过伯父在阎罗王左右，逍遥无事，因为其生前曾与众人腊月八日一起浴佛，施舍过粟六硕，所以免其罪苦。刘萨诃为驴耳王治疗耳病，驴耳王为报恩而造刘萨诃和尚像等，末尾还指出“莫高窟亦和尚记，因成千龕者也”——这些都是梁、唐两朝僧传以及天宝初《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中不见记载的内容。类似刘萨诃到过敦煌并为莫高窟授记的说法，这个时期在敦煌当地十分流行。

在敦煌遗书中有不少相关记载，如《乾宁三年（896）唐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岩泉创修功德记》（S.2113）里有“萨诃受记，引锡成泉”，《长兴元年

（930年）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建龕一所上梁文》（P.3302V）中有“古有三危圣迹，萨诃仗锡”，《归义军节度押衙知行都料董保德等修兰若功德记》（S.3929V）中亦有“疑是观音菩萨易体经行，萨诃圣人改形化现”。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是后周广顺四年（即显德元年，954）为赞颂刘萨诃事迹而作，其中也提到了他“遂致敦煌并邑”的经历。归义军时期敦煌著名僧人道真曾造刘萨诃像以作供养。根据P.2971《壁画榜书底稿》记载，刘萨诃的地位竟提高到与鸠摩罗什、佛图澄、慧远等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大德并列的程度。另外，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有敦煌汉文写本《北宋乾德六年（968）修凉州御山感通寺记》（C.121），则说明了曹氏归义军时期对凉州瑞像的尊崇。

这个时期为何附会出这种说法，又为何这种说法能让敦煌的僧俗如此热衷呢？我们认为这与凉州瑞像在归义军时期所代表的特殊意义分不开。

敦煌地处边陲，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后，处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包围之中，可谓孤悬于戈壁。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增强凝聚力，归义军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对外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联姻，对内恢复唐朝制度，依靠世家大族；文化上恢复汉俗汉服，提倡儒家忠孝伦理；宗教上加强各种佛教活动，努力营造敦煌尤其是莫高窟在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地位。

最后，张小刚老师表示，刘萨诃授记的传说提高了敦煌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刘萨诃预言的凉州瑞像由于其政治性与产生于中国

尤其是河西地区的本土性，逐渐成为敦煌佛教的代表。在归义军时期现存各种瑞像中，凉州瑞像在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瑞像，而且与其他瑞像不同的是，它常常脱离瑞像群单独出现，即使与其他瑞像共存一处，多数时候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表明了其独特的地位。这个时期，凉州瑞像的政治性在于它承袭了汉唐文化血脉，象征政治、文化的正统，亦即象征了归义军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它具有“惩革胡性”的教化功能和造福兹方的作用，表明在各族合围的瓜沙地区，归义军政权当仁不让地成为保存和向外辐射汉唐文化的旗帜。它又是产生于河西本土的一种瑞像，迎合了归义军政权加强地方性以便提高自身地位的需求。历代归义军节度使仍多以

观察、处置河西诸州而自居，凉州瑞像作为产生于河西本土且曾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一种瑞像，受到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认同不难理解。正因如此，在归义军政权的对外交往中，凉州瑞像也成为敦煌的一个宗教标志，比如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感通画图像群中，凉州瑞像与牛头山瑞像被绘制于整铺画面的中心位置：凉州瑞像在上方，牛头山瑞像在下方，两者结合在一起。在敦煌和于阗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凉州瑞像与牛头山瑞像处于对等的地位而超然于其他瑞像，前者代表敦煌，后者象征于阗，反映这一时期敦煌和于阗之间紧密的同盟关系。

（撰稿：张小刚）



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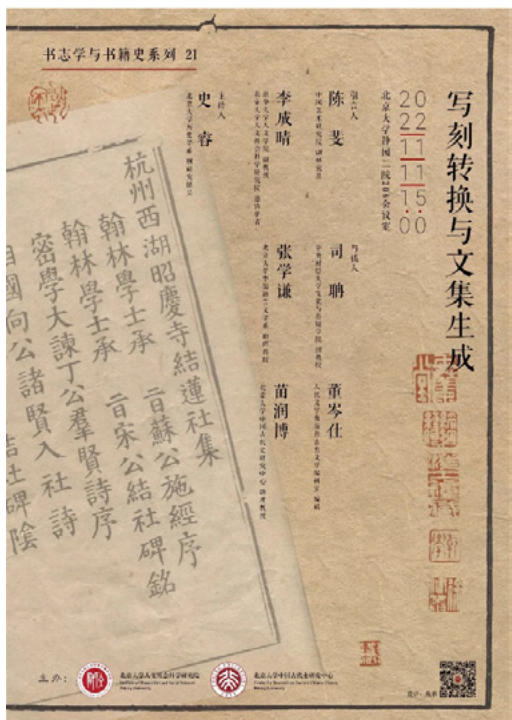
写刻转换与文集生成



【编者按】2022年11月11日下午，“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讲座第21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写刻转换与文集生成”。本次活动由文研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陈斐，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成晴作引言。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司聃、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张学谦、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副编审董岑仕、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苗润博与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万海松，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蔡书涓，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杜以恒出席。

讲座伊始，陈斐老师以“北宋西湖莲社集编纂考”为题作学术演讲，讨论刻本时代一个文本从日常交际中的写物到进入刻本文集时，在内容、版式、署名等方面有哪些延续与变化。西湖莲社是北宋文化史上的重要社团，兼具文学和佛教性质。有学者称其为“目前可以考知的宋代最早的诗社”，社主省常亦被尊为“莲社七祖”之“七祖”。向敏中、王旦、王禹偁等重要人物纷纷投诗入社，但由于距离遥远、公务缠身，大多未能亲临寺院参加活动。莲社这个“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寺方通过编纂社集“建构”、宣传出来的。长期以来，由于史料阙如，国

内学者对莲社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直到近年从韩国流入国内的宋刻孤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面世，才大大推进了相关研究。根据对刻本特征、避讳使用及碳14检测，可确定其最后成编应在大中祥符二年年底前后，付梓最晚在仁宗朝之前。就其版式、行款整体而言，《莲社集》的序文及大多诗文刊刻时，凡遇佛、法席、宝偈、省常（上人、高人、常师等）、昭庆寺、白莲社（社、白莲、莲社）、华严净行品、朝廷（景祚、京师）、君王（圣主）以及三公四辅相关诗社成员等词语，个别作空格抬头，更多的是跳行抬头，以示尊敬。有些形式上未作抬头，



但对敬辞特意作每行字数的调整处理，使之位于行首，同具有抬头的效用。显然，寺方刊刻此集，并未求版式行款的齐整划一而刻意对文字作形式上的编排调整，而是直接根据序文及入社诗的原稿（用于交际的写物）面貌刊刻的。核诸作者履历，序文之署衔与创作时间皆一一对应。然而，《入社诗》中不少作者（特别是官职较高的名公巨卿）的署衔，比该人投诗入社时的职衔要高。这只能是编者在编集时为了抬高身价，根据截至编集时作者最新、最高的职衔做了修订。读者如果仅着眼于书籍外在的版式、行款，极其容易错判。而将孙何《白莲社记》所载社员入社职衔和这些人在其作文时最新、最高职衔，同《入社诗》所署职衔相对照，不但可以确证该人姓名，而且可以探究此人的入社时间及《入社诗》所署职衔是否经过修改、

修改时间大致在何时，进而推断编集过程。

随后，陈老师以陈尧叟与王化基二人的职衔变化为例，指出《入社诗》一方面在版式、行款上尽量保留了诸人投寄时的原貌，这样做既省事，又能显示投诗者对寺方的尊重；另一方面，对有些社员（特别是名公巨卿）的署衔又做了修改。这种修改很可能出于编集的需要。寺方编书，目的是为了弘法宣传，自然要将诸人署衔改为最新、最高的以抬高身价、扩大影响。这是“官本位”社会的普遍心态。比如，别集中尺牍之拟题，交往者的署衔也会在编集时修改为最新、最高者。

《入社诗》的情况与此有些类似。至于有些职衔经过修改，对应的时间互为先后，极有可能是多次不同时间编集、修改遗留下来的“漏洞”，这也符合社员不断增多、社员职衔不断迁转的实情。由此看来，《入社诗》可能存在多种版本，现存者只是其中层累编成的一种而已。

在结束对《入社诗》版式、署衔的讨论后，陈老师继续探讨《莲社集》同样存在的层累递编或续编现象。《莲社集》中，撰写时间最晚的钱易《总序》为柳体，其他部分皆为颜体；且目录中无钱序，故极有可能在钱序撰成之前，该书不但已经编成，甚至已完成雕版，钱序为后来增刻，或许曾有无钱序之印本流传。又《入社诗》中的一些诗作已经提到了莲社集，如苏易简诗云“忽览群公莲社集”、赵稹诗云“每思胜地空开卷”、张去华“相识公卿皆入社，旋吟章句已成编”，这说明作者在写诗入社前，已收到寺方寄来的莲社集。因莲社集主要承担着介绍结社缘起、招徕社员的交际功能，寺方不可能只编

一份稿本给某个特定的人，抄多份的话成本也比较高，故他们所收者应为刻本。另外，《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西湖莲社集》一卷……《续西湖莲社集》一卷。”《宋史·艺文志》：“僧省常《钱塘西湖净社录》三卷。”《文渊阁书目》卷二“月字号第一厨书目·诗词”载：“宋《莲社诗盟》一部四册。”《〔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大昭庆寺”条载：“天禧中圆净大师创白莲社……古刻有《白莲堂诗》《莲社诗》《文殊颂》《入社诗》《真悟律师行业记》《菩提寺记》，皆毁于火。”现存刻本《莲社集》，作为物证，证明书目著录不虚（起码是其中的一种）。由此类推，西湖莲社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活动过程中，随着社员的逐步壮大，层累递编或续编、续刻莲社集的情况是很自然的。

接着，陈老师对西湖莲社的成员及其所编系列社集的内容做了探究。他指出，省常仿效东林慧远发起西湖莲社，据考，社员有八十高僧、一千大众、一百二十三位士大夫。就士大夫这一圈层而言，莲社具有很强的诗社性质，系列社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续编纂的。《入社诗》即士大夫寄呈的诗体“投名状”，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大规模“同题共咏”诗集。其中因多名公巨卿之作，应是莲社编纂的主体和招徕社员的主打宣传品。而《莲社诗》所录，应是士大夫在寺院雅集时闻法随喜赞叹而创作的诗作，或僧、俗社员你来我往的唱和诗。由于距离遥远，加上公务缠身，绝大多数投诗入社的士大夫都不能亲临寺院参加活动。对于这些人而言，莲社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他们投诗入社，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亲佛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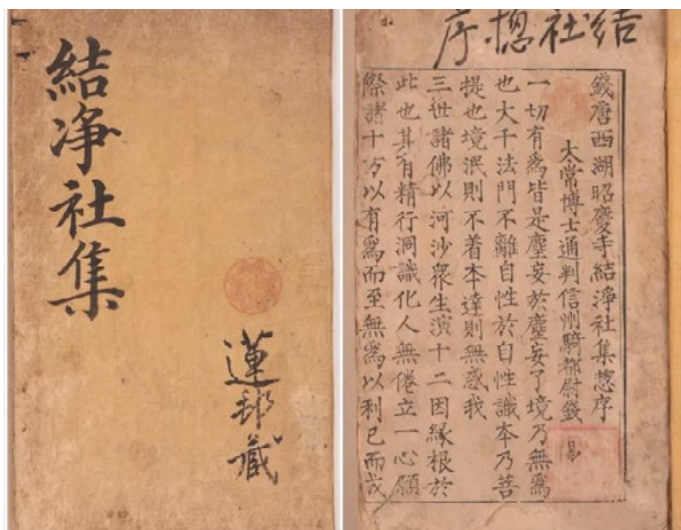
态，或许诺退休后前来清修，或感慨当下身不由己。还有些不一定信仰佛教甚至排佛的人应约赋诗，可能是碍于情面、聊为应酬罢了，然而，寺方为了宣传，也将其作品编入《入社诗》以壮声势。真正能在寺院参加雅集或者与僧人唱和的，应该都是在杭州为官、居住或路过杭州的士大夫，这些人数量不多。

总之，西湖莲社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基于弘法宣传、招徕或联络社员的目的，编纂过一系列社集，呈现出层累递编或续编迹象，符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莲社社员不断壮大、诗作不断累积的状况。由于社集交际功能比较狭窄且需要频繁更新，所以它们应是由寺方或其浼人编纂并版刻的。令人叹惋的是，因为一场大火，寺院及社集版片化为乌有。许景衡曾于宣和七年（1125）赋诗云“莲社群公迹已陈，壁间诗句尚清新”，这天他受邀到昭庆寺吃饭，登临过白莲楼（应即白莲堂），还在寺院墙壁上看到过莲社诸公的诗句（应即寺方悬挂的“诗牌”）。最终该寺应毁于南北宋之交，版片也在付梓百年左右就亡毁了，故这些社集流传不广，宋以后罕见传本及谈艺家提及，近年才有《莲社集》从韩国流归国内。

通过西湖莲社社集编纂的探究，可以看出，在刻本时代，文本也存在从日常交际的写物到版刻文集转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内容、版式、署名等既有延续，也可能发生变化。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改写，都没有任何标识地反映在刻本中，有时甚至是层累式地反映。因此，我们依然要重视文本生成、流传的流动性，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某一形态的文本，可能只是处于不断流动、变

化的文本链条中的一环，要有与链条中其他文本（包括通常文献学上所说的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以及实际交际的写物与随后编集的刻本）比勘异同并探究成因的思维，否则，可能会遗漏文本的很多重要信息及其蕴含的丰富文学史及文献文化学意义。因此，有必要提倡一种“用文献学的方法发现并论证文艺学问题”的研究思路。

李成晴老师从体制、义例角度切入，考察白居易诗在唐写到宋刻的流变过程中，许多卷轴古本中的题下注羸入到诗题之中的现象，并由此讨论南宋绍兴本《白氏文集》诗题的“应然”与“例校”问题。唐宋嬗递，四部典籍的物质性载体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写刻”（或称“抄印”）转换即为其重要内容。但宋刻唐集已是写卷唐集迭经众抄又经版刻后的“固化”之集，其文本面相已经远离了唐集作者的手墨体制和编次义例，而这其中尤其以诗题的变貌最为严重。究其原因，与古人在抄诗、读诗时对诗题、题注不甚留意有很大关系。唐人诗卷中常见的题下注或被有意刊落，或被无意遗漏，或被误抄、误刻而同诗题联为一体，致使后世翻刻传抄之本沿承其误，习非成是。以白诗为例，宋刊《白氏文集》将这种变貌加以固化，并在后世渐渐形成了阴差阳错的制题“传统”。在大部分唐集写卷原本已不可见的情况下，运用本证、旁证并举的方法，总结唐集体制、义例规律，仍能够有逻辑、有按断地对部分羸乱的唐人诗



杭州西湖昭庆寺刻本《结净社集》

题进行“例校”。所谓“例校”，系据唐写卷文集之义例斟理文本编次的变貌，与涉及文字本身正误的“理校”取径同而旨归异。由白诗的诗题、题注入手，可以寻绎出唐集文本体制、书写义例的某些通例，从而为《白氏文集》的文本校勘再进一步。

李老师以元白诗题结穴处的文本体制为例，抽绎三种通例，进而就白诗诗题的“违例”之处进行例校。继而，李老师指出，在唐诗篇章这种不同文本单位区隔正、副文本的秩序里，会有特定的文字充当标识词，将这类标识词发现并提取出来，即可以梳理出唐人视野中副文本诗题、诗注与正文本文诗题之间约定俗成的“应然”义例。唐诗文本体制、义例既明，则可以反过来依例检视一篇唐诗的正副文本中是否存在文本羸乱导致的变貌，进而予以例校。比如，唐人诗题，每以“时”字引起题下自注，用来对诗作本事背景进行补充诠释。在唐诗传写、传刻的过程中，“时”字引起的题注很容易羸乱而进

入诗题，如白居易著名的《观刈麦时为盩厔县尉》诗，宋绍兴本《白氏文集》载“时为盩厔县尉”为小字题注，尚存唐卷旧貌；而《四部丛刊》影日本古活字本则作《观刈麦 时为盩厔县》。像“时为盩厔县”这样抄作大字（漏抄“尉”字）但实际文本性质属于题注的例证，在传世唐写卷、诗刻中尚有其佐证。一个字符的空格，也向世人昭示着此后五字并不联属于诗题这一文本单元。同时，考察元白诗之“时”字界分诗题、题注的规律，可以推广开来，从而考察传世唐人诗集是否也存在着类似题下注入诗题的变貌。

检视唐集，我们还可以发现唐集中人物类、名物类诗题及题下注的通例性规律。题下注与诗题往往有重文，一望而知诗题与题下注具有对文互补关系。此外，唐集诗题的题注还往往起着解释补充诗题的作用，由此义例，我们得以考察白居易诗题中人物诠释入题注、名物诠释入题注两例。关于前者，唐集有关人事的诗题、题注具有一通例，即题注在解说人物、本事时，往往称号、文字重出，这其实可以作为厘分诗题、题下注“应然”规律的一条重要线索，如《神照上人照以说坛为佛事》《送武士曹归蜀士曹即武中丞兄》。此外，部分写本（如日本藤原行成写《白氏诗卷》）在抄诗时并无题下注，盖以其为注释性子注副文本略而不写，这样的书写传统，实际上是很多唐诗题下子注剥离、遗落的根源。至于后者，则有《竹部石首县界》《褒城驿军大夫严秦修》等例。饶有意味的是，白诗题注诠释地名时，与诗题之题末结穴常常形成顶真结构，如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卷十二《真娘墓墓在虎丘寺》、卷十三《题

故曹王宅宅在檀溪》。这类顶真结构也见于他种诗题，如《白氏文集》卷十五《蓝桥驿见元九诗诗中云江陵归时逢春雪》。

需注意的是，在北宋及以前的文献传抄时代，文献传播方式复杂随机，抄写者在处理具有特殊体制、义例的文本时，往往会有多种呈现形式。以诗题、题注而论，要么会在传写过程中将题注删落，要么保留题注但呈现为多样的结构状貌。保留题注者又分为多种情况，或抄为双行/单行小字注，或抄为旁注。并且，题下注也并不一定是小字，而是与诗题相同的字号，仅空一到两格，这样宋代刊刻唐集时很容易将题注与诗题联为一体。因此，更需关注对诗题、题注厘分“应然”规律的提取，而不是主张对已不存世的唐集写卷进行“实然”的复原。我们在整理古籍时，难以也并无必要将其全部还原为写本的初始面貌，因为各种变貌甚且可以用“惊心”二字来形容。唐诗诗题、题注的紊乱，随着年湮世远，反而“积非成是”，明清诗人在制题时有意模仿唐诗的文本体制、义例，并没有悟出所模仿的文本模式可能并非唐集诗题原貌，比如汤鹏《寄李碧珊观察时碧珊遭劾去官屏居鄂渚》、查慎行《虎林与同年许莘莖话旧时初自蜀归四首》等，实则唐诗制题例皆以“时”字引起题下注。汤、查之所以如此制题，显然是沿袭了宋刻本唐集经过紊乱的诗题“传统”——这其实是文学文本流变史上的一桩公案，也是文化传承脉络里的一大误会。

评议环节，司聘老师首先指出，西湖莲社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为我们揭示了早期文学社团的特点与组织形式，也反映了当

时比较真实的文学心态。陈老师的演讲材料翔实，意义重大，具有宏阔视野。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丰富了文学文化史的相关内容，也提醒我们依据结衔判定年代的“危险”之处。同时也揭示了刻本时代版本演化的重要性，以及文本修改背后隐藏的文化意图。李老师的论述也颇具启发性，“例校”事实上是当时普遍行用的一种“规范”。若将该题延展，则苏轼作诗时也惯用长题，可供参据。此外，中唐以降，诗题变长，叙私事变多，体现了某种独特心态，或可称为“心灵史动机”，亦值得关注。

董岑仕老师认为，陈老师的研究不局限于文献，而是进一步探索文献背后反映的编辑过程及文艺思想等话题，纯粹由版本目录视角出发探索的话，有些问题或许就会埋没不显。但文章对《通志》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的史源关系、对疑似伪作《蒙竹堂书目》的使用等问题仍待进一步考量。关于李老师的研究，在写刻转换的视域下，以白居易为中心，探讨唐人诗题的制题通例，以期作出合理的例校。部分传世唐写本与宋刻本可以比勘，写本与刻本之间也有如双行小字注的体式变化痕迹。制题和自注而言，“注”是极其重要的纪事性“副文本”，李老师的研究，既涉及文献整理层面的考证，也关乎对文本之外写作场景的还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够关照对唐宋诗歌叙事性的加强、中唐以来文学的“日常化”等问题的研究，这些都是校勘问题之外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董老师也结合自己的研究及校勘



讲座现场

《王安石诗笺注》中李壁注的经验，对写刻转换中的诗题小字问题进行补充。

张学谦老师提出，陈老师的研究提示了刻本时代文本的生成与编纂这一复杂问题，但其中的变化并不取决于写本与刻本的不同物质形态，而是从篇到集的变化，根植于作者及作品承载功能的转换。关于《莲社集》，其具有宣传作用，尽量保持最初体式即与此性质相关。一般而言，古人将诗文集扩编时，会尽可能使用旧版，如有职官题衔变动，则需挖版修正。但今存《莲社集》并无任何挖改痕迹，由此版本实物来看，如何证明《莲社集》是不断递编的产物，仍需其他证据。李老师的研究以“例校”为名，相当准确合适，展示了从对义例的总结和认定入手推进研究的路径，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不仅有方法论方面的启发，还能助益文献整理，以当代的研究成果推进整理与复原工作。但讲座中所举《论语义疏》之例，由于不能直接证明其中朱笔标记为何人所写，恐怕难以作为论据。

苗润博老师认为，“刻本时代的文本生成”之题与讨论内容似有脱节，后者强调的是文本的不断编次，尤其是在刻印之前修改文本的问题；应关注到其实用性的性质，并考虑在跳出佛教式结集的文本属性后，《莲社集》的定位及其文本典型性所在，由其特殊性出发讨论；研究所及部分文献的史源问题也值得重新考察。此外，对“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使用也须斟酌，这或许只是某种“应酬的共同体”，成员对这一“共同体”的归属感与参与“共同体”运作的程度难以判断，应关注文本背后真实的历史情境。关于李老师的演讲，“例校”概念的提出非常符合当下古籍整理工作关心文献体制的需求，从“是非性”校勘走向“源流性”校勘。但研究似乎止步于“例”的内容（平面），而相对忽略了这种制题传统形成的过程（流动），后者更关乎文献体式的变化脉络。此外，“变貌”等词语的使用似亦可更简练直白。

史睿老师总结道，回到历史原境，需要多样的证据与路径。如针对《莲社集》反映的社员、寺院与莲社整体间的关系，可以参据不同种类的史料，建立跨载体形式的互文性。关于《白氏文集》诗题的大小字问题，

则应打通写本与刻本的界限，尤其需考察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多级用字实例。史老师也结合自己对黄伯思《东观余论》的研究，提出要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书籍史问题，从碎片到整体。

随后，两位主讲人作出回应。陈老师指出，由写物到刻本的转换，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命题，诸位老师所言由篇到集而生的文本功能转变等等，都很精辟，也都可纳入此框架继续研究；《莲社集》对时效性要求较强，有联络交际功能，现存刻本明显取材（刻版木料）不精，故其递编后应该主要通过重刻而非挖版更新（修订不仅涉及职衔更改，还有次序调整，后者挖版无法解决），而且，多次递编迹象可能层累式地呈现在一次刻版中。李老师则就作者自注与诗文本本身的时间关系、“习非成是”的历史进程等问题进行回应与阐发。接着，会议进入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围绕双行小字注的源流与行用、《莲社集》的再版或挖板与否、文本流动性等问题展开讨论。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撰稿：徐伟喆）



文研读书

39

王裕华：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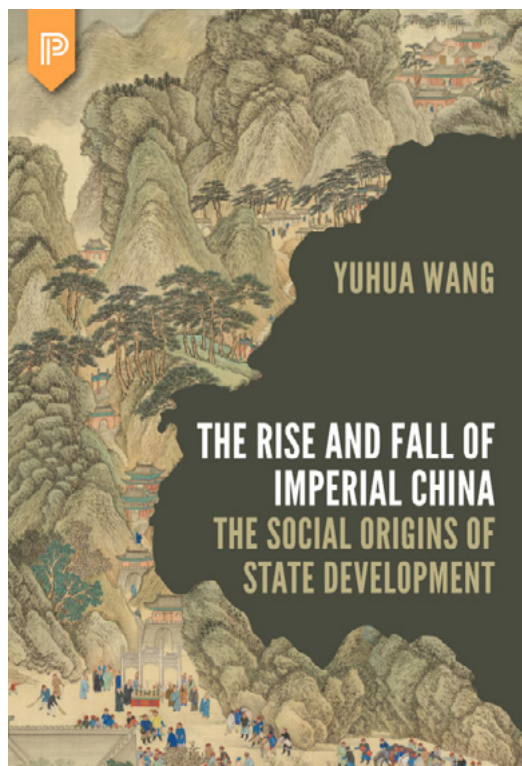


【编者按】2022年11月23日晚，“文研读书”第39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王裕华主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与谈。本次活动由文研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

讲座伊始，王裕华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皇帝的命运与国家力量的联系。一方面，中国古代皇帝中只有一半是自然死亡，剩下的一半里大多数都是被精英推翻的。而皇帝的命运大致以唐宋之交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皇帝死于非命的比例更高，统治时间普遍较短；在此之后，皇帝的统治时间则大大增长。另一方面，考察中国古代的财政政策，可以发现唐宋之交也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增税政策更多，之后则反之。人均税收与财政政策情况类似，也是在唐宋之交达到顶点，而此后除了明前中期的高峰，基本呈下降趋势。鉴于二者相反的趋势，王裕华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短命的统治者治理一个强国家，而长命的统治者则控制一个弱国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绝对君权的巩固和中国帝制国家的衰弱？

接着，王裕华老师介绍了相关的学术史。较早思考这些问题的是以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及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为代表的亚洲停滞论。此后，尤锐（Yuri Pines）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着手，指出儒家塑造了帝制中国的国家形态。二者的共同点是强调国家起源，将早期中国的一些要素视为是经久不变的，其缺陷是无法解释历时性变化。历史学方面则有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费正清等人主张王朝更替理论，但皇帝命运和国家力量的变化不是朝代内部的变化而是跨越朝代的变化，因此王朝更替理论也无法完全囊括之。最近的社会科学涌现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等理论，不过只关注帝制中国的开头和结尾，未能解答中期过程的变化。

因此，王裕华老师开始尝试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更为合理地解释这两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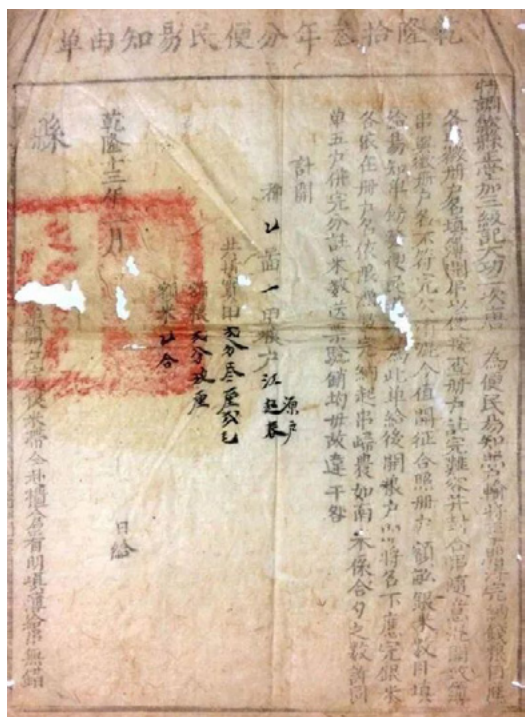
王裕华著作《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书影

王裕华老师观点的核心是君主的困境（the sovereign's dilemma）——任何皇帝都面临扩大君权和增强国家力量两大目标，而这两个目标往往无法并存。比如，如果皇帝选择扩大君权，则势必要削弱精英，这将削弱国家力量。《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一书要论述的，正是君主的困境在不同朝代如何显现。

王裕华老师接着介绍了其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数据和方法。他将帝制中国的社会精英结构分为两种模型：星状结构和领结式结构。在星状结构中，中央官员在星状中心相互联系（通婚），并广泛与处于星角位置的

地方精英联系。在领结式结构中，中央官员互相缺少联系，但选择跟特定地域的地方精英联系。这两种模型可以演化出一个假设，即星状结构不利于君权，但有利于提升国家力量，领结状结构则反之。因为在星状结构中，中央官员联系紧密，与地方精英联系也十分广泛，这使得中央官员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提升国家力量，以保护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关系网络。领结状结构则反之。

具体到每个朝代，王裕华老师指出从秦到唐以星状结构为主，从宋到清则以领结状结构为主。由此可以看到，结构变迁仍然发生于唐宋之交，因此需要重点关注这一节点。在研究过程中，王裕华老师接触到了北宋名臣富弼的墓志铭，因而察觉到墓志铭蕴含的重要史料意义。此后，他系统收集传世文献和墓志铭中包含的从三品以上官员的家庭关系网络，单是唐宋时期的家庭关系网络就涉及 4190 位官员和 42157 位关系网络成员。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经过分析，王裕华老师指出，唐朝是典型的星状结构，中央有两百多个主要门阀士族垄断官位，相互通婚。该结构可能在晚唐气温下降及随之而来的黄巢起义后瓦解，因为地方无法继续为朝廷提供足够的官员。因此，宋朝必须系统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人才，这导致了精英的“地方化”和精英网络地方化。这一转向的影响可以在王安石变法中得到验证。比如，王安石家族的地方化指标很低，因而希望推动国家改革；其政敌之一吕公著的家族地方化指标则较高，因而倾向于维护地方利益、反对改革。总而言之，唐宋之交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中央官员之间的联系削弱，宋代



清代的钱粮师爷的“便民易知单”，用以通知纳粮农户

皇帝将之加以利用以加强君权；精英家庭关系网络地方化，中央改革意愿下降，转而专注地方利益。如此也就能解释此后君权上升和国家力量下降的趋势了。

接下来，几位与谈人逐一发言。赵世瑜老师说，王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明确表示，“我没有研究历史，我是通过历史来研究政治”“历史只是我研究政治的一个窗口”。所以，正确的历史认识很重要，是社会科学解释模式能否成立的基础。比如本书的核心概念“精英社会域”（elite social terrain），用同一个含混不清的 elite 概念来指称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集团，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这个概念中的“精英”在北宋前后已经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在帝制晚期社

会史研究中，local elite 指的是形形色色的控制地方权力的人群，与中央高官很少重叠；所谓“精英地方化”不仅指平民阶层可以通过科举上升为中央高官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指出现了各种在地的“精英”力量。换句话说，此前的“地方社会群体”变成了此后的“精英”。再如，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弱君主能统治一个强国家，而强君主反而导致一个弱国家，宋代以后的国力日益衰弱。这个国力的数据是按岁入（特别是田赋收入）算出来的。必须要清楚，政府的岁入绝不是国家财用资源的全部，更不能用来代表国力。以明代为例，上供物料有多少、作为服务的徭役怎么算、户部之外其他部门的收入有多少（比如作为另外一套国家管理系统的卫所屯田），加起来是怎样一个数？同样，清代内务府的收入（不能只理解为“皇帝的腰包”）、分布于各地的各类八旗旗地上的税收和物料等，也不算在这个户部岁入里面。所以，至于如何估计明清时期的国力，还要慎重。本书的结论是，正是因为国家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在前者衰弱的时候，地方精英可以接管对社会的控制，才使国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稳定，而 19 世纪的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打破了这种平衡，最终导致清朝国家的衰亡。依作者的看法，就是那个传统的“精英社会域”被损毁或颠覆了。不过，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晚明以来的赋役册籍系统的建立有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从地方上的各种户籍册和地籍册的编制到省以至中央的《会计录》和《赋役全书》可以看到，国家可以按同一种原则和方式控制人口和土地。这种体制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民国，从内地一直到边疆。在

这样的机制中，哪些人在发挥作用？又如何用“精英社会域”加以解释？事实上，原有的“精英社会域”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或者说，转变成为一种内部关系结构不同的新的“精英—民间社会域”，并与国家重新建立联系。因此，精英社会网络的变化不仅仅是中央—边缘的位置调整，该网络本身的性质和运作逻辑也在改变，研究者必须慎重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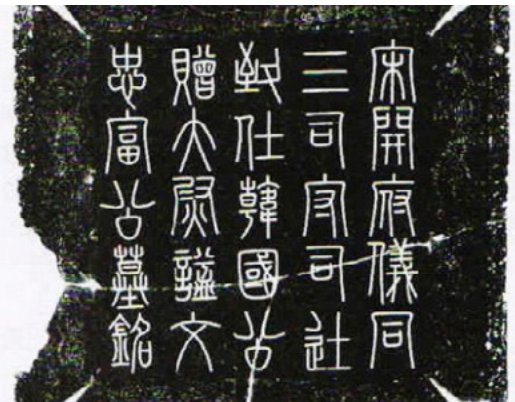
张静老师认为，王老师的研究胜在数据的系统性，很难彻底推翻，但需注意辨析精英行为背后的基础。比如，如果亲缘网络越是遍布全国的精英，越在态度上支持国家变法，那么这些地方精英，是希望这个法律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是希望以支持国家的态度，营造一种关系，从而能够通过和国家的关系保护自身利益？这两种情况下国家都可以增强自身的能力，但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一个是法治（制度基础），一个是关系（网络基础）。张静教授提问，精英的行为为何只是基于已知的确定利益，而不是创造利益机会，从而能够进入皇权庇护网络，或者颠覆这个庇护网络？这里存在理论预设的变化：以社会结构业已存在的利益关系作为解释变量，还是关注精英宗族的战略行动创造关系，追求形成新利益，作为解释变量，更能够贴近历史现象？

张泰苏老师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古代王朝财政能力的确从宋开始呈现宏观上的下降趋势，而其中关键的节点是宋朝和清朝。宋朝是常规汉人王朝中的异例，清朝则是异族征服王朝，出于意识形态实行超低税收。这样来看，研究者是否需要一个统

一的模型来解释不同朝代的变化？其次，政治精英网络与军事权力网络不一定重合。在中国古代，军事权力对君权的威胁比士大夫精英更大。而且二者逻辑相反——精英越地方化越安全，军事权力则反之。那么，研究者应该如何处理不同权力之间的张力？

严飞老师也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国家力量分为两个面向：对外扩张与对内攫取，后者又分为暴力和意识形态两种方式。因此，强国家不仅意味着财政收入的提升，更要考察意识形态能力和公民服从度。其次，精英与统治者之间有不断的回合互动。精英可能在上一个回合提出反抗，在下一个回合则表达忠诚。那么精英做出决策的出发点未必是静态的精英家庭网络，更多是不断的回合互动。

随后，王裕华老师对各位与谈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并一一作出回应。对于财政能力和国家力量的关系，王老师认为财政收入作为研究上千年历史的指标的确不完美，但却是最好的。而徭役等攫取形式之所以存



富弼墓志盖

在恰恰是因为国家力量弱，无法负担常规雇佣成本；内务府是皇家收入，与国家力量无关。此外，田赋的确在国家财政中占主要地位。因此，通过田赋收入衡量财政收入，进而衡量国家力量的方法仍是合理的。对于精英为何不创造新关系和新利益的问题，王老师认为科举的竞争性导致精英倾向于维护地方关系网络，而非开辟新的利益。对于宋朝的特殊状况，王老师指出，宋朝中央官员党争严重，有利于外敌入侵，因此仍与精英关系网络的变化相关。最后，王老师将历史学

研究比作写实派，将社会科学研究比作印象派，强调了理论构建的重要性。

讲座最后，与会观众热情发言，提问涉及古代中国远距离姻亲网络的社会条件、元清两大异族征服王朝的精英网络情况、星状和领结状结构中精英竞争的程度、君主方面对精英网络的利用等方面。王裕华老师逐个予以简要回答，此次读书活动至此圆满结束。

（撰稿：李果安）



文研经典阅读

05

王权中的正统论与神秘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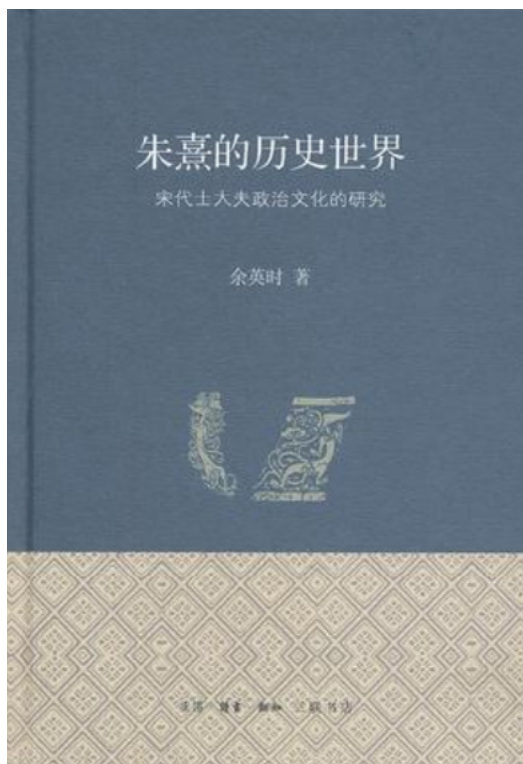
【编者按】2022年9月至10月，文研院“王权中的正统论与神秘论”主题系列研讨班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1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班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老师，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刘寅共同发起，希望从“王权”(kingship)的两个基本层面——即作为权力的王权和作为王权正当性规定的“道统”的关系出发，来检讨王权的构成。2022年秋季学期，主讲人高波老师以余英时先生名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为导引，探讨从“政教关系”出发的政治史写作。

第一次研讨围绕《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道统”论述展开。高波老师首先介绍了本学期四次研讨班的大致思路与安排，接着进入《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对《中庸章句序》的文本分析。高波老师谈到，《中庸章句序》是两宋道统论叙述的典范文本，朱熹将上古圣王时代与孔子以降的新时期做一划分，孔子之后至两宋的千余年被当作是圣王不再的漫长等待期。在宋代的道统论中，“君”成为了一个需要被士大夫“改造”的角色，更近于士大夫行道的“工具”。在讨论环节，孙明老师评述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并指出北宋以降的王道观念与汉唐有根本区别。刘寅老师指出，“致君行道”与“得君行道”间存在明显的主体意识上的差异。田耕老师则就“天下”与“道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阐发。



研讨会现场

第二次研讨主要关注宋明理学传统中对“相”的理解。高波老师首先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宋代政治文化中君相关系的论述，接下来介绍了田余庆、邓小南、方诚峰等学者对帝制时期君相关系模式的解释，并探讨了在朱熹之后儒学传统中对“相”“禅让”的不同解释与讨论。刘寅老师指出，在西方中世纪史中，君相关系这一问题并不突出，



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书影

王权的扩张并不体现为相权的衰落。刘老师还就《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的君相关系解释的可商榷之处以及“士大夫政治”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中的解释力谈了自己的看法。田耕老师认为，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的历史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与道统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田老师进而对这种思想史写法可能存在的“洞见”与“不见”谈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次研讨从《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有关“皇极”的论述引入。高波老师指出，《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关于“皇极”的讨论从属于书中对“国是”问题的解释，本书上卷对“皇极”的解释与下卷对宋孝宗时期政治文化的分析有很大的关联。余先生对孝宗心术

的心理史学分析构成了下卷的枢纽，读者在这部分也可以看到理学心性论对作者历史叙述的影响。田耕老师提出，可以借助人类学中的“自我献祭”来理解孝宗对其父高宗的心理。田老师认为，改革派士人需要一位“非例行化君主”来促成他们“行道”的理想，但韦伯所论的“卡里斯马型君主”本身就是真正的政治行动者。就此来看，“得君行道”的政治实践模式存在很强的内在困境。刘寅老师谈到，余英时对朱熹《皇极辨》的解释与后王安石时代对“得君行道”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仍然可以看到较为强烈的作者个人印记。

第四次研讨围绕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论》与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两个文本，探讨晚清以来的“君主专制”问题及其批评。高波老师指出，中国现代转型中对“君主专制”问题的认识，构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关于“政教关系”论述的思想背景。在梁启超的论述中，“专制”被认为是政体进化过程中仅次于民主制的较高阶段，还未被完全负面化。钱穆则更强调士大夫的平民特征，否认士大夫与贵族的关联。余英时是以上二十世纪学术论争的综合者，钱穆与梁启超的论辩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都有曲折的体现。田耕老师指出，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我们不可能抛开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代去认识它们之前的所谓前近代“传统”。当代学者也不可能绕开民国学术去理解帝制时期的“中国传统”。田老师还谈到了近代早期与法国大革命后对“开明专制”的不同理解。刘寅老师进一步谈了“开明专制”论在 17、18 世纪的语境，并将梁启超、钱穆的论说与

日本京都学派作了对比。孙明老师认为，道统论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比较有政治哲学意味的一种学说，为士大夫追求良政提供了持续的驱动力。此外，几位老师还就如何调用合适的概念工具解释古代历史现象进行了讨论。

以上四次探讨是本研讨班的第一部分，2023年春季学期，本研讨班的第二与第三部分将继续进行。主讲人刘寅老师将以《国王

的两个身体》为导引，讨论不以“政教关系”来描述王权的政治史写作。在年度研讨班的最后，田耕老师将探讨韦伯学说中的卡里斯马型君主与传统型君主，并对本次讨论课的主题作一整体总结。

（撰稿：杜泽宇）



北大文科创新讲坛

21

贺桂梅：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与创新



【编者按】2022年10月27日下午，“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六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与创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主讲，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章永乐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与谈。本场讲座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主办。



贺桂梅老师在讲座现场

一、解题：四个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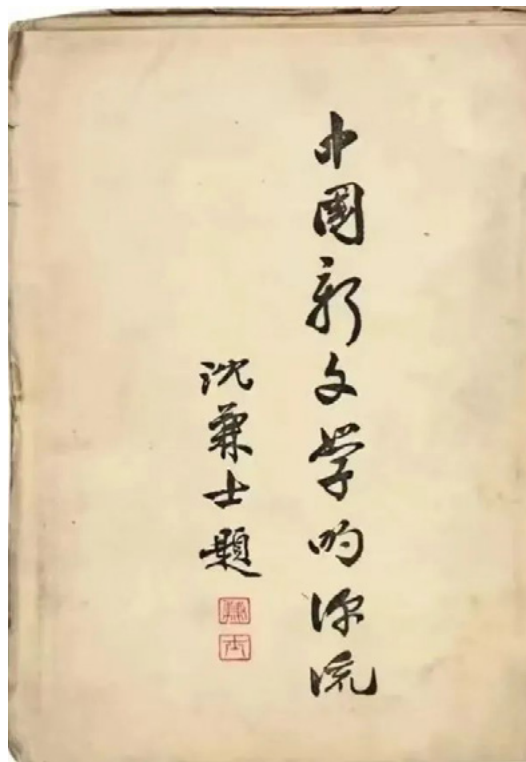
讲座伊始，贺桂梅老师用四个关键词对本次讲座讨论的主要范畴及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和界定。

第一个关键词是“百年文学”。它涵盖“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整合性范畴，与“新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讨论常相关，

并与“古代文学”相区别；而当“百年文学”作为讨论对象时，其实际上也被历史化，并反过来界定了所处“当代性”的位置和立场。

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学史研究”。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与学科体系、大学教育、专业体制联系在一起，决定着一个时期研究的主导规范；不仅指文学史著作，更是一个包括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总体性概念和“统一场”，从形式上也包含了文学史教材、专著、论文（集）、丛书或大系编纂等多种样态。

第三个关键词“范式”是本次讲座最核心的概念。“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库恩认为，任何研究都包含着一种“常规”的科学形态，凝聚着从事这些研究的共同成员，他称之为科学家共同体。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分享着



初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影
北平人文书店 1932 年版

相近的研究理念，试图去解答大家有共识的那些问题。所谓“常规的科学”，即共同体一起“解谜题”。但在某些时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常规科学”无法解答的现象和问题，由此引起范式的危机，需要通过探索而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库恩将之称为“革命”，并强调“范式”在所有的研究当中具有优先性。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思考学科创新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

第四个关键词是“（跨）学科”。文学史研究既是文学研究，也是历史研究。必须要把握一些史学的前提，才可能对文学现象进行理论化和秩序化的整理；同时，要将文

学史研究放在 20 世纪现当代中国文学学科建制的历史视域里展开。本次讲座讨论新文学史研究三个主要范式的变化，涉及对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追溯，同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跨学科视野，将文学史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当代中国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文科建制史互相参照。

二、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三种范式

贺老师提出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并从六个要素来比较这三者，即处理的核心问题、代表性著作、主要体例、理论资源和关键词及学科化特点。

1920—1940 年代的启蒙范式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处理古与今的关系。最初的论述策略是如胡适《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1922 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年）等将新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书写中，强调“今从古出”。但是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推进，对新文学之不同于古代文学的独特性即“今别于古”的关注，越来越成为新文学史研究的主导方向。1935 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由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如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等按照文体编选作品，是新文学自我历史化和经典化的标志。

启蒙范式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是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提出的关于新文化、新语言、新伦理等理念，关键词主要集中在“新”“文学”“人”“国语”“运动”等。

此时，新文学开始进入自我经典化的过程，尚未学科化，主要研究形式是学术性著作，包含个人著作、课堂讲稿、文学大系等。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范式”也可称为“准范式”。

1950—1980年代的革命范式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同时在新文学内部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将其区分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即五四新文学运动到1949年之前，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而1949年之后的文学则称之为“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或社会主义的文学。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两卷）、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等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并在1970年代后期形成独立专业方向的诸多当代文学史教材。这些著作的主要特点是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原则来叙述新文学的各种现象和作家作品，同时继承了之前的新文学史按文体编排的基本叙述体例。

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为专业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实践而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推进，具有自我规范的特点，关键词涉及“人民”“文艺”“社会主义”“阶级”“反帝反封建”“民族形式”等。可以说，革命范式塑造了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学科体制和格局。

19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当时的青年学者提出了整合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范畴，凸显文学的独立性，并用“现代化”的统一标准来整合现

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重视其连续性而非断裂性，在当时的文学史研究中具有一种范式革命的意义。新范式提出了一个旧的新问题、新的旧问题：中国文学为什么没有完成现代化或如何完成现代化？学者希望以这一问题序列来“重写”此前由革命范式主导的文学史。这一范畴偏于理论性，其文学史实践仍在探索中。粗略来说，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后，这一可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文学史研究仍有着较大影响力。

现代化范式的理论资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科学界提出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Michael E.Latham）追溯了在六十年代冷战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界如何提出了现代化理论并迅速地被美国政府采用为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进而在逐步扩散中蜕变为普遍的意识形态。

此外，贺老师在《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讨论了80年代的六个思潮，认为推动80年代发生理论和话语范式转型的实则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并非美国的移植或翻版，而是在全球性知识扩散过程中的重新转换。对此，罗荣渠在其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中也有讨论。

在80年代的全球现代化意识形态中，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强调的关键词是“现代化”“人性”“文学性”“民族性”“文化”等。其特点是当代中国学科体制内部的自我变革，以专业化和文学研究的专业自主为基本诉求。

三、三种主流范式面临的危机及当前研究界的创新诉求

作为一个时期常规研究的主导性规范，三种范式是在对立、转换的过程中陆续出现的，相互间有诸多不兼容性。比如新文学启蒙范式为确立自身合法性，将晚清文学和古典文学作为“敌人”。现代化范式则提出要“重写”革命范式的文学史，其中受到的最多质疑，是难以包容或更充分地展示革命文学实践的丰富性。

三者虽有很大的差别和矛盾冲突，但皆为现代性内部的范式。其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有意无意地携带着某种西方中心主义，难以包容中国文学传统和中国现代性经验；其次，难以呈现现代性以外的文学因素，并将现代性作为规范百年文学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难以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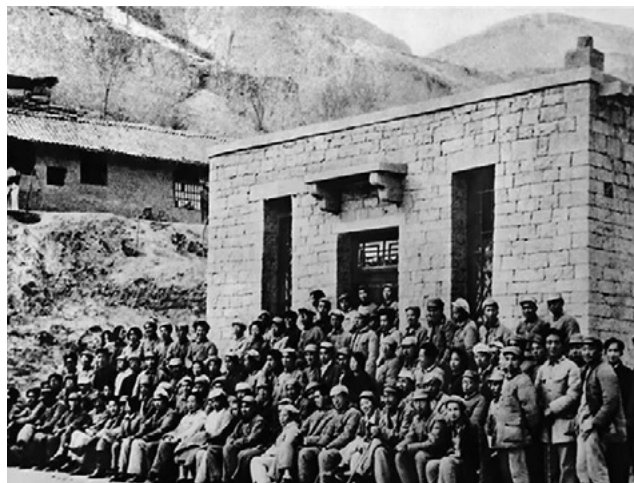
此外，三种范式的危机还表现在学科体制的固化，以及由于过度专业化导致的“封

闭性”，无法与当前社会现实互动。同时，受到解构“总体性叙事”的思潮影响，文学史自身也面临着理论上的合法性危机。

值得提及的是，21世纪中国和文学也发生了诸多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作为曾经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如果仅用西方式现代化标准，则无法呈现中国的独特经验；第二个变化是中国在21世纪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相对于20世纪的“崛起”和“文化自觉”，这种变化也相应地对文学史研究范式提出新的诉求。第三个变化是文学的变化。20世纪的文学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介都更占据现代性文化建构的核心位置；但在21世纪，文学不再享有中心位置。此外，从学科史的角度考察，学科体系也有自身创新的需要。启蒙范式致力于确立新文学的主体地位，创造现代性文学；革命范式追求革命实践的合法化，并创造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现代化范式则完成了西方式理论的移植与中国转化。到

21世纪，真正需要的不再仅是中国文学与文学学科的现代性构建，而应当创造既包容也超越现代性的新的学科话语体系。

以上诸多变化使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以上三种文学史研究范式之中，而出现了新的诉求与尝试。第一是从国家建设层面提出的中国主体性话语重构的诉求，也即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中国自主性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等，背后是中国主体性的凸显。第二个层面是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摄于1942年

文学史研究中史料学和文献学研究整理的热潮、古典学的兴起等，使“古今之战”等问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而驱动人们去探索更有包容性的描述百年文学的研究范式。第三是文学创作本身的变化，文明传统已转化为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部分，诸多重要作家创作和文学现象中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文明整合意识。第四是近年出现的新的文学史尝试也值得关注。如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事件史的方式，通过具历史标记性的时间节点上出现的文学事件，来勾勒四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图景。值得提及的还有王德威、陈国球等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抒情之现代性》等著作中提出用“抒情传统”来构建“以古通今”的文学史等。

以上诸多实践和现象已经松动了此前固化的对于文学史及其三种主要范式的理解。目前，学界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还需要文学史”，而是“能否从批判性反思的角度构建出具有 21 世纪中国当代性特点的文学史”。

四、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构想

贺老师尝试提出更具包容性、整合性的新范式构想，以呈现中国百年文学的三重性，即现代性、当代性（革命性）、文明性（传统性）。贺老师指出，文学史研究范式背后都包含着如何阐释“中国”的视角。比如，启蒙范式背后有关于“除旧布新的中国”的理解，革命范式的主体是一个“不断革命、自我推进的中国”，现代化范式则隐含着“自

我改造的中国”的民族意识。而以上三种范式都无法描述 21 世纪位置变换、主体性更强的中国。贺老师谈到她关于 21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观察到中国知识界在 21 世纪的三个十年中，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向“文明自觉”的变化。

文明史是“总体史”，也是“新世界史”，要探索新的文学史研究方式，需要从重新阐释“中国”开始。关于“文明”内涵的问题，贺老师指出，“文明”早已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名词，其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是超大型政治体；其次，文明不止一个，需要建构“复数的文明观”。她认为，文明史（新世界史）的相关研究，成型于 1960 年代的西方史学界。布罗代尔(Braudel)的“总体史”观，汤因比(A. J. Toynbee)、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等人的研究，都涉及如何以“文明”为单位来叙述更为完整的世界史。90 年代初期，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实则是在这样的文明史脉络中提出的。而中国知识界从 21 世纪开始的文明自觉，也是在这样的世界性对话关系中产生的。如费孝通在 20、21 世纪之交提出“文化自觉”，提出文明的特点不在“冲突”而是“融合”“交流”，而文明交流的前提是文化自觉。这就是在与亨廷顿对话，并引发了知识界的相关讨论和实践。

因此，贺老师指出，重新阐释中国百年文学史，前提是把中国视为一个文明体。文明史视野对百年文学史研究提供的启发，可以概括为五个维度：

第一是中国主体和中外关系。“文明”是从新世界史视野提出的范畴，因而要破除

西方中心的现代观和世界观,将“世界”看成是多个文明体的碰撞和交流。历史地考察中国百年文学如何融入世界、转化自身,如何又保存了它作为文明的边界,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用新的方式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

第二是用“文明体”阐释中国的“多元一体性”。这种内在多元性与现代性整合的过程,也是中国完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过程。具体内容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二元结构、内陆与沿海、两岸三地等文学的不同展开形态与相互关系。主题是中国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如何通过文学而得以塑造,尤其是其中溢出西方式国家与文学关系的地方。

第三是古今关系。“从古看今”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普遍思潮,同时也需要“从现在发现传统”的分析视野,重点是处理文明范畴所体现的古今连续性和变异性的辩证关系。其实,“新文学”之“新”即一直包含着“复兴”与“进步”的交错,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百年”的起止时间点以及如何处理百年文学现代性转换的不同时间层次与速度等。

第四是文明范畴的总体性问题。文明体是非均质性的,包含了上中下等不同层级。百年中国与文学现代化的转化过程,就是将其整合为一体的过程,因而在书写百年中国文学史时,需要同时处理日常生活、文学场、经典等多重结构的不均衡性。

第五是文明视野中的“文学”。这一维



线下会议现场

度需要处理的是内与外、心与物、精神与符号的表达形式问题。核心在于既将现代性文学(Literature)做历史化理解,也要从当代性视野重新理解中国文明传统中的“文”“文章”等的变异性转化。

从文明视野理解百年文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文学史的三重关系:文明特性是百年文学的土壤和基础,是多元现代性的来源;现代性是一种断裂性创造和重构,而且已经构成了中国和中国文学自身特性的一部分。但文明传统和现代性文学呈现出更具时代性的文学史面貌,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当代性”的历史内涵。

贺老师强调,“文明”从来就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范畴,而是一个阐释性同时具有一定边界性和稳定性的范畴。将文明话题引入百年文学史研究,要避免一种“文化宿命”论的思路。关键在于,文明的内涵是当代性视野中的创造性建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中国,如何把中国创造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文学史也不是一套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能动

的理解历史世界和文学的方法，关键在于如何释放其批判性反思性力量。

与谈环节，渠敬东老师指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词。一个是“panorama”即“全景式的分析”；第二个就是今天讨论的核心概念“范式”。只有在全景意义上，才能去考虑范式的转换的核心问题；如“启蒙范式”最重要的整体性的基础即五四运动，而“启蒙范式”独特的文学运动是连接着整个西方学术意义上的思想运动，它提供了“新古典学”的很多范式，给予文学史写作新的面貌。“启蒙范式”对文学史建构的“士人传统”提出了挑战，由士人推动的白话文运动，体现着文学史意义上的两种矛盾性。

至“革命范式”，其实已把庶民和士人的关系问题转化成“我”与“非我”之间的关系，并基本确立了“非我”属性的完整格局。因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贡献在于它彻底打开了中国人关于“天地”关系中“大地”部分的理解，赋予它非常多的重要含义，并以“大地”为基础的所有概念来吸纳人的个别性。

而“现代化范式”本质上是讨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的问题，包括表达、心理、情感、现代人和世界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传统的文学，无论是创作和研究，在当下其开合度已经不够了，已不能启发安慰、扩充生长今人的心灵。因此，只是重返所谓中国以往的传统是不够的，这是贺老师强调的当下性的意义。所谓“文明体”是一个集成过去与未来、起源与乌托邦的终点，内世界与外世界的整体，且要不断去吸纳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因素。

无论是作家研究、文本研究，还是环境研究、思想史链条的研究，本质而言都是多个文明在不同层次上彼此搭建、转化和构造的过程。文学永远是一个文明体的构造，或者用文明体反衬出来的一个构造的形态，其感人之处，正在于此。

吴晓东老师指出，贺老师进行讨论的范式转型，背后涉及一个巨大的、百年的且连接中西方、古今的价值系统。文明史范式同时也是阐释中国还有人类前景的重大范式，触及的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都在面对的关键性的结构；而具备文明史视野，也有助于把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以及在文明进程中加以整体性的考察。尤其是在所谓的“新冠的纪元”，全世界各种文明似乎都在遭遇挑战，遭遇危机。建构一个文明史视野，可能就更有迫切的现实性。

吴老师对今日讲座的三点表述尤为注意。首先是中国主体的能动性，即认为文明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范畴，而是阐释性的范畴，是建构性的实践过程。第二点是论文明史的批判性的维度，这种批判可能不仅仅立足于中国的本土性，也指向对国际理论界的相关领域的各种文明范式的论述，是一种双向的批判。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或者说真正有理论自信也有道路自信的文明范式，也应该内涵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向度。第三点是文明史范式所具有的兼容性，一种新的范式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或者说是有解释力的，或许就在于其兼容了既有范式的合理性部分。

吴老师继而指出，关于百年中国任何一个总体性的叙事，可能都会面临其他宏大叙

事的挑战，也意味着所谓的“百年中国”，既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更是话语体系、阐释范式和历史叙事。它所指向的似乎首先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事关当下中国现状的一种现实判断，还有关于未来的远景叙事。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虽然面临危机，但也依然无法被彻底替代。这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启蒙、革命、现代化的三种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三种范式是不是在彼此纠缠的、相互对峙的同时又互相补充，从而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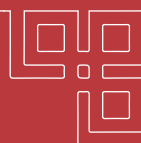
对此，贺老师指出，从范式概念对文学

史研究进行探讨，既包括其自我表达的层面，也涉及其具体实践的层面。研究者的意义正在于揭示诸范式自觉及不自觉的多重面相。论及范式危机和转型，需要在极为复杂和缠绕的对话关系里展开，应用包容的态度去探索新的可行性研究思路，进而找到更具当代性的表达方法。直面“大叙事”，不是为了简单地复活或重复它们，而是提醒我们始终对根本性问题的敏感，努力探索一种能将不同研究者的主体性代入、使研究工作变得更有效的“能动性”总体叙事的可能性。

（撰稿：隋雪纯）



文研回望



文研回望

沉吟师友谊，犹眷草木心——文研院举办第十三期邀访学者欢送会



十二月本不是凛冬，气氛却沉静了一阵。二十日这一天，文研院所在的静园二院，重回往日欢畅，以一场线上线下的相聚，赠别2022年秋季总第十三期邀访学者。九月初的景象尚清晰在目，夏末仍有烈日，从北京、上海、敦煌、台湾、美国、墨西哥等海内外各地赴约而来的十三位学者，前后脚迈进了这座林木葱郁的百年院落。虽有旧相识，更多新相知。四个月的驻访生活，在特定的现实情境、城市起伏的呼吸声中，有引吭高歌，也有沉郁顿挫，但如邓小南院长所说，文研院的日常从未也不可停摆一日。这一期的邀访生活，有更真实深刻的对人的生存与学术生命的内在体认，道了更多珍重，也有更清晰的对这个时代的审视，更准确的评估。道别之际，未名湖毫无声响地结下厚实的冰面，静默地铭记下水波荡漾、塔湖摇曳之时众人欢歌、阔论之形象。



第十三期邀访学者线上合影

勤耕二院 倦卧静园

9月5号报到当天的金色日光，在一段记录影像的开头重现，洒过红墙碧树，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跳跃。即便季节轮转早已谙熟人心，道别时总不忍直面。二十多分钟的短片，回顾了十三位学者在文研院期间的日常时光，也记录了他们临别时的所思所想。

文研院的一部分日常，在每周二、四的报告会与交流会上，这是学者们最集中的思想激荡、切磋研学之时。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孟宪实老师多次提及这一制度性规范动作的重要性，并分享他关于“王言”制度的研究如何在此过程中受到启发，而后

转变为对皇帝制度的研究。他借此指出，学科交叉最深刻的彼此影响，不在于解决具体问题，而在于促发各学科在方向上的内部自省。进一步来说，即从具体学科到人文社科的身份认同与关怀递进，这一点在多位学者的感言中被引为共识。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张小刚老师认为，文研院洋溢着基层单位少有的交流气氛，彼此间的坦诚、互相批评都尤为珍贵。这一难得的探讨机制得到了所有人的共同珍视，因此活泼的氛围中也不乏迫切与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万海松老师称其既感到应接不暇，又深陷并乐在其中，如高尔基所说“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

二院另一半的日常，是它作为会友、闲聊、雅集的起居之所的集体生活，更多形式的学术漫谈酝酿于其中。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唐克扬老师提及，文研院的气质延续了它前身作为燕京大学宿舍的属性。他曾写过考索燕京大学校园营建史事的《从废园到燕

园》，又在二十年前的静园读书，对这一片院子极为熟悉，这次驻访原以为是一次物理空间的重访，却于预料之外找回作为“学术之家”、倦归栖身之所的“燕园”。来自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潘光哲老师，会心于这里人与人之间充满浓郁人情味儿的感情交流，“学术是为了人类生活；文研院不仅是一个学术体制，还是一种生活体制。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热切关心着‘人’的‘人的体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Keith Woodward老师称这里“可以更自在地尝试各种想法，因为你知道，这里充满关爱”。墨西哥自治大学的Enrique Stephanus Dussel老师则感叹这里的“家庭生活”以及他所感受到的如来自家庭成员的无尽耐心。唱歌、跳舞、打乒乓，聚餐、散步、摄影，不同学科的交融在学者们的文研生活中悄然推进。

过去几年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应星老师经常来文研院参加活动，是文研院的老

朋友。此番转换身份，成为驻访学人，他感慨文研院带给大家一份现实世界难得的从容。因为这份从容，所有人得以在人生中共享了这段2022年秋冬转换之际的微妙体验，其中充满了归属于自然和人群的记忆。

“刚来的时候躲着烈日；如今则要追着太阳”，中国社会科学院



疫情封控期间，在院学者与历史学系学者雅聚



于故宫参访活动中小憩

近代史研究所的金以林老师将感受寄托于日光。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王振忠老师，则流转于对光与影的每日追察之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成晴老师醉心于明月、斜阳、风雨，以及院中的松树、槐树、山楂树。以上种种现实的生活情境，被视为更加具体的“学术研究的历史情境”，描绘了一个特定群体的“小镇生活”。在离院前的访谈中，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打山楂的场景，久不从事的体力劳动，不仅唤醒了久居书斋的学者们的身体记忆，同时激发了大家作为知识生产共同体的彼此认知与彼此温暖。这种认知与温暖，无疑将以特定的能量反馈到共同推进的学术事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赵晓力老师说，有文研院这么一个地方在，哪怕我们以后回到自己的单位，回到各自的学科，就觉得手头做的工作还是有点意义。

访古抚今 汇源成河

访前人访过的山，认古人认过的碑，深入田野所带来的与古今之人心心理共振的冲击

感，也在学者们的临行回忆当中成为共同的体悟。秋冬之际，尽管疫情使得外出活动的组织变得困难重重，文研院仍重启了考察计划，由李零老师和唐晓峰老师带队，组织邀请学者一同前往北京的“五顶”、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以及京郊的万佛堂、金陵、大石窝和琉璃河遗址实地考察。在这几次考察中，文研院还邀请了校内外的专家老师进行讲解。考察的时光是短暂的，但与田野和人的一次次相遇及感悟，或能成为隽永的经验，伴随学者们的学术道路。

应星老师是做田野调查出身的，对田野经历并不陌生，但跟着李零老师考察历史遗迹，“使得自己原本理解的田野的厚度、宽度大大拓展”。金以林老师对去房山大石窝考察时相识的老石匠印象深刻，在地经验的不同，使得老石匠对文化遗产、文化保护的认识，以朴实的言语讲出一番道理，“东西要经手摸一摸”“怎么把东西留下来”的一片赤诚令人动容。唐克扬老师回忆起考察途中每一次车门开启之时，总有一些新的伙伴加入，使旅途因为充满未知和一闪而过的片刻而更加奇妙。文研院一行在奔赴和离开当中所创造的种种场景，又何尝不是与历史在多个瞬间的重合。

文研院的楼梯间悬挂有两幅复制精美的敦煌壁画，是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先生所赠。每游走其间，都难免再为丝绸之路上文化汇流的局面所震动。学校严格封控时，张小刚老师曾带领大家驻足于此，领略画中五台山的水墨山水、神僧圣迹；临别之际，他也将文研院在一定程度上比作古代的敦煌，是汇集世界各地思想的地方。



文研院邀请学者照片墙

邓小南院长在欢送会上总结了各位老师四个月来所公开呈现的学术成果，各位老师为北大贡献了精彩的课程、讲座、读书会、论坛发言，并在文研院的多个重要时刻“挺身而出”。来自南美和北美的两位外籍学者，也分别在历史学系开设了中拉关系研究的课程，以及组织了连续数周的社会理论读书会。文研院珍视每一位邀请学者带来的每一支思想源流，并以“服务学术”“守正出新”的一贯宗旨将这些支流汇聚于一处，使其能碰撞出大江大河之势。

从容立世 琴音愈亮

在上半年遭遇“困学”之后，下半年第十三期的邀请项目继续了预料内的困学情境，同时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新近状况。整个社会经历了封控、沉寂、放开管制。十一月中旬开始，一部分学者被封控在了校园内部，另一部分学者则无法进入，所有活动转为线上线下坚持推进，虚拟时空的静音比任何沉

默都更沉寂。渠敬东老师再次住进了二院，解决留院的邀请学者所面临的各类问题。韩笑老师与其他团队成员也交替申请入院，以维护开展日常学术活动。

比利时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曾论及：人们相知不深，只因不曾共处于沉默。离院之前，第十三期邀请学者集体感受了这股短暂的沉默之力，

如一次隐忍的寒冬夜行。但在寒冬的迷雾与一片低沉静穆之中，我们终究听到了琴弓触弦、“燕”声呢喃，后竟越来越响亮：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的徐欣老师的琴声与一首《燕子》回荡在了冬日校园，成为大家于沉默中久等来的一次打破沉默的契机，也托出了众人的希望。

进入十二月之后，在疫情大范围扩散的形势下，邀请学者以及文研院的同事大多都病倒了。然而，潘光哲研究员筹划已久的“胡适的生活世界”工作坊，依然在胡适先生生日这一天如期举办，多位学者带病做了报告或评议；由孟宪实教授主持，徐欣研究员、张小刚研究员与北大历史学系朱玉麒教授共同主讲的“丝绸之路三重奏”也如期举行。

邓小南院长称以上活动是我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共同坚持，是被铭记的特殊的历史瞬间。同时，对于疫情中受到干扰的治学条件，邓老师表达了遗憾，但也从这段岁月中感受到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感受到各

位的达观，感受到每次欢谈背后的沉重，感受到各位的忧思和对于真正学术的期待。学术是学问与见识，也是方法与道术。学术是学者日常生活自然而然的重心，让我们看到文研院坚持的意义所在。大家在二院交流学术，渗透式的交流既丰富又纯粹，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学者在不同的环境下为人、立世的样子。从封控到放开，猝不及防的变化让文研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调整、应变，我们感觉到无力，我们也在努力。我们希望能够为学界探求一条真正的思考之路、开放之路。”

渠敬东老师认为第十三期邀请学者所共同经历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他相信在二院这个特定空间中所进行的多场关于时代的谈话，都将在众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文研院也在此中思考学者、学问之区别。真正的学问，来自于师友，而真正的师友展现自由，自由又来自于忧患中有守持。“我们努力让文研院变成这样的地方，在难以捉摸的不确定的时代里，能让我们心之所系的、在忧患中获得从容的地方，才是我们想共同建设的地方。”

韩笑老师也回忆了外界扰攘之际，大家犹能珍惜相聚一地的机会，从容论文讲学的情景。那些特殊的时间和空间，那些走廊漫谈里包含的“忍不住的关怀”，都烙在了这一期相对短暂的相聚之中。

念。”

“汉唐卷帙思无尽，犹眷南窗草木心。”

“温暖、笑声、人情味儿十足，吾辈夫复何求！”

“歌也欢洽，行也欢洽。与诸君一席谈，总也欢洽。”

……

十三封手书寄语，仍余留写信人的温度。笺短思长，除去离愁，更有一番潇洒和期许。应星老师在酝酿明年的学术活动，金以林老师在策划近代史所与文研院合作的学术展览，文研院也在计划以多种方式邀约各位老师重返欢聚。

杨弘博老师主持了整场欢送会，代表文研院为第十三期邀请学者送上特制的离院礼物。“平生风义兼师友”，静园二院愿为学者们留守住这片精神故乡。群英会、藏修息游之地、学术之家，自由、开放、从容、舒畅，既是文研院留给各位学者最深切的印象，也是学者们留给文研院最恳切的鼓励。

欢送会后，十三位学者相继离院，留下自燕园相从离去的背影。由于疫情，我们不能够当面集体相送，纵有遗憾，更待重聚。道别之后，未名湖的冰场悄悄开放。但不消数日，一阵烟岚，几日风雨后，寒冬终将尽。春风不远，但问归期。

（撰稿：尹冉旭）

平生师友 犹眷南窗

“旧事如水更如海，知己相望不相闻。”

“未名湖，莫高窟，一点离愁，两处思



文研院承办第十九届北京论坛分论坛“文明的交界面：生态与族群的历史反思”



2022年11月18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崔钟贤学术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九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本届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共创人类文明的未来：信任、对话与合作”为主题，下设12个分论坛和1个海外分论坛。12月10日至11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承办的分论坛“文明的交界面：生态与族群的历史反思”以线上形式圆满召开，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语文学、考古学等不同领域的十余位中外学者共聚云端，就“文明研究的谱系”“欧亚大陆的流动性：人和物”“文明的走廊和腹地”三个主题分别展开研讨与交流。

自2016年成立至今，文研院已先后六次承办北京论坛分论坛，主题遍及出土文献、社会转型、早期文明的书写实践、百年中国与世界等广阔领域，致力于以全球化的视野，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要议题的对话与研究。围绕文明跨越各种边界的核心特征，本次分论坛聚焦“文明的交界面”，以文明的传统与现代关系、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遭遇为展开问题的场域，从生态与族群两大角度切入，邀请国际和国内重要学者从文明的上述根基性问题出发展开讨论。

12月10日下午，分论坛正式开幕，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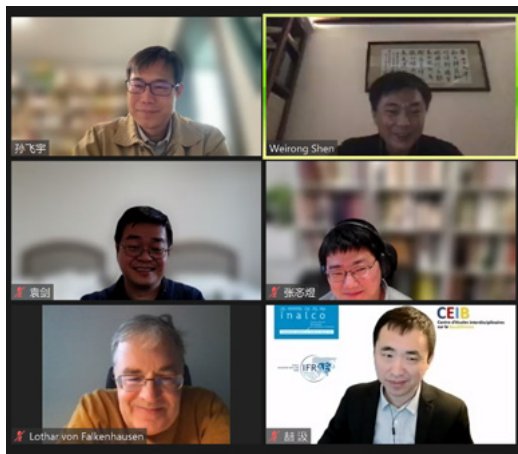
敬东首先为论坛开幕致辞。在他看来，“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牵动着世界上各个国家与族群命运的恒久论题，值得在跨学科的层面上不断加以深入探讨。同时，“文明”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交界面，一种所谓的文明必然要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遭遇、连接、构造才能成就自身。因此，文明既是就其本体论而言的单数形式，同时也必然是复数形式，包含着各个文明相互融通而进行自我塑造的结果。在此背景下，渠敬东老师欢迎各位与会学者以不同学科相互融合的方式检讨“文明的交界面”话题，呈现面向自身与世界的思考。

文明研究的谱系

随后，分论坛举办首场讨论，与会学者以“文明研究的谱系”为中心奉献四场主题



渠敬东教授致开幕辞



论坛现场

报告，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持讨论。

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沈卫荣通过研究不同佛教传统中的观音菩萨崇拜，倡导打破学科壁垒而进行整体性的汉藏佛教研究，强调所谓的印度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同属一个文明体系与同一文明的整体发展过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从文化接触区角度考察作为文明交界面的长城地带。以对拉铁摩尔相关论述的解读与分析切入，袁剑老师分别讨论了互动主体、互动关系、跨互动三种观察视角，并就未来如何深化长城地带的讨论提出展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以印度文明研究的视角转换为线索，在概括、提炼不同时代与情境中印度文明研究具体内涵的基础上，着重探讨 90 年代以来印度研究环境史转向的发展路径，及其对世界文明研究的启发与意义。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汲喆则

选取列维－布留尔、葛兰言、列维－斯特劳斯、德斯科拉等代表性的法国人类学家为例，分析中国文明在人类学发展史上扮演的关键角色，还原中国文明在人类学图式中的发展脉络。

首场讨论侧重于从学术史角度梳理不同文明研究的谱系，领域多样，视野广阔，为此后论题的进一步延伸与展开打下扎实基础。

欧亚大陆的流动性：人和物

12月11日上午，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咎涛主持第二场讨论，主题为“欧亚大陆的流动性：人和物”。与会学者分别选取地理、人口、乐器、宗教等历史与文化中的具体侧面，共同考察欧亚大陆上文明交界面的形成与流动，彼此之间展开精彩对话。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书院特聘教授刘迎胜介绍了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交流过程，分析了中国所在东亚大陆地理位置论、史前东西交流的欧亚草原通道、中国从“天下”到“世界”认知转变这三方面内容。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欣着眼于丝绸之路历史流动中的琵琶华化与分层问题，介绍了传统丝路琵琶的历史，比较了当代与民间琵琶的特征，试图分析中国琵琶保留的周边文明的痕迹与出现的全新特征。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教授 Jamsheed Choksy 以帕尔萨波斯人、马达梅德

人、蒙古人这三个先后在亚洲西部生活过的民族为主要例证，讨论了民族迁徙对当地语言、信仰及习俗的改变。

最后，咎涛老师介绍了四种探讨土耳其与中亚世界关系的理论框架，并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奥斯曼帝国与中亚各国的历史发展背景，试图探讨伊斯兰化的精神性结盟与当今泛突厥主义联盟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文明的走廊与腹地

午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王明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郑少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共同参与第三场讨论“文明的走廊与腹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主持。

王明珂老师以“文化传播、民族迁徙与文明起源”为题，希望反思文明的传播、接触和冲突论，从文明、民族和国家形成的角度思考文明，以藏彝走廊为例，通过研究其间的社会类型和整体人类生态，展现人类走向复杂社会的多样途径，并关注文明世界的底层，了解农民和农村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郑少雄老师基于王权理论的启发和“陌生入王”的概念，围绕“头人为什么造土司的反？”这一问题，分析土司和头人二者各自与土地的关系、等级流动性、社会起源、社会分工等面向，揭示了土司与头人之间范畴性的差异。

梁云老师则根据周代考古过程中发现的葬俗与族属间的强相关性，基于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北向墓人群为姒姓夏族，南向墓人群为彭姓、

己姓部族，夏王朝的兴起可能开始于姒姓夏人与“祝融”后裔部族的联盟。

与会学者围绕文明跨越交界面的传播、冲突与演变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再度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思想互动，在为分论坛落幕画上圆满句号的同时，也留下了长久的学术回响。

文研院自成立以来，始终是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广袤园地，孕育与滋养学术的动脉。通过此次承办北京论坛“文明的交界面：生态与族群的历史反思”分论坛，文研院再次为中外学者搭建了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在与会学者、观众中取得良好反响，未来将继续为广大学友展现前沿成果，传递人文关怀与思想跳动。

（撰稿：徐铖）



文研院举办南亚研究知名学者布莱恩·奥尔教授系列讲学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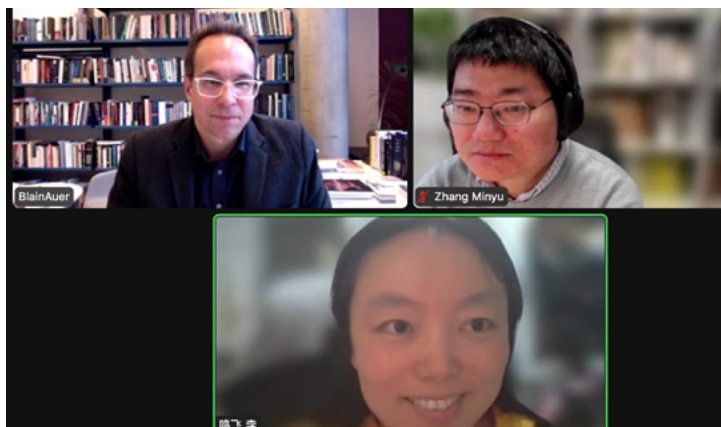


德里苏丹国建立于1206年，并在之后三百余年中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后期印度次大陆影响力最大的王朝国家之一。与此同时，蒙古帝国向中亚西亚的扩张驱使许多军事冒险家和文人教士离开故土，或经山口穿过兴都库什山脉，或循阿拉伯海路南下莫克兰海岸和坎贝湾，抵达印度。在德里苏丹国治下，中亚西亚裔移民和本地居民以印度的人力、物力和精神财富为笔，以对伊斯兰世界和波斯帝国往事的回忆和诠释为墨，努力绘制了一幅新的帝国蓝图。这项新的帝国工程续写

了印度与中亚、西亚古已有之的联系，并凭借武力和文治统和了中世纪邦国林立的印度次大陆，为印度向早期现代军事帝国转型奠定了基础。

2022年11月25日至12月9日，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联合发起，邀请瑞士洛桑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南亚伊斯兰研究教授布莱恩·奥尔（Blain Auer）举行三场讲座，从历史、政治、宗教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德里苏丹国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型的帝国工程，见证了亚洲文明交融。系列活动为国内首次举办基于波斯语、梵语、阿拉伯语等多语种一手印度史史料，全面系统探讨德里苏丹国历史及相关话题的前沿专题学术活动。

11月25日的第一场圆桌会围绕《中世纪伊斯兰权威的象征：德里苏丹国的历史、宗教和穆斯林合法性》（*Symbols of Authority in Medieval Islam: History, Religion and Muslim Legitimacy in the Delhi Sultanate*）一书展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熊艺同学作读书报告。在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咎涛、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和北大外院国别和区域研究



第二讲线上讲座现场，左上为奥尔教授

专业助理教授张恣煜等与会老师就伊斯兰印度时期的政教关系、印度的多元史学传统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随后，布莱恩·奥尔教授带来题为“伊斯兰印度的历史”的讲座。讲座探讨7—14世纪穆斯林社群在印度的起源以及印度的伊斯兰帝国建立时的伊斯兰宗教和政治权威的理想。张嘉妹、张恣煜等与会学者和奥尔教授进一步讨论印度伊斯兰政权的统治特点等相关问题。

12月2日的第二场圆桌会围绕《以波斯诸王为镜：印度波斯伊斯兰宫廷和帝国的起源》（*In the Mirror of Persian Kings: The Origins of Perso-Islamic Courts and Empires in India*）一书展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李子焯同学作读书报告。在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副教授时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鸣飞、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讲师李彦军等各位老师着重探讨波斯伊斯兰文化传入印度、印度穆斯林对波斯文化的吸纳和诠释，以及比较帝国研究视

野下的印度波斯互动研究的议题。

当天下午，奥尔教授应邀进行题为“印度的波斯君王们”的主题讲座，探讨德里的苏丹们如何借鉴和改写源自前伊斯兰时代波斯历史的王权和治理模式，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帝国事业。李鸣飞、李彦军等参会老师就德里苏丹借助波斯文化统治

印度的动因等问题与奥尔教授展开讨论。

12月9日，奥尔教授带来第三场讲座，主题为“印度—伊斯兰劝谕文学”。在讲座中，奥尔教授探讨印度中世纪和早期现代世界的政治和治理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如何通过翻译、抄写和注释《五卷书》实现跨文化传播。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新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副教授范晶晶等与会学者与奥尔教授讨论了《益世嘉言》、《五卷书》等用于政治劝诫的故事文学作品的应用场景、传播流变等相关问题。

自2016年建院以来，文研院就将“多文明互动与比较”定为凝聚议题之一。6年来举办了多场有关东西方文明的讲座、论坛、工作坊等活动。作为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文研院在疫情期间仍通过多种活动形式与国际学界保持交流，加强国内学者与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联系，为国内师生打开研究的新视野。

（撰稿：詹丹妮）



专题
论文

教育与现代中国：从科举制到考试社会



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

——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在政治方面，它充分体现了“政必须教、由教及政”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传统中国政治理论。古代中国的学校，本身也是官吏养成之地，其一个主要目的即造成有良好训练的官吏。而教育和政治在制度上的连接，正落实在科举制之上。

科举制的功用并不止于此。周作人曾深有体会地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这一跨越时空的维系物，就是中国的“思想文字语言礼俗”。^①的确，从先秦到清末西潮大举入侵之前，两千多年来形式上的“书同文”也就是一种共通的全国性思想言说（discourse）。正是科举制使其制度化为一种统一的全国性思想意识市场，它恰起着全国性的商品市场在近代

西方的维系作用，是传统中国社会能维持基本稳定的重要支柱。除了这种社会的思想聚合作用，科举考试的最高一层在京城举行，与科举密切关联的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也都设于京师。这些制度，又在不同程度上起着思想的社会聚合作用，使京师集政治中心与全国性的思想论说中心于一体。

同时，科举制逐渐成为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mobility）的主要途径。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故科举制同时也在行动和制度上落实了中国传统的“布衣卿相”梦想（这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其重要正类“美国梦”在美国文化中的意义），适应了以耕读为业的士阶层的社会需要。

进而言之，科举制还具有“通上下”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参政议政以“通上下”，而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维持有机联系的主要渠道。传

* 本文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执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本文原刊《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本书讨论了科举制废除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可参看。

① 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32-33页。

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市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人员的流通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概言之，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①

可以想见，废除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制度，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后果。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提出：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这里自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比如新型的金融业、工商业等的出现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②

本文主要依据晚清山西一位乡绅（这里的绅是与官对应而言）的自述，简单考察分

析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对一个身处既不十分“开通”，又不十分闭塞，且相对富庶的内地（山西省太原、太谷二县）并基本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型乡绅及其家庭生活的直接影响；并进而通过这位乡绅之眼观察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四民社会解体前后的一些现象，希望能从感性层面增进我们对这一社会剧变的认识 and 了解。

这个自述就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凤，1857—1942）所著《退想斋日记》^③。从1890到1942年，刘氏日记凡51年，现存41年，本文特别注重废科举前后那二十年间的记载。刘氏早年也有青云之志，他的日记，与大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一样，是有意写给人看的^④；故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中岁以后，随着鹏程万里梦想的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对史学的价值也就远非一般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了。刘家世居太原县，刘大鹏本人在科举制废除前后一二十年间则在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任塾师。太原是山西的首县，太谷则是富甲山西的商业集中地区，刘氏一生所居均属于中国内地经济条件较好且信息较流通的区域。他眼中山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示了近代中国各地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第一

① 以上讨论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

② 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③ 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以下凡引此书，一般都注出其写作时日，以突出材料的时代感；凡正文中已说明时间、或无需准确年月日的泛引，则仅注出页数。

④ 如他于1892年8月15日记自己俭而孝，特别说明记下来并非“夸示于人”，可知其日记确是要示人的。

手依据。

刘大鹏生于咸丰七年，少历同治“中兴”时期，成年后目睹光宣时的日渐衰落，与其大多数同龄士人一样，总有今不如昔之感。他回忆中同治年间时“吾乡到处皆家给人足，气象甚觉丰隆。”光绪三四年间山西遭到大凶荒，“人民去其大半，所留者多贫不能支。”从此境况就未能恢复。刘氏所在地区的衰落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他所居之乡，因“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家无余粮，平时或比一般务农之家稍好，惟特别不耐荒年。光绪初年的大荒，“造纸人家饿死者甚多，务农之家未能饿死一人。”^①鸦片是山西变穷的另一大原因，据刘氏观察，清季时吸鸦片者已达“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一二”。这个数字或许不那么准确，但吸鸦片者众应是无疑的。后来种鸦片者也日多，因其利厚。不过，种鸦片者与造纸者在家无余粮方面正相同，仍不耐荒年。一遇荒年粮价猛涨，便有饿死之虞。^②

像多数传统的士一样，刘氏以观风规国为己任。他注意到，秋成报赛是山西一直实行的古礼，“年谷顺成而始为之”。道光年间晋祠镇一带举办抬搁送神者共十三村，中间因太平天国事停顿，后又办，但到光绪七年（1881），同一区域有财力举办抬搁者仅六村，已不及前半。故刘氏“于此见农家之景况，较前远甚”。^③农村如此，商业也比

以前衰落许多。刘氏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每年都询问商人景况比上年如何，而答复皆曰“不若去年”。到1893年时他听到“一年不如一年之言，于今已五年矣”。^④故刘氏的确看见“世道衰微”、今不如昔的迹象。此后整个日记中类似的记载不断重复出现。

同时，刘大鹏更有一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感，颇能体现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内地举人在社会转型时的心态。他于光绪四年（1878）入学（取秀才），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后三次会试不第，科举制即被废除。民国年间他一直以清遗民自居，直到“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他才逐渐从内心里认同于民国（也就是说，直到这时他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刘氏以传统的士自居，终其生也基本保持着士的心态（如果告诉他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多半不会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在科举废除后也终不得不像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实际是很不自由地随社会变动之波浮动）：从塾师到小学教员、校长、县议会议长都作过，后来更长期经营小煤窑，但终以“老农”这一自定身份认同度过余生，以维持耕读之家的最后一点象征。下面就藉刘氏之眼与口，着重探讨他这种生不逢时心态的社会渊源。

① 《退想斋日记》，1892年8月13日，1893年2月7日、12月11日，6-7、17-18、26页。

② 《退想斋日记》，1892年10月4日，1893年7月8日，11-13、21-22页。

③ 《退想斋日记》，1892年11月6日，15-16页。

④ 《退想斋日记》，1893年2月7日，17-18页。

内篇：科举制与耕读之路 断绝前后的乡村社会

刘氏家居太原县赤桥村，“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但刘家“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全仗父亲大人在外经营（按刘父在太谷县经营木材业），母亲大人在内整理”。^①可知刘家的主要经济收入，还是来自在外经商的父亲。与近世许多耕读之家一样，“读”是包括经济考虑在内的发展方向，“耕”在经济上逐渐仅为一道糊口的最后防线；“耕读”相连恐怕更多的意义还在其传统的象征性一面，略有今日美国人讲究的“政治正确”^②的味道。自嘲“耕读之家”者其主要收入实来自经商，虽然大半以商为生却要坚持耕读的方向以正名，都提示着宋代以降四民社会中士、农、商这最主要的三民（“工”的人数既少，影响也不算大）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刘父虽为商，刘氏自己仍像多数儒生一样看不起商人。但他确曾遇到好几个“深于学问”的商贾，甚感“渔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同时，他也注意到有些读书人“惟求词章之工，不求义理之精”，虽儒冠儒服而行为不检，“反为老农大商所嗤笑”。^③可见士商之间，

差距确在缩小（但农商之间矛盾似有增强的迹象）。^④在西潮入侵之前，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社会变迁至少已有数百年的进程^⑤，是研究西潮冲击引起的近代中国社会变动时不可忽视的层面。

由于刘家“究竟不甚宽绰有余”，刘大鹏自己年长后也不得不与“舌耕”者为伍，像大多数未能做官的读书人一样走上教书之路。刘氏在中举之前，已出任塾师。但中举后地位变化，对塾师这一身份认同就颇不能释然，每慨叹其不得不为此“糊口”之业，曾一度想辞馆回家“躬耕事亲”。他以为，“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脩金为事，此亦可谓齷齪之极矣！”有人“或谓教学足以传道”，刘氏觉得这恐怕也是未能入仕者的掩饰之辞，盖其未见“道之传者几何也”。正因为如此，他看不起一般以教书为终生计之人，认为他们没有远大志向，“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每年多得几两脩金，饷食好些”而已。^⑥

的确，一般塾师的待遇并不太好。刘氏曾遇到一个业商失败而任塾师者，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脩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稍好者，一年所得“除却饮食杂费”，还可“落

① 《退想斋日记》，44-45页。

② 关于美国的“政治正确”，参见罗厚立：《美国方式与美国梦：“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权势转移》，《东方》，1996年3期。

③ 《退想斋日记》，48-49页。

④ 参见《退想斋日记》，51页。

⑤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收入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41-579页。

⑥ 《退想斋日记》，71-72、54-57页。

二十余千钱”。此类人考虑的，已不再是糊口，但仍“所入不敌所出”。^①刘氏自己的收入待遇，要好得多。他的东家“家资数十万，家中并无一吸鸦片烟者，且极勤俭”，待刘氏颇厚，供饷食之外，束脩还有银一百两（据其日记，每两至少合千钱），并曾主动增加到一百二十两，但因未事先对他言明，结果刘氏以为有轻视意，“坚辞不受”。^②

以求馆或求好馆为目的之读书人，其用心自然主要不在“传道”之上。但对身处晚清的刘氏而言，圣道之不传，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威胁和冲击。还在废科举之前，读书已不如以前那么被看重。本来读书为仕进之正途，而学校也就是官吏培养之地。刘大鹏指出：“书院为作育人才之地”，而此中养成的人才，是为了“贡之朝廷之上，为舟楫、为盐梅；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③但部分因为清代可以通过捐纳得功名，仕进之途已多元化。靠捐纳得来的功名虽不被视为正途且只能补低级官职，对许多未中进士的中下层儒生来说，低级官职也正是他们所期望者。同时，随着清代统治时期的延伸，先前各科已得功名却未能补实缺的士人积累渐多，入仕之路已比从前要拥挤得多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在发生转变，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这或者与刘氏所居在太谷商业区有关，此情形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地区

有可比性，尚待考证）。

还在改革科举之前，弃儒就商已渐成风气。刘氏发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原因即在于“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然，经商也非人人可为，如前所述，也有读书人经商不成功又回过来任塾师者。但总的来说是“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而且已出现了读书无用论：“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这恐怕多少与其乡“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有关。故不仅“视读书甚轻”，根本就“视农事甚轻”。^④传统社会的“耕读”，其中自有内在联系。

商人地位的上升，政府提倡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晚清政府在因西潮冲击而产生的“商战”意识推动下，大力发展商务。中央成立了商部（后改农工商部），各省及地方也遵命成立商会。一般商人都认识到“国家郑重商务”。但同时山西很多商人也发现，商务不仅未得到振兴，而且减色，商家“多困惫之情形，将有不可支撑之势。此何以故？商利微末，而加抽厘税日增月盛，靡所底止也。”^⑤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面，大的方向还是商人和商务都呈上升趋势。

① 《退想斋日记》，1893年6月21日，1894年1月17日，20、27页。

② 《退想斋日记》，63、88页。

③ 《退想斋日记》，70页。

④ 《退想斋日记》，1893年1月2日、6月21日，1892年8月13日，1893年12月11日，17、20、6-7、26页。

⑤ 《退想斋日记》，161页。

与商人地位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士人地位的明显降低。光绪初年，太原已出现商人凌侮乡民和轻视士人之事。到 1896 年 7 月，榆次县一孝廉被县衙门的门丁“大侮”，引起“阖邑读书者大怒”，直告到省。士人地位降低也与他们中一些人的自尊不足有关。既然不少读书人以教书为终生计，他们“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自然不可能在东家面前摆架子。这些人“以东家有财，非惟不嫌东家不致敬、不有礼，而反谄媚东家”。读书人既然不能自重，要东家敬重当然就不那么容易了。刘氏注意到“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的现象。这后一点的本质，刘氏看得很清楚：许多人请先生教子弟，“亦是作为浮事，何尝郑重其事”。^①换言之，过去商人虽富而一般仍敬重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仕进之途，如今这些富人请教书先生部分或不过是摆摆样子，大约也有点不得不为之以维持“政治正确”之意；但他们从内心到表面都已不很敬重读书人，也并不真想让其子弟走读书仕进之路了（从轻官重商的角度看，这也可算是商人独立意识的表现）。

据刘氏的观察，重商轻学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应童生试的人数日减。从 1898 年起，“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清代科举是预定各地录取人数，然后据此扩大数十倍为考生额数）。以太原县为例，

光绪三年（1877）应童生试者百数十人，次年则八十余人，“自是而后，屡年递减”，光绪二十二年（1896）45 人，比上年少十余人。四十人左右的数目约保持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光绪二十六年（1900）则只有二十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23 人，到废科举的前一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考童生者仅 18 人。^②与此同时，应会试的人数则呈上升之势，^③说明以前各科余下的举人为数尚不少。高层次应试人数多而低层次应试人数少，正体现了读书仕进这条路是新近一二十年才开始衰落的。

故科举废除之前，四民社会的维持已较困难。“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迂流伊与胡底耳！”^④一两千年来传统社会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已不太走得通，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取。这一社会变迁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必然导致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士人已不能起四民之首的表率作用。四民之首这一社会角色的一个含义就是士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如刘大鹏所言：士“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但他观察到，一些士人不仅不能为表率，“而反为乡人所化”，同于流俗，是“不

① 《退想斋日记》，16、59、65—66 页。

② 《退想斋日记》，78、65、99、118、132、135 页。

③ 《退想斋日记》，75、80、121 页。

④ 《退想斋日记》，1904 年 1 月 8 日，26—27 页。

足以为士矣”。^①关键在于，榜样与追随者的社会分工能够为双方接受并维持，各社会群体间就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不论从哪方面被打破，都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危机。

这个现象既是普遍的，也受到刘大鹏所居地区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1892年夏，刘氏到省城应试，宗师勉励士子要“有根底之学，不可徒攻时文”。刘氏闻之颇觉亲切，但也担心同应试者会“以为此皆老生常谈，而不遵行之”。^②可知“不可徒攻时文”已成老生常谈，刘氏日记中的确频繁出现他慨叹士人只知读时文的记载。但是，读书者多读时文而不问经史子集或者可说是近代中国普遍的土风不佳；就刘氏所在的地区言，因“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庠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③

实际上，刘氏虽知读书之“正道”在多读经史子集，其所处之乡学术水准确实不高，他自己读书也不算多。1893年夏，刘大鹏游晋祠时，“见一杂货摊上售一部《三国志》，爱不释手，遂用三百廿钱买之，如获至宝”。^④旧时一般的科举文章，考秀才时主要看文辞的美恶，要做得空灵；考举人的文章就要有点所谓书卷气，多少要体现一些学问，不能太空（考进士则学问一面要求更高）。这是

当时学做时文者的常识，刘氏自然不会不知，也一定在做准备，而且他是一向主张要读经史子集的。但他在进学十五年之后，竟然最多不过在别人那里翻过《三国志》（“前四史”是过去士人的必读书，当然主要是作为文章典范而非史书来读），可知他平时所读的非时文书也不会太多。

而且，刘氏家乡的“僻处偏隅”决非他的谦词。晚清科举的最后一关，即考进士时的殿试，尤重小楷，这是当时制举业者的常识。而刘氏要到1895年到京应试，才知“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诗[时?]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这样的信息都不知道，其余信息的不流通可以想见，自然很难考中进士。一年多以后，他还在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⑤可知此事给他印象颇深。问题在于，写好小楷原非一日之功，刘氏获得信息既晚，即使天天练，功夫或难与早就在练习之人相比。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刘氏得知取士以字为先的日子，已是小楷重要性下降之时（蔡元培于1892年中式，他的小楷实未必佳）。到1905年废科举时，刘大鹏还是个举人，以此功名终其身，这与他所处信息不通之地，大有关联。

① 《退想斋日记》，69页。

② 《退想斋日记》，4-5页。

③ 《退想斋日记》，1893年5月3日，6月22日，20、21页。

④ 《退想斋日记》，22页。

⑤ 《退想斋日记》，1895年3月18日，1896年9月12日，40-41、61页。

同样重要的是，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1889）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①这虽然只是一例，但民国新人物中有功名者实多，大抵为清季最后二十年间中式者，却颇发人深省。

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就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刘氏于1895年到京应试后，大概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次年十月即请人代买回书籍一箱，其中有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士浚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自那之后，刘大鹏有半年的时间平日所读都是这些“经世”的新派文章（包括驳新派的文章，但所关怀的问题仍相同），思想也有一些变化；他由此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②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也曾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

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

刘大鹏自己在多读买回的“经世”之文后，也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十几天以后，他就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此新例也”。^③这距刘氏回忆起他也学过算学并后悔已将其忘掉也不过两三个月。到1901年10月，刘氏已认识到“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由于“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结果是“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④但像刘大鹏这样要到进入二十世纪才完全认识到这一趋势的人，实已太晚。

这一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与京师的信息距离（而不一定是地理距离）越近，变得越快，反之亦然。到1898年夏，刘氏就注意到府学的考试题已改考策论，题目的内容也与时政密切相关。而同日县学出的考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在不欣赏趋新变化的刘氏看来，“府学业已改试策论体，县学仍旧，则风气尚未全变。”^⑤但他没有想到，县一级按旧法训练出来的学生，到了府一级就很难考过据新法所出的试题。刘大鹏自己在赴京考试之前，其日记中就全无洋务、新学、西学这样的词语，只是

① 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4页。

② 《退想斋日记》，62-70页。

③ 《退想斋日记》，1897年5月18日、5月30日，72、73页。

④ 《退想斋日记》，102页。

⑤ 《退想斋日记》，86页。

在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后始出现关注这类事务的言论。可以想见，那些举人以下未曾出省应试的读书人，大概就只有等到考试内容正式改变的通告发出后才能认识及此，他们也就更加无法与口岸地区的时代发展同步。1897年时就有人根据北京传来的信息劝刘氏在家塾中“教子弟习洋务”，盖其为当时所重。刘氏是否接受这一劝告，因日记被删，不得而知，从其语气看他大约是不接受的。^①但与上同理，全依旧法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少在仕进一途，必然要吃大亏。

一旦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刘氏那种一次性的购书补习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在追赶新学方面“落后”于时势的状况。1902年，清政府正式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又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故书商、书局抬其价，并不贱售”。^②可见不仅山西的新学落后于北京，即使同为内地且邻近如山西、河南，新学的传播也很不一样。场中所考既然多为新学，两地读书人已不可同日而语。刘氏只能再次落第。当然，由于开封书商多来自京、津、沪、汉，这次是特别来卖书给应考之人，属于临时性的书市；还有一种可能是河南读书人也不过是新近才接触到这么多新学书籍，则河南读书人或仅比山西士人略更幸运（从刘氏斥开封因“五方杂处”而“人

情多浮诈，风俗亦侈糜”看，开封的“开通”的确超过太原）。但至少内地读书人与书商所自的口岸读书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应是毫无疑问的。

近代信息的传播已有许多新兴的方式，报纸即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晚清之报纸适应读者需要，对于科考颇为重视，常刊载时文典范供士子揣摩。特别是改试策论后，因为“主事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亦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所以，士子“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③刘氏所居之乡看来比这里所说的“穷乡僻壤”还要穷僻，所以并不知看报可以帮助科考。山西有《晋报》，始于1901年秋岑春煊抚晋时。而刘氏日记中提到读报，还要略晚，约在一二年以后，其所读也与科举考试全无关联。即使在那时，我们也可从他阅报的时间与所阅报纸的出版时日看到近代信息传播不同步的现象。从刘氏所阅报纸看，他开始阅读的山西《晋报》一般是两周以前出版的，而他首次提到读外地的《中华报》，是在1906年，所阅者为70天以前的。到辛亥革命以后，信息流通的速度显然加快，他在1914—1915年提到读《申报》和《大共和报》，都只差七八天。到1917年，又提到阅《顺天时报》，只差两天，与阅本省的《晋阳日报》同。^④此时可以说已没有什么差异了。也就是说，要到民国初年，山西较开通的地区才与全国的主流信息

① 《退想斋日记》，74页。

② 《退想斋日记》，121、609页。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转引《上海闲话》），三联书店，1955年，108—109页。

④ 《退想斋日记》，130、149—150、162、195、199、203、246—247页。

渠道同步。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①用刘氏自己的话说，即“中国渐成洋世界”；^②这里的“中国”和渐成的“洋世界”，正是当时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种“世界”的表征（非刘氏原意）。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则必须按其中之一的“洋世界”的方式竞争。读书考试做官的路径还没有变，但考试要求的内容已改变；这已足以将相当一部分士人拒之于新的上升途径之外，僻处乡野的刘大鹏及其同类士人实已不能“预流”。其结果，在趋新大潮的冲击下，科举考试已可能凭机遇（生长在口岸就比内地占先手）而不是作文的本事（八股文的优劣是一事，大家考同样的东西至少体现了竞争的公平），考试的公平性和所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重要的是，像刘氏这样的读书人，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抵触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他们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也有追赶的实际行动。刘氏自己就一直在补习新学。而且，山西省城各书院在义和团之后改为大学堂（即李提摩太促成并经手的山西

大学，是当时除京师大学堂之外中国唯一的一所“大学”），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且“所学以西法为要”，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隔县的教馆赶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③由此可见，只要读书仕进这条路不断，像刘大鹏那样的士人对新学是既不满又要追赶。但由于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不得不名副其实地落伍了。

刘氏起步既晚，又不愿舍弃孔孟“正学”，对新学也确实颇有抵拒之心，所以追赶的速度就慢。在他于1903年又一次落第后，才进一步醒悟到，其他士人“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是为了“求速效”。因改试策论后，“所最重者外洋之法”，也只有求速效的人才考得上。对于维持“正学”的士人打击更大的是，不仅读书仕进之途已尊西学，即使教书谋生，也是“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④这还只是开头，但已有点杀手锏的味道。约在同时，与刘大鹏同年中举的郝济卿，即因其东家嫌其“守旧学”而“欲令子弟学西法”，郝氏不愿教新学（或亦不十分能教），只好“力

^① “两个世界”的提法得益于张灏先生，参见其《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页。张先生主要是据钱穆先生对晚清大儒陈澧、朱一新等人学说的诠释，指出他们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故得出西方影响主要在“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这样的结论。我以为张先生对“在位的学者官员”对全国士林的影响恐怕估计过低。无论具体的诠释如何，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的两个“世界”，我想是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的。

^② 《退想斋日记》，1902年2月28日诗，107页。

^③ 《退想斋日记》，111—112、115页。

^④ 《退想斋日记》，126页。

辞其馆就别业”。^①此时讲旧学者尚有选择余地，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就只能失馆，那就更不仅仅是束脩厚薄的问题了。

1896年春，刘大鹏所在地区已闻“废学校、裁科考之谣”，立即引起士子“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反应快的，当下就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但更多的读书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②很明显，如果说身处口岸的某些“先进”士人考虑的是废科举将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内地一般读书人最直接的反应正是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方向转换问题，而他们首先考虑的也就是怎样因应这一可能出现的变化。

很快，传闻的消息就与恰发生在同时的省城晋阳书院裁减诸生的膏火银一事结合起来，据说裁减膏火只是第一步，接着就要“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新立同文馆、博致书院，请洋工师主教”等。这也是自上而下的，外省已在进行；山西因抚宪抵制，尚“不至一旦变于夷狄”。其实后来弄明白，至少裁减膏火是用于给书院山长加束脩。^③但那些传闻将发生的事，显非无因，后来大致以不同的形式逐渐出现。

1904年初夏，刘氏又从《晋报》上看到“政府欲将各省州县各教谕之缺一律裁汰，所裁教官即分别派充各小学堂教习，所有教谕署中应办事件即并归各省学校司办理。”清制，

举人参加“大挑”考试合格即可用作地方教官（虽然从挑中到实际补缺可能会有十年或更长的候补期），也是入仕之一途，这对刘大鹏来说只有一步之遥。如今此路将断，他立即意识到“读书人更无出路矣”。^④

到1905年2月中，刘氏已知“天下学校全改为学堂”。在他看来，“学堂者，外洋各国之名也”；盖“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那年十月，他获悉停止科考，当即感到“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刘大鹏是有大志者，故其所虑或在仕途的中断；对于其他前途本不甚光明的读书人，却是威胁更直接的“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果然，刘氏还在担忧“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而一两月之间，同人已“失馆者纷如”。对于家有恒产者，尚不致虑及吃穿，“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⑤

科举制本是集文化、社会、教育、政治等多功能于一身的建制，它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应该指出，清末各项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因为中国传统政教模式的确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在位的中国士人可以接受最初由西方传教士提出的废除科举制的主张，就因

① 《退想斋日记》，138页。

② 《退想斋日记》，57页。

③ 《退想斋日记》，1896年5月25日，6月8日、1897年5月27日，58、58、73页。

④ 《退想斋日记》，135页。

⑤ 《退想斋日记》，139、146-148页。

为其许多功用已经或正在失去。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是，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一夜间便可造成。如果说刘大鹏等人考虑多是个人出处，他们也看到一点关键所在：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①时就突然废除的。很明显，清季时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

从某种程度上言，清季最后几年新政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当清政府终于认识到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而主动推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日，却正是义和团事件之后大量过去维护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主要象征）的那些士人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之时。^② 科举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正反映了在主流士人心态与清政府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政府希望藉此可以挽回这些士人的支持。从1901年到1905年那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而将科举制废除。^③ 由于改和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遂造成旧制度已

去而新制度更多仅存在于纸面的现象。旧制既去，而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④

实际上，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已带有质变之意。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不论是为了实行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任何士人都必须学习新学。刘大鹏就是一个显例。他也有大志，若科举不废，假他以时日熟悉新学，至少也还有“身登仕版”的可能，所以他才不愿以教书为生，“依人门户度我春秋”。此制度一旦废除，这个他一生寄予厚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之路就突然关闭了。

耕读之路走不通后，士人怎么办？年轻的或可进新学堂，转变得更快的，已知道出洋游学。但那些已到中年不宜再进学堂而又无力出洋游学者，他们怎样因应这一社会变动呢？刘氏发现，他认识的许多读书人因科举废除而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他不禁慨叹道：“嗟乎！

① 《退想斋日记》，146页。

② 鲁迅曾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卷，282页。）这里的“群”，实即主流派士大夫，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在义和团之时恰与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当时“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就是那些当年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中立是新入的洋概念，从传统观念看，就是有外侮而不勤王，听凭外人宰割君主）所致。类似的心态也可见之于清季的温和改革派。他们反对革命，却承认清政府不可恃（这在逻辑上本身是不通的：清政府不可恃，就必须更换之，否则何以救亡？此派之所以得不到多少民间的支持，就在于其政治主张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些问题当然已越出本文范围，只能另文探讨了。

③ 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236—245页。

④ 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

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①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到1906年春，因县令传谕各蒙馆均“改名为学堂”，致使各蒙馆闻风而散，学生全都不读。在刘氏看来，这体现了“民心之不愿改为学堂，不愿学洋夷之学”。其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县令既然只命改名，暗存承认既成事实之意，则所有馆师尚不致失业。各馆皆散，恐怕恰是各东家及就读学童家长为使其子弟能学新学而无形中实际解雇旧馆师的婉转手法。既然“士皆舍孔孟之学而学洋夷之学”是为政府所鼓励引导，像刘大鹏这样的个别士人或许能坚持不“随俗浮沉”，一般家长则必然会“靡然从风”。散馆的结果，其实质就是所有的馆师失馆。^②如果散馆只是临时现象，则塾师尚有复职可能。一旦新学堂建立起来，塾师的希望就渺茫了。

果然，到第二年春，情形就比较明朗。没有改学堂的蒙馆，“弟子来读者无几，藉事不来者有之，托病间旷者有之”。而凡新设学堂之村庄，蒙馆就被废弃。由于学堂的蒙童要“从事于科学”，旧有的塾师“多不

能安其业”。反之，稍知新学者，或可为“劝学员”（即由绅充任的低级学务人员），或可为新学堂教习。换言之，只有到新学堂林立，知新学的读书人数量不足以充教习时，旧塾师才可望重返教职。即使此时，旧塾师还面临一个被再选择的问题。多数新人物在安身立命之处，其实也重旧资格，故像刘大鹏这样有举人功名的，仍会被优先选用；而原来学历稍差、竞争力不太强的，通常都落得个长期失业的结局。到1908年夏，刘氏仍观察到“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的情景。^③

这还只是清季的情形，一到民国，更有根本的变化。一般塾师必须通过县一级新政府的考试才能教书，“若不合格即不准设帐授徒”。刘大鹏在任县议会议长的短暂时期，就有一老秀才怕考试通不过，“势必生路告绝”，不得不“声泪俱下”地请他“庇护”。以前士人不读孔孟，只是受包括考试内容在内的各种“引导”，如今“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新旧之间的攻守之势已完全改变。像刘大鹏这样继续得以充任蒙养小学堂教习的士人，尚可在教学时暗中抵制，“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但省视学到他的学校检查时，显然发现了问题，乃重申“仅许办理新学，不准诵读经书”。^④

结果，刘氏这样的“顽固党”终不能见容于新时代，到1914年初，他已不得不“另图生计”，开始经营小煤窑。他自己总结说：“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

① 《退想斋日记》，149页。

② 《退想斋日记》，151-153页。

③ 《退想斋日记》，1907年4月9日、4月14日、1908年6月29日，159、159、169页。

④ 《退想斋日记》，1913年2月19日、3月27日、4月29日、6月27日，177、179、180、184页。

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故“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他一面以《中庸》上的“居易以俟命”自我解嘲说是“处于乱世，所学不行，聊藉一业，以藏其身”，^①一面坚持称自己是“老农”、“乡人”，^②并不以“商人”为其身份认同。然而，这仍不能改变他之所为正是他以前一直鄙薄的因生活境遇不好而“弃儒就商”这一事实。清季民初世事变化的沧海桑田，终于使最后一代四民之首的士（而且是那些主观上希望维持其原有的身份认同者）自己走下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四民社会也就随之而解体，不复存在了。

旧有的士人谋生既难，新的士因科举制的废除已不能再生成，士的存在也就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其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那时刘氏耳中所闻，眼中所见，“无非困苦情形。农曰岁欠饥馁……士曰学尚新学，遗弃孔孟，士皆坐困……工曰今有机噐，废置手工，无所觅食……商曰百物征税，日重一日，商务利微。”可谓“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而“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③

衣食足而后知礼节是中国的古训，先有面包然后有艺术是近代西人的新知。如果士无以为生，自然也就谈不上作表率。一个没有共同接受的榜样的社会，加上其余三民也多困苦（必须指出，也有不少适应社会变动而上升者），民生和民心皆不稳定。此时天下或者大乱，或者以严刑治；前者为清政府

及鼓吹废科举者所不欲见，后者为尚未正式放弃儒家学说的清政府及推广改革者所不能为。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的确是主张废科举者始虑所不及的。

外篇：近代内地 乡绅心态的史学启示

科举制是传统中国社会一项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体制，其废除无疑是划时代的。但从刘大鹏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衰落远早于此，至少在山西乡间，耕读之路早已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而科考内容的改革无形中已使那些仍能一心读书的士人所学内容从孔孟之道逐渐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虽然废科举的始作俑者是西人，但西潮的冲击当然不仅是在科举。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主要思想资源转变（更多是在意识层面，潜意识即通常所谓的安身立命之处则基本未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科举制的废除。在这一方面，身处内地的儒生型乡绅刘大鹏记录下来的与耕读生涯相关的心态变化，也给予我们许多从上层精英人物纪录中所难见到的启示。

从1896年底开始阅读时务书籍，刘氏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至少不仅仅在趋新的一面。他看到了“华夷通商，是天下一大变局”，但一开始个人信心也还比较足；“时人皆忧中夏变于夷狄”，在他看来，“夷狄

① 《退想斋日记》，1914年2月5日、29日，191、192页。

② 《退想斋日记》，227、262—263页。

③ 《退想斋日记》，1906年11月25日、1907年2月14日，155、157页。

不能变中夏，仍是夷狄变为中夏也”。这一点尚是古训，但刘氏的推理却是近代的：西人到中国传其洋教，“欲胜吾圣贤之教……不知吾道甚大，无所不包。泰西之教非但不足以敌吾道，久之而必化其教入吾教耳。乃知海禁之开，是吾道将来出洋之由，非西教混行中华之渐也”。^①那时的“经世文编”，虽有明显的倾向性，到底是两造的文章都选，所以时务书籍有时也给抵拒时务者提供了思想依据。^②

但在义和团之后，刘氏发现：一方面，洋务已是举国皆趋，孔孟“正学”已经不明；另一方面，“洋夷扰乱中华，如此其甚，我则衰弱自安，不思自强”，他的自信心开始逐渐丧失。到科举废除之后，眼见一留学英国回来得举人的太谷县读书人，服色已易洋装，“宗族亦待为异类”，终不得不承认有“华人变为夷者”这一事实。^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氏眼里，洋务并不等于自强，这或者是海峡两岸各以“洋务”和“自强”称谓同一“运动”者值得研讨的吧！对他那样的士人来说，搞洋务者所致力“争胜”和“富强”，“凡举一政，必费巨款，而其款即从民间科派”；不但不安民，实是扰民，“虽云自强，其实自弱也”。传统儒家思想最反对与民争利，而新政之下的“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无一不是

与民争利，其结果是“民心离散”。而民心才是真正自强的基础：“国家当积弱之秋，外侮交加，而欲奋然振兴以洗从前之耻，其策在省刑罚、薄税敛，施仁政于民，俾民修其孝弟忠信而已矣。不此之求，惟事富强，失策孰甚焉！”正因为这样，在刘氏眼中，“自变法以来，各行省民变之案接踵而起”，出现了“人心莫不思乱”的现象。而且是“民困愈甚，思乱之心更深，一有揭竿而起者，民必响应无穷矣”！^④

刘氏强调的“薄税敛”是儒家仁政的主要内含，且有极强的时代针对性。的确，除了“洋夷无他知识，惟利是趋”^⑤和中华之邦讲究礼义这个根本的价值冲突外，晚清改革的大多数事项都需要增加开支，这些开支或直接或间接，最后都落实到老百姓头上（历次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更是如此）。若与同时期的西方和后来的中国比，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各级常规和非常规的各类税捐加在一起，或者仍不算太高。但对具体时期的具体个人和家庭来说，新出的各类非常规税捐的确是以空前的大幅度增加，而且呈不断增加之势（民国重于清，国民党又重于北洋）。

刘大鹏观察到：“各省大吏均以财用为务，凡所设施，非与民争利，即加征加赋，动曰效洋人之法也。”^⑥这就看到了晚清政府“与民争利”的思想资源是来自西潮。从

① 《退想斋日记》，1897年3月23日、1896年6月22日、1897年10月7日，71、59、75-76页。

② 同样，在民国代清之后，自居“大清之人，非民国之人”的刘大鹏，拒绝用民国纪年，仍用宣统年号。但他能够“各行其志不能强”，所依据的思想资源，竟然是“维新人所谓之自由是也”。《退想斋日记》，1914年11月17日，199页。

③ 《退想斋日记》，1902年2月9日，1906年3月6日，105、148-149页。

④ 《退想斋日记》，160、105、117、142、128、120页。

⑤ 《退想斋日记》，130页。

⑥ 《退想斋日记》，1905年5月16日，140页。

理论上言，这直接牵涉到西方自近代以来聚讼不休的“小政府”和“大政府”的问题（也类似中国历代关于皇帝是否应内外“多欲”的争论）。对西人来说，纳税是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政府要多办事，当然要多征税。刘氏的同乡，任新学堂教习的维新士人杨谟显就认为，加征加赋是为筹兵饷，老百姓“因此而民变”，只能说明“民之不仁甚矣”。他以为现在加得还不够多，“即倍而加之，亦分所应尔”。^①这样的观念，虽近代变法之人暗中常以为本的法家学说也不及此，显然已融入了西方理论。

刘氏在1906年3月遇到两个新近游学日本的山西士人（一进士一生员），“盛称倭学之高；言倭之理学，华人不能其万一”。这种言论，大致也是出自真心。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也曾认为他所看到的英国政治是中国上古“三代”政治的再现，留日学生中多有认为有些传统在中国已失，而在日本尚保存者（鼓吹日本负有东亚振兴之责的有些日本学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但出发点却颇不相同）。不过刘大鹏也能看到问题的实质：“噫！舍吾学而学倭学，宜乎倭学之高也！”^②的确，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多是在西方文化优越观已确立之后才出国游学的，其容易看见象征西学的日本学高明之处，正因为先有求仁之心，故能出现我欲仁而斯仁至的现象。

但对刘大鹏这样的儒生来说，“惟事富

强”本身就不合中国传统，而“维新之人一意加捐，以期政治之维新”，并不念及民困耶否耶，更是失策。儒生当然应有“澄清天下”之志，不能只顾及眼前；但他们同时也遵循“思不出其位”的行为规范，在乡就要言乡。在刘氏一类乡绅眼中，国家的“富强”还是个影子，而越来越多的各类税捐却是实实在在地落在周围的乡民身上。故刘氏越来越肯定：清季“民心离散”的根本原因，就在“维新之家办理新政，莫不加征厚敛”。^③

这样，新政内容之一的兴办新式学堂，在刘氏眼中就是一项明显的苛政。因为“每堂必筹许多经费，俱向百姓抽剥”，故学堂设得越多，则百姓的负担就越重。“趋时之人只求迎合官吏之心，不顾群黎之怨”。问题在于，若“民生不遂，教何由施”？^④到1906年7月，刘氏已获悉直隶（今河北）灵寿、平山两县数千百姓因抗“勒捐巡警经费”而起民变，在毁县衙打县令的同时，因“百姓又愤学堂捐，复将两县所设学堂焚烧”。又一年后，身处山西乡间的刘大鹏已看到，“凡设学堂必加征加税，致使民怨沸腾，动辄生变”，长此下去，“天下大局殆将有不堪设想者”，“恐不到十年即有改变之势”。^⑤辛亥年的革命史实表明，他这个预测大致是准确的。

而且，设学堂“经费甚巨”的一个原因即在“学堂规模只是敷衍门面”，讲究“铺

^① 《退想斋日记》，1905年5月29日，141页。

^② 《退想斋日记》，149页。

^③ 《退想斋日记》，170、174页。

^④ 《退想斋日记》，1905年2月2日，138页。

^⑤ 《退想斋日记》，153、158-159、151、162页。

张华丽”。几年后刘氏到省城参观各新立学堂，果然“均极雄壮”。^①这与章太炎所见不谋而合。盖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太炎指出，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这一点恰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其后他省效之。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②则可知刘大鹏所见，决非仅是旧人物看不惯新事物。

最使刘氏不满的是，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兴办学堂，为此不惜勒索百姓，激起民变，但学堂里的学生却“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时政得失”，且“竟敢显言‘排满’二字”。^③究其原因，也正在于这些学生服洋服、学洋夷学；服洋服则“失中国之形”，学洋学则追随西人主张自由平等；学生既然“一以西人之学为宗旨，无父无君，皆习为固然，故入革命党者十居八九”。既然无父无君，当然也就谈不上尊师。于是，新学堂的体操课，在他眼中就成了“师弟无等级，将读书气象全行扫除”的表征。^④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最后一点半是误解。但对于服膺孔孟之道的近代士人来说，平等自由最可畏惧之处的确在其提示的无父无君方向。

社会转型之时，类似的现象并非不存在。1904年12月，刘氏就听到来自上海的传闻，说一京官王某送子出洋游学，子归而“跪请曰：‘男有一言，父若俯允男才敢起。’王某曰：‘儿有何言？’其子曰：‘今日所请者，即父；自此以后愿不为父子，成为同等。’王某闻言面成灰色，无言而答，然已无可如何，听子所为。”1906年7月，刘氏又听说山西平定县就有“在省西学堂毕业生徐姓，不以其父为父，竟以平等相称。”^⑤北伐之时，也有类似的传说，讲参加国民党的青年要与其父亲互称同志。虽皆传闻，亦未必无所本，至少表达了当时士人关怀之所在。

在士人趋新成为大潮后，刘氏所谓不同于流俗，也有了新的时代含义。他在1903年又一次落第后，日记中首次出现了“顽固党”一词：社会上对那些不追逐西学而尚“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一年多后的1905年夏，他总结说：“近年来为学之人竟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⑥一般而言，在口岸地区，新旧两派的划分至

① 《退想斋日记》，1905年3月14日、1908年3月1日，140、167页。

② 章太炎：《教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760页。据太炎所见，“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张之洞给学生以优厚待遇，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己。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由此看来，近代因读书人不返乡造成的城乡之别还要早于废科举，实始于兴学堂。

③ 《退想斋日记》，1906年4月14日，150页。

④ 《退想斋日记》，163、158、162页。

⑤ 《退想斋日记》，138、153页。

⑥ 《退想斋日记》，126、143页。

迟是在几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已经明确，即所谓“自六烈士杀，而新旧泾渭于是分矣”。^①但在刘氏的世界中，这个划分显然要晚得多。那“顽固党”的称谓及其伴随的新旧之分，很可能还是他出门应考得到的新知识。近代中国各地区思想心态的不同步，于此又可见一斑。

科举制一废除，不但各级官吏“专事奢华，事事效法洋夷之所为”，而“草野人民亦多仿而行之”。^②新旧之分的情势在乡间也很快明朗起来，而且维新派显然在短期内就大占上风。刘大鹏一向逢人就喜欢讲伦常之理，^③但在废科举之后不久他又讲伦理时，一个朋友就劝他说，你讲的虽然有理，“但不合乎时。若对维新之人，非特受其讥訾，且必招其斥骂”。^④可知在此之前，刘氏尚颇有发言权，然维新派在短时期内已今非昔比，完全占据了乡间的言论阵地。旧派之人若不在言论上自律（即 self-censorship），就会自讨没趣。到1908年春，有讲说孔孟者更会被读书人“群焉咻之，目为顽固，指为腐败，并訾以不达时务，为当时弃才”。^⑤世风的丕变表明，新派此时已取得了乡间思想论说权势的完全控制。

故刘氏等正忧国家和个人前途无望，维新者却都“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⑥对那些认为科举是中国进步的大障碍的士人来说，这样的期望想必是真诚的。但刘氏等视科举为中国的根本制度者，其忧患意识也是发自内心的。同一事物而士人所见竟截然相反，近代中国思想论说及其载体的两极分裂，显然值得进一步重视。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刘氏所说的“维新之人”，并非我们一般史学论著中专指的戊戌变法前后的主张变法者。同样，像“新政”这样的字眼，在刘氏日记中也是1903年才出现，专指1901年及其后的“变法”。^⑦这就又一次提示我们，戊戌变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全国，恐怕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研究的题目，很可能其影响主要仅在所谓“洋世界”的范围之内（现刊印的刘氏日记缺光绪二十五、六即1899—1900两年，所以尚难准确了解戊戌变法对刘氏所居山西民间影响的程度，但他的“新政”一词全指1901年或以后的“变法”，完全不涉及戊戌变法，却是无疑的）。

可以看出，刘大鹏观察社会问题的倾向

① 李群：《杀人篇》，《清议报》88期（1901年），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卷一上，23页。

② 《退想斋日记》，158页。

③ 对刘氏这样的儒生型乡绅来说，伦理是“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他的日记一开始就讲伦理，最后结束时仍在讲伦理。在他看来，自古“伦理明则天下治，否则天下乱”。四十年代日本军队在中国“行其暴虐之政”，也是因为全世界都已不讲究伦理，“惟是行求利之法”。（《退想斋日记》，1892年2月13日，1942年8月19日，2、590页）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帝国主义，其实也不无所见。

④ 《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10日，149页。

⑤ 《退想斋日记》，168页。

⑥ 《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19日，149页。

⑦ 《退想斋日记》，128页。

性是明显的，但他也并非全不客观。比如，对于严禁鸦片一条，他就认为是超过以前政策的“新政之最好者”。^①另一方面，刘氏无疑是带有偏见的。当他将所有他最看不惯的新事物和各种新老问题皆归咎于“学堂之害”时，他的不满情绪显然压倒了一个“觐国”之士观风析政时应有的客观。1908年9月，刘大鹏将“学堂之害”总结为三点：一、“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二、“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三、“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②从他以前的记述看来，只有第三条可以算是兴学堂以后才发生的事情（这也专指刘氏所在的山西乡村而言，别处讲平等自由并不待兴办学堂）。此点确有可能促进了“读书人士日减一日”的局面：一部分害怕子弟与其讲平等的父兄或即因此而“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这就与废科举一起强化了第二点的发展趋势。而改蒙馆为学堂不过使第一条发展到极端化。但无论如何，前两点都是在兴学堂之前很久就已发生，且早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刘大鹏之所以会有这样带偏见的看法，与他的基本价值观念颇有关联。他在1914年末总结自己的一生说：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蹶，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

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③

这真是一幅近代科举制与内地乡绅关系的清晰写照。他的生活目标、希望、失望，皆系于此一制度，可谓成亦科举、败亦科举。在大致丧失“风云”之机会后，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仍靠与科举制密切关联的耕读生涯。从科举制的改革、废除到民国代清，刘氏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每下愈况，最后不得不“困厄于乡”，慨叹“不亦虚生”，以“惭仄曷极”的心态度过余生。

这样，刘氏将他眼中清季民国的主要弊端皆归咎与教育改革，就不难理解了。他在1916年春指出：“自光绪庚子以后改设学堂，不数年停止科考，并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学洋夷之学……洋学既盛，孔孟之学遂无人讲；中国人士均尚西学，则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皆置诸如[无?]何有之乡，遂养成许多叛逆，未越十年，即行返国，凭据要津；至宣统三年，突然蜂起，革我清之命，改称民国，号曰共和，而乱臣贼子乘势行其素志。”以后的变化，都是“以贼攻贼、以暴易暴”，造成“民不聊生”的状况，“岂非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之所致乎”！^④

刘氏眼中的“叛逆”，显然包括了我们的

① 《退想斋日记》，172-173页。

② 《退想斋日记》，162-163页。

③ 《退想斋日记》，198页。

④ 《退想斋日记》，227页。

平常所说的“立宪派”和“革命派”，这似乎提示着我们学术界过去多看见这两派的异，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同。至少对刘氏这样的内地儒生型乡绅来说，两者之间的同多于异。在强调两派共性的前提下，刘氏能观察到新学所造成的“叛逆”在辛亥革命之前实际上已“凭据要津”，这一洞见是超过许多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的。的确，如果细观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兴衰，后起的政治势力往往是在前者执掌政治权势时已隐据思想论说领域的权威，先造成有道伐无道的声势，然后以弱胜强，取代前者。^①

如果抛开刘氏出自清遗民的成见，不计较其某些情绪化的表述，而从文化竞争即“学战”的视角看，他最后的结论，也不无所见。余英时先生最近提出：“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学的具体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他赞同陈寅恪先生关于“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法律制度公私生活之方面”的论断，并进而指出：传统中国“从个人和家庭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儒家原则。^②换言之，这一儒学支配下的秩序是一个全面的体系。一旦“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整个体系即走向崩溃。刘氏虽处乡间，其切身的体会与后之大儒的系统诠释颇相契合，正体现了儒学贯

穿于人生日用之细行与国家兴亡之大道这一无所不在的特征。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变化，仍是文化竞争的失败。中国士人引进的西方思想，总体倾向着重于“争”，不仅要“外竞”，而且实际上更多是提倡“内竞”，故对中国既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多取挑战的态势。这样一种大趋势或者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这且当别论，但其客观上无疑造成了许多人（不仅仅是士人）的生活困难和不安宁，而“民不聊生”这个现实又是对任何既存政治权势的最根本威胁；结果，晚清政府的变法在失去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前提下，建设不足，破坏有余，无意中走上一条自毁之路。^③

可以看出，儒生型乡绅刘大鹏当时记录下来种种观点，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提示着一个问题：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许多耳熟能详的论断，在刘氏所处的“世界”中，或者不同时，或者不同义；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到今天仍然是侧重某些层面，而忽略了另一些层面呢？假如是的，刘大鹏日记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就不止在科举废除引起的社会变化了。

① 北伐就是一个显例，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②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中国文化》，第11辑（1995年7月），1、15页。

③ 反之，也可以看出，从皇室到大臣的清季主朝政者所考虑的，应不完全仅是维护其统治（这当然是他们最主要的关怀）。有相当部分的变法措施，明显不利于家天下的统治，但在位者相信其有利于国家，故此得到推行。假如这些最终导致清室失位的政策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对这些末世的改革者来说，也可算是求仁得仁，虽以悲剧告终，倒也不失为悲壮。这个问题涉及太宽，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了。



科场场域

——1895-1905 年的湖南*

应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导言

1905 年科举制的废除一直被视为一个“大事件”，这是因为它在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经典叙事中被赋予了特殊位置。费孝通首先分析了科举制的社会影响。他认为通过科举制实现的社会流动率并不算大，但由科举制所产生出的士绅是传统中国所谓“双轨政治”的运转枢纽。科举制的废除大大加速了士绅阶层的蜕变，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发生“社会侵蚀”的重要导因。^①张仲礼对科举的制度安排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提出科举制虽然曾是政府控制士绅的有效机制，但这种机制自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便逐渐从内部衰落了，而它本身又完全无法适应西方冲击所产生的新需要，废科是清廷顺应历史的必

然之举。^②何炳棣以其对举子详实的家庭出身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清因科举而存在着频繁的社会流动，社会底层可由此途进入上层，统治阶级也因此建立在一个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上。科举废除的社会后果首先就是对这种社会流动机制的破坏。^③汪一驹对科举制废除后兴起的西学教育的分析补充了何炳棣的看法。他认为，以留学为顶端的新式教育成了替代旧式功名的进阶之梯后，因为新式教育在教育费用上远高过以前，结果，社会流动率大大降低了，乡村社会由此而失去了稳定并进而影响到了社会变迁的方向。^④此外，还有罗兹曼、罗志田、桑兵等人，都认为废除科举的重要性超过了辛亥革命，昔日主要由科举所维系的社会整合已被破坏殆尽，中国社会结构失去了重心，也失去了

* 本文作者系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革命社会学。本文选自氏著《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第一章，本书通过三个不同类型的个案考察，展示了从 1895 年到 1926 年的三十年间，新教育场域逐渐兴起的艰难历程，读者亦可参看。感谢应星老师提供文稿，引用请据原书。

① 费孝通与潘光旦：《科举与社会流动》，（上海）《社会科学》1947 年第 10 期；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5-170 页。

②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8-173 页。

③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255-266. 也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联经出版公司 2013 年版。

④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梅寅生译，久大文化公司 1991 年版，第 117-141 页。

现代化所必需的条件。^①上述这些学者尽管对废科事件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显然,谁都不否认它的重要性。中国学界在科举制停废百年后举行的大规模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把科举制研究推向了高峰。^②

不过,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自196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对中国研究领域发生影响,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思想尤为人们所借重。^③施坚雅开拓了中国研究新的空间结构,魏斐德等人则认为中国从16世纪中叶到1930年代这段时期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④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事件已如布罗代尔所说的“泡沫”一样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构本身。贝蒂根据对安徽桐城县的研究,发现从明到清都主要是由更具稳定性的土地与宗族而非科名来决定上层社会地位的。^⑤以周锡瑞和冉玫铄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着重区分出两种社会持续:一种是某种特定的精英类型在社会上的持续,另一种是精英个人在社会地位上的持续。他们认为,虽说科举制保

证了保守的、同质的、整合的精英统治不被打断,而特定的精英个人难以靠它来获得地位的持续,但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诸如宗族势力、财力或军力)来长期维系其地位。科举制的废除虽然打断了前一种社会持续,却未必能打断后一种社会持续。^⑥这与日本学者士古宙三很早以前提出的一个观点相呼应,即强调士绅在辛亥革命的第一阶段(1900—1913)尽管遭遇了包括废科在内的三次危机,但最后都顺利地巩固了既有地位。^⑦孔飞力在剖析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影响时也指出:废科只是意味着原来用以确定士绅的几个正式特征不再适用,士绅阶层的特征有了许多变化,但士绅在农村中的地位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难以动摇的。^⑧正如高慕轲用“辛亥革命之消失”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一样,^⑨我们也可以说,作为重大事件的废科之举随辛亥革命一起“消失”在了这种趋势中。

上述两种研究方向看似根本对立,实际上在思想模式上却存在着一些深刻的联系。

① 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段小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343,643—646页;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页;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1页。

② 参见刘海峰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0页。

④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F.Wakeman&C.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75:1—25.

⑤ H.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127-132.

⑥ J.Esherick&M.Rankin (eds) .*China's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 of Domin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1-24.

⑦ ChuZo Ichiko.“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in M.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297-317.

⑧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29—239页。

⑨ 高慕轲:《辛亥革命之消失》,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52—1568页。

正如李猛所指出的：“大事件”的确是以一种人为构建事件等级制的历史目的论为支撑的；但企图在社会现象背后寻找一个楼房构架式的社会结构的作法仍然未摆脱“大事件因果性”中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忽视。^①在社会史研究中要真正将事件作为分析的焦点，就不能不超越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采取关系主义的研究策略，即将任何一个事件总是作为关系去把握，而又不将关系化减为结构，而是始终视之为事件，这亦即“关系/事件”的分析。^②正因为此，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为中国社会研究展示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

布迪厄早年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但他后来借以实现自我超越的一个主要理论资源却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通过对（经济）资本的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再生产（即经济再生产）的机制；而他则要建立一门“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即揭示支配权力的各种再生产机制。^③布迪厄的分析不是立足于“浑然一体的社会空间”，而是在他所谓的“场域-资本-惯习^④”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他认为以往所谓的社会空间其实是被大大小小的场域所分割的，在这些场域背后贯穿着的是各种

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逻辑。布迪厄这种分析思路与社会结构分析相通的在于他承认每个场域都有其独特的结构性的调控原则，而二者的不同在于场域是一种不断得到维系或改变的关系的构型——其维系抑或改变端赖场域内行动者之间的斗争势态。它与社会建构分析相通的在于场域是一个行动者参予形塑的社会空间，而不同则在于行动者的形塑又受到场域既有关系与调控原则的制约。因此，要真正理解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就必须明白“场域”只是一个关系性而非实体性的概念。“场域”概念与另外两个概念“资本”、“惯习”是密不可分的。资本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概念的延伸——在布迪厄那里，资本的基本形态有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资本既被当作场域内争夺的目标，同时又是赖以展开争夺的手段，（比如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的资本交换）。而惯习则是场域在行动者身上体现出的一种性情倾向（disposition），它一方面是被场域所形塑的，另一方面又恰使得场域不断地生成出来。布迪厄的整个实践理论所体现出的都是卡西尔所说的那种关系性思维。^⑤例如，布迪厄多年来对西方学校教育体制的关注就与传统的教育社会学的视角绝然有别：在他眼中，西

① 李猛：《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1期。

② “关系/事件”概念是由法国思想家德勒兹提出来的；从整合的角度来看，那两种研究方向接近于洛克伍德所说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对立，而布迪厄提出的“逻辑整合”概念则超越了这种对立。李猛（《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1期）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联作了出色的阐发。

③ P. Bourdieu. *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159-197.

④ habitus 与通译为“习惯”的 habit 不同：后者有着浓厚的笛卡尔式的主体意愿色彩，而这正是布迪厄竭力想超越的。在他看来，habitus 犹如一个无人指挥的管弦乐队，有着“即兴创作中的无意图创造”，是身体化的社会知觉图式。鉴于他用“habitus”来超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意识主体与无意识主体二元对立的意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的中译者将 habitus 译为“惯习”，以别于通用的“习惯”。

⑤ Cassirer 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Open Court, 1990:309-325.

方国家中学校这个场域与西方社会支配关系无所不在的权力元场域有着特殊的亲和性，用他思想的一位阐释者的话来说，即学校是“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为社会等级制提供证明的极为重要的制度机制”。^①当然，一个社会再生产的机制是极复杂的，绝非某一、两个制度安排即可承担——各种等级以纵横交错的方式构成，而各种价值体系也同样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社会行动过程。但我们同时要看到：在特定的场域体系中，总是存在一种或几种主导性的制度构成了社会权力分割的基本格局。在当今西方就是由学校及其文凭所代表的文化资本构成了整个权力场域斗争的主线。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布迪厄的思想对开拓中国近代社会分析新思路的借鉴意义。

我们首先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是：科举制与中国帝制权力运作究竟有何种关联以及是怎样关联着的？从理论上说，科场是向多数人开放的，但由于多数人并不具备进入科场所必需的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也由于官僚权贵在科场各个环节的插手，结果，科场内所实现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统治集团（由皇族、官僚、士绅、地主与富商组成）的内部流动。另一方面，运作于后台的支配权力在前台又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形式上平等的机制。这种“平等”的实质意义是使被支配者与支配者都认同通过科场确立起的关系，都乐此不疲地去参与科场行动。故此，

科场的争夺过程不仅是个分配科名、产生候选官员的过程，而且，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还同时成了确立支配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过程。事实上，自宋朝以来，科场就已被构型为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的一个关键性的场域。所谓“科场场域”，就是按科场特定价值观与调控原则所构建出来的社会空间，是科场中各种社会位置的一种关系构型。在这种构型中，考生根据各自的位置去争夺以科举功名所代表的文化资本，维系或部分改变着科场空间的界限。而使科场上的考生对这种关系产生认同的动力机制可称之为“士绅惯习”^②。所谓“士绅惯习”，是指科场场域在士绅（考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构成作为文化资本携带者的士绅采取种种策略去维系科场场域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士绅惯习既被科场场域所形塑，同时也是科场场域得以不断生成的推动力。考生们所争夺的也不再仅仅是特定的科名及与之相连的官职本身，而且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进入科场场域后被制度化了的文化资源。一方面，它是该场域内行动者进行相互争斗的手段——在科场场域中，文化资本表现为科场应试能力；另一方面，它又是行动者展开争斗的目标——在科场场域中，文化资本又表现为科试通过后所获取的相应功名。布迪厄在分析西方学校时也曾提及中国的科举制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特殊意义。^③ 艾尔曼具

^① 华康德：《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对布迪厄〈国家精英〉的讨论》，李猛译，载苏国勋、刘小枫编《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7-374页。

^② 确切地说，科场上的考生与广义上的“士绅”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在此将“士绅”视同前者，是取其狭义。

^③ 布迪厄（也译“布尔迪约”）、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8-159页。

体分析了帝制国家、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是如何围绕科场场域这个中心而共生的。^①我稍后将“科场场域”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

由此看来，科举制的废除必然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支配关系紧密关联着。在此意义上，废科仍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它的重要性只能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本篇即是要在一个省的史料基础上，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角度探讨 1895—1913 年间科场场域的变迁。

之所以将研究时限界定为 1895—1913 年间，是因为 1895 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是科场场域变迁的肇端，而 1913 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标志着现代学校场域开始得以构型。其间的十八年正是科场场域内展开的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制的过程，也是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机制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本篇所重点研究的既不是某一事件——辛亥革命也好，废科事件也好——本身，也不是布罗代尔式的“长时段”的“结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在科场场域消长的局势史，借用萨林斯的话来说，即是科场场域的“并接结构”（structure of the conjuncture）。^②

中国地域本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北宋

开始的儒学地域化以及晚近开始的地方军事化更使地方在晚清社会政治格局的分量日重。^③我们之所以将研究范围集中在湖南省，一方面是因为它位于施坚雅所划分的长江中游区域，在全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横向上看，它的社会变迁速率与深度居于长江上游与下游区域之间；从纵向上看，它不比岭南早受西风之袭，但又往往较华北得风气之先；即从长江中游区域内部而言，湖南的社会变迁也多介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另一方面，湖南既是湖湘书院文化群落的所在地，又是地方军事化的重要代表；^④既是晚清绅权扩张最为强盛的地方之一，又是诸多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政治、军事人物之渊薮。将本篇的研究放在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省份去展开，或许能较好地兼顾全国与地方这两个层面。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英国著名史家劳伦斯·斯通所说的集体传记研究法（prosopography）。^⑤因为社会史研究既然是要“重建结构大变动中的普遍人的历史”，^⑥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是重在若干历史“大人物”的洪业上，而是要重建中国

① 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载氏著《经学·科举·文化史》，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39—157 页。

② 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 页。

③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第 64—112 页；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 224—237 页。

④ 孔飞力研究近代地方军事化的经典之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湖南的史料得出结论的。尽管麦科德对湖南军事化的高水准及其绅权由此得以扩张的看法表示了质疑（麦科德：《清末湖南的团练和地方军事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但无可否认的是，曾国藩亲创的湘军给湖南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以致不少人称近代湖南人有一种“湘军情结”。

⑤ L.Stone.“Prosopography”, *Dedalus*, 100.1(1971): 46-79.

⑥ 蒂利：《重建欧洲生活》，马得等译，载蔡少卿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2—296 页。

晚近变迁中普通湖南士绅的生活史。据估算，湖南近代士绅数量高达 11 万人左右。^① 要遍寻这些士绅的资料已不可能，但研究其中近 150 名在各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士绅的生活史，还是可以得到一幅其轮廓接近全景的缩微图。部分士绅的史料选自《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湖南辛亥革命人物传略》和《自立军史料集》等。但由于以上资料较多收集的是历次社会运动中的所谓“正面人物”，内容上也有一些讹传，我们从辛丑暨壬寅科（1903）与甲辰科（1904）的《会试同齿录》、清末出版的《学部官报》、台北 1962 年影印出版的房兆楹编的《清末民初洋学生题名录初集》及湖南省市县的文史资料以及其它各类传记资料中进行了较多的补充、校核与编纂。在集体传记研究法的基础上，本研究也对这些资料兼作某些统计分析与个案对比分析。

二、科场场域与 1895 年前的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

（一）科场场域的成型

在闭关自守的帝制中国（尤其是其后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句老话生动地道明了皇权元场域的“在场”。所谓“元场域”是派生出所

有其它权力场域的场域。^② 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原本企图通过仕进的开放来消抑贵族的发展、达致皇权的独尊。但当我们把宋朝以后的科场作为研究对象去建构时，却发现此时的科场已经有了区别于元场域的某些特征，换言之，它已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按布迪厄的看法，一个场域形成的标记，一是要有特定的场域边界，二是要以对某种类型的资本争夺为中心。^③ 我们来看看科场是否已形成了这样的标记。

1. 进入科场的制度化障碍

在由童试、乡试和会试这依序而进的正途科场上有着不同的入场限制。在参加童试的资格上，唐代尚无多少明文规定，宋则明确了皂隶胥吏、犯刑居丧、“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不得与试。而明朝又增添了倡优士卒与罢闲官吏不得入试。清代则详罗列了被排斥在外的各类“贱民”。^④ 而乡试的参加者必由学校出身者：生员、监生或贡生。会试则只为举人所设。

除了在应试资格上的限制外，构成平民进入科场的主要障碍是起始经济资本的匮乏。据张仲礼的统计，科举中榜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生员 24 岁，举人 30 岁，进士 35 岁。^⑤ 这即是说自 5、6 岁私塾发蒙起到金榜题名时，一般需要 20—30 年的读书应试生涯。要能

① 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69 页。

② 参见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 155—156 页。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评提醒我们重视在皇权元场域覆盖下各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及晚近的重要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元场域本身是虚拟的。

③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 142—143，147 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 8、152 页。

⑤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 77、100、104 页。

投身在这漫长的读书备考生活以及往往长达数月、辗转千里的赶考生活中，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要有钱；二要有闲。时间与财富成为得以应考的起始资本（在匮乏经济的时代中，闲暇与有产本就是一体的）。为了不到 1/40 的中举率，科场应试者不得不承担起 10—15 年读书不挣钱的损失，以及 10 年以上求学期间的学费。^①显然，这些资本在社会上的分配是极不平等的：只有那些在资本分配的既有格局中已居支配地位的家庭才有较大的能力支持其子孙年复一年地备考赴考。对许多贫寒之家而言，纵有登进之心，却无求学之闲与买路之资。

此外，参加科场应试还要求有特殊的语言基础：文言文与官话。前者与日常口语的巨大差别、后者与南方各地方言的相互隔离使多数应考者不得不用相当的精力专门来学习文言与官话（对南方人来说）。在这一过程中，出身官宦富绅之家的考生显然有着平民寒士无可企望的优越条件。据宫崎市定的统计，“四书五经”的篇幅长达 43 万字，这意味着考生必须有相当的古文功底^②——它对于世家子弟与农家子弟的过关机会显然是不同的。这正如布迪厄所说的：“要想真正察觉到并把握住那些形式上向所有人开放的潜在机会，你必须占有最低程度的经济资本

与文化资本。”^③

2. 科名：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

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会有一套用以满足自己生存实践需要的知识，但只有少数人才别具用以规范社会行动的知识。费孝通称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④规范知识的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它与文字结合在一起，人们需有专门的闲暇和教育条件才足以掌握它。具备了这种知识的人在一个所谓“有语无文的乡土社会”里显然居于支配性地位（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我们可称其为文化资源的占有者。科场刚开始时还只是使这些人的支配地位合法化、制度化。

但当科试越来越囿于以八股格式来阐释“四书五经”、宋明理学时，当学额越来越被严限（从而成为稀缺品）时，尤其当科名一旦在手就能够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实现交换并藉此保障成功者及其家族对文化及社会支配地位的长期把持时，^⑤由科名来承认的就不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文化资源的占有，而是对某种特定文化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亦即垄断。换言之，对科名的争夺体现出的已是文化资本的运作逻辑。^⑥我们可以作个假设：就算第一代人在参加科举时是完全平

① 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第 550 页。

② M. Ichisadu.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0.

③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 168 页。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88 页。

⑤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 26—39，245—265 页）对士绅的特权地位及由此而积聚的财富所作的研究充分证实了科名是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

⑥ 关于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区别及其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条件，参见 Bourdieu. *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183-187. P.DiMaggio [“Social Structure Institute and Cultural

等竞争的，到第二代人参赛时，他们就已经不可能是平等的了，因为那些父辈是成功者的人可以享有父辈的科名带来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并将这些资本转化为自己参加科试的巨大优势，而父辈是失败者或未曾进过科场者的人则因无所继承而位居下风。到第三代人那里，祖辈父辈的优势可进一步积累。当然，继承科名这种东西不象土地那样直接，前者对继承者的文化能力有相当的要求。但科举发展到后来，后天能力的竞争已经越来越不如在先天积累上的较量。何炳棣只注意到了科试考生的直系上三代的社会地位，而哈特威尔等人发现，若同时分析获取科名者的直系亲属、姻亲的身份，那得出的社会流动率便会比何炳棣的数字低得多。^①

可见，科场虽宣称平等竞争，多数统治者也确实愿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但实际上，那些不具备起码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行列之外——正是科场大门外这种看不见的社会挑选使科场已成为科场场域。只看到考试，而没有意识到在考试前便已经历了社会挑选的过程——这正是布迪厄与帕塞隆所说的“误识”（misrecognition）。^②那么，那些有幸进入了科场场域的人是否就能展开公平的竞争

呢？这须来分析科场场域与其它场域的关系。

（二）科场场域与其它场域的关系

若从实体的角度去看科场，看到的只有两种社会角色——考生与考官；但从关系的角度去深挖，就会看到远比考试本身复杂得多的东西。用戈夫曼的拟喻来说，科场上的考试就象是在“前台”演戏，而作用在考官与考生身上的各种社会力量则是在“后台”唱戏。^③

先拿科场场域的“考官”来说，他们同时是皇权元场域里的“臣仆”和科层场域里的“官僚”，一旦辞官去职后还是民间统治场域^④里的“士绅”。作为臣仆，他们无权力可言，所听从的只有皇帝一个人，只是在为皇帝挑选另一个未来的臣仆；但作为官僚，他们置身的是一个与皇帝保持着相对自主性的政治力量中，而这个政治力量往往是由各种派系所分割的，^⑤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这些派系交织的网络中有选择的听命；作为未来的士绅，他们又不能不考虑退出官场后在家乡如何能稳固地立足。因而，考官自身的利益常是与派系利益、地方利益连在一起的。考官在取舍时既要执行学术标准，更要执行

Goods”, in Bourdieu&Coleman(ed.),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Westview Press, 1991:133-155] 对布迪厄的这一思想提供了一种解读。他认为，所谓文化资源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可树立起符号优越性的文化手段；而文化资本则是文化资源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源，它被一套权威体系所认同。

①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92-125;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1982):365-442.

② 布迪厄、帕塞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第151-188页。

③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④ 我们把士绅所主导的（县以下的）地方权力场域称之为“民间统治场域”。

⑤ 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沈原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309页。

政治标准；既要体现皇帝的意旨，又不能有违于自己在官场的利益。一场表面上的学术选拔，实质上既从根本上是国家权力支配关系的体现，又往往是科层派系支配关系的实现。

而“考生”的情况比“考官”还复杂。上层考生（即贡生与举人）与下层考生（即生员、监生与童生）的地位相差悬殊。举人已跻身于上层士绅的行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贡生的地位比举人低，但尚属上层士绅的边缘人物。监生在下层士绅中位居头列，生员居于士绅与平民之间，而童生只能算是平民中有些文化的人。各级士绅有着各自的特权，少则免徭役、减丁税、拖赋款、得食禀、获学租，多则掌团练、主祖祭、戴金顶。越是高居士绅上层的考生因其自身的特权地位而越有能力靠自己跨越进入更高级科场的制度化障碍；而在完全不被纳入士绅行列的童生那里，就只有主要靠其家庭来提供跨越进入最低一级科场的制度化障碍的条件——这对许多贫家来说是难于上青天的。家庭背景在较高级的科场上仍有着相当关键的影响力。对有某些家庭背景的人来说，在科场上的优越性往往是被予以制度化保障的。比如，高官显贵子弟的试卷被标以“官卷”，并另设举额。据说此举最早的本意是给穷书生以较多的机会，但实际上官试中试的机会是越来越优于民卷。又如，富家子弟可以捐例监生或例贡生的方式跳过童试，而直接参加乡试。而盐商子弟应试是另设商额，其中试机会也优于其他平民。^①所以，即使是同一级

的科场上，所谓的“考生”也都是有着复杂背景和各自资本的不同类的人。比如乡试科场上既有贡生这样的上层士绅，也有监生、生员这样的下层士绅；有官卷试者、商卷试者，更有民卷试者；有人靠山在后，有人无依无凭。可以说，“考生”在科场上如同“考官”一样是被各种背景与关系纵横切割开来的。

实际上，科场场域里同时有两种结构，实现着两种支配。一种是科场场域的正式结构，考官与考生是围绕着对文化资本的公平竞争而被组织起来的——但这不过是使皇族对其他所有人的支配得以实现而已。另一种是非正式结构，考官与考生是围绕着文化资本与其它资本的非法交换而被组织起来的——这时官绅富商是部分截断了皇权支配而实现了他们自己对大众平民的支配。我们可以根据这两种结构的强弱构建这样一个连续体：

文化资本本身的逐求与分配→文化 资本与其它资本的交换

在连续体的左端是科场场域完全按文化资本的分配原则与逐求原则来行动的，也即考官与考生的关系是纯粹意义上的清廉公正考官与无所依托、仅凭学力竞争的考生的关系。在连续统的右端是科场场域完全实现文化资本与其它资本的交换，即徇私的考官将科名完全“售与”以关系或贿金来参与竞争的考生，也即所谓“随意请托，贵者托以势，富者托以财，亲故者托以情”。^②在前者，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153—154页。

^②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是皇权支配在科场的彻底实现；在后者，则是派系支配或权贵富豪的经济支配在科场场域对皇权支配的完全排挤。事实上，这两者都是一种“理想类型”，完全公正的的竞与选以及完全徇私的买与卖都是极少见的。科场上绝大部分的考官与考生是处于这一连续统之间，至于说什么时候更靠近左端，或什么时候更靠近右端，完全依每一次的具体情况而定。

考官与考生关系的一种特殊变型是皇帝与考生的关系。皇帝是所有考官的选官与最高层次的文化资本的分配者。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有可与皇帝进行交换的资本，所以他们是围绕着文化资本本身的逐求与分配而组织起来的。但在这一表象后仍有许多复杂的内含。理论上通过“怀牒自列于州县”而会聚起来的考生是国家权力场域里所谓的“自由流动资源”。将其从先赋性群体（如血缘、地域群体）释放出来构筑成一个具普遍主义性质的科场场域——这是“历史官僚帝国”中政权统治者的一个主要目标。^①故此，皇帝总是在文化资本分配中强调成就（学术）标准本身，其不遗余力地打击科场作弊、维护科场的“纯净性”正是为了防止其它场域对这种资本的据为私有。但帝制本身又决定了皇帝总是要将这些自由流动资源控制在传统合法性内，因而科场场域同时是国家权力

的作用场所，它所谓“纯净的”自主性只是极有限的。明清以来，皇帝人为地规定南北各省的进士额就是吸取1397年南北榜之争^②的教训，从权力稳固的角度来控制科名的地区分布。1451年捐纳制度的实现，则是为了开辟出“异途”的考生以平衡、制约“正途”考生的力量。^③此外，皇帝在科场上为贵族功臣子弟保留的“荫”、“恩”特权甚至索性直接赐予的“举人”乃至“进士”虽然为数不多，但仍是值得注意的科名贵族化现象。因此，皇帝既坚持以成就取向将文化资本分配给考生，同时又以权力取向控制文化资本在考生中的各种分布。

但无论怎样，科场场域内发生的社会流动基本上都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内部流动：在皇帝的最高统治权不受触动甚至得到加强的情况下，实际治理权从原来的门阀地主、品官地主流向官绅地主、庶民地主。

（三）士绅惯习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

尽管科场场域在实际运作中并不符合平等的精神，但它又有一整套显示“平等”的机制：从学额的精心安排到考试内容的形式化（如以八股取士，以书法定鼎甲），从科场纪律的严肃性（比如，从搜检进场到封闭号令，从别头到锁院，从弥封到誊录，^④从慎选考官到重惩舞弊）到对少数贫寒出身的

^① 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第119—123页。

^②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会试中所录取的进士全系南方人，引至北方举人强烈不满，指责主考因自己是南人就包庇南人。朱元璋派人复查，结果维持原榜。北人又上疏，以致朱元璋最后将一位主考及复查者、状元等人处死后，亲自阅卷，钦定的进士全系北方人。

^③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58页。

^④ “别头”指举人若与考官有族人、亲戚关系，必须回避，别置考场应试。“锁院”指考官一旦受命，即锁居贡院，与外界隔离。“弥封”是将试卷上考生姓名、籍贯、家世等记录封贴起来。“誊录”是指试卷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

问鼎者的着意渲染，这些都仿佛在向每一个应试者昭示着平等的机会。其实，这一切“平等”神话的炮制都是在掩饰科场功名在“幕后分配”的实质。少数寒士的“幸运”正是要使多数被排挤者得到合理化的解释。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统治者对不满朝廷的被统治者在帝制后期开的一副药方便是将其诱入科场，一旦科场失意，便只能归咎于自身的不济而无怨于科举本身及朝廷。^①纵然科场是多数人的“考试地狱”，^②但俨然严明的科场纪律使其只能为“三场辛苦磨成鬼”枉自嗟叹。

尽管屡受挫败，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对科场恋恋不已呢？因为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将考生们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他们乐此不疲的行动。这东西就是儒家经典、文言官话、书法诗画、长袍顶戴种种有形无形之物构筑起来的“士绅惯习”。士绅惯习是在长年累月备考应试中自觉不自觉按科场形塑起来的，是科场场域固有属性在场域成员身上的内化物。同时，又恰恰是由它将这个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辉煌色彩、值得众人去投入的世界。^③尽管科场根本不可能授予多数人以科名，但它却成

了让每一个考生都程度不同地去分享的“身份文化”^④的场域。考生们常年熏陶在这种场域里，仿佛产生了同在某个别样的“生活世界”的平等感。这一切都精致地遮蔽了科场的“后台”，使考生们获得了在“前台”乐此不疲地去参与的动力

然而，士绅惯习在把受同一种身份文化熏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把掌握着不同资本、操持着不同话语的人隔离开来，确立起官/士、士/民、富/穷、上/下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等级与心理障碍。士绅惯习驱动着权贵之家进行以科名来保持并扩大资源的行动，驱动着贫寒之家进行以科名来获取资源、改变地位的行动。正是在这些胜少败多却又无休无止的社会行动中，既有的社会支配惯习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少数侥幸获得功名的贫寒之士可能由此摆脱受支配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仍始终被固定在被支配的位置上。更何况，他们也只不过是成为了布迪厄所说的“统治集团中的被支配者”而已。^⑤

特纳在分析西方学校教育时曾区分出“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两种规范制度。^⑥科举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有形式

再由考官审阅，以免考官凭笔迹识人。以上四种制度从北宋开始实行。

① 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等译，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89-300页。

② M. Ichisadu.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pp.1-15.

③ 《儒林外史》（吴敬梓，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中有段话将这种士绅惯习清晰地勾勒出来：“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种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④ 柯林斯：《教育成层的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马和民译，载张人杰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4页。

⑤ P. Bourdieu. “*The intellectual field: a word apart*”, in *In Other Words*. Polity Press. 1990:140-149.

⑥ 特纳：《赞助性流动、竞争性流动和学校教育》，何瑾译，载张人杰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第76-93页。

上公平竞争的一面，更有实质上由特定的权威集团及其代理人来控制筛选的一面。筛选“前台”的特殊主义标准保证了既有的社会权力格局之再生产，筛选“前台”的普通主义标准则赋予了这种格局的合法性——我们可把这种筛选引起的流动称之为“集团内的竞争性流动”。正是这种流动模式使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被不断再生产出来。

既然我们说低微出身的人通过科场进入统治集团后是屈从于既有的社会分类体系，那么，当那些如王冕^①一类的人从根本上拒绝科场所确立的分类体系时，这是否就是抵抗了呢？如果说前者是因为承认科场文化、接受同化，从而被这个制度所笼络的话，那么，后者将自己排斥在科场大门之外岂不是将自己始终固定在被支配的地位上了吗？也许在这里存在着布迪厄所指出的无法解救的矛盾：“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正是通往解放。这就是被支配者的两难困境，他们无路可逃。”^②但如果真是这样，究竟又如何理解场域变迁呢？如何理解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转型呢？这些问题是我们下文要展开分析的。

（四）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因素对科场场域的影响

科场场域在运行规则上是覆盖全国的，即令是地方（省级）学务也是由中央派出的

学政直接控制。但晚近以来，地方政治势力的份量日增，儒学也有了地域化发展的趋势，加之各地的区域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都使各地的科场场域受到某些地方性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因素大致有四方面：

首先，湖南地方的军事化对科场场域有相当特殊的影响。湘军之兴除打破了中央—地方、满—汉的政治势力平衡外，还另开了一条新的晋升之阶——从军。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并非是抛开科场办团练，而是创立了“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原则。据《湘军兵志》统计，官佐出身于从附生到进士一系列的士人占有58%之多。^③这即是陈志让所说的“军绅政权”^④的前身：绅军政权。湘人由此一改清中期以前科名寥寥的局面，形成了科名与军功的对流（即以士领军或以军功捐科名），湘运也呈蒸蒸日上之势。湖南在太平军起义后生员和捐监生数增长了43.5%；湖南士绅的数量在全国官学中从原来的第9位上升到第5位；上层士绅数量剧增，湖南乡试中额在1850年前为45人，会试中额大约每两科9人，而1850年后乡试中额高达70多人，而会试中额平均每科高达11人。^⑤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湘军之功。军功作为一种新兴势力开始介入了湖南科场的运作。

其次，湖湘书院文化对科场场域的影响。儒学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地域化过程。在第三个

① 王冕是《儒林外史》中一位与举子构成对照、隐避山林的“名士”。

②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5页。

③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66页。

④ 陈志让：《军绅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⑤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115—117，123—125页；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教育志》，湖南出版社1995版，第71—84页。

阶段，湖湘以书院为载体，以事功乡贤之崇祀为手段，以“朱（熹）张（栻）会讲”为契机，渐致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霸权。^①在科场场域中学校（书院）体系一般来说几乎是科举的附庸。但就湖南而言，因其文化传统、历史影响而在各种风浪中存留下来的湖湘书院（以岳麓为典型代表）与科场场域一直保持着或疏或密的张力关系。^②

再次，湖南近代士绅的城市化趋向明显。传统士绅大多居住乡村，此即所谓“乡绅”。而近代以来，绅士开始越来越多地聚居城市，湖南尤其突出。这除了费孝通所分析的在全国普遍存在由“社会侵蚀”所带来的城乡分化因素以外，^③还有一个湖南社会特定的因素：湘军被裁撤后，回乡的将士一般都集中在所属县城或省城。如长沙新增“宫保第”13家，湘乡县城有2000户士绅家庭落户于此。^④湖南大量士绅集中在城镇尤其是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一方面使士绅便于互通声气、易于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使科举制度终结后新兴的学堂本来就面临的城乡不平等的结构问题更加突出。

最后，湖南自有明以来几近一个移民社会，其人口有三分之二来自江西。^⑤移民社会对湖南民风由古时的怯懦激变为近世的强

悍有极大影响。^⑥有人称移民而致的湖南民风是“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也有人说“湖南人性格沉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⑦这种易走极端的民风在士子中自然也有相当的体现。我们很快就要看到，它对1895年以后走向波诡云谲历史中的湖湘士子行为的影响。

三、新的支配关系的确立与科场的衰败：1895—1905年的湖南社会

1840年前的科场场域被一个完全封闭的皇权元场域所覆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虽逐渐被打破，皇权也屡受内（农民起义与地方势力）外（列强逞霸）两方面的挑战，但这个元场域还是基本上得以维系。1895年甲午战败后签定的《马关条约》及随后开始的割地狂潮标志着中国国家权力场域真正被纳进了世界权力场域中，皇权在中国不再构型为一个元场域，而是蜕变为受列强场域支配的一个场域。这种新的社会支配关系必然要渗透进科层场域、科场场域、民间统治场域等场域，同时，这些场域之间及其与皇权场域的既有关系也必然随之而有所改

①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第347—390页。

② 虽然湖湘学人更多以书院作为其权力凝聚的文化象征符号（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第372—390页），但应该看到，湘学与科场不是简单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的。务实重功的湘学固然熏染了许多湘人，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抵御士绅惯习更为强大的驱动与诱惑。即使是那些并不热衷于科名的人也还是乐意在它域建功立业的同时也能顺摘科名。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61—170页。

④ 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第74—75页。

⑤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载氏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233页。

⑥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7页。

⑦ 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变。

外国强权进入中国主要是靠船坚利炮，但要长期维系这种权力，就不能不借助某些机制来遮蔽支配的不平等性，使这种关系合法化。西方列强无论是在自己国家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这一正当化过程的。^①大力发展西式学堂便成为这个权力场域的必然要求。^②另一方面，在中国已无法自外于世界体系的情况下，要在某种程度上仍维系国内既有的支配关系，就必须对列强的支配权力有所反拨；而要反拨列强的支配权力，就不能不首先学习这个权力场域的基本技术与话语（当时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表达的正是将欲制之必先师之的思想）。^③为此，列强场域与中国国内权力场域之间所构成的张力使西式学堂有了进入科场场域的“入场券”，科场的斗争也由此揭开了全新的一幕。

（一）新旧文化资本的竞争

1895 年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说，这一事件是科场场域

的转折点。首先，这种上书行动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当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约有 3000—5000 人，而参加上书的就达 1300 多人，占了总人数的约四分之一。^④而这样公开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又发生在科场的最高层次——会试的过程中，它意味着一时竟有那么多举子甘冒丢科名、犯龙颜的风险。其次，这次集体上书内容的尖锐性是前所未有的：它明确、系统地提出要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创设报馆与引介西学。虽说西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在沿海地带生长出来了，但它正式进入科场场域还是自此始算。

1895 年的甲午战败震动了整个士林，而对湖南士绅来说这种痛苦更是别具滋味，因为湘军无敌的神话也由此破灭。痛定思痛，湖南固有的居傲强悍之气使其从排外守旧中心激变为变革求新中心。湖南士绅既是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又是随后维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⑤当新兴的维新在京、沪受阻时，素以“欲新中国，必新湖南”自期的湖南就成了维新的中心，新式学堂的发展正

① 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第 11—79 页。

② 虽然西学作为一种新文化资源早在 19 世纪中叶即已通过教会学校传输进了中国，但它当初不仅在地理的分布上集中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5—238 页）所说的“香港—上海走廊”这个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而且，即使是在 1860 年后开始进入内地的情况下，仍然受到正统士绅的排斥。其中湖南就是一个著名的排外中心。据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 2002 年版，第 111—113 页）的统计，湖南 1861 年到 1893 年发生的有案可查的教案就达 19 起，遍及从长沙到岳州的潇湘大地。西方传教士将湖南比作难以突破的“铁门之城”。所谓要大力发展西式教育，首先是指要从这种边缘地位挣脱出来。

③ 这里存在着一个在原来的科场场域中就有过的复杂的悖论：你承认既有的社会分类体系固然是一种屈服；若是将自己排斥在世界（或科场）的大门外，却是将自己始终固定在了被支配的地位上。

④ 总人数数据前一年乡试取额及前一次会试未中人数估算。由都察院代奏的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上书 31 次，加入人数 1555 人次；由康有为另行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集众千三百人”而题名发表 602 人，不过，这次上书实际上并没有递交上去。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67—75 页。

⑤ 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梁等广东士绅是以湖南士绅为首要支持者的。诚如杨笃生在《新湖南》中所说：“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人舞之。吾于广东如驂之靳也。”载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615 页。

是维新的要务。

1895年，谭嗣同在浏阳开始筹办算学格致馆，以介绍西洋科技知识为旨。次年，湘乡士绅开办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成法，分设算学、格致、方言与商务四斋。1897年，在谭嗣同、欧阳中鹄、唐才常等人的努力下，在算学社基础上正式开办了算学馆。湖南在学堂建设上的突出成就是1897年10月时务学堂在长沙的创办。它是在上层士绅诸如王先谦、熊希龄与省级官员诸如陈宝箴、黄遵宪的一致支持下的结果，后来又请进梁启超、韩文举等一批粤籍学人，使其成了名闻中外、专门培养新式人才的学堂。时务学堂创设后，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他们纷纷改革书院章程。最让人瞩目的是，千年书院——岳麓书院也“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甚至还开设了外语。^①

西学作为新文化资源在进入湖南初始所获的一致支持是因扣合在士绅暂时的危机共识与湘学的经世指向上。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与科场场域里占据正统地位的旧文化资本相冲撞。事实上，它们必然为争取自己的文化霸权而展开曼海姆所说的“原子式竞争”(atomistic competition)。^②这种竞争先后在两个层面展开。

1. 书院与学堂的正统之争：1895—1901年

在科场场域中，书院既从总的来说是从

属于科场的，又有某些自主性。湖南书院与学堂的斗争有双重性质：它既是科场与学堂争夺(总体)文化霸权的前哨战，又是湖湘文化与西学争夺“区域文化霸权”^③的遭遇战。其中，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的斗争是最具有典型性的。

岳麓书院有“千年学府”之称，是科场与湘学共同参与形塑的湖南教育重镇。时务学堂禀新锐之气，是维新时期所树的教育范本。它们有过和谐相处的时期：不仅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曾领衔倡办时务学堂，使学堂吸取了书院教法之长，而且书院本身也进行了改革。实学曾使二者相互吸引、接近。但自梁启超1897年11月到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后，岳麓与时务的矛盾便日渐上升。他们之间的争斗分为四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围绕时务课艺展开。梁启超等人所倡的民权之说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反感，此时流言四起，纷争渐生。第二个回合围绕岳麓官课展开。巡抚陈宝箴曾允书院官课不出八股时文题，后不到半月又改口从旧。前者使旧派不悦，后者让新派愤慨，陈宝箴夹在了两派相争的中间。第三个回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岳麓书院宾凤阳等八名学生联名上书王先谦，对时务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王先谦即联络了九名士绅，递了份《湘绅公呈》给陈宝箴，要求严加整顿时务。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熊希龄也联络了一批人，上书公恳整顿书院，并在《湘报》上力驳王

^① 以上资料汇自《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104—109页)和《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陈学恂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76—81页)。

^② K. Wolff (ed.), "Competiton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From Karl Mannhei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235. 也见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126页。

^③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第250—360页。

先谦等人。第四个回合达到了高潮。王先谦等人商订了“守道辟邪”的《湘省公约》，后又发生了岳麓学生以揭贴攻击时务的“飞诬揭贴”事件。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岳麓的大获全胜：梁启超离湘，皮锡瑞出走，熊希龄被罢，韩文举被辞。1898年，曾支持时务的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先后去职，时务学堂被改为求实书院。^①

对这次斗争有代表性的阐释有两种：一是认为此系民权与专制之争；一是认为此系湖湘与岭南的儒学地域文化之争。^②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见地，但并不够恰切。实际上，岳麓与时务之争是其分别所代表的旧文化资本与新文化资源之争。斗争的焦点是在教育场域里旧文化资本能否保持垄断地位，而新文化资源能否力争获得制度性的支持，成长为新的文化资本。一个是要维系教育场域的正统，另一个则是要打破这个正统。^③这其实是新文化资源步步紧逼的结果：当西学以往尚被限制在沿海地带时，它是力争从边缘突破到中心来；而当它终于进入到科场场域中心地带时，它又要力争新的正统地位。

从这次斗争的表面结果看，似乎是书院最后成功地压制住了学堂的挑战，时务学堂

于1898年被迫改为求实书院。但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尽管这次争斗中新文化资源并未转化为文化资本，但科场场域内的正统在斗争中已经发生了位移。用张灏的话来说，戊戌的两大遗产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意识时代和诞生出一个新兴的文化集团。^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三十年前洋务初兴、同文馆开办时的情形。当年，清议派以其咄咄逼人之势使洋务派不得不左顾右盼，夹着尾巴做人。郭嵩焘不就是因其一部客观反映“夷狄”情况的游记便成为千夫所指吗？而在这次争端中，康梁之民权说虽被斥为妖孽，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却在无形间被簇拥成新的正统，清流则基本上退出了话语的争辩空间。按布迪厄的看法，在话语争辩构成的意见域背后尚有一个未经质疑的空间，这即信念域（doxa）。^⑤在中国的科场场域上，所谓的信念域即士绅惯习。我们可以1895年为界作一个对比的图示。（见图1-1）

由图1-1可知，尽管书院与学堂尚未使士绅惯习受到根本性的触动，但在意见域里的正统话语已经发生了位移，新的话语开始进入了科场。如在1897—1898年的湖湘地区府、州、县试上已出现了这样的试题：“伸

①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1959年第1、2期；《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10—115页。

② 刘泱泱：《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载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编：《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7页；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第350—387页。

③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82—114页）对湖南新旧之争的阐释。在他看来，原来趋新的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之所以后来转旧，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将被列强瓜分的紧迫感不如新派，却更担心中西文化竞争的长远威胁——如果中学自乱阵脚，就在最根本的文化上无法与西方竞争。

④ 张灏：《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393页。

⑤ P.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63-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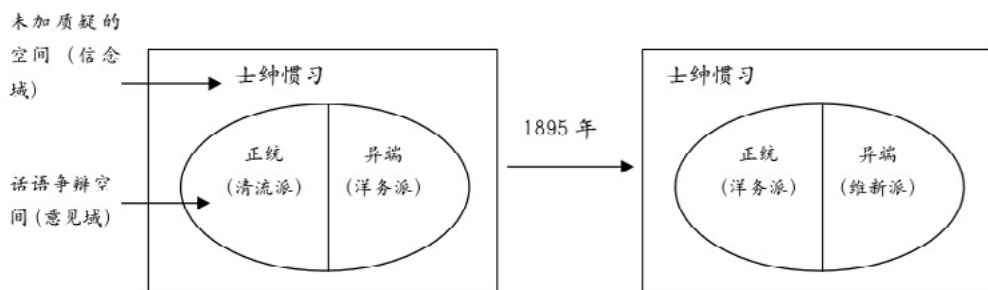


图 1-1

民权可以尊君权说”、“日本变政本末考”、“泰西议院学校相为表里说”、“罢谏官设议院议”、“穷则变，变则通”。^①

2. 学堂与科场的竞争：1901—1905年

新文化资源与旧文化资本第二个层面的斗争是在学堂与科场之间从1901年开始展开的正面交锋。1901年的新政与维新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皇权元场域里自上而下推进的资本再分配。但就承担着社会结构再生产功能的科场场域来说，却有着前后迥异的结果：维新是悲惨地夭折；而新政竟在几年内导致了科场场域的衰败。细究起来，就可以看到维新与新政发生时社会条件的巨大差别：维新是在国家权力场域呈现出慈禧/光绪二元格局下发生的，而新政时的国家权力已复归到传统的一元格局中了；维新是在甲午战争刚开始瓦解传统士大夫的正统共识时发生的，而新政时期，经过书院—学堂之争后，新的正统共识已然确立；维新面对的主要刺激是一个所谓“蕞尔小邦”的日本在身边的崛起，而新政面对的主要威胁是通过庚子蒙难感受到的整个西方列强对中

国的虎视眈眈。

从新政的最初制度设计看，并未打算断然废除科举。但鉴于造就新式人才的急需，清廷同意迅速将西学接纳为科场场域里的新文化资本。两种文化资本并存竞争的这种后果，却是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1) 新文化资源被接纳为新文化资本

1901年1月，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新政由此揭幕。教育因其直接关涉人才培植而成为新政重心所系。在此过程中，张之洞虽然身在地方（1907年前），却因其《劝学篇》而具备了全国性的影响力。他与刘坤一合上的“江楚会奏变法”实际上成为新政教育改革的实施纲领。

从1901年6月诏令举行经济特科到1905年3月正式废止科举前，清廷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其基本思路是在尚不立刻触动旧文化资本的前提下，将西学通过新式学堂与派遣留学两途接纳为新的文化资本。给学堂及游学以所谓“出身奖励”，实际上就是一个合法性赋予的过程。而废八股试策论、另开经济特科则是在旧文化资本中渗进

^① 《湘报》报馆：《湘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

了新的文化资源。1903年，由张之洞参与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正式颁布施行——它标志着学堂被赋予了完全的合法性。

维新时期的教育是微调，所以，以别立几所新学堂为标本来带动书院的改课。而新政时期的教育是剧变，所以，书院改学堂变成接纳新文化资源的方便之门。1901年9月的上谕即称“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①

在湖南，我们看到了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之争的延续及绝然不同的结果。戊戌政变后上台的湘抚俞廉三先采取了一个保存与改设并行的办法。他将由时务学堂演变而来的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后来又遵旨降其为高等学堂）；同时又保留岳麓等书院，只是“分斋设额，课以经忠及各国国书。”赵尔巽1903年接任湖南巡抚后又将原来的高等学堂改为农工商矿实业学堂，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至此，岳麓与时务以汇流为高等学堂为告终。虽说王先谦在赵离任后又另建起一个规模颇大的岳麓景贤堂，但那不过是在书院大势已去时的回光返照罢了。^②

为解决学堂师资，1902年由湖南官府选派俞诒庆、仇毅等11名举贡生赴日游学。次年，省师范馆创设，王先谦为馆长。1904年湖南分路办师范：中路师范设在湖南三大

书院之一的城南书院；西路师范设在常德；南路师范设在衡阳。在办官办学堂的同时，民间也积极筹资办学。1903年由龙璋等人办起后来名闻四海的明德学堂，经正学堂。同年还有修业、隐储等学堂开办。此外，龙璋等人还尝试办过女校。虽然受挫，却为日后周宗纯创办周氏女塾开辟了道路。到1905年，湖南全省已有学堂227所，学生多达10232人。与此同时，留学在湖南也蔚然成风。到1904年10月止，2852名留日生中就有401名湖南人，占其中的14%。^③

（2）学堂与科场的“原子式竞争”

新文化资本被接纳进科场场域后，传统士绅对科场场域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但旧文化资本又尚未丧失其合法性，因而，两种文化资本必然为争取自己的文化霸权而展开竞争。在竞争中，新文化资本的竞争方略是堵路与断根。所谓“堵路”，是指原来“取士必由学校出身者”，而今新式学堂已取代了旧式官学及书院的合法地位，使科名之源渐致干涸。所谓“断根”，是指新政伊始便立罢武科、骤废八股，而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所奏九年内减尽科举中额也获钦准^④——这表明科举之废只是迟早之事。另一方面，旧文化资本以其强大的士绅惯习为支援还占据着科场场域的主阵地。旧文化资本凭其优势地位开展的是总体阵地战，而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54页。

^②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64页。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第177-181页。

^③ 《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20-134页；光绪三十四年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7）；清国留学生会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1904）。

^④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105页。

新文化资本以其灵便开展的只是游击战。科名毕竟还是在科场场域中真正具有符号权力 (symbolic power)^① 性质的东西, 因此, 科名之争成为两种资本竞争的焦点。

对科场而言, 要维持科名的合法性, 不能不在科试内容上赋予崭新的内容。对学堂而言, 要争取出身的奖励, 不能不别开一个准科试性质的选拔考试。于是, “原子式竞争”的景观是——两种资本不仅相互对峙, 而且还相互渗透。对此, 我们可以对两个个案作对比分析。

1895年到1905年间共举行过三场会试: 1898年的戊戌科, 1903年的癸卯科与1904年的甲辰科。艾尔曼已经对这几次考试在内容要求、顺序安排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分析。^② 我们现在再对癸卯科、甲辰科会试试题本身作点分析。这两科是在1901年8月上谕变通科举后进行的, 所以, 不仅八股已禁、改试策论, 而且各国政治艺学已被列入了第二场考试。且看癸卯科第二场的题目: “首题, 泰西最重游学, 英大儒斯密氏所论游学之损亦最切摅, 应如何固其性质, 限以年例, 以期有益无损策。” “二题, 日本学制改用西法, 收效甚速, 然改制之初, 急求捷径, 不无躐等偏重之弊, 东国名儒类能言之, 取长补短宜定宗旨策。” 再看甲辰科第二场的试题: “学堂之设, 其旨有三, 所以

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孰为最急策。”^③ 如此之命题, 不仅显示出命题者接受西学熏染后所表现出来的史无前例的眼光与胸襟, 而且也足以引导考生真正睁眼看世界, 反思中国求变图强之策。因而, 它也利于挑选出那些虽攀缘在旧学进阶道路上, 却已颇具新学锐识的人才来。在甲辰科会试上, 高中会元的湖南茶陵人谭延闿后来在湖南社会转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便是一例。新学堂所代表的新文化资本已成为争夺科名的必要手段。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命题上, 也表现在中试进士须经历的再教育上。据1902年11月的上谕, “自明年会试为始, 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 二三甲之改庶吉士, 用部属中书者, 皆令入京师大学堂, 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习之一甲进士庶吉士, 必须领有卒業文凭, 始准送翰林院散馆。” “知县签分到省, 亦必入各省课吏馆学习”。^④ 也就是说, 新科进士必须经过京师大学堂的“认定”才有任官资格。而其中许多人还由京师大学堂进士馆转向了留学, 进一步由留洋教育来确认进士身份的合法性。据统计, 仅仅日本政法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就汇聚了癸卯科进士33人, 甲辰科进士73人, 其中还包括了甲辰科的状元、榜眼和探花。^⑤

与上述纳新学于科举构成对照的是, 也出现了纳科举于学堂的举措。在1901年的“政

① P.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63-170.

② B. Elman. “Change in Confuci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Ch'ing Dynasty”, in B. Elman and A.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114-122.

③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年齿录》(1903)、《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1904)。

④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第864页。

⑤ 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务处礼部会议学堂出身疏”中确立了对学堂毕业生进行出身奖励这种考试方式，到1904年1月清廷颁布了详尽的《各学堂奖励章程》。既然新学堂源自西洋和东洋，那对留学生的考试也最为官府所重。我们就以1905年5月的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为例子来作些分析。这场考试分两场：第一场按所学科目，分门发问；第二场以经史命题，作论说两篇。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场是由礼部按照乡会试复试之例，奏请钦定日期，在保和殿举行殿试。在参加考试的14名留日生中，曹汝霖等7人获得进士出身，陆宗舆等7人获得举人出身，并分得官职。对这次复试和引见情况，一位当事者有过很生动的回忆：“越数日，即行殿试，悉循科举例。黎明，应考者即集左角门，各携考试用具，并肩一可折的矮几，点名后入保和殿，殿铺藏毡，将矮几展开，席地而坐。有顷，监试大臣二人入场，少顷，钦派阅卷大臣三人手捧钦命试题同试卷，分各生每人一份。……越二日发榜，张于左角门外。”“吏部定日引见，在颐和园仁和殿，御案移近殿门，引见者站在阶下，上下都能看见。每人高声自背履历，慈禧太后坐中间，光绪皇帝坐于左侧”。^①如果不加说明，我们会以为上述的情景就是科场殿试的情景了。而考试的内容实际上是要求洋学堂毕业的人必须具有中学根底或进行中学的补课。这说明学堂的合法性需要经过科场的再检定。你纵然洋书万卷于胸，也还得赖

皇太后的恩赐才能换取科场场域里的“硬通货”——科名。

可以看出，1901年后的学堂与科场之争仍是在科场场域里展开的。不过，这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意见域的正统之争了，由士绅惯习所维系的信念域此时也成为话语争辩的空间。科场场域已被两种文化资本所切割。当然，从文化的特性看，儒教文化是具低度“生机控制性”且内控取向的文化，而西方基督教文化则是具高度“生机控制性”且外控取向的文化。^②学堂在科场获得合法性后必然构成对士绅惯习的强烈冲击。如图1-2所示。

（二）“原子式竞争”下的士绅惯习

要考察1895年后的士绅惯习，我们首先要将科场行动者区分为两代人。从世代上说，每二十年左右必代代相接；但从社会来看，世代 (generation) 之间的交替主要与社会变迁的程度和速度相关。^③既然科场的根本性转折是从1895年开始的，那么，我们可以将1895年前已获贡生以上功名的士绅视为上一代人（因为他们是科场场域主要的既得利益者，有资格担任官职，其士绅惯习在科场场域遭受挑战前便已较稳固地获得，我们称其为“1895届上层士绅”），而将此仍处于科场底层的行动者（包括各类生员和监生、例贡生）视为下一代人，他们要当官则必须捐纳或通过更高等级的考试，我们

^① 陈学恂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0页。

^② 所谓的“生机控制性”是指一个文化群体掌握其独立与发展所需有利条件的程度。对此概念的具体解析及中西文化在此方面的对比分析，参见叶启政：《制度化的社会逻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71-174页。

^③ K.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97:276-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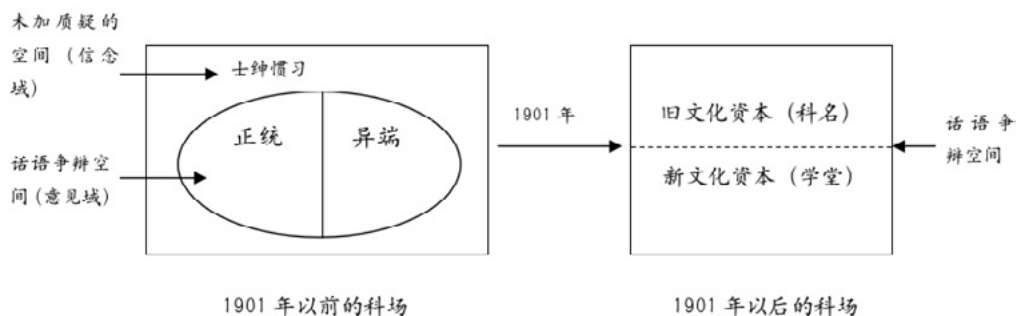


图 1-2

称之为“1895届下层士绅”。我们这里分出的两代人不是按照年龄来分的，而是按照其在科场场域的地位及与之相关的士绅惯习来划分的。^①

1. 士绅惯习的变异 (i)：1895届上层士绅

湖南 1895 届上层士绅的人数估计超过万人。^② 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中最负盛名的那些士绅的生活史勾勒，来探知士绅惯习的变异情况。

(1) 1895 届上层士绅：整体勾勒

在湖南上万上层士绅中，表 1-1 所列的 40 人是留痕史迹的人物。不过，他们的名气是与性质极为不同的政治事件与个人选择联系在一起：名冠“清末湖南三大儒”之首的王闿运不为任何时潮所动，一心沉浸于“帝王之学”；而他最得意的门生杨度则不仅与曾熙、彭施洙等一起参加了“公车上书”，

而且在留日、办刊、参加经济特科试与护路斗争等各种浪潮中出尽风头。王先谦、熊希龄、叶德辉、张祖同等人曾携手共创实业，倡设时务学堂。不料，转瞬之间又分成水火不容之两股势力：熊希龄与皮锡瑞坚决地站在了维新队伍一边，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则会同黄自元、孔宪教等人上呈了一份痛斥“康门谬种”的《湘绅公呈》。同样曾卷入留日热潮中，回湘后有如罗正钧般循规蹈矩地服务于新政者，更有如谭心休、唐乾一般以教育作革命手段者，还有如陈荆般投笔从戎乃至不惜以身相拼者。在政潮起伏中，既有阎镇珩这样稳驻书院不动者，也有黄忠浩这样从学界游走到商界，再从商界游走到军界者。从维新派到顽固派，从反（洋）教辟邪之士到保（儒）教劝学之士，从立宪党到革命党，从不党不群的“王术派”到夏曾佑所谓“革政派”——这形形色色的思想倾向都可在这一代士绅中找到。据表 1-1 统计，始终坚持走科场道路、在书院执教或其它传

^① 这种划分与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研究》中对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的划分是一致的。

^② 清代湖南各类贡生约 16500 名，举人 5800 名，进士 764 名，共计 23064 名，其中举人和进士有很大一部分是 1865 年后获得的（《湖南省志·教育志》，第 74—84 页）。因此，到 1895 年，湖南在世的上层士绅至少在万人以上。

姓 名	出生年份	籍贯	家庭出身	科名 (1895年前)	主 要 活 动 (1895-1905)
贝允昕	1865	浏阳	官宦	举人	书院山长; 1904年留日。
陈家鼎	1878	宁乡	士人	举人	1904年留日; 次年筹建同盟会湖南分会。
陈荆	1869	湘乡	?	举人	营救自立军人士; 组织反清诗社; 1902年留日习武; 参加暗杀活动。
陈炳煊	1860	湘阴	?	廪贡	留日学堂监督; 中路师范学堂监督。
崔睐	1834	宁乡	仕宦世家	举人 (1862)	早年曾以“天下第一伤心人”为名撰反教之文。晚年侨居常德, 卖书画为生。1902年逝。
戴展诚	?	武陵	?	进士 (1891)	参加公车上书, 后自费留日。
冯锡仁	1849	沅陵	?	进士	宦游回乡后任西路师范学堂监督。
黄忠浩	1859	黔阳	富家	优贡 (1888)	主讲书院; 筹建新军; 参办公司; 支持明德学堂; 任省教育会长; 总理营务。
黄自元	1840	安化	士人	进士 (1868)	主讲书院; 参办公司; 参加《湘绅公呈》。
贺金声	1853	邵东	?	附贡 (1881)	1900年卷入衡州教案, 1902年组织“大汉灭洋军”, 同年被人诱捕致死。
孔宪教	?	长沙	?	进士	书院山长; 参加《湘绅公呈》。
刘煌	?	长沙	?	举人 (1889)	参加公车上书。
刘凤苞	?	常德	?	进士	参加《湘绅公呈》。
罗亮杰	1865	安化	?	举人 (1891)	书院主讲; 参办学堂。
罗正钧	1855	湘潭	贫家	举人 (1885)	参加诱捕贺金声; 赴日考察学务; 任职省学务处。
罗杰	1866	长沙	?	附贡	留日; 任学堂监督; 组织反清团体“新华会”。
龙湛霖	1837	攸县	官宦	进士	支持明德学堂, 任总理。
龙璋	1854	攸县	高官	举人 (1871)	捐助明德学堂; 支持黄兴及华兴会活动。
梁焕奎	1868	湘潭	官宦	举人 (1893)	参办实业; 留日学生监督; 1903年应经济特科试。
李树芳	?	慈利	富家	廪贡	入湘按察使幕; 后辞职居长沙。受自立军一事的牵连于1900年遇难。
欧阳中鹤	1849	浏阳	士人	举人 (1873)	办浏阳算学馆, 入湘托幕。
皮锡瑞	1850	善化	官宦	举人 (1883)	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 书院主讲; 南学会会长; 学堂教习。
彭施涤	1869	永顺	贫家 幼丧父	举人	参加“公车上书”; 1898年留日; 1905年入同盟会。
瞿方梅	?	保靖	?	举人 (1895)	实业学堂副监督 (宋教仁是其学生)。
唐乾一	1878	衡阳	提督	举人 (1895)	1904年留日, 次年入同盟会, 并在长沙办学。
谭心休	1860	宝庆	?	举人 (1879)	1903年留日, 1905年入同盟会。
王闳运	1833	湘潭	商人 幼丧父	举人 (1855)	书院主讲, 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
王先谦	1842	长沙	士人	进士 (1866)	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 岳麓山长; 开办实业; 倡办时务学堂; 发起《湘绅公呈》; 任省师范馆馆长。
王礼培	1864	湘乡	?	举人 (1893)	学堂监督。
文俊铎	?	醴陵	?	举人 (1891)	参加“公车上书”; 参办学堂。
吴骥	1841	临湘	?	进士 (1889)	书院山长; 南学分会会长。
熊希龄	1870	凤凰	军人	进士 (1894)	时务学堂总理, 开办实业, 创设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赴日考察实业, 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
杨度	1875	湘潭	总兵 过继; 幼 丧亲父	举人 (1894)	参加“公车上书”, 主讲书院, 1902年留日办刊, 1903年参加经济特科试, 1904年参加护路斗争。
叶德辉	1858	湘潭	富家	进士 (1892)	参办实业, 参加《湘绅公呈》, 书院主讲。
阎镇珩	1846	石门	士人	禀生 ¹	加官不就, 书院山长。
左孝同	1857	湘阴	总督左 宗棠子	举人 (1885)	1897年在湘办保卫局。

曾广灼	1867	湘乡	高官	曾进士 (1889)	曾与维新人士来往密切, 也曾在湘开矿, 后不问世事, 埋首读书。
曾熙	1862	衡阳	?	(幼丧举人父)	参加公车上书, 1903 年中进士, 学堂监督。
张祖同	?	长沙	富家	举人	参办实业, 参加《湘绅公呈》, 学堂监督。
涂启先	1834	浏阳	?	优贡 (1874)	书院主讲, 支持办算学社, 主持小学堂。

表 1-1: 湖南 1895 届上层士绅的生活史 (1895—1905) 选录*

* 本表资料来源: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人物志(上)》, 湖南出版社 1992 版;《湖南历代人名词典》编委会编:《湖南历代人名词典》, 湖南出版社 1993 版; 郭汉民:《湖南辛亥革命人物传略》,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1992 年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民国人物传》, 中华书局 1979-1983 年版; 政协湖南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湖南文史》总第 43 辑 (1991); 常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德文史》第 3 辑 (1991); 政协湖南省湘乡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湘乡文史资料》第 3 辑 (1988); 湖南省桃源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桃源文史》第 3 辑 (1991); 政协湖南省醴陵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醴陵文史》第 7 辑 (1990); 湖南省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郴县文史资料》第 2 辑 (1988); 湖南省长沙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 11 辑 (1991)。

统文人生活方式^①的只有 5 人, 而其它 35 人中, 有 13 人赴日留学或考察, 18 人在学堂或学务处任职, 7 人曾参予公司创办, 2 人致力于新军或警务, 另有 7 人投身于反清革命中。^② 这些士绅的家庭出身多为富家。在表 1 可查考出身的 23 人中, 出身富家和官家的就有 13 人, 出身士人 5 人, 出身商人和军人的 2 人, 出身贫家的仅仅 3 人。

由于我们所定义的这一代人横跨了近 50 年 (表中年龄最大者在 1895 年是 62 岁; 年龄最小者那时才 17 岁), 所以, 年龄自然可以被看作解释其士绅惯习之差异的一个因子。但年龄并非主要的解释因子。比如, 37 岁的叶德辉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出来的固守与 45 岁的皮锡瑞表现出来的激进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更不用说 52 岁的龙湛霖以高官

之身却对新政时创办的私立明德学堂寄予了极大的热情, 甚至亲任学堂总理。事实上, 既得利益的大小 (如进士与举人不同, 有实任官职与徒有虚衔不同)、各别的家庭出身背景 (权贵子弟与贫寒子弟的不同)、家居的不同地理位置 (是位居省城、县镇还是孤守僻壤)、尤其是个人生活史的不同轨迹是更重要的参数。这些参数的复杂组合决定了那代人 1895 年后对“道统”的固守程度和对西学的接纳程度。

如果我们把崔欸这类出身书香世家、去官遭讥仍坚守士绅惯习的情况视为士绅惯习变化的起始端, 而把彭施涂这类既参加了挑战科场的“公车上书”又参加了反清排满的同盟会的情况视为士绅惯习变化的终端, 那么这一代的多数士绅正是游走在这两端之

① 科场场域除了科场本身作为主体空间外, 还将书院等传统教育机构都覆盖在内。对于尚未拿到最高科名的人来说, 其士绅惯习集中表现在积极参与科试上; 而对多数已获进士头衔的人来说, 尽管不用再出入科场了, 但仍是科场场域中的人, 其士绅惯习表现在对诸如在书院任教等传统生活方式的选择上。

② 对这 35 人的统计中, 各项均有重复统计现象, 因为很少有人留过学却又不致力于新式学堂建设, 也很少人只办公司而完全不涉身学务。

间。至于在这个连续谱中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则因受年龄、出身、出生地、既有地位诸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因素是个人生活事件。故此，我们在作了一个粗略的整体勾勒后，还须进一步作个案剖析。

（2）个案对比研究之一：王闾运与王先谦^a

1895年，62岁的王闾运与53岁的王先谦有颇相近之位势：并为名冠潇湘的大儒，同为著名书院的山长（王闾运主船山书院，王先谦主岳麓书院）。后人还常将其都看作是维新和革命时潮中的顽固派，只不过王闾运似乎是无声地在固守，而王先谦是公开地在卫道。其实，尽管他们出身小康之家，高踞举人、进士之名，享誉缙绅士子，但其士绅惯习均已发生了某种偏离。

王闾运的偏离发生在1895年前。他早年科场顺利、仕途前景光明：19岁成生员，22岁中举，后入肃顺幕，为其所赏识。但他成年之后就屡屡受挫：会试不中，又因肃党受牵；入幕曾国藩后献策辄不被采纳，最后使他虽以经世高才自期却不能不蛰居故里。此后几十年，他一直执教于各书院，虽始终怀跃跃欲试之心，却历戊戌、拳变、新政各时潮而无异动。当然，他对1895年以后的西学西政日进之势是固拒的：他认为康党维新必不久长；他反对其得意门生杨度的留日之行；他还颇不以学堂之设为然，认为“今

之弊政……根由起于学堂。……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此迂生所以甘踈伏而闭距也。”但是，他并非执意要维系既有的皇权专制格局。事实上，他的经学既重在与纵横霸道之术相通，又引入了老庄之道以作韬晦之策，因而其思想更多打着重政治事功的湘学烙印。他虽崇奉原儒（以《春秋》为本），却根本鄙夷宋明理学之道。郭嵩焘对王闾运有这样的评论：“壬秋（王闾运字——引者注）力求绝俗，而无一不与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见以畔道者。但论文章，友之可也，师之可也。至与辨人才之优绌，语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饮狂药，将使东西迷方，玄黄易色，颠沛蹉失，而不可追悔。”对郭语最好的印证便是：王闾运在咸丰年间曾游说曾国藩南面而王。所以，他对新文化资本进入教育场域的态度可谓固守（他于1903年明言反对改变学制，并固辞学堂之请），但他并不卫道——在他那里本已无道可守。

与王闾运不同的是，王先谦的士绅惯习是在1895年前后经历了某些蜕变。他生在文风最盛的长沙的一个士人之家，13岁应童子试，16岁中举，24岁成进士后即得到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可谓少年得志。此后他在国史馆等任过职，并历任云南、江西、浙江分试的正副考官，官至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在这一道路上成长起来的王先谦对科场自有其特殊的感情。1875年，王先谦曾坚决反对废八股的上疏。但另一方面，王

^① 参见马积高编：《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37—2706页；王代功编：《湘绮府君年谱》，载《近代人物年谱丛刊》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348页；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83—842页；卞孝萱等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435页；秦孝仪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3册第53—74页，第4册第77—84页。

先谦也受到魏源经世思想的影响，并与遭到许多士人围攻、讥刺的郭嵩焘、曾纪泽相交甚契。他1889年回籍后接长的思贤讲舍正是郭嵩焘之推席相让。王“与侍郎（即郭嵩焘——引者注）日相磨德艺，纵论及瀛海，故晚有外国史地之作。”这为他在1895年后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

1895年的国势使王先谦感到了“河山残列郡，天地胜危楼。……倚剑听哀角，吾生浩荡愁。”故此，他认为救世“切要之图，莫过于洋务”，并提出了“以制器为先”的主张。正是本着这一思想，王先谦在湖南由守旧中心而激变为维新中心的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宝善成制造公司的创设，还是时务学堂的倡立，无论是南学会的诞生，还是《湘报》的创办，均由王先谦领衔或得其大力支持。他甚至还毅然与“昨日之我”决裂，专门作了《科举论》，对八股取士提出了径直的批评：“今之时文，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昔人谓代圣贤立言者，去之弥远。”有不少论者说他到1898年时思想又发生了一次逆转，这倒未必如此。因为他在1895年所改奉的是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观，而到梁启超、谭嗣同、皮锡瑞等明倡民权时，他挺身而出卫道，其实是在其情理之中的，谈不上是什么逆转。他领先发起《湘绅公呈》表达出的是立中体西用为正统的诉求。所以，他虽在1898年主导了对时务学堂的绞杀活动，却又在1902年出任

省师范馆馆长，以后还出任过省学务公所议长——这表明他并非排斥学堂本身，只是要驱逐康梁这样的异端而已。王先谦确实是以一个卫道士自任，但他所卫的道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科场场域的“道”了。他这样的旧派可谓是“旧中有新”。^①

（3）个案对比研究之二：熊希龄与杨度^②

如果上面分析的王闾运和王先谦是所谓的“顽固派”，那么，25岁的熊希龄与21岁的杨度就算得上是与时俱进的人了。但这两个在1895年前一年分别获得进士与举人科名的人在士绅惯习的变化上仍有很大的不同。

熊希龄出身于一个湘军将领之家。12岁成生员，18岁肄业于沅水校经堂，21岁入长沙湘水校经堂，并于同年中举，次年中贡士。当时因怕书法不好影响殿试成绩，所以专门练字两年。24岁熊补应殿试，获进士功名，并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之职，顺利登上了科场的最高峰。他此前完全是在传统教育的浸润下成长起来，士绅惯习自也随其少年得意之历程而积累。他当时虽颇有忧患意识，却是内忧甚于外患，对洋务不以为然。“今之谋国者，龄窃惑焉。言富强，则曰兴洋务，言战守，则曰习洋操。……中国之财为彼用也，中国之人为彼用也，量其轻重，权其缓急，孰得而孰失乎？”他既没有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也就只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

^①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115—160页。

^② 参见北京市档案局编：《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4页；湖南湘西州政协编：《湘西文史资料》第3辑（1982）；周秋光：《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秦孝仪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6年版，第503—513页；吴祖缙编：《民国百人传》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9年版，第313—326页。

料,其开出的救世处方不过是“兴教养”、“严吏治”的那一套。同时,他与多数湘士一样还沉迷于湘军的辉煌战绩中。但湘西强悍刚劲之民风与少年血气方刚的冲劲使熊在甲午战败(亦即他获进士的第二年)后恍然大悟,顿生对洋务的趋步之心,并慷慨上书朝廷,说是“屈膝东洋倭寇之谬种,……实乃养虎贻患也。与其坐而待亡,孰若革新庶政,与列强比埒,乃为上策。……吾愿为爱国同仁,鞠躬尽瘁,临危救义,以拯吾国。”不料这番表白被慈禧批了个“妄言以害国政,欲毁我二百年圣祖之基业”,并将他发落回湘。熊就是这样负气回到湖南来一展宏图的。

熊希龄 1896—1905 年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896—1898 年。此时从宝善成制造公司到南学会,从时务学堂到《湘报》,从不缠足学会到鄂湘善后航船局,他几乎介入了湖南维新的所有活动。尤其是由他任总理的时务学堂更成了维新开展的一个标杆。他在此期间也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转变:从对“西艺”的学习进而向“西政”的借鉴。在当时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中,他实际上是站在了梁启超一边,为湖南的维新不惜舍身相拼。第二阶段是 1898—1902 年。他自戊戌被革职以来,被迫到衡阳、芷江蛰居闭户读书。第三阶段是 1902—1905 年。他重获起用,筹办了西路师范传习所(即西路师范学堂之前身)与常德中学,并于 1904 年渡日考察实业,回来后即兴办了醴陵瓷业及学堂。1905 年他随五大臣出洋,随即开始了他的立宪活动。从熊希龄的生活史可以看出,他在 1895 年后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士绅惯习的断裂:西艺西学西政已被他完整地

接受,尽管其出发点仍是以夷治夷。寻求国家的富强成了他不可遏止的行为冲动。

杨度出身贫家,但天资聪明。幼岁丧父后由身为总兵的伯父抚养长大,19 岁即获举人功名。次年,他参加了世人瞩目的“公车上书”。但杨度与熊希龄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深受王氏帝王之学影响。所以,尽管他参加了“公车上书”,但他的士绅惯习并未受到太大冲击:1898 年他又一次进京参加会试。当时正是新旧两党斗争白热化的阶段,他虽与谭嗣同等人交好,但却遵王氏之命回湘避祸。于是,他终成了戊戌维新中的逍遥派。这种情况到 1902 年才出现了变化。庚子拳变后的国势再无法让杨度“尽心听莺并看花,无心无事作生涯”了。他那时不顾其师的反对,决然赴日求学。同年,他与黄兴等人创办了《游学译编》。在杨度所写的发刊词中,明确可以看到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严复所译《天演论》对他的深刻影响。昔日作帝王辅的欣然自期为今日亡国之忧所替代:“大忧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自此以后,又将为黄白存亡王欧交代之过渡时代矣。悲夫!”尽管他仍不想放弃对科场的最高科名——进士的追逐,但他却已从旧学改从新学了。1903 年他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试,虽名列一等二名,却终因被指为新党而被迫再度赴日避风。时潮就这样将王闿运这位弟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异国成了他卷入一个接一个的风浪之间的暂时的栖息地:1904 年他回国参加护路斗争,后又被迫第三次逃亡日本。但到 1905 年,杨度又卷入了立宪浪潮中。从杨度这时期的

行动可以看出：他终于已偏离了科场场域的思想行为准则，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出了王闳运的师门。不过，他并不象熊希龄那样真正接受西方。在他骨子里仍摆脱不了对帝才之兴的寄望，这实际上已埋下了日后他拥袁复辟的基础。

2. 士绅惯习的变异(ii)：1895届下层士绅

对1895届上层士绅的生活史分析已经表明：除了一小部分人始终对时潮采取抗拒态度外，相当部分人的士绅惯习都开始发生变异，其行动的新趋向大致有三路：一是投身在新式学堂、学务机构中；一是参办实业，实现绅与商的渗透对流；一是投笔从戎，加入新式军队。如果说这代人由于年龄较大、地位较高，行动的分化还很模糊的话，那年龄较小、地位较低的士绅就可能有了更明显的分化。且不说那些已决然退出科场场域的人，就看那些留在科场场域的人，其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1) 湖南1895届下层士绅的生活史：整体勾勒

表1-2所列的46人是成千上万下层士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由于1895年时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3岁(统计其中知道出生年份的40人而得)，所以他们面临着两个基本路向的选择：一是在1895年到1904年间继续

攀援着科场阶梯由底层进到上层，一是到国内新式学堂或日本接受再教育，走出与科场别样的一条路来。在这46人中，只有4人选择了前者，^①余皆选择了后者，或说是被推向了另一条路。不过，这两条路并不是没有交叉。因为一方面在1895年后(尤其是1902年后)的科试中已渗透进大量的新学内容，另一方面，留学本身也是获取科名的重要手段。谭延闿以进士身份转而致力于新式学堂建设，姚生范以前党人之身留日回国后在廷试上获举人功名，即是两例最好的说明。当然，同样走学堂的新路，也自有其迥异的意旨：既有如黄兴般寓身于学堂的坚决的革命党人，也有如俞诒庆般忠实地将学堂作为巩固既有秩序手段的学监；既有如杨昌济般倾心于教育救国的人士，也有如谭延闿般以学堂作为谋取地方自治手段的立宪党人。但无论怎样的分化，这一代士绅在共同向西学靠拢的过程中，其士绅惯习已较上一代士绅发生了更大的变异。两代人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1895届上层士绅中像陈荆那样去操刀动戈、组织暗杀的人是极为个别的，但在下层士绅中像黄兴那样虽然寓身于学堂但实际上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却屡见不鲜了。

(2) 个案对比研究之三：谭延闿与黄兴^②

从表面上看，谭延闿与黄兴甚少共同之处。谭延闿出身于巡抚之家，即使是在1895

^① 这里要排除1897年徐仁铸作学政时得以由生员而成拔贡的那批人，因为西学在那次选拔中所占的份量极重，与传统科试迥然有别。

^② 参见毛注青编：《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6页；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谭祖安先生年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1-70页；《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1904)；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姓名	出生年份	籍贯	家庭出身	科名 (1895年前)	主要活动 (1895—1905)
毕永年	1869	善化	宦宦	生员	1897年成拔贡; 联络会党反清。后赴日, 参加兴中会、自立军。1900年参加惠州起义。后出家为僧。
蔡锷	1882	邵阳	农民	生员	1898年入时务学堂, 次年赴日留学。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 后赴日。1904年回国任军事学堂教习。
陈应轸	?	龙阳	军人	优廪	参加1900年自立军起义。
陈犹龙	1870	桃源	?	廪生	书院毕业, 1900年参加自立军; 1901年留日, 办《二十世纪支那》, 入同盟会。
陈文玮	1855	长沙	巡托	廪生	长沙学堂任职, 1905年弃文从商。
陈润霖	1879	新化	贫家 (幼丧父)	附生	就读岳麓; 1901年留日, 1903年回湘办教育。
陈作新	1870	浏阳	士人	监生	入南学会, 参与自立军, 上学堂。1905年入同盟会。
程子楷	1872	资兴	士人	生员	1897年成拔贡, 1904年留日, 入同盟会。
樊维	1872	邵阳	贫家	生员	1897年成拔贡, 南学分会会长, 支持《湘报》, 参与自立军; 1903年留日, 办刊, 后在学堂任教。
何未保	?	武陵	士人	生员	参加南学会, 参加《湘报》等维新活动, 后入校经堂就读; 参加自立军。
何衢	1871	湘潭	?	廪生	1905年留日, 任教学堂。
胡元铤	1872	湘潭	宦宦	生员	1897年成拔贡; 留日回来后致力于办学, 创明德学堂。
黄兴*	1874	善化	士人	生员	书院就读; 1899年赴日考察, 1902年留日, 参办《游学译编》, 组织反清革命; 1903年到明德学堂任教, 发起华兴会, 1904年到民主立第一女学、实业学堂等任教, 1905年筹建同盟会。
刘揆一	1878	湘潭	湘军差役	生员	就读于岳麓, 参加自立军活动, 1903年留日, 后回湘任中学监督, 参创华兴会。
刘佐楫	1850	醴陵	?	廪生	留日, 后在明德任教。
刘师陶	1876	醴陵	?	生员	1905年留日。
刘鼎和	1870	善化	贫家 (幼丧父)	生员	1905年留日。
李执中	1853	石门	?	生员	1897年成拔贡, 1902年中举, 1904年任中学监督; 创湘西公学。
龙纪官	?	湘乡	?	附生	1902年留日, 后任学堂监督。
欧阳振声	1881	宁远	?	附生	1902年入学堂, 1904年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
彭兆瑾	1873	湘阴	?	廪生	1904年留日, 参加华兴会、科学补习所。
彭润祥	?	长沙	宦宦	优廪	参加自立军。
仇亮	1879	湘阴	?	廪生	1903年留日, 办刊, 次年任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
苏舆	1874	平江	士人	生员	1897年成拔贡, 1904年中进士。主编《翼教丛编》, 攻击维新, 驱逐樊维。后赴日游学。
宋教仁	1882	桃源	士人 (幼丧父)	生员	书院就读, 1903年入学堂; 1904年创华兴会, 组织科学补习所; 后赴日留学, 参筹同盟会。
谭延闿	1880	茶陵	总督	生员	1902年中举, 1904年得会元、成进士。后回湘办学, 任丁卯即化于某日; 丁卯立元地切。
谭人凤	1860	新化	农民	生员	联络会党组织反清起义; 办小学; 1905年留日。
唐才常	1867	浏阳	士人	生员	1897年成贡生。办算学馆, 编《湘学报》, 讲学时务, 创南学会。后留日; 组织自立军起义。1900年遇害。
唐才中	1875	浏阳	士人	廪生	入时务学堂。(唐才常弟)
唐才质	1880	浏阳	士人	生员	入时务学堂; 后留日(唐才常弟)
沈萃	1872	善化	商人	生员	进岳麓书院; 留日; 参加自立军。
石陶钧	1880	邵阳	寒士	生员	入时务学堂, 留日。

* 黄兴及刘揆一均是在1896年获得生员科名的, 本不属我们定义的研究范围。但考虑到他们在湖南近代史上的典型性及其获科名的年份非常接近1895年, 所以, 我们仍将其纳入研究对象中。

田兴奎	1874 凤凰	?	生员	1897 年成贡生; 就学新式学堂; 1904 年留日, 1905 年入同盟会, 回湘办学。
王天曙	1866 江陵	富家	生员	后成贡生, 捐家资支持自立军。1900 年遇害。
文斐	1872 醴陵	?	廪生	书院就读, 又入湖南师范馆, 1905 年留日, 入同盟会
杨笃生	1872 长沙	富家	生员	1897 年中举, 1898 年成进士; 任教时务学堂, 后留日, 编《游学译编》。
杨昌济	1871 长沙	士人	廪生	留日; 学堂任教; 后又留英。
俞诒庆	1879 善化	?	生员	1897 年中举。1902 年留日, 回湘后任学堂监督。
俞蕃同	1875 善化	高官	监生	1902 年留日, 回国后办私立学堂。
颜昌晓	1868 湘乡	?	廪生	留日, 任学堂监督。
左学谦	1876 长沙	士人	生员	任教学堂。
姚生范	?	慈利	?	生员
赵学圭	?	邵阳	?	廪生
袁吉六	1868 保靖	士人 (3 岁丧父)	生员	1897 年成拔贡, 书院主讲, 学堂教习 (陈天华为其学生)。
余焕东	1877 汉寿	?	生员	就读书院, 留日回国后考取工科举人; 任师范馆监督。
张通典	1859 湘乡	?	生员	入幕相托, 参与维新。曾参与自立军事。后致力于办学。

表 1-2 湖南 1895 届下层士绅的生活史 (1895-1905) 选录, 资料来源同表 1-1。

年以后也一心走着传统科场之路, 直到 1904 年他 24 岁时, 在帝制最后一场会试中高中会元, 被授翰林院编修。随后他回湘结交官绅商界, 参与办学, 为其日后成为湖南立宪党首领打下了基础。黄兴则出身于乡间一般士人之家 (其父为岁贡生, 在乡间设馆授徒)。直到 1896 年他 22 岁那年方获得个生员科名, 以致他自述“在校经堂读书时 (时为 1898 年——引者注), 尚无革命思想, 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随即他在 1899 年赴日考察后就渐生出反清革命思想, 并在 1902 年的正式留日就读中成为革命社团的组织者, 到 1904 年, 他已作为著名的革命领袖而身陷囹圄了。

尽管有如此之差别, 两人还是因为共同

经历新旧两种教育而相连。正如曼海姆在分析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时所指出的: “是教育使他们跨越了出身、地位、职业与财富差别, 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联结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的独特性在于使许多千差万别的因素在此保留下来, 也使许多相互对立的派别都可从中运作。^① 谭延闿虽长期置身于科场中, 但 1895 年后科试内容上的许多改变不容他不勉力去学习、接受新的文化。1904 年会试中的一题即是有关新式学堂的: “学堂之设, 其旨有三, 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孰为最急策”。在这次考试中高中会元的谭延闿以恢宏之笔论述了“陶铸国民乃学堂之设的要旨”, 表明了他对新学的鲜明态度。在他中进士后没有留京做官, 而

^① K.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Brace&World,Inc., 1936:138; 应星: 《曼海姆的知识分子观述评》, 《国外社会学》1995 年第 5-6 期。

是回乡担任中路师范学堂监督、省学务公所议长。他甚至变卖其妻陪嫁的部分金器来捐助明德学堂办学。学堂被谭视为权力场域争斗的焦点之一。同样地，对于曾从旧式教育中走过来的黄兴来说，尽管他曾愤然作书：“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但他并没有像不少同龄人那样从此投身军营去操刀动戈了。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仍选择学堂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因为这不仅仅是可以教员为身份掩护，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在新生代中播下革命的火种。故此，立宪派的谭延闿便与革命党的黄兴在湖南新式学堂楷模——明德学堂中有过一段相携之中又相抗的历史，加上王先谦的门生刘佐楫等也在明德学堂任职，于是，明德学堂就成了当时湖南所有新旧势力交汇斗争之地。

（三）士绅行动的分化与废科事件的发生

从上述对 1895 届两代士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科场场域尚未崩裂前，士绅惯习使不少人仍汲汲于科名之得，那些在科场上已获得上层地位的人是将其士绅惯习与既得利益联结在一起的，而那些千辛万苦拿到低级功名的人也不愿轻易放弃向更高功名爬升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西学已作为新文化资本在科场场域里获得了合法性，这即别开了另一进身之阶。两种资本的并存既然改变了士绅惯习垄断科场的局面，那么，昔日一心扑在科场上的统一的行动模式也随之被打破了。既有以旧文化资本作为争夺新文化资源手段

的（即由绅而学），也有以新文化资本作为争夺旧文化资本手段的（即所谓“奖励出身”），还有以新文化资本谋求彻底颠覆科场背后的社会支配结构的（即以新学为革命手段），当然，仍有坚持走科场、书院正统道路的。

1895 年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的确立逐步蛀空了科场场域存在的外部基础，而西式学堂所负载的新文化资源以其强劲的生机控制性使科场场域赖以运转的士绅惯习被破坏殆尽——从这一意义上说，废除科举是科场衰败后的必然结果。

废科事件在这里值得研究的已不再是废科本身为什么会发生，而是这一事件为什么会提前九年发生。因为，按照清廷 1904 年 1 月批准的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奏折，是计划自 1906 年始分三科减尽科试取额的。但到 1905 年 9 月 2 日，清廷就改采袁世凯等人的主张，决定次年即停止全部科试。按照袁世凯奏折上的说法是“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①归纳起来即是两点：一是“强邻环伺”之外来威胁；二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而学堂则无以发展。前一点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有一种加速深化的趋势。在费正清所称之为“条约制度”^②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 110—114 页。

^②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 233—291 页。

列强在中国的支配权力从 1840 到 1895 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扩展速度远不及 1895 - 1905 年这十年的扩展速度。从《马关条约》到割地狂潮再到《辛丑条约》，列强的支配力已经到了可以将清统治者逐出皇城的地步。而 1905 年在中国发生的日俄战争给中国的刺激不仅是被迫置身局外的蒙羞，而且是由日本获胜所再次显示出的立宪政体对君主政体的巨大威慑力。而袁世凯等人所说的第二点

表明科考对学堂学生仍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导致无心向学者众；与此同时，学堂的发展却又销蚀了科考的合法性，因而造成科考与学堂两不相宜，既无法让老树接新枝，也无法让新瓶装旧酒。加上 1905 年议修京师贡院之事引发了以兴学为急务的部分督抚的危机意识，因此通过权谋改变决策层人事，通过非常规的决策程序催生了将减额渐停改为立停科举的诏令。^①

^①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4-136 页。



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 ——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

刘云杉 王志明 杨晓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提要】：研究以1978-2005年北京大学录取新生中的农村学生为对象，从时间维度上剖析这一群体所历经的身份之争，不同身份群体迈入北大的门槛有高低之分，以此揭示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从空间维度上揭示这一群体所遭遇的地域之别，不同类型的省市精英选拔圈子有宽窄之分，研究借此展示了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布地图；从学科文化的角度，关注这一群体的专业选择以及其后资本转换的实践智慧。研究在彰显国家精英选拔中的制度与文化、结构与秩序之后，最后质疑精英选拔用形式公正的贤能主义遮蔽了招生中繁复的权力因素，而精英养成中的文化资本缺失、文化连带断裂更为堪忧。

【关键词】：教育选拔；社会公正；北京大学；农村学生

一、研究缘起

在中国社会，“跳龙门”——精英选拔的生动意象，作为一种励志图腾，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其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激励机制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个体与家族成就通道。科举制在确保官僚体制充沛的人员候补的同时，更凸现国家权力机构透过教育与考试制度所完成的人才遴选与社会治理。^①1949年以

后，教育仍然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获得社会身份的重要途径。在本研究中，精英选拔特指北京大学的新生录取，尤其关注来自农村的新生，即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教育场域带有浓郁的政治性，马克斯·韦伯曾经警示：教育的专利将滋生一个享有特权地位的“种姓集团”，那些优势集团，史无前例地运用各种权力和名衔——财产、教育和门第，武装自己。他们无须选择出身还是功绩，天赋还是获致，承继祖上还是自身努力，因为

* 本文第一作者刘云杉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学。本文原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①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 简慧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M]. 李荣昌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7.

都可以兼而得之。^①布迪厄则更直接，在其《国家精英》中，教育系统被视为权力的生成机制得以考察，^②高等教育视为精英生成的权力场域得以曝露。不同的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在此进行隐秘且繁复的转换，学校被视为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为社会等级制提供证明的极为重要的制度机制”^③。通过某种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的运作机制，根植于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社会秩序，经由个体的自我转换(考生及其后的学校与家庭)，成了一种智力上的贵族统治(激烈考试竞争中的高分)——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被巧妙地掩饰起来。高等学校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其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了出来。

布迪厄触及了现代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借助这种构造，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得以掩饰了自己的本质，——即根植于经济与政治权力中的必然性转换为教育系统中“温和”且“公正”的竞争。无论攫升精英者还是沦落下层者，对这一权力规则都所知有限。帕金提出“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理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

程序，将获得某些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择某些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

本研究在上述理论基础，探讨在中国的社会秩序与教育系统中，国家精英是如何选拔的？在“这一个”制度与文化中，哪些结构与秩序、哪些核心因素决定了对他们的甄别？这一筛选究竟是复制还是偏离甚至颠覆既有的社会秩序？他们又将以何种文化资本以及其后的专业选择、实践智慧做出何种人生规划，旨在成为何种精英？

研究聚焦于“农家子弟”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基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分化。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1957—1958年，户籍制度从治安管理、人口统计的管理功能转化为限制人口自由迁移、禁止农民流入城市等控制功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不同的户籍持有者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各个层面差异悬殊。概而言之，建国初期的社会转型虽然打破了阶级体系，但农民仍被约束于土地与身份之中，先赋性因素——借助户籍制的建立——将其束缚在不利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资本当阳称尊，农民处于经济分层中最不利的地位。^④

① L. 华康德·解读布迪厄的“资本”概念[A]. 李康译·苏国勋等·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55. 此处借用帕森斯的在决定个人成就与地位时的二分：先赋性因素(出身、天赋与祖上)与获致性因素(功绩、获致与自身努力)。

② L. 华康德·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对布迪厄《国家精英》的讨论[A]. 李猛译·苏国勋等·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57.

③ 同上，359—360.

④ 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15.

以 2005 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10493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3254.9 元^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上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 3 倍，加上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城市居民与农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

其二，基于身份制上的出身差异。韦伯最早提出身份和身份群体的概念，其核心构成为生活方式、教育过程以及因出身与职业而获得的声望等。我国在 50 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更多突出政治身份，譬如贫下中农、富农、职员、干部等。改革开放以后，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逐渐演变为干部、工人、农民三种出身，不同出身的群体在生活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三，基于资源分配的行政区划。中国社会至今，社会结构仍然具有清晰的金字塔结构。从上到下，第一级省会城市，第二级为地级，第三级为县城，第四级为乡级即村镇，金字塔的底座是广袤的农村。不同行政区划在资源、机会和社会空间占有的能力相差甚远，行政区划越高，资源的控制力越强。对于数量如此庞大的处于社会等级金字塔底座的农村人口，其年轻一代要进入城市、获取体面的职业，拥有骄人的成就，社会结构与制度为其留下一扇门：接受高等教育——“跳龙门”。“跳龙门”——北京大学的录取——可视为中国教育资源与教育成就的一个信号

指示器。“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北京大学是第一所国立的综合性大学，享有崇高地位。时至今日，北京大学无论在学科实力、社会声誉，还是国家重视和扶植力度等方面来说，都享有优势。北京大学的教育经历与文凭是进入筛选严格的专业技术机构及国家权力机构的入场券，吸引无数考生在“万里挑一”^②的竞技场上展开角逐。因此，北大的录取是一个便捷有效的信号机制，既是基础教育阶段层层优势累积的结果，又是家庭、学校、地域等各种资源以及其后各种资本叠加、积累、转换、兑现的结果。这一信号机制，从微观角度即对新生个体与家庭而言，意味着获取社会晋升的期许与承诺；从中观层面即对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而言，是其教育质量高低的有效标志；从宏观层面即教育系统与区域发展来看，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地图。

精英的选拔即北大的录取由两个步骤组成。其一，高考筛选。考试场域的主导逻辑是能力原则，其后遵循贤能主义 (Meritocracy) 的技术路线，即“成就”取决于考生的“智力”与“努力”。^③对于考生个体而言，以省为单位的高校入学考试，是一场公开与公平的升学竞争，高考成绩决定其能否进入北大。其二，北大招生。在招生场域，不仅有技术原则，更有政治因素（权力因素）掺杂其中（形式上可能是依循惯例而来），诸如北京大学在各省投放的录取指

①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中国连锁经营年鉴 2008[Z]. 北京：年鉴出版社，2008.

② 以 2005 年山东省为例，山东考生有 73.1 万人，北大招生计划中山东仅 75 个名额，“万里挑一”名副其实。在近十年的招生中，仅北大一家高校就收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状元”，历年来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林匹克竞赛获奖学生更是绝大部分在北大深造。

③ I.Q+Effort=achievement

标,各专业的招生名额,推优、保送与加分的政策等等。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招生的人数与分布均由有中央政府统筹,学校被定位为人才选拔与培养的国家代理机构;晚近三十年,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高校招生自主权逐渐扩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在各省、各院系之间如何分配招生名额受到政府权力(教育部门)、学术权力(院系)、地方权力(社会、各省区)与顾客(学生市场)几方力量的影响,招生成为一个各方势力博弈、利益分配的场域。

在本研究中,考试的技术性与招生的政治性——前者是考生之间的博弈,后者是考生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共同构成北大的新生录取。拥有不同身份、处于不同区域因而拥有不同资本的子弟在这一场资源角逐中分羹为何?在新生社会构成这一看似浅显的数据组合魔方背后隐藏着繁复的权力斗争:借助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资本,承载于竞争性的身份团体中、分布于差异性的地域间、积淀于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透过此,本研究的旨趣在于探究精英选拔与精英生成的文化政治学。

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研究涉及四个层面:其一,从时间维度来看,精英群体中农村出身者的比例究竟有多高?哪些因素影响这一比例的升降?这将聚焦于新生录取中的身份之争。其二,从空间维度来看,教育资源分布是否均衡?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哪里?这将图示优质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其三,从文化资本来看,农村新生的专业选择上有何特征?这将探及新生个体在几重资本转换之间的实践智慧。最后将在价值层面上,

探讨贤能主义——考试选拔机制的理性化是否具有相应的价值正当性?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两个部分。1978—1998年的数据来源于北大档案馆中教务部按年集册的新生录取花名册,数据信息包括生源地、性别、政治面貌、家庭出身、毕业中学、民族、考试分数以及入学后的系科与专业等信息。以生源地为例,又将其编码为五类:农村/县城(县级市)/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等。在家庭出身一栏,如实登录新生花名册的内容,包括干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军人、教师等。2000—2005年的数据来源于教务部门的新生入学统计,这一部分的数据是由省招办所填写的电子数据。与1978—1998年的数据相比较,在生源地上信息缺失较多,但学生户籍信息较全,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

二、身份之争:精英门槛的高与低

研究首先要显示:究竟有多少农村学生走入北大?即北大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其次要探究,对农村学生而言,北大的门槛何以更高?

客观的高度:北大的门槛。因为数据的局限,研究采用两种形式来呈现农村新生的定义,其一,以居住地来划分,农村学生指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其二,以家庭出身来划分,农村学生指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2000—2005年的数据中,农村学生指持有农村居民户口的学生。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数据之间可以彼此参考。譬如,农村户籍的学生并不一定都居住在农村,所以1978—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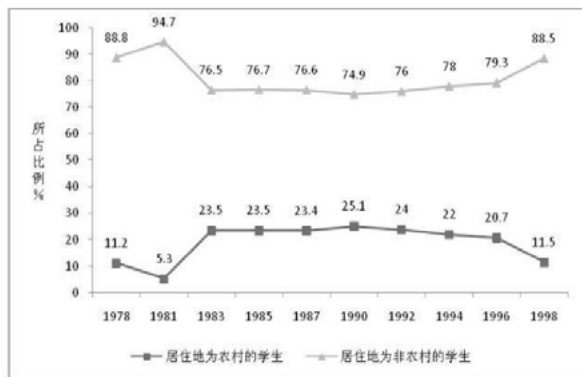


图 1: 1978-1998 年居住地不同的新生比例



图 2: 1978-1998 年家庭出身不同的新生比例

中数据中的农村学生比例与实际的北大农村学生比例相比，可能偏低。需要指出的是，家庭出身为农民与户口为农村户口也不能完全对应，但仍能彼此印证，观其大要。

从图 2 可以看出，1978—1998 年，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比例在 20—40% 之间，尤其是 80 年代，农村学生在 30% 以上；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比例除个别年份，集中在 20—30% 之间，80 年代中后期比例较高；两套数据在 90 年代中后期以后均有下降。而图 3 中 2000—2005 年的数据，农村户口的新生比例在 15% 上下呈平稳的直线。除去统计口径的误差外，研究可以确定：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下降始于 90 年代中期以后，2000 年以后，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在 10—15% 之间。

农村新生比例显著下降是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的一个积极成就吗？我国正经历从传统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阶段，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少地方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村兼业化”和“农民

老龄化”的现象。目前中国有上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和生活，尽管他们仍然处于城市管理的边缘。从统计资料来看，2006 年城镇率为 43.9%，城镇人口达 5.77 亿，相应农村人口下降到 56.1%，有 7.37 亿人。按照户籍来统计，农村户口尚有 9.49 亿人。^①就此而言，15% 上下农村户籍的北大新生比例颇低。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45594 万人，占总人口的 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 8073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3.91%。200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情况显示，城市应、往届人数为 1938323，占总招生报名人数的 49.89%，农村应、往届人数为 1946500，占总招生报名人数的 50.11%，同年，北京大学招收城市新生占总招生人数的 81.90%，农村生源学生占 18.10%。^②

相对的高度：身份之争。“家庭出身”具有浓郁政治性，尤其带有毛泽东时代的阶级论色彩。在我国的政审中，常以两个类目

① 陈锡文：《农村转型》[J]，财经年刊：2008 预测与战略，2008。

②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00》、北京大学教务部学生档案整理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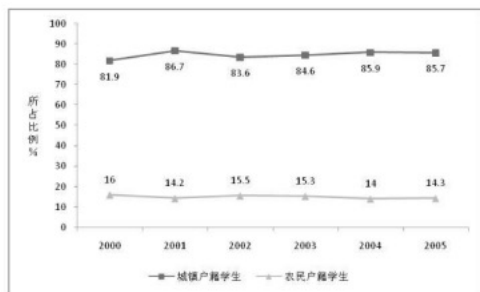


图 3: 2000-2005 不同户籍新生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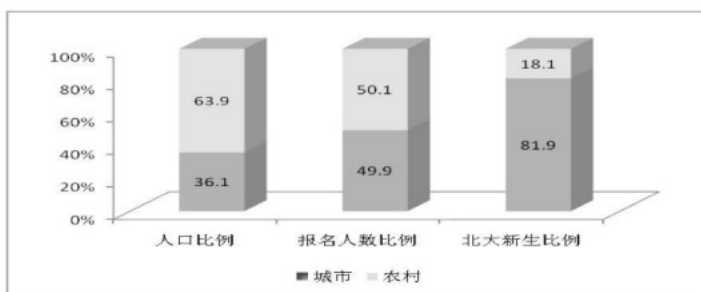


图 4: 2000 人口比例、考生报名与北大新生城乡比例比较

来确立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可视性”：家庭出身与个人成份；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为，父亲的成份即子女的出身。

出身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为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尤其是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不同的待遇。^①1949 年以后，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三个中心高度重叠，中国社会带有总体性社会特征。^②在此社会中，身份制盛行。就不同的身份群体而言，在户籍、就业、人事与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上面临不同的制度性障碍或享受不同的制度性优势资源。中国社会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阶层）^③经历以下的演变。首先，50 年代中期建立的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斥的界线，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实现了阶层之间的社会屏蔽。^④其次，在城市居民内部，又分为干部与工人两大类。社会福利（生活资料、就业机会、住房与子女教育等）和社会保障（养老与医疗等）常与单位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粗略分为三种类型：干部（资源高）、工人（资源低）、农民（无资源）。^⑤

根据新生的入学登记卡，家庭出身为以下 8 类：干部、工人、农民、教师、职员、军人、工商业者以及其他。

① 徐晓等.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M]. 北京：中国文献出版公司，1999. 徐友渔序。

② 孙立平等.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 [J]. 战略与管理，1998, (5).

③ 改革开放以后又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参见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④ 孙立平等.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 [J]. 战略与管理，1998, (5).

⑤ 1978 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 2.4:1，到 1983 年缩小到 1.7:1，到 1997 年又迅速扩大到 2.5:1；2000 年扩大到 2.79:1，农民人口占全国的 65%，但储蓄不足五分之一。（孙立平，2002）2001 年是 2.9:1，2003 年是 3.21:1。城市居民还有一些诸如住房补助、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农民这一部分完全缺失，实际上的城乡差距应该是 5-6:1。在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乡土”所能提供的资源和财富非常有限，在西方国家，这个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乡土”上的“人口”越来越少，在我国，城乡壁垒仍将广大农村人口束缚在“乡土”之上，

家庭出身	干部	教师	职员	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	军人	工商业者	其他	总计
人数	6059	1212	945	2423	4810	383	595	75	14	16552
比例 (%)	36.8	7.3	5.7	14.6	29.1	2.3	3.6	0.5	0.1	100

表 1：1978-1998 年北大学生家庭出身总体状况

干部出身：干部指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社会福利的保障者，就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可以形成转换——即圈内转换，干部这一身份团体是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在本研究中，将教师——国家法定文化的代表者（7.3%）、知识分子（2.3%）、军人（3.6%）归为干部一类，与实写为干部的比例（36.8%）相加，干部群体的比例为 50%。

工人出身：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居民在地位上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即使一般的市民，境遇一般也优越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居于社会的中间层的地位。^①但在社会福利中，工人属于低福利的享受者。工人群体比较复杂，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岗位是人们向往与追求的工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多数工人仍然是普遍的收益群体，但仍有大批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员工，认为自己属于相对被剥夺阶层^②，孙立平用“类中产阶级”来定位这一群体。与此同时，工商业者与职员等体制外资源的拥有者出现，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得以重新出现。因此，

研究将实写为工人（14.6%）、职员（5.7%）与工商业者（0.5%）等体制外资源的拥有者归为一类，以其主体“工人”代称，其比例为 20.8%。

农民出身：既无国家的权力，也无体制内外的资源；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上均有缺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碎片化，农民已成为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随着集体缓冲层的丧失，这一身份群体不管是面对市场，还是面对国家代理人，均是脆弱的。他们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权力机构的路径都是堵塞的，成为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③本研究中家庭出身填写为农民者的比例为 29.1%。

其一，优势与中间家庭出身群体比例上升。从图 5 可看到，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在 90 年代以后稳定在 50% 以上，1998 年甚至到达 69.4% 的峰值；农民出身的学生在 1983—1987 年在 35—40% 之间，1990 年以后下降；工人出身的学生比例聚焦在 20% 上下。三条曲线呈现出此起彼落的特征，80 年代农民出

由近 10 亿人分享日益萎缩的资源和财富。农民与农民工是一种社会身份，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

①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 [J]．战略与管理，1998，(5)．

② 同上。

③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 [J]．战略与管理，19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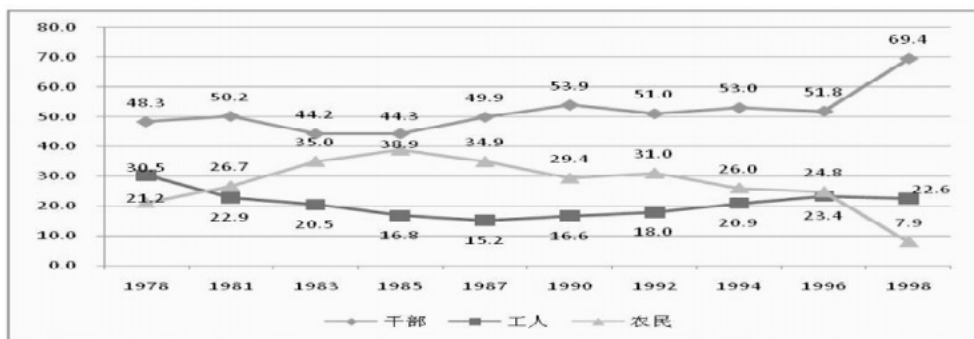


图 5: 1978-1998 年北京大学三类家庭出身的新生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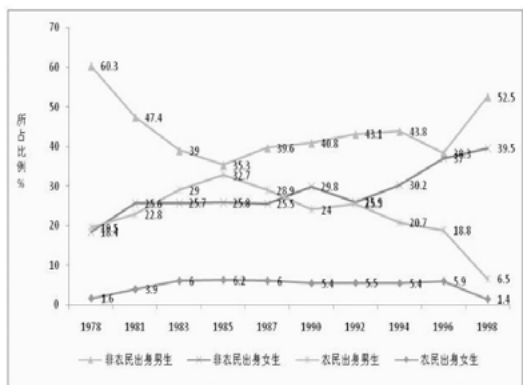


图 6: 1978-1998 年不同出身男女生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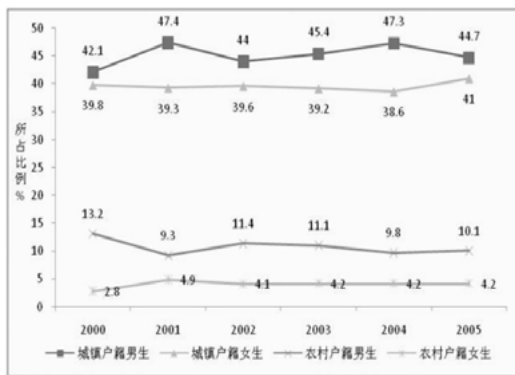


图 7: 2000-2005 年不同户籍男女生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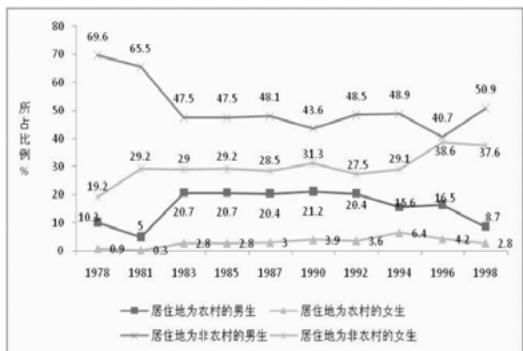


图 8: 1978-1998 年居住地为农村和非农村的男女生比例

身学生呈小抛物线时,工人出身的学生略有下降;90年代中期后,在农民出身的新生比例明显下降的同时,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明显增长,工人出身的新生比例也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招生是一场零和博弈,在总数确定的前

提下,输赢相加等于零。即博弈诸方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从图 5 可以清楚看出,谁获益,谁受损。研究也从一个视角昭示:对农村学生而言,门槛何以又被提高。

其二,城市女生的分羹。为进一步解释 90 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这一事实,研究将新生以城乡与性别两个维度,将新生分为四类:城市男生、城市女生;农村男生、农村女生。

从图 6-图 8 可看出,农村女生(无论是家庭出身、居住地还是户口)一直是低比例,可谓招生利益的缺失者;而城市男生(家庭出身、居住地与户口)同样具有不被挑战的高比例,可谓利益的优势维持者。2000 年

以后，城乡户籍的数据中，农村男生的比例降至10%，而城市女生趋近城市男生。有意思的是，在1978-1998年的数据中，家庭出身为农民的男生一度高过家庭出身非农民的女生，两者之间犬齿交加，构成博弈。而居住地在农村的男生比例从来没有高过居住地非农村的女生，这说明，尚有比例不小的农民出身但不再居住在乡镇的新生考入北大。

还可以看出，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无论出身、居住地、户籍）比例下降，即北大的门槛更高。假设农村学生的减少缘于农村的城镇化，在数据中应该是城市男生与城市女生比例皆相对提升，但事实却是城市男生比例变化不明显而城市女生比例急速上升；因此本研究认为农村男生的比例下降并非城镇化的结果，而是城市女生比例的上升挤掉了农村男生的比例。

另外一个疑问是扩招后的教育收费导致了农村男生的比例下降吗？研究认为并非如此简单。扩招加剧了农村男生的比例下降，但需要重视的是，博弈中的获利群体——城市女生比例的上升始于扩招之前的90年代中期——这正好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大学的时间。因此，生育政策的变化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城市女生在教育获得上有大幅度提升，扩招后的收费政策将这一优势扩大。

因此，在中国由传统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历程中，由于生育政策变迁下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加上教育政策的变化，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大学的新生中出

现了四个特征明显的群体：利益维持者，利益相对获得者，利益相对受损者与利益缺失者。

维度	男性	女性
城市	利益维持者	利益相对获得者
乡村	利益相对受损者	利益缺失者

表2：新生录取中四个博弈群体^①

其三，按省分配招生名额所形成的制度性障碍。在各行政区划、各身份群体对有限机会与资源的激烈竞争背后，最根本的舞台规则是北京大学按省录取的招生政策以及其中的名额分布。1978-1998年的10年间，北大北京生源的比例为23.1%(4192人)，超过同一时段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这6省的总招生人数(4177)，而这六省居住在农村的学生比例均在30%以上，是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前六省。由此可见，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之低，与按省分配名额的招生制度有密切关系。在高考这一公开与公平的场域中，贤能主义的技术路线确信入学率是一个客观的教育成就事实；但在录取名额划分这一环节，则充满着不确定性与不透明性，是多种因素与势力角逐的场域，是考生尤其是农村考生无力左右的场域。此处的身份之争，博弈于干部子弟、工人子弟与农民子弟之间，博弈于城乡之间，甚至还博弈于不同性别之间。北大的门槛对每一个群体都不低，但对于农家子弟，这一不低的门槛究竟被拔高了多少？

三、地域之别：精英圈子的宽与窄

中国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分布不均，在按省招生的录取原则上，不同省份的新生来源地有诸多不同，不同省份新生的城乡比例差异悬殊。研究从分析不同省份北大新生来源地的行政区划入手，进而探究在地方分级办学的制度下，北大录取所标识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各省分布如何，有无类型性特征。

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确定了“分级办学”——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基础教育的原则。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政府在办学能力上究竟有何差异？北大新生来源地的行政区划

正是考察不同省份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显示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发达与欠发达）、在不同的文化区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或沿海）、在中国发展不同的梯度（东部、中部与西部）上，北大新生来源地的行政区划有无类型差异，这些差异背后揭示着什么？

农家子弟有几许？

首先，农村新生比例相对高的省份：1978-1998年，山东、河北、吉林等12个省区的农村学生（家庭出身为农民）比例在40%以上，在2000年后的数据中，户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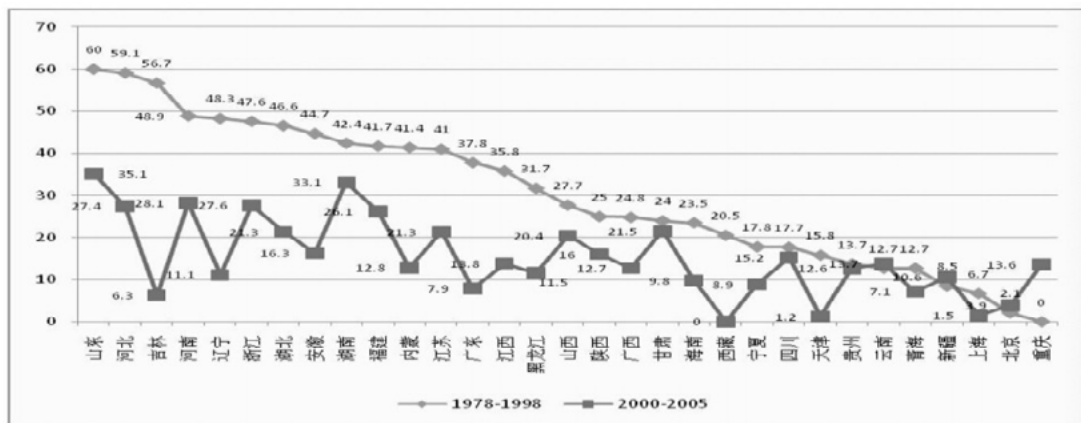


图 9：1978-1998 年家庭出身为农民及 2000-2005 年户籍为农村的学生比例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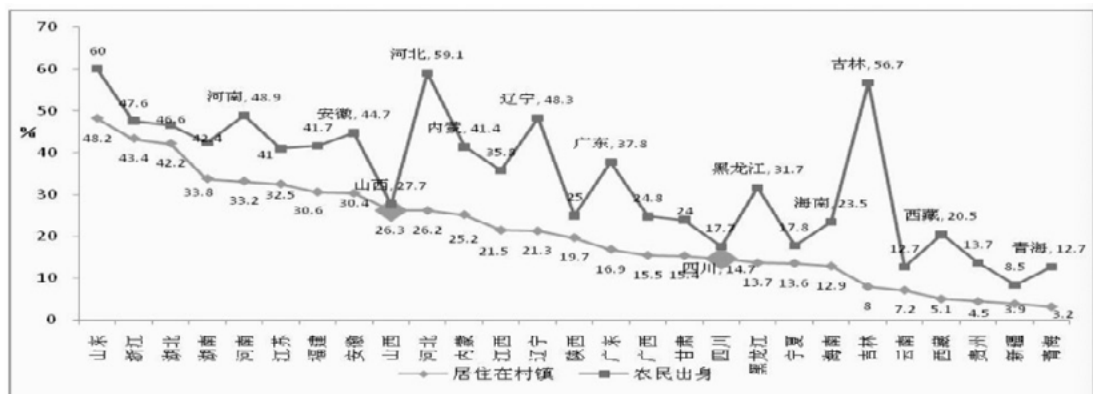


图 10：1978-1998 年居住在村镇的学生比例和农民出身的比例对比 (%)

为农村者仍高者（超过 20%）有 8 省：山东（35.1%）、湖南（33.1%）、河南（28.1%）、浙江（27.6%）、河北（27.4%）、福建（26.1%）、江苏（21.3%）与湖北（21.3%）。而吉林、辽宁、内蒙下降显著。

第二，农村新生比例居中的省份：1978—1998 年，广东等 9 个省区的农村学生比例在 20—40% 之间。2000 年后，山西（20.4%）与甘肃（21.5%）的农村户籍学生较高。

第三，农村新生比例低的省份：宁夏、四川等 10 省市的农村出身比例在 20% 以下，2000 年以后的数据中，四川（15.2%）、云南（13.7%）、贵州（12.6%）等农村户籍新生数在 10% 以上。四个直辖市中，重庆的农村户籍学生比较高（13.6%），随后依次是北京（3.9%）、上海（1.5%）、天津（1.2%）。

农家子弟居何处？

研究假设居住在村镇的新生绝大多数为农村学生，但仍有不少出身为农民的新生并没有住在村镇，而是住在县城甚至更高行政级别的市区。居住地为村镇的比例与出身为农民的比例应该较为接近，其间的差异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考入北大农家子弟居住在哪里，在哪里接受的中学教育。

从图 10 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民出身的比例普遍高于居住在村镇的比例，即有更多的农民学生居住在村镇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省有更高比例的农民出身的学生居住在村镇之外，譬如吉林（56.7% 与 8.0%）、河北（59.1% 与 26.2%）、辽宁（48.3% 与 21.3%）。而山西、四川、浙江等，农民出身的比例与居住在村镇的比例更为接近，这可

说明此类省份的北大农村新生更多仍居住在乡镇。

优质资源在哪里？

对 1978—1998 年的新生数据，研究以四级架构的方式对新生来源地进行分类：村镇（乡级——第四级）、县城行政区（第三级）、地级行政区（第二级）、省会城市（第一级）与直辖市五类。根据农村生源的比例从高到低，全国 31 个省市大致呈现出三种类型：洋葱头型（生源地主体为乡镇与县级，乡级生源高于 30%）、橄榄型（生源地主体为县级，乡级生源介于 15—30% 之间）、官帽型（生源地主体为省会城市与地级城市，乡级生源在 15% 以下）。

研究主要依据乡级生源的比例，同时结合县级与地级行政区划的新生比例，对各省的归类略作调整，将原属于第二类的内蒙和甘肃下移，原属于第三类的黑龙江、吉林上移，最后确定出三类特征明显的省份：资源均衡、乡级实力雄厚的洋葱头型，县地两级实力强大的橄榄型以及省级城市资源垄断、精英封闭的官帽型。研究进一步选取三种类型的典型省份——山东、江西和贵州，做出更加直观的新生源地分布图，以便清晰地呈现不同类型的省份北大新生来源的行政区划架构的明显差异。

洋葱头型：资源均衡，精英群体开放

1978—1998 年，乡镇新生占 30% 以上的 8 个省份为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江苏、福建、安徽。来自乡镇的新生比例高于其他三级行政区划（福建例外），随县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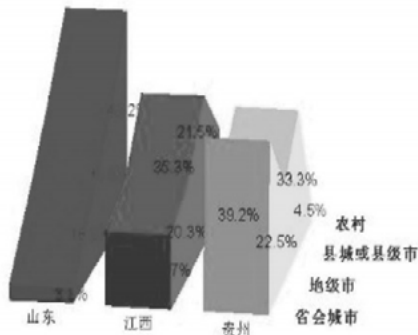
		农村	县城或县级市	地级城市	省会城市	直辖市
1	山东	48.2	31.0	16.8	3.8	0.2
2	浙江	43.4	26.8	13.1	7.6	9.1
3	湖北	42.2	28.4	14.1	15.0	0.3
4	湖南	33.8	35.3	20.7	10.0	0.1
5	河南	33.2	26.7	27.6	8.6	3.8
6	江苏	32.5	30.5	21.1	7.0	9.0
7	福建	30.6	32.6	14.8	11.4	10.7
8	安徽	30.4	25.1	19.1	12.4	13.1
9	山西	26.3	20.2	14.4	23.3	15.8
10	河北	26.2	24.6	24.0	13.2	11.9
11	内蒙	25.2	8.4	30.2	21.3	14.9
12	江西	21.5	35.3	20.3	16.7	6.2
13	辽宁	21.3	14.5	40.7	23.4	0.1
14	陕西	19.7	21.9	13.2	32.7	12.4
15	广东	16.9	33.6	32.4	16.4	0.7
16	广西	15.5	29.9	33.6	20.4	0.6
17	甘肃	15.4	18.3	19.7	36.1	10.6
18	四川	14.7	37.7	17.1	16.4	14.1
19	黑龙江	13.7	26.2	21.2	27.1	11.8
20	宁夏	13.6	26.4	10.0	49.3	0.7
21	海南	12.9	16.1	33.9	35.5	1.6
22	天津	9.1	3.7	0.0	0.0	87.2
23	吉林	8.0	28.8	21.2	30.5	11.5
24	云南	7.2	28.3	23.1	37.8	3.6
25	西藏	5.1	30.8	20.5	43.6	0.0
26	贵州	4.5	33.3	22.5	39.2	0.5
27	上海	4.2	0.7	0.0	0.3	94.8
28	新疆	3.9	15.7	39.9	39.9	0.6
29	青海	3.2	24.6	18.3	33.3	20.6
30	北京	1.1	1.2	0.0	0.0	97.7
31	重庆	0.0	34.0	6.0	0.0	60.0
	总计	19.1	20.4	15.4	13.0	32.1

表3: 各省新生源地行政区划比例

地级、省会递减。呈现明显的洋葱头型。

山东、浙江、湖北三省的乡镇新生比例超过40%。以山东为例,乡镇新生比例为48.2%。从时间维度看,山东乡镇生源的比例一直居高,县级生源逐渐上升,地级生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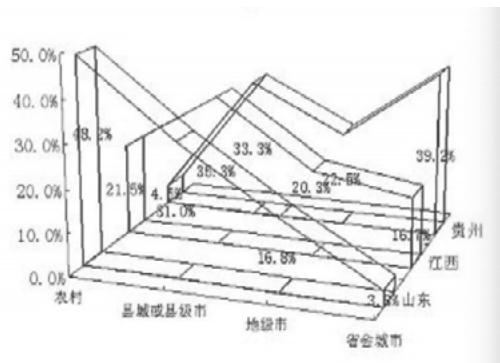
比例在20%以下波动。另外,这一时期山东农民出身的新生比例为60%,这可解释为尚有不少农村学生居住在县、地级。省会城市济南的生源一直最低。山东省内不同行政区划的生源比例明确,区分明显,其教育资源



相对均衡和稳定。大体上，洋葱头型的八个省均呈现如此特点。

研究再进一步考察山东新生的家庭出身，除去1998年的数据，家庭出身农民的比例在55%—82%之间，在80年代中后期，比例均在70%以上。其次是宽泛的干部阶层——城市相对优势资源的获得者群体，在20%上下，90年代以后，随着农民出身的比例缓慢下降，干部群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宽泛的工人群体——城市中的资源较低群体比例主体在10%以下。

乡镇生源高比例的八个省份均为文化发达、人口众多的省份，其经济也较为发达；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①能有效地动员农家子弟的升学愿望，并为其脱颖而出提供现实的途径。相对于全国平均情况，这些省份的农家子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北京大学，跻身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行列。精英集团的遴选在洋葱头型省份呈现出相对的开放性。



橄榄型：资源集中，受益均衡

1978—1998年间，乡镇新生比例在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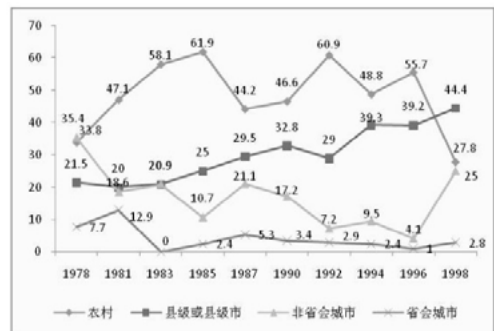


图 12：山东省新生居住地行政区划比例（%）



图 13：山东省新生家庭出身比例（%）

30%之间的省份有10个，分别是山西、河北、

^① 张玉林的研究指出，以河南为例，省会郑州市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全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初中生中，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也高达5.9倍。以高中的入学率来看，1999年，初中毕业生的入学率的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安徽的城乡差距是3.6倍（55.7%:15.4%），中部的教育大省湖北是3.9倍（71.4%:18.4%），人口大省山东的差距是4.4倍（72.3%:16.8%），河南是4.5倍（57.4%:12.9%）。

江西、辽宁、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黑龙江、吉林。橄榄型省份来自县地两级的新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行政区划，以县、地级为最高点，新生比例向两端递减。橄榄型省份又大致分为两类。其一，县级突出，县级新生比例分别为四川(37%)、江西(35.3%)、山西(20.2%)，高于其他三个行政区划，第三台阶突出。其二，地级突出，如辽宁(40.7%)、广西(33.6%)，北大新生聚焦在地级行政即第二台阶突出。从上述分布特征中可考察这些省份的优质中学分布在县级还是地级城市。

需要特别指出，橄榄型中不少省份的农民家庭出身比例高于其乡镇生源比例，即这些省的农民出身学生多居住在县级或地级城市，譬如河北(59.1%)、吉林(56.7%)与辽宁(48.3%)。广东与黑龙江同属此类，不少农民出身的学生及家庭已移居乡镇之外。

以江西为例，除了90年代初期的小幅度波动之外，县级新生比例在四个行政区划中一直居于最高，省会比例低位徘徊，地级新生比例在不同年份波动幅度很大，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农村新生比例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江西省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为41.2%，农民出身的新生比例为35.8%，工人出身比例为23%。以90年代为界，之前工人出身比例稳定，干部与农民出身构成此起彼伏的竞争关系。之后农民出生比例下降为20%多，工人出身比例上升至30%以上。

县、地级市新生比例较为突出的橄榄型省份，多为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中间状态的地区。优质的教育质量凸显于县级与地级，多以“县中”等重点中学的形式凝聚地方办学的力量。从橄榄型省份北大新生的家



图 14: 江西省新生居住地行政区划比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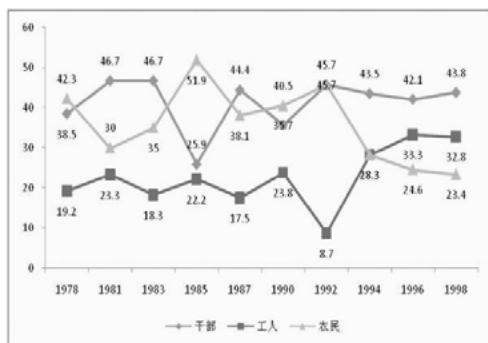


图 15: 江西省新生家庭出身比例 (%)

庭出身来看，干部子弟、农村子弟与工人子弟相对均衡。

官帽型：资源垄断，精英封闭

1978-1998年，乡镇新生比例在15%以下的9省市(直辖市不在分析之列、吉林归为橄榄型)为内蒙古、甘肃、宁夏、海南、云南、西藏、贵州、新疆、青海。新生聚集在省会城市，譬如宁夏(49.3%)、西藏(43.6%)、新疆(39.9%)、贵州(39.2%)、云南(37.8%)、青海(33.3%)、陕西(32.9%)、海南(27.1%)，省会城市的新生比例最高，优质教育质量集中在省内的最上层。少数省市出现省会与地级城市平分秋色的情形，譬如新疆(省级39.9%与地级39.9%)、海南(省级35.5%与地级33.9%)。就四级行政区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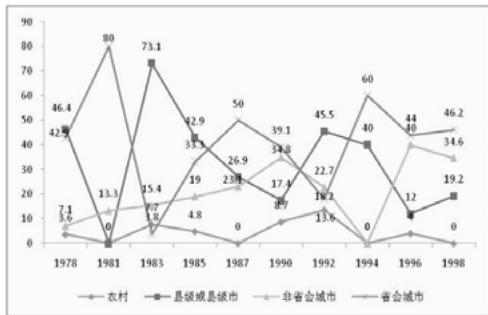


图 16: 贵州省新生居住地行政区划比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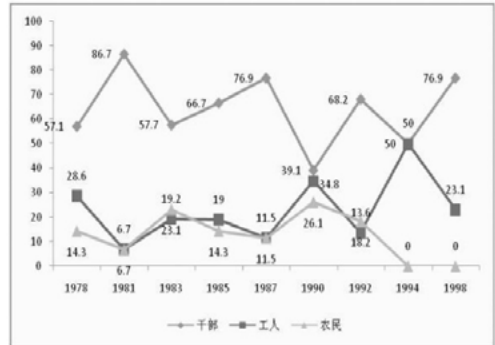


图 17: 贵州省新生家庭出身比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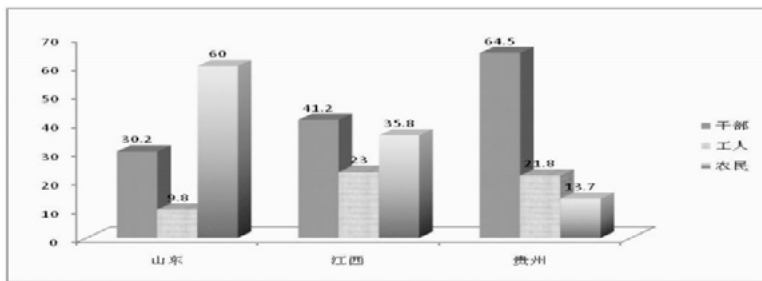


图 18: 三类省份新生家庭出身差异图示 (%)

而言，这类省份上大下小，其形如官帽，故称其为“官帽型”省份。

以贵州为例，新生比例在省会城市处凸现，县级新生起伏不定，乡镇新生比例很低，均值在 10% 以下。贵州的干部出身新生比例高达 64.5%，出身农民的比例为 13.7%，工人比例略高 21.8%。

官帽型省份大多为地处边缘、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省份。在少数民族地区，官帽型特征尤为突出，省城或少数地市的一两所重点中学，占尽天时、地利与人缘，成为输出精英的垄断基地，而这类中学的就读学生通常家境优越。因此，在官帽型省份，优质教育资源并非分享，而是为大城市的干部子弟所“多享”甚至“独享”。这类地区精英的再生产呈现出“圈内的封闭”的特征。在这

一地域，且不论农家子弟，即便是县市两级的干部子弟与工人子弟，跻身北大新生之列均希望渺茫。

在洋葱头型省份，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能惠及乡镇，有不低于 30% 的农家子弟能考入北大，一些省份（山东）农家子弟甚至居多，精英群体的选拔结果呈现出开放性。在橄榄型省份，优质教育资源的获益者多集中在县、地两级，农家子弟、干部子弟与工人子弟获益相对均衡。在官帽型省份，优质教育资源为少数省会城市垄断，大城市中的干部子弟独享其益，精英再生产呈现出“圈内封闭”的特征。通俗地说，假设一个资质优良、勤奋努力的农家子弟，有幸生在山东或浙江，他尚有进入北大的机会；倘若生在甘肃、贵州，他只能感叹：生不逢地！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再来看，各省的录取分数差异为何？如此分数差异，对农村新生提出何种挑战？

由于高考中各省的试卷与计分方式不同，研究只能选取可以比较的有限年份，例如1987年的高考成绩。按照当年各省北大新生的高考成绩平均分，可以得到以下排序（如表4）。

由表4可见，洋葱头型的八个省份情况如下（括号内为成绩排名）：山东（2）、浙江（6）、湖北（3）、湖南（4）、河南（15）、江苏（8）、福建（7）、安徽（12），这八个省份有六个成绩平均分排名在前八位，河南和安徽的成绩也比较靠前。橄榄型的十个省份：山西（13）、河北（17）、江西（5）、辽宁（11）、陕西（22）、广东、广西（14）、四川（9）、黑龙江（16）、吉林（10），这类省份的北大录取平均成绩大多居于中位，除了陕西（22），排名均在前十八位。官帽型的九个省：内蒙（27）、甘肃（25）、宁夏（24）、海南、云南（18）、西藏（29）、贵州（21）、新疆（26）、青海（28），

成绩排名靠后，包揽了后七位。^① 研究分别用2001年文科平均成绩和理科平均成绩对应这三个类型，得出类似结论。这种契合度如此之大的对应，提示这样的分数与类型的对应绝非某一年出现的特殊现象。

按照各省考入北大新生的分数段分布，由1987年的数据可见（图19），大部分省份的绝大部分学生以501-600分考入北大。然而，几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值得注意：山东和广东考生601-700分数比例特别高，而甘肃在该分数段的人数基本为零；贵州以401-500分——在入学分数中属于低分——进入北大的占到了将近20%。在新生行政区划构成中，山东和广东同属洋葱头型，而甘肃和贵州则是典型的官帽型。

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出身农民的

排名	省份	平均分	排名	省份	平均分
1	广东	589.6429	16	黑龙江	555.0418
2	山东	584	17	河北	554.3786
3	湖北	576.404	18	云南	552.04
4	湖南	574.5543	19	天津	550.58
5	江西	570.5556	20	上海	549.28
6	浙江	569.0978	21	贵州	549.0385
7	福建	568.9531	22	陕西	545.7015
8	江苏	568.6321	23	北京	542.6047
9	四川	567.4545	24	宁夏	536.7
10	吉林	565.1111	25	甘肃	536.4714
11	辽宁	563.274	26	新疆	529.7308
12	安徽	560.7333	27	内蒙古	526.9167
13	山西	559.1935	28	青海	509.0476
14	广西	558.78	29	西藏	495.6667
15	河南	555.9			

表4：1987年北大录取平均分各省排名

^① 海南在1987年尚未设省，所以不在此排名中。广东虽未第一，但是其分数按标准分计算，所以我们将单独拿出，不放入三类省份的比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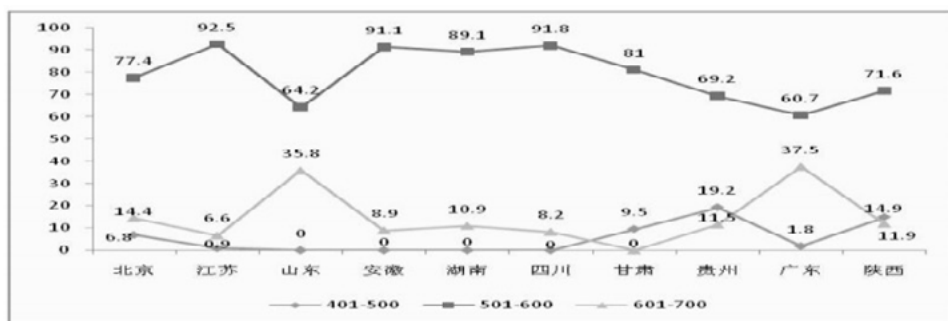


图 19：1987 年各省分数段分布比例 (%)

新生多来自高分省，他们以省内不低的分数、全国范围内偏高的分数考入北大。在官帽类的低分省，优势集团的子弟以省内不低、但全国范围内偏低的分数进入北大。如此看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处的地域之别，区别于三种类型省份精英构成的开放与封闭，区别于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还区别于不同省份的录取分数。至于其形成，则是历史、文化、经济、人力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资本之用：精英选择的热与冷

此处的精英选择专指专业选择，专业因其对考生的吸引力的大小不同，可用“冷”、“热”这一维度来做标识。此处的“资本”在形式上指考生的成绩与分数，其后更深层次实指考生及其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资本需要在市场上交易以兑现，因此强调其功用。专业选择与未来的社会空间紧密联系，与个人的生活机会和

生活道路紧密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研究将显示北大新生在专业选择上的城乡差异。

首先需要讨论专业的冷热之别，专业的冷热指吸引学生的能力，这一能力决定于学科的生存力、适应力与影响力，还取决于学生日后的就业能力与发展空间。托尼·比彻用硬/软（区分于方法是否严格）、纯/应用（区分于与实践的联系）将学科分为四类：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纯硬科学，以机械工程等技术学科为代表的应用硬科学，以人文学科为代表的纯软学科，而应用软学科指社会科学，如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①纯学科（基础学科）需要接受长期严格的训练，需要学习者长时间心智专一地投入，研究探索未知的不确定性需要从业者能忍受寂寞、承担一定的风险。应用性学科有功利性主导的特征，与外部的世界具有密切的联系，研究成果易受外界的褒贬，其学者的社会知晓度高。在知识市场化的时代，学科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为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还要这样的贡献为社会所知晓所认可。因此，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易成为热门学科。

^① 托尼·彼彻·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 [M]. 唐跃勤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学科的地位高低、专业的冷热有所不同。譬如，古典学曾一度处于全盛时期，享有非职业学科内的最高学术声誉。基础理科同样享有较高的声誉，人们普遍认为硬纯学科对研究者的智力要求很高，对高智商的个体有很强的吸引力。应用型常因其实用性而被社会所重视，但是在英国，人们将精英主义和理论研究等同于上流社会，应用型实践等同于工人阶层，因而对应用型研究的社会态度并不积极。北京大学既有中文、哲学、历史等学术传统雄厚的学系，也有光华、法律旨在社会服务的新贵，还有考试竞争激烈的理科院系。专业的冷热之别也在发生变化，以文科院系为例，中文、历史、哲学在80年代还能吸引到各省的状元，而2000年后，光华、经济与法学等院系几乎囊括当年全国所有的文科省级状元。

其次，专业选择与考生身后资本的联系。布迪厄对此有细腻的分析，他认为精英选择进入什么学院与专业，具有实践智慧。这一选择不仅承载着考生及其家庭对所具有的各种资本理性计算后的投入，也体现出不同资本所塑造出来的价值取向与趣味偏好。譬如，巴黎高师是“知识分子学校”，是法国高级知识界人士的温床，大部分迷恋这所学校的学生，只是因为他们的性情倾向是这所学校所要求和维持的那种资本的生动体现，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来自资产阶级中有文化素养的群体并将马上回到那一群体中去。而巴黎高等商业学校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就是为

了培养产业巨子和政府要员，基本上是那些来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中经济富裕的群体、并注定要回到那一群体中去的学生的领地。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将候补内阁成员和高级公务员的职位，这一精英类型糅合文化与经济两方面的潜质，因此主要吸引那些既有家学渊源（文化资本）又有厚实财富家底（经济资本）的子弟。^①

因此，在名牌大学内部，在历史悠久的大学院与家底单薄的小学院之间，在以知识分子价值信念为取向的学院和以培养政治经济人才为宗旨的学院之间，存在着横向的截然对立。考生在做专业选择时，缘起于主观因素——兴趣与回报，实现于客观条件——考生分数与招生的专业与指标。兴趣的实质即为布迪厄所谓的社会文化习性，即文化惯习，指长期浸淫于一种文化资本中所形成的心智特征、文化性情与价值取向。回报是指一种理性的生涯规划与经济计算，指更愿意踏入哪一个场域，究竟是学术场域、行政场域还是经济场域，其生涯规划旨在成为哪一类精英。

我们来看两组数据：1978—1998年北大各专业的农村生源比例排序，2000—2005年的同类排序，以及各专业农村生源的比例变化。

1978—1998年，农村新生比例高的专业多为文科中的人文学科（考古、政治、哲学、历史、小语种等），理科中倒是一些偏应用的学科（地质学、应用化学、技术物理等）。城镇学生比例居高的文科专业是应用型学科与

^① L. 华康德·解读布迪厄的“资本”概念[A]. 苏国勋等·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344.

专业，譬如英语与大语种（虽是人文学科，但更突出人才培养的应用价值）、广告、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等社会学科；理科却是生物学、电子学、化学等纯硬科学——学术声誉高、竞争激烈、出路宽阔的基础学科。2000-2005年，农村新生比例高的专业更集中于冷门专业，譬如图书馆、编辑与考古学与哲学等；理科专业没有显著的变化。文科中城镇学生比例高的专业更突显其应用价值与功利性特征，譬如管理学、经济学与法学。如元培计划、艺术类、新闻类等新的专业与学习项目中，农村学生比例显著低于均值。

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北大农村学生的专业选择呢？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其一，受限的专业选择空间。在空间维度来看，不同的省份除了招生名额不同，招生的专业类型以及各专业招收的人数也不一；从时间维度看，北大给每个省份的专业名额是动态变化的。譬如北大的小语种招生，两组数据之间农村学生比例下降16.2%，这与近年来北大小语种招生计划的更改有很大关系。在2004年招生计划中，小语种仅在北京、天津、吉林等地区投放了名额，而山东、浙江等农村新生比例高的省份，新生根本没有选择小语种的机会。

其二，求稳的专业选择行为。高考分数是新生的选择资本，在同一省份，考分越高专业选择空间越大。对于那些分数不高、刚上提档线的新生，他们并不具备足够的选择资本，如果执意要上北大，就只能求其次，选择对分数要求较低的“冷门”专业就读。对于那些分数中等因而有部分选择权力的农

村新生，又因为落选复读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偏高，求稳心态让他们倾向于选择胜算相对高的“冷门”专业。

其三，功利的专业选择动机。至于那些具有充分选择资本的高分考生，大多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在“跟风逐热”的心态下，算计如何利用考分的交易价值，将高分作为“筹码”去兑现更高门槛、高交易的热门专业。至于这些专业是否符合自己的志向与心智特征，多半由于对专业认识的信息的稀缺而不被考虑。

从新生的专业选择来看呈现出重选拔、弱选择的特征。选择基于资源与偏好（resources+preference=choice），就资源而言，在有限的专业选择中，农家子弟赖以选择的资源相对较少，高考分数是仅有的资源（保送与推荐考试的名额、各种加分的政策、各种特长学生的特殊通道很少惠及这一群体），“风险规避”的求稳策略常使他们过于保守。就偏好而言，农家子弟的兴趣与爱好究竟受到多少尊重与培植？与城镇学生相比较，农家子弟在资源与偏好两个维度上均处于劣势。同时，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与提升社会地位的现实压力，使得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更看重可能的经济回报与地位提升。农家子弟的“偏好”在现实环环相扣的“理性”选择中被压制了，学习者的兴趣与爱好被放在了极为次要的位置。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重要的是“跃过龙门”，荣升为精英集团的一员；而非选择自己的兴趣，成就内心的愿望。因此，专业选择的权力不在考生个体，而在学科与学校。与其说这是一个学习者的选择，毋宁说是学术制度的选拔。

1978—1998			2000—2005			专业变化	1978—1998 (%)	2000—2005 (%)	农村学生下降幅度 (%)
专业	农村 (%)	城市 (%)	专业	农村 (%)	城市 (%)				
考古	34.1	65.9	编辑出版	30.8	69.2	考古	34.1	25.4	8.7
地质学	31.4	68.6	图书馆学	30.0	70.0	地质学	31.4	19.7	11.7
政治学	28.7	71.3	考古	25.4	74.6	政治学	28.7	19.9	8.8
哲学	26.0	74.0	哲学	25.2	74.8	哲学	26.0	25.2	0.8
历史	24.5	75.5	技术物理	24.3	75.7	历史	24.5	21.6	2.9
应用化学	24.0	76.0	社会学	22.4	77.6	应用化学	24.0	17.4	6.6
技术物理	22.4	77.6	信管	21.7	78.3	技术物理	22.4	24.3	-1.9
小语种	22.3	77.7	历史	21.6	78.4	小语种	22.3	6.1	16.2
社会学	22.1	77.9	政治学	19.9	80.1	社会学	22.1	22.4	-0.3
国际关系	21.3	78.7	地质学	19.7	80.3	国际关系	21.3	16.0	5.3
图书馆学	21.0	79.0	中文	19.6	80.4	图书馆学	21.0	30.0	-9.0
环境科学	20.9	79.1	医学预科	18.7	81.3	环境科学	20.9	14.9	6.0
数学	20.7	79.3	英语	18.1	81.9	数学	20.7	12.7	8.0
中文	20.7	79.3	计算机	17.5	82.5	中文	20.7	19.6	1.1
法学	19.5	80.5	应用化学	17.4	82.6	法学	19.5	14.4	5.1
管理学	19.3	80.7	新闻类	16.8	83.2	管理学	19.3	12.0	7.3
信息管理	18.2	81.8	国际关系	16.0	84.0	信息管理	18.2	21.7	-3.5
物理学	18.0	82.0	物理学	15.6	84.4	编辑出版	18.0	30.8	-12.8
编辑出版	18.0	82.0	环境科学	14.9	85.1	物理学	18.0	15.6	2.4
经济学	17.6	82.4	电子学	14.9	85.1	经济学	17.6	12.9	4.7
心理学	15.8	84.2	法学	14.4	85.6	计算机	15.8	17.5	-1.7
计算机	15.8	84.2	大语种	13.5	86.5	心理学	15.8	8.3	7.5
化学	15.1	84.9	经济学	12.9	87.1	化学	15.1	11.4	3.7
电子学	15.0	85.0	数学	12.7	87.3	电子学	15.0	14.9	0.1
生物学	12.9	87.1	管理学	12.0	88.0	生物学	12.9	8.3	4.6
广告学	12.5	87.5	艺术类	11.6	88.4	英语	11.8	18.1	-6.3
英语	11.8	88.2	化学	11.4	88.6	大语种	11.4	13.5	-2.1
大语种	11.4	88.6	元培计划	11.4	88.6	医学预科	8.3	18.7	-10.4
医学预科	8.3	91.7	生物学	8.3	91.7	广告学	12.5	/	/
			心理学	8.3	91.7	新闻类	/	16.8	/
			小语种	6.1	93.9	艺术类	/	11.6	/
						元培计划	/	11.4	/
总计	19.3	80.7	总计	15.10	84.90				

表 5: 1978-1998、2000-2005 北大各专业城乡生源比例及农村学生比例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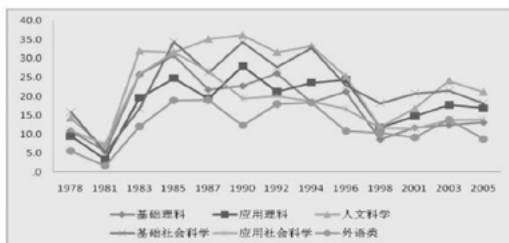


图 20: 北京大学学生的专业选择 (农村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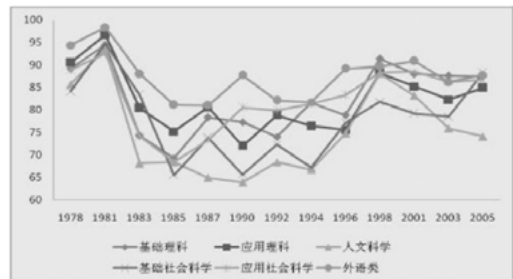


图 20: 北京大学学生的专业选择 (城镇学生)

然而，学术选拔的结果与新生的心智结构、文化性情之间能否达成一种“本体性的契合”？——这是决定其日后学术成就与社会贡献的重要前提。再看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比例高的专业：考古、图书馆、编辑、政治、历史、哲学、地质学等，多数为纯的软学科或应用型理科，这些学科具有以下特征：学术圈内封闭循环，要求从业者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文化资本）与非功利的价值取向——淡泊名利的爱智者，追求真理而非追逐名利，“为”学术而生而非“以”学术谋生。这样的学科惯习与向上流动的强烈动机、改变家族命运的迫切要求具有内在的不相容。另一方面，农村学生家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对缺失，县中“选择性禁闭”的培养模式，使他们很难拥有与专业要求相适应的文化性情与心智取向。其中的不匹配既可能导致学生个人的学业倦怠，更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

此处的资本之用，不能仅止于个人及家庭的资本交易，更应该深虑学科层面、国家层面的资本涵养与增值。北京大学既是国家精英集团选拔的代理机构，更是精英人才的培育机构，还是学术生产与传承的知识重镇。如果“选才”的功能替代了“育才”，如果微观角度的资本计算替代了宏观层面的资本涵养，既是国家的不幸，也是学科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

五、结语

我们再从北大的经验研究重回与布迪厄的理论对话中。布迪厄的《国家精英》尤其关注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在布迪厄看来，国家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化地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取向、文化性情与行为选择中。国家不仅具有军队、税收这类有形的权力，国家更具备无形的符号权力：国家首先充当“符号信用的中央银行”，签署所有的委任状，借助这些委任状，各种社会划分和尊崇声望得到分派和发布，即在既定的地域和人口范围内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得到传播。而学术职衔（其后的文凭与录取）就是这种“国家魔法”的典型体现，借助这些名位称号，以成绩记录为名义，制造出各种社会身份与社会命运。国家权力用纷繁细微且又秘不可见的方式，通过教育灌输给我们各种范畴对我们所有人都施加影响。每当我们运用这些范畴理解和构建社会世界时这些影响便体现出来。国家不只是以科层制度、权威机构和各种典礼仪式“外在体现”出来，它还通过形塑思维，创造欲望，训诫关系从而“内在于此”——在我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因此，社会秩序其实质是一种认知生态秩序，人们用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图式与行为习惯均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国家影响最有效的途径，国家权力最可用的侍仆，不是军队、监狱，也不是精神病院和医院，而是学校——当代社会秩序最有力的保障者。^①

^① L. 华康德，解读布迪厄的“资本”概念 [A]. 李康译，苏国勋等，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 [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339-356.

我们由此再深究：其一，在精英选拔中，贤能主义在形式上能否保持选拔的公正？其二，在精英生成中，成功的晋升者能否承继且光大其家族文化资本？

贤能主义：合理的伪饰

北大招生实行按省分配录取名额、省内按分数择优录取的原则。若从个人视角与过程视角来看，这是一场能力取向的“贤能主义”主导的公平竞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获致性（成就、分数）因素掩盖了先赋性因素，成为招生录取场域中的决定性因素。

若从整体视角与结果视角看，按省分配名额的录取原则，导致各省的录取指标、录取分数差异悬殊。先赋性因素——“你所能”与获致性因素——“你所能为”之间形成一个繁复的社会拓扑结构，身份之争、地域之别与资本之用——在招生录取场域却成为虽隐匿不显却无处不在的关键性因素。

更具体地说，在高分省（洋葱头型），农家子弟凭借不低的分数进入北大（体现了考试场域贤能主义主导的技术路线）；在低分省（官帽型），农村考生因为分数不够而进不了北大，垄断大中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干部子弟却以省内的相对的高分、全国的相对低分跨入北大。由此可推论，北大的农村新生多来自高考高分省，这一群体分数均值就偏高；而官帽型的低分省，政策照顾的收益者多为省会城市的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而非这一区域的农村学生。在此，先赋性因素——身份团体、社会网络、家庭的经济资本、毕业

中学的文化资本——具有和获致性因素（考分）不相上下的作用，前者甚至决定了后者。

考试场域看似客观公正的贤能主义用过程的公开、个体的公正遮蔽了优质资源分配过程的权力性因素，招生录取场域中的政治原则（各省均占一定比例的代表制）所惠及的却是边远省份的干部子弟，在这类地区，精英集团的再生产呈现出更强的封闭性。贤能主义在此真是一层光鲜漂亮的面纱！

精英晋升策略

“县中模式”对精英生成的影响值得关注。在洋葱头型和橄榄型省份中，农村或县市的学生以高分胜出，县中成为这些优秀学生的孵化器，为农民出身的学生提供了跨入北大的现实机会。

一所优秀中学的形成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与教育资源积淀的成就，全国著名高中大多聚集于洋葱与橄榄型所涉及的省份中。^①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沿海地区，如福建、江浙等，在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办学历史悠久、师资雄厚的著名高中多分布在县与地两级，强大的“县中”为来自农村、县市两级的学生进入重点高校铺就了一条相对宽敞的道路。“县中”——这类分布在下，或者说从民间文化、从历史处长出来的优秀中学，为乡镇、县市等中下层的优秀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扩大精英选拔的开放性，推动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公正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县中模式正是我国当下制度背景

^① 根据2005年10月29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2005年（首届）中学校长论坛上发布的《2005年中国百强中学》评选结果。

下，基层社会凝聚智力、物力与人力，聚拢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优质教育质量的独特模式。

“县中模式”的教育理念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县中亦有考试“集中营”之称。在高训诫的纪律空间中，教育以“总体制度”（total institutions）的方式来运作，这些制度被设计用来彻底转变学生的心智、身体和自我，以适应名牌精英学校和未来精英集团的预定要求。这类学校用严厉甚至苛刻的制度来进行时间控制与空间控制，用频繁的、高竞争、高淘汰的考试来控制学生的心智结构。县中用“选择性禁闭”使学生与他们的家庭隔离开来，也使他们和同龄的其他群体隔离开来，彼此之间形成既竞争又认同的同源性群体，这一群体的同源性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共享的社会化进程和社会资本的封闭性。^①从此意义上来看，这些著名的中学成就了学生新的社会出身与身份团体。

然而，在“选择性禁闭”中强化出来的学生将如何面对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精英再生产中的文化断裂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在决定一个学生升学意向与升学选择上，学校的作用多甚于家庭。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子女的影响多体现在“择校”之上，而学生的学业成就、兴趣发展则在学校这一竞争性的环境中培养。

在名牌中学“选择性禁闭中”，家庭缺席了，中国学生可谓一个“制度的孩子”——理性的、高竞争的制度的孩子。在中下阶层的精英培养与选拔中，学校的作用远大于家庭的影响，学校是学生价值观念形成、行为习惯养成、参照体系确定的重要场所。针对农家子弟，情形尤甚：家庭单薄的社会资本、薄弱的文化资本对其成长影响甚小，求学的历程就是一个个人奋斗的历程。成功的农家子弟可以说是学校的骄子、制度的宠儿——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更可能是这一制度的“受伤者”。在凭借优秀的成绩进入精英集团之后，他们需要面对、接受一个疏离甚至背离自己的家庭文化与价值的社会圈子。在精英团体的生产中，文化资本或者匮乏或者殊异的农家子弟，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丰厚的城市学生之中，是否被强化“阶层差异的暗伤”？在他们的成长中是完全背离自己的家庭还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提升与回馈自己家庭？我们需要严肃地询问：中下阶层能从这些成功晋身者身上获得相应的文化尊严与社会提升吗？

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这一步的跨越——身处地域之别，体受身份之争，计算资本之用。然而，这些成长中的未来精英能否保有其阶层的文化与尊严？在促进向上流动的社会公正之下，能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民主——这更值得期待。

^① L. 华康德·解读布迪厄的“资本”概念 [A]. 李康译·苏国勋等·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 [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65-367.



学业竞争大众化与高考改革*

陆一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提要】：通过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程的结构分析来揭示学业竞争大众化现象的形成，以及近20年间高考功能的应势之变。高教大众化之前，由于存在前置的社会性分流，作为英才选拔“指挥棒”的考试不至于成为大众上学的“紧箍咒”。“报名率”超过50%意味着前置的社会性分流消失——高考竞争大众化，这是当前高考改革的深层动因。因此改革成败取决于能否恰当地为学业竞争设置边界，扭转教育系统在急剧扩张中因无序扩容而造成“一”遏制“多”，“平凡”遏制“拔尖”的双重压抑局面。若能建起兼容“英才选拔纵向分层”和“大众升学多元适配”两种功能定位的考试升学系统，将实现中国教育治理能力的跃升。

【关键词】：报名率；升学竞争；考试厌倦；前置社会性分流；高考有效容纳量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考改革是两个在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经过多年研究积累，两个议题各自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讨路径，然而两个议题之间的正面对话却不多见。从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顶层设计视角来看，两者都是直接关乎中国教育体系结构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跨越边界，将两者贯通起来讨论，从而更加有效地解释民众在教育变革中累积起来的不适与困惑，以便更好地回应国家教育改革的决策需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丁·特罗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壮大所隐含的质与量的变化规律做出有效概括，其理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

响力。随后，高教大众化理论被全面译介到中国，随即毛入学率超过50%被正式设定为标识中国高教发展的关键指标。^[1]在国家教育发展目标制定之后，高教大众化、普及化就成了热门研究课题。此一课题的主要方向是研究关于高等教育量的增长如何影响质的问题、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性与大众性的问题、大众化前后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化问题以及大众化如何促使大学教育教学发生变革等问题。研究此领域的学者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际学界展开了充分对话，在可比的要素（如高教发展阶段、数量、性质、结构、财政等）上实现了成效的国际比较。然而总

* 本文作者系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请学者，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及教育与社会系统中的枢纽性问题。近年来综合灵活地运用多学科方法，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考试与中国社会”等主题领域开展持续的研究。本文原刊《教育研究》，2021年第9期。感谢作者提供文稿，引用请据原刊。

体而言，中国高教大众化问题的论域没有超出高等教育的范围，几乎没有研究专门讨论高教大众化对基础教育乃至全教育系统的影响。

另一方面，高考改革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土属性和政策指向。恢复高考以来，每当经济发展对教育供给产生新的需求，亦或是社会观念变迁对学校教育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便会催生新一轮高考改革，而每一轮高考改革前后都会掀起一波学术界与公共知识界的热议。^[2] 高考改革类的研究多数是为改革政策做学理论证或效果验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工具性。还有一类研究采取史学范式，着眼于中国历代考试制度的考证，旨在揭示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与考试之间错综复杂的规律。^[3] 从中国考试制度史研究中汲取的经验尚不能直接涵盖当前教育现代化的全新阶段。大体上，政策研究直面当前的改革呼声，却不如历史研究那样深思熟虑，而历史研究则不免陷于“古识”，在政策建言方面力有不逮。

笔者认为若要以历史的、发展的、全局性眼光来思考今天的高考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容忽视的背景。还有一类研究出于对平等权利的关注，沿袭美国教育社会学的主流范式，采用量化实证的方法揭示：当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具有怎样身份的人更有可能获得如此这般的入学机会。^[4] 已有研究显示，中国数据样本可以验证著名的“不平等最大化”理论^[5]，或者说中国近20年的大学扩招过程存在有效扩大不平等现象。然而，中国的高考选拔制度的

建立与改革并不以“平权”为最高价值依据，也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教育平权”。相反，平权观念下对入学者身份背景的高度关注与不问出身的高考制度存在矛盾。因此，用平权程度的增减变化衡量高考改革和高教大众化前后的入学机会分配，只是采取了一种特定立场的视角观察解读社会现象，并不致力于必须兼顾全局的政策制定或优化改革举措。并且，高考制度所追求的公平竞争与有效选才等价值原则与美国教育平权的理论基础具有本质性分歧。

立足中国教育体系来看，对于高考制度如何受到高教大众化影响，我们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理论空白。国际上公认的规律是，高教扩张隐含着大学、学生和教师的全面多样化与层次化变革。这种多元与分化对于一个由国家统一组织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招生制度所规定的教育系统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大规模的高教扩张对高考制度施加了怎样的改革压力？这个体制性问题超出了欧美学者提供的理论准备。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高考制度是结构性的论题^[6]，而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只影响高等教育，更是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教育系统，牵引着每个家庭的教育观念。

本文拟围绕中国高教扩张中的两个关键变化：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升学竞争性质的变化，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高考功能属性的变化，将其还原到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展开分析，以期为陷于理论与实践困局中的高考改革开辟新的思路。

一、报名率：高等教育扩张与大众升学热情

为了确切地描述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实际态势，笔者整理了从1985年至2019年官方统计的适龄人口数、高考报名人数、高等教育本科入学人数和本科入学人数，见图1。

图1中最上方的圆点折线代表当年18岁人口数近似值^①，该数值呈波浪形态，在1986年和2006年两度达到最高峰。图1中部黑色折线表示每年高考报名人数，总体不断上升，在1999年至2008年间上升的斜率很大，其余年份比较平稳。图中最下方有三层带纹理的区域，自下而上依此表示每年的本科入学人数、每年专科入学人数，两者相

叠加后的区域表示总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而叠加后的区域与高考报名人数曲线之间的区域（竖线纹理部分）代表的是报名参加高考但最后没有得到高教入学机会的人数，即“落榜”人数。以上人数均以“万人”为单位，参考左侧纵坐标。

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1999年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1985年至1998年）18岁人口数量庞大，多数年份超过2000万，但报名高考人数大体稳定在200~300万之间。期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则从60万稳步上升至100万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稳步扩大阶段，也是精英高等教育时期。

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政策性大幅扩招，本科和专科入学人数均急剧增长。扩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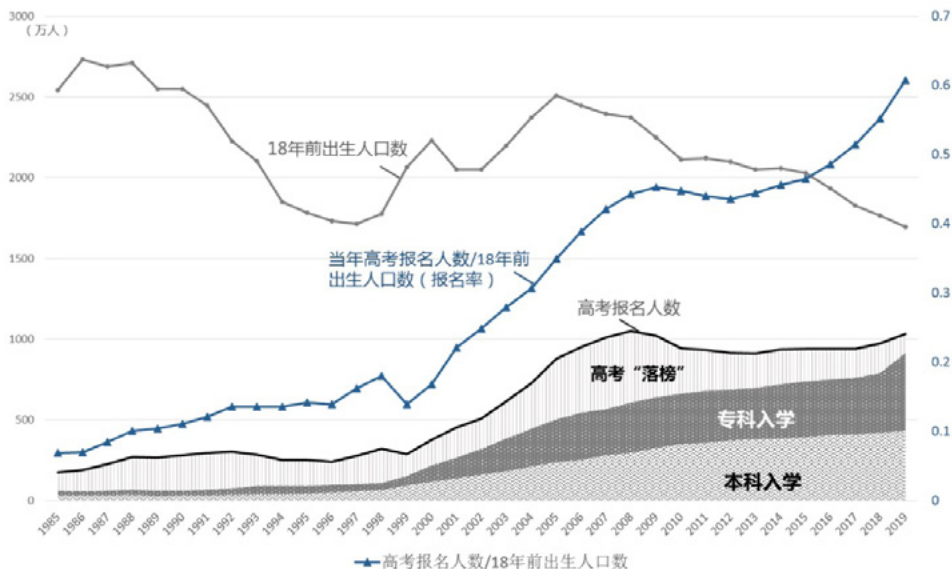


图1: 扩招过程中高考“报名率”的变化

^① 由于官方并不公布每年的18岁人口数，但公布每年新生人口数，且一般条件下18岁前人口死亡率比较稳定，因此本文将18年前的出生人口数代表某一年的18岁人口近似值，本文中涉及的18岁人口数均为此近似值。

政策与人口变化同步，18岁人口在2005年达到1986年后的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高考报名人数增长也很剧烈，2007年突破1000万，以至于2007年前后几年每年落榜人数比此前各阶段都更多。2010年后，由于人口回落等因素，高考报名人数不再急剧增长，高等教育扩招速度也有所缓和。2017年后，本科扩招增长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专科急速扩招，可能受此影响，高考报名人数又一次进入增长趋势，而落榜人数则进一步减少。

由于每年适龄人口数变化较大，为了更好地刻画人们升学意愿，图1中三角形端点折线表示高考报名人数与18岁人口数的比值，^①该比值对应的是右侧纵坐标标尺，下文简称为“报名率”。虽然数值含义不够严格，该比值在不同年份的相对变化仍可以代表人们对参与高考的热情增减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这一时期的升学热情越高。同时，本文操作化地定义：上线率 = 入学人数 / 升学考试报名人数，以此代表考试的筛选强度。

进一步观察图1中各项数据趋势，特别是其中反映升学心态的报名率的变化，可以将八十年代至今分为三期4个阶段（第三期有2个政策性阶段）。

1. 1978年至1998年：“读书的料”上大学

这个阶段高考的报名人数年均250万，本科上线率低于20%，加上专科的高等教育上线率均值是30%。高中的毛入学率虽然大

幅增长，但1998年之前都没有高过四成^②，适龄人口中只有少数会参加高考，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考虑要接受高等教育。能够考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凤毛麟角，被认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当时大学毕业“包分配”制度具有鲜明的精英教育属性。

由于当时国民经济水平不高，在初等、中等教育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是多数人的常规选择。18岁劳动力不从事生产本身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在中等教育后就业是多数家庭的选择。当然，随着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和适龄人口的相对减少，报名率稳步提升，到1998年最高点不过18%。

虽然高考报名是开放的，但要真正参与高考竞争的现实门槛很高。在当时能够上大学不仅意味着这名青年学术性才智出众，还隐含着家庭人口数与经济状况等背景条件。家庭能够供养得起他继续升学，又没有繁重的家庭劳动任务，如照料年迈和年幼的家人。可以说，当时的高考并没有实现全面筛选，有许多“漏网之鱼”。除非被长辈、学校和社会均认为是“读书的料”，才会得到支持去报名高考，能够为了能上大学供养子女“复读”的家庭更为稀少。

另一方面，当时没能上大学的青年中也不乏会读书、爱读书的青年，他们由于生活的负担或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升学。得益于近40年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才需求旺盛，此类人才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完全被埋没，凭着天生的才智能力和自强不

^① 中国的高考制度对报名年龄并不仅限于18岁，其中还包括了年龄更大的考生，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超过18岁而仍有意愿参加高考，从而升学的群体可以认为是广义的“复读生”，此外还有一些中职单招考生。

^②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高中全口径毛入学率为21.9%，一路增长至1998年为40.7%。

息的精神，一些人在多年后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取得了大学文凭，从另一条路径也取得了高教大众化的红利，获得了事业成功。

2. 1999年至2009年：独生子女争先搭上“升学电梯”

第二阶段随着1999年高校急剧扩招拉开序幕，直到2009年左右扩招速度减慢为止，人们的升学热情发生了明显变化。这10年间，高考报名人数从288万猛增至1020万，增幅达354%，本科实际录取人数与报名人数同步调增长，也实现了约350%的增幅，每年的本科上线率稳定在29%左右。2009年，本科录取326万人，加上专科录取人数，高教录取总人数为640万人。

这一时期的18岁人口先增后减，而报考人数有增无减。高校猛烈扩招得到了充分积极的报考响应，这种升学热情背后有其社会性动因。我国1980年开始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第一批独生子女在1998年满18岁。中国文化虽然历来崇尚考学出世，但过去多子女的家庭并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每一个孩子上大学，独生子女政策下，每一个孩子都成了家里唯一的希望。同时，本世纪初中国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从不到6000元上升到近3倍的1.7万元以上，越来越多的家庭摆脱了因经济条件制约而无法支持孩子上大学的困境。这些因素都强化了高中后继续升学的愿望。

自1998年起，报考大学的主体人群成了独生子女，恰逢高校扩招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考学难度不如

过去那样大，特别是1999年至2004年的落榜率显著较低。在几年之间，大学生不再是凤毛麟角，身边许多普通人只要努力、得要领，都有机会上大学。观念率先转变的家长着手拜师补课、针对性应试、支持复读、在扩招机会中找门路，其子女从中得到了显著的变革红利。入学门径也空前开放，2008年后，许多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大幅扩张，过去严守5%的名额限制拓展到“原则上不超过10%”，个别名校比例更高，降分幅度也可高达30分乃至60分。当一些看起来资质平平者也如愿上了大学、上了名校，其他家长更加意识到在经历结构性变化之时“抢跑道”的必要性。

这些现象进一步刺激了升学热情，报名率于2009年达到空前的高点。在大扩招的变革过程中，由于评价机制也处于摸索试点阶段，决定许多孩子能否上大学、能上什么大学的有不少机运成分，眼界、经济、社会权力、信息资源方面具优势的家庭更有能力帮助孩子抓住机会。^[7]和前一时期相比，这批高中毕业生可谓生逢其时，他们如能敏捷地把握住扩招机遇，就好像幸运地坐上了上升电梯，与自行走楼梯或止步不前的同龄人分道扬镳。

3. 2010年至2020年：竞争持续升温形成“高压锅”

2010年后，18岁人口数量连年减少，高等教育的扩招继续，而速度明显放缓。这一时期，前几年高考报名人数略有下降，2014年后又开始上升，2017年后增幅明显。另外，2019年开始高职大幅扩招，开启了新

一轮结构性增长。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至2020年图1中高考报名率曲线的变化,前5年,报名率先抑后扬,总体在48%上下。2015年后报名率从50%一路攀升至60%以上。在18岁人口显著下降的情况下,高考报名人数不降反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8岁人口中六成以上都报名高考,因为报名者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复读生,这反映出10年间人们对高等教育升学态度变化。因此,进一步划分2010年至2014年为第一阶段,2015年至2020年为第二阶段,即以报名率超过50%的2015年为分界。

在本期第一阶段,急速的扩招带来的副作用逐步显露,最直接的反映是毕业生总量在短时间内成倍增加,大学生就业压力剧增。大学毕业生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经济增长与结构提升的速度。大学生就业局面由过去的“卖方”市场演变为“买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面临失业危机。然而,这不能单纯地归因于高等教育总量过剩,因为经济产业界对专业技术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职位空缺和失业现象并存。由于人才培养模式与教育内容固有其传承的稳定性,高等教育机构难以在短期内根据社会需求改造教学定位,大学生的观念也大多停留于过去的大学精英的印象,就业期待与岗位现实差距较大。^[8]高等教育的扩张总体上有其积极意义,然而急剧的扩张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协调,造成了大学生结构性失业。

这种就业压力传导回大学教育阶段,便造成了“文凭贬值”观念,并进一步引起大学的学习变质。文凭贬值在消极的方面引起

了“读书无用论”^[9],一些就业受挫者怀疑高等教育文凭无法带来预期的高收益,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升学热情有所降温。在另一方面,人们发现过去大学生在初入就业市场上能享有的优厚待遇现在只有少数名校大学生才可能拥有。一些实证研究验证了人们的感受,在高教扩张前,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收入回报无显著差别,都显著高于高中教育,进入高教大众化时代,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内部做出区分,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回报差异大于大学与高中两阶段之间的差异。^[10]

于是,为了维持住一定的就业竞争力和经济上的收益优势,争取上一本、上名校的考学努力被激发起来。不接受仅仅取得一个普通高等教育文凭,而主动投身“地狱”备考模式,家里不惜“砸锅卖铁”、全力陪读,也要力争一个更好的大学文凭,此类现象在近10年越发多见。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可谓时代的缩影,该校以每年帮助成千上万的复读生考上更好的大学而著称。2010年后,在高考中分分计较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为了上个更好的大学而选择复读的群体愈发扩大,课外补习产业也越来越成规模。

本期第二阶段,图1数据显示,2015年起高考报名人数和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均不断上升,这与2010年以来的趋势保持一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总基调没有变化。不过,与前期数据趋势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适龄人口数降幅扩大,高考报名人数增幅又很明显,以至于图中高考报名率曲线呈现急剧上升^①,升学热情第二次高涨。起初,人们感

^① 当然报名者未必都是18岁人口,其中也包括了大量复读生,部分中职学生也会参加高考。

到上个普通大学不合算，不如不上，但局势很快发展到了不接受高等教育就难以找到工作的境地。^[11]根据特罗的高教大众化理论，随着扩招的推进，接受高等教育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难以轻易拒绝的普遍“义务”。

数据显示，2017年起，高考报名人数与18岁人口比值超过了50%。机会越开放，竞争越激烈，升学之路变得更加狭窄艰难。社会学研究有力地佐证了人们在升学过程中的体验，重点高中毕业生更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基础教育阶段是否获得优质教育对后续教育的路径分流有决定性的影响，教育机会具有明显的累积性优势效应，并且，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扩招进一步加大了差异。^[12]这就使得考试竞争不仅发生在高中，而是向前一阶段层层传递至初中、小学。随之，对学习功利化，以及只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应试教育弊病的批判成为了教育系统的全局性问题。在不断积聚的教育批判与考试改革的呼声中，2014年后全国高考政策进入了频繁的改革期，试点政策的更迭、招考规则的复杂化、从中央到地方教育信息释读的不充分^[13]等因素都在客观上使许多考生及家庭产生“改革性焦虑”，考生在面临选择时感到无比迷茫。至今为止，考试竞争的严峻气氛有增无减，不仅笼罩着每个考生，把背后的家庭都裹挟其中。

虽然自从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报名资格不问出身，始终向大众开放，但真正“高考竞争的大众化”到了2015年后才实质发生，其标志是报名率超过50%。随着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张、文凭贬值，以及高考的影响力扩大，学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然而，

竞争的目标资源，如优质高等教育、名校文凭、高端岗位等并没有实现与高教扩张等量齐观的改善和增长。高等教育的供给、大学文凭的效用、社会分层的结构和产业发展的进度都有各自的前进步调和内在规律，变革增值不可能如扩招般一蹴而就，这就形成了一种对有限资源与身份的剧烈竞争态势。至此，学校的教育考试系统几乎成了大众竞争“高压锅”。

二、适龄人口升学率与考生上线率： 高考功能应势而变

上节讨论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高教扩张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民众升学态度的变化，高考报名率为核心观测值。本节依旧针对这一历史时期，使用同样的原始数据，从另一个视角展开分析。

首先，图2中的折线定义为“高考升学率”，它是当年高考录取人数与18岁人口之比值，参考右侧纵坐标。这条折线反映了“扩招”的过程，也就是有多少比例的适龄青年根据高考的分配得到了高等教育升学机会。另一方面，以当年高考录取人数与当年高考报名人数之比值的百分制来定义的本、专科上线率及落榜率，在图2中以三种纹理区域表示，参考左侧纵坐标。这组数据代表着高考的选拔强度、分层功能，也就是这场考试将考生区分为怎样分布的三个层次。通过两组数据的同时段历时对比可以直观地看到高考总容量的变化与分层结构的变化。

1. 从“英才选拔”到“大众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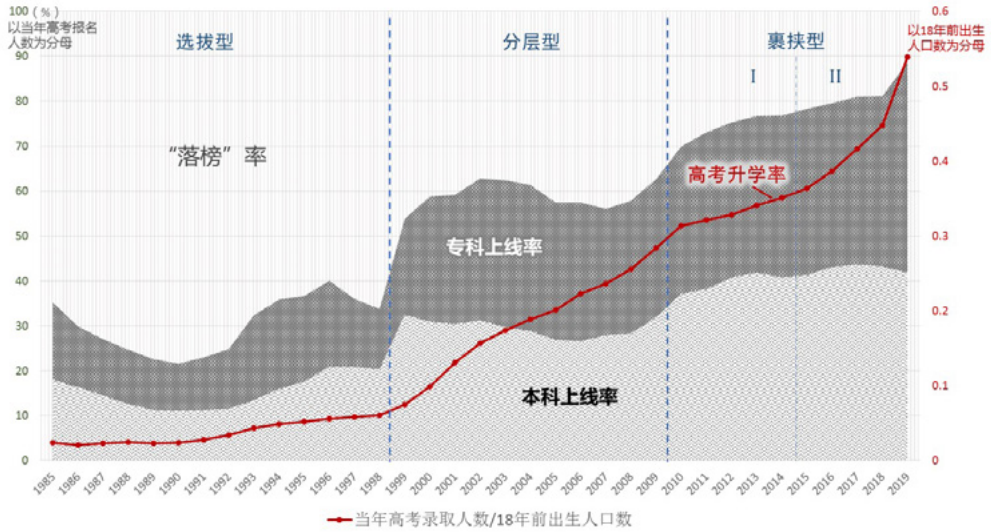


图 2: 扩招过程中高考筛选功能变化

图 2 可见，1980 年代至 1998 年，即前文所述的“读书的料”上大学时期，高考的基本特征是报名率低，上线率也很低，具有鲜明的选拔属性。高考在二三百万报名学生中筛选出更出类拔萃的 20% 进入大学本科，其次 10% 进入专科，淘汰 70%。这一时期考试科目较多，命题对于当时的学生总体水平而言有相当的深度、广度与难度，以至于分数上拉开了较大差距。因此，当时高考命题针对的是少数学术优势型学生。当时各科高分都很稀少。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能够凭借一两门科目取得高分，而其余科目仅有平均分左右，其总分仍足以进入国内最好的大学，作为“偏科”的拔尖人才，得以就读擅长领域的专业；也有一些学生各科成绩均衡较高，总分脱颖而出。这种选拔效能对两类优秀学生都较能够识别招录。

1999 年至 2009 年，高考报名人数大幅增加，前文所述的第二个阶段（独生子女搭上“升学电梯”），从适龄人口的 14% 增长

至 45%，十年间高考的相对受众容量扩大 3 倍。同时图 2 可见高考升学率也猛增近 5 倍。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8 岁适龄人口数在 2000 万至 2500 万的区间内先增长后减少，虽然报名率和升学率双双连年大增，但是每一年高考考生中本科上线、专科上线和落榜生的比例大体稳定在 3:3:4。

从 300 万考生中遴选 100 万人达到本科线以上，到从 1000 万考生中遴选 300 万达到本科线以上，看似筛选的比率差别不大，但必须注意到 300 万和 1000 万的基数含义大不相同。扩招前的 300 万考生并非随机产生，而是同龄人中在初高中里成绩较优，家庭条件较好，更有学术能力与学术追求，也被家庭、学校和社会赋予更大升学期许的群体。至于 1000 万人的基数则已经超过我国近年 18 岁人口数的一半以上，新增的 700 多万考生群体并不会均匀地分布于各个分数段，而是相对集中于较低分段（相比 300 万考生规模时）。所以在这个扩张过程中，高

考的实际功能发生了质的转变，过去需要高考发挥“英才选拔”功能，2000年以后则越来越服务于“大众升学”的目的，筛选机制势必发生“重心”下移。

那么高考的内容、筛选的方式实质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这十年中，一本、二、三本和专科都发生了大幅扩招，而18岁人口有增有减，扰动不太大。首先推论，如果命题难度维持不变，且历年学生学业水平总体稳定，那么为了实现扩招，在高考总分不变的省份，主要分数线都会相应降低以便录取更多学生。事实上通过统计历史数据可知，1999至2009年，高考不仅维持住了本科、专科、落榜大致3:3:4的分层功能，多数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也大体维持在了一定的区间水平，一本线和二本线几乎略有上升，仅专科线有所降低。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提出三种猜测：一种可能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教学努力，我国18岁人口的学业水平发生了全面显著提升；第二种可能是，高考整体命题难度显著降低，以便更好地区分庞大群体而非较优秀的小群体；第三种可能是，有较大规模的学生没有通过高考统考，而得到了高教入学机会，或凭借大幅加分入学干扰了分数线。三种可能的变化对应的教育现象，其一是真正的教育提质升级，其二是高考本身选拔性减弱，作为“指挥棒”所代表的学业内容与标准的下降，其三则是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一系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对高考统招制度另辟蹊径式的双轨制改革探索。

回看这段历史现实，有理由相信以上三种情况都发生了。第一种变化无疑是最令人

乐见的，不过基础教育的全面提质依赖教育规律，总是发生得缓慢而艰难，不可能完全适应急速扩招的步伐，第二、第三种变化则属于为了快速实现高教大众化，高考制度所付出的改革成本，放权。高考悄然地完成了命题难度降低与筛选功能的转型，从只关注遴选少数学术精英苗子的选拔性考试，转变为“大众的高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急剧的高教扩招中，纵然高考看起来还是那个“高考”，教育和考试体系的实质却已然改变。

2. 普惠性增强，选拔功能钝化

在急剧的教育扩张要求面前，高考逐渐演变为“大众的高考”，包括使命题定位更加标准化、平易化，在考试技术和组织手段上适应了超大规模下的实施保障和公平监管要求，还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倾斜性的优惠等。应该说，这些只是使高考能够顺利地容纳更多考生，体现了教育机会分配的普惠性，但是这种静态的“大众化”没能首尾相顾，不足以使高考积极地统领教育系统。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考命题的普惠性变化，以河北省理科为例，根据其历年高考的一本、二本、专科等几条分数线做出图3。其中，为了表示最高层次的选拔要求，采用历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在河北省的理科录取分数线的平均值来做出最高的分数线，下文简称“清北线”。由于河北省近20多年的高考始终采用全国一卷，满分为750分没有变化，具有较好的历时稳定性。河北省高等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然而民众向学传统深厚，因而考试竞争尤为激烈，产生了衡水中学等高考名校，因此以该省为分析案例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从下往上依次观察，图3中以2010年为界专科录取分数线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此前在300分至400分之间移动，此后大幅下降至200分。750分满分的考试中得到200分的得分率仅为27%，而高考各科命题中都有相当的分值是用来检验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的，200分意味着掌握基本知识方面存在明显疏漏。这条分数线近10年几乎没有随历年命题难度的波动而变化。^①综合这些情况来看，200分看似为“门槛”一般的分数线，实则是降无可降的合格线。分数线定在200分意味着这项考试对专科入学而言已经没有了筛选功能，决定入学与否更多取决于学生的意愿——他是否愿意完成最基本的学习任务，愿意参加完考试，报到入学。从录取分数线演变为准入合格线，说明2010年后专

科文凭在社会上不再具有相对的符号优势。

对学生而言，这种高等教育学历的价值更多在于受教育、涨技能本身，而再不能够满足人们借此出人头地的进取心。可见在高教扩招过程中，首先丢失选拔性的是专科教育。

其次，以2014年为界，此前一本分数线基本平稳，二本线略有所下降，此后，一本、二本线显著大幅下降，二本线的下降幅度之大，与五年前的专科线大有同步趋势。在高教进一步扩张而适龄人口显著下降的大背景下，2014年以后，一二本分数线难以维持在原先的分数段而大幅下跌，说明高考全国卷维持一定的命题难度的前提下，又要保证足够数量的招生录取，呈现的结果便是降低分数线。录取分数线的大幅下降意味着更多考生得到了继续升学的机会，体现了普惠性，同时也暴露了扩招中大学生源质量的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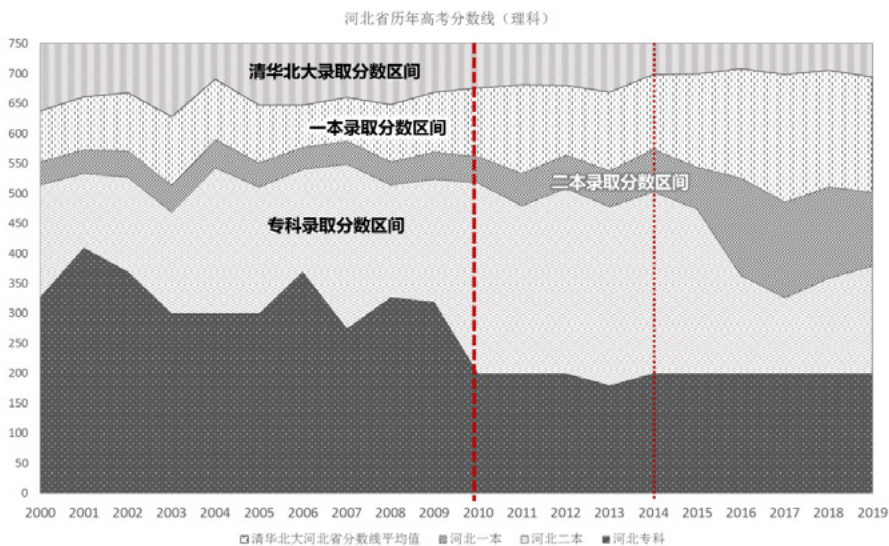


图3：河北省历年高考分数线（理科）

^① 除了2013年减低到180分，当年试题难度明显偏高，其余几条分数线都有所降低。

更值得关注是图3的上部,近20年来在顶尖高校招生数大体稳定的前提下,“清北线”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近5到10年间上升了近50分。2015年以来每年超过700分的都有数十人,他们离满分仅一步之遥。大量高分考试、接近满分考生的批量出现意味着这项考试在高学业挑战度方面的区分度已经非常低,没有足够的难题来识别选才。确实,大众化高考对命题的要求是题型标准化,第几题考哪一部分知识点几乎是固定的,出题涉及的知识范围受到教学大纲严格约束。要避免“偏”、“难”、“怪”题,不能太过灵活机巧,出题“超纲”会成为一种失误,因此考题的平庸化势所难免。

这种局面非常不利于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对才智出众,基础扎实的学生而言,没有足够的难题来展露才华,能够应接高挑战的才智潜能无用武之地,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避免在丢分上跟自己较劲,久而久之消磨了锐气,把自己训练成在较低难度水平上快速精准答题的机器人。在高考统招制度下,顶尖大学空有形式上“优中选优”的优势,却受困于平庸的大众化命题,实质上已经丧失了灵敏有效的选材工具。

目前的高考高分更多体现为在才智中上的群体中精选那些更加谨小慎微、按部就班或者更有运气的学生。高考分数难以告诉我们在才智优良的前20%的考生中,谁才是更有潜力肩负国家前途、影响人类命运的1%。同理,所有特长都难以显露,各科均接近满分的分数无助于识别某些学生有强烈倾向性的才华特质。大众化的高考命题无法识别前文描述的早期那种“偏科”的拔尖人才,学

科竞赛因而成为别无他选的关键性补充。然而,由于全社会缺乏其他支撑性、辅助性的识别选拔机制,学科竞赛等又被泛化为大众竞争。

3. 社会性考试厌倦的产生

对当前学校教育 with 考试体系反感的并不只是参与其中的学生,招不到拔尖学生的高校,还有大量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成功人士。常见的公共讨论中,一些人认为教育考试“越改越乱”“不如回到过去”的想法,另一些人认为整个体系有问题需要彻底变轨。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学校经历和社会阅历都从来没有被如此深深地卷入考试竞争,两种观点都折射出成年人在情感上对高教大众化背景下现行学校教育体系运行规律的不适应。中国高教扩招之迅猛,情势在一代人之内发生了骤然的变化,父母辈的经验已经不起作用,更不用说祖父母辈。

原本属于成人的漫长的社会竞争被急剧地挤压、提前到青少年阶段。家长中流传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之类的言论常常遭到“反教育”的批评,其中却也不乏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的洞察,学校教育的终点成为了步入社会竞争长跑的起跑线,带着怎样的学历背景进入社会,作为成人的人生道路起点完全不同。^[14]当社会竞争越激烈,贫富差距越大,家长就会越重视教育竞争^[15],而教育竞争本身也有显著的积累效应,前一阶段的优势能够被后一阶段放大。于是,成人的竞争焦虑与不安一路传导到教育的最初阶段,恨不得在小学、初中就决出胜负。

市面上产生流行起两种南辕北辙的教育

观念：一边是守候成长静待花开，一边是争先恐后“抢跑道”。本着为孩子负责的态度，高度理性而冷静的家长不得不要求孩子在本应探索、试错、发展自我的成长阶段就参与到成人化的、不近人情的竞争中去——现实中的两难处境使成人倍感愧疚。（然而，这种教育上的异化现象问题并不出在学校教育本身，甚至也不是考试造成的，而是社会竞争提前所带来的。）

另一部分人对考试竞争的直觉式反感在于其酷烈程度超过了成人的社会竞争。人生历时漫长，结果不易辨认。生活的丰富多样，社会的复杂多元为人生航程提供了宽容的避风港。相形之下，学校里的学业竞争胜负分明，分数排名清晰苛刻，选拔考试残酷无情。从积极的方面讲，它锻炼了学生勇于拼搏，不怕失败等坚毅的意志品质，免于娇惯柔弱；从消极的方面讲，学生容易不堪重压，垂头丧气，情绪萎靡，精神枯槁。

可见，假设考试制度和考试命题内容都没有改变，人们看待考试的情绪也会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张而发生转变。考试厌倦不仅仅是考生的个人情绪，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观点。

三、从社会变迁认识教育考试问题

近几年的教育考试改革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共识。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社会反应强烈的教育与考试中存在的弊病，如“一考定终身”“学习负担过重”“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等，多数改革方略便专门针对

这些问题来提出对策。然而，正因为高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性制度，局部对症的方式不仅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还会因忽视整体而使为了解决问题的举措背离体制，造成制度内在的矛盾冲突，制造始料未及的新问题。本文提出，与其从弊病或理念入手，不如回到社会现实并通观全局，试问：我们的教育与社会生态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发生了怎样的变革？新形势对考试制度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1. 学业竞争大众化

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高考制度全面左右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这一点十分特殊。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考能够不问出身，从基层拔擢才智突出者。由于机会稀少，竞争没有扩大化，许多青年的才智潜力没有被针对性地充分发掘，还有许多青年由于家庭经济限制而主动放弃升学道路。当时能上大学固然很好，上不了也不代表某种失败，考试升学不至于成为唯一的成功途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竞争是逐步展开的，往往要到成人以后，在工作岗位上才显露高下分殊。

到了高等教育急速大众化的阶段，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扩大与经济高速发展中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同步发生，而高考继续承担着大规模升学机会分配的关键责任。上大学被认为是一种具备中上才智水平者通过努力可以把握的优势机会，也是一条相对能够避免坑洼崎岖的人生坦途，通过早期努力取得学业竞争优势，能够为后续社会竞争占据先机。这种观念逐渐被事实验证为一种明

智的预判。这种经验判断在发达国家早有理论阐释。吉登斯在《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刻画出西方产业社会形成了上中下三层，三阶层分别对应占有生产资料、教育或技术，以及体力劳动三种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16]。2000年以来，进取的普通人得以通过掌握教育或技术成为中产阶级，这条形式上绝对平等竞争的渠道正是超大规模的高考制度赋予的。

此后，随着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几乎所有人的青少年时期都在学校里渡过，学校教育成为了所有人的筛选装置，学校教育的优势积累效应变得越发显著，社会各行各业的选人用人都比过去更看重学历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在早期的学校教育选拔中没能占据优势地位，后续就越来越难以“翻盘”，学校中的“掉队者”要在日后“逆袭”成功（成为中上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高教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恐怕不可逆转。现代学校最大限度地支撑并拓展了人类理性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发达的产业社会无不高度倚重学校教育的筛选机制和培养成果。学校教育的整体性扩张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前文论证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同时带来了学业筛选的普遍化。

要成为未来的成功人士、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才，是否必须首先在学校教育中脱颖而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未必”变成“必然”在中国大约只花了10年时间。社会的骤变令人措手不及，激烈的考试竞争令人望而生畏，“读书无用论”和考试批判论迎合了某种侥幸心理和旧观念，当一些人还在反思学

校教育、书本知识与考试筛选背离了“真正的教育”，社会结构已经快速地从混沌无序发展成层，成为社会精英之路眼看着就被学历精英所垄断。

2. 前置社会性分流消失后的改革要求

在不“反智”、不放弃严格的公平竞争与起点机会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学业考试竞争无可避免，而教育机会的大众化又造成学业竞争的大众化。人人都要经历学业筛选的时代已经到来。问题在于，学业筛选的普遍化不只意味着扩容筛选量，而要通过全面立体地理解变化，把握发展态势，积极构建新的筛选机制。

因而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力主推进高考改革的动因不应简单归于这项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事实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而是在社会快速的发展中，要使教育考试系统驾驭住新的局面：高考要从为精英教育体系提供竞争机会，转变为支撑起大众教育体系并容纳精英选拔所必须的竞争。

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高考的存在并不像今天这样全面支配大众的基础教育。曾经，在有限的学校教育机会，拮据的家庭经济条件，以及人口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综合作用下，18岁人口在高考前就实现了自然或自觉的分流。虽然90年代初有“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说法，其所谓“千军万马”描绘的还是精英教育系统中的学业竞争，毕竟当时的“报名率”不到15%。可以说，那时的高考实质上并不是大众化的高考，考试竞争的压力也没有过度泛化。随着学校教育普及，家庭子女人口减少，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特

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每年参与高考的人数超过18岁人口数的一半，并继续不断攀升。目前除了中考，全体系没有其他分流机制像过去那样在高考之前率先完成分流，也就是说，前置的社会性分流的消失，标志着高考竞争的大众化^①。

由于参与高考且被高考决定升学去路的学生人数极为庞大，高考不得不承担起超大的社会责任，也就不得已地成为了裹挟全民，迫使人人都要在试卷里先分出高下，影响笼罩全部基础教育历程的“利维坦”。结果，多数人从小的学习便不得不以此为指归，一切难以落实为高考分数的，哪怕十分有益的教育和学习都成为不必要的。于是“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考试本身也为了适应大众需求发生质变，选拔功能钝化，筛选效率大打折扣，导致在当前人们的观念里，高考要维持“公平”的价值就会与“高效”的优势构成矛盾。^[17]

通过前述历史分析可以推断，作为基础教育“指挥棒”和人才“筛选器”的高考存在一个有效容量区间，大幅扩容或者说威胁到高考的效能，表现为“高考竞争大众化”。由于基础教育升学机会的开放和高教大众化，前置的社会性分流几乎消失。那么，现阶段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重构我们的教育考试升学系统，使每个人的学业竞争都限定在必要的限度和范围之内，从而避免竞争的彻底泛化：即每个人与每个人在所有学习阶段展开竞争，以至于在竞争中耗尽学生时代。以及，对于必要的学业竞争，能否通过考试形式与命题的优化放大其对国民素质的

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的无序蔓延？

四、“新高考”：构建宽严有界、一体多径的升学系统

过去，“一考定终身”的提法往往被个体化地解读，用于反映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被高考所左右的焦虑情绪。暂且不论这种焦虑是否存在部分正当性，在尝试了多种改革试点后我们发现，只要考试结果“说了算”，不论是“多次考试”“选择性考试”还是“复读”，都不可能解决这种焦虑，甚至还会放大竞争性弊病。同时，在历次改革中，考试公平得到了一贯的坚持，公平性保障得到不断的加强。可以说，教育机会的分配由考试结果所决定，这构成了中国高考制度与高考精神的本质。^[18]

关键在于，“一考定终身”所揭示的改革动因不能只从个体感受层面来理解，它真正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如果存在前置的社会性分流，“精英教育社会”的高考可以是高等教育入学前的一次考试。当教育机会开放消除了社会性分流，那么要能够驾驭“大众教育社会”的高考却不能只是那一次，还要为大众的教育需求开辟更加多元的升学路径。更重要的是，如果充分理解了“大众教育社会”的本质，就会意识到改革成败将取决于教育系统能否恰当地为各阶段学业竞争设置边界，从而扭转教育系统在扩张中因无序扩容接纳而造成的边界模糊、目标混淆，两两相害。

至此小结，高考改革的目标与挑战可以

^① 本文将“高考竞争大众化”的数据标志设定为“报名率”>50%。

明确为：构建起兼容“英才选拔纵向分层”和“大众升学多元适配”两种功能定位的考试升学系统。前者要求严格的选拔性考试与代表国家教育指挥棒的统一性，后者诉求宽容的普惠性考试与多元适配的路径选择。成功的“新高考”改革将成为这套“宽严有界、一体多径”系统的总称。

眼下，由于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强化，市面上杂多的考试竞赛受到清理和约束，自主招生、特长保送生等制度有待开启改革的新一页，政策应致力于如何在一个“大众考试竞争社会”中为拔尖创新人才“冒”出来提供机会，开辟通道。^[19]当前的教育体系迫切需要政府力主扩大广义上的选拔供给，让更多元的才能、多样的需求都能在公平的舞台上展露出来，既可以为高考在早期实现“硬分流”，也可以向学生家长和学校释放信号，调整预期，避免学业竞争大众化趋势带来的选拔性压抑。

本文的建议与未关注到大众化结构性变革的策略之间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强调要使一个教育体系包容两种性质迥异的升学路径，能够依据社会民情和经济技术条件设置通路与边界。“先粗筛，后细筛”^[20]便是据此初步提出的一种改革思路。

总之，在大众教育社会的转型中，高考改革需要全局性的举措，有赖于国家考试主管部门、基础教育界与社会一起，共同再造适应新局面的教育选拔与分流机制，从基础性的选拔与分流制度供给入手，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机会与发展途径，这将成为中国教育治理能力的最佳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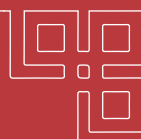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1] 郭大光.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与马丁·特罗教授的对话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3(06):6-9.
- [2] 董秀华, 王洁, 王薇, 赵亚君. 新高考改革的政策初衷与实践挑战: 由高校人才培养视角反观 [J]. 复旦教育论坛, 2020,18(02):72-78.
- [3] 郑若玲. 再论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侧重谈对高考改革的历史借鉴 [J]. 江苏高教, 2020(01):31-37.
- [4] 吴愈晓.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 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4):18-35.
- [5] Raftery A., M. Hout.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66).
- [6] 刘海峰. 跌宕起伏: 中国高校招生考试70年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40(11):9-22.
- [7] 刘精明. 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 1978 ~ 2003 [J]. 社会, 2006(03):158-179+209.
- [8] 钟秋明. 我国当代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研究 [D]. 湖南大学, 2015.
- [9] 谢爱磊. “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7,15(03):92-108+190.
- [10] 周扬, 谢宇. 从大学到精英大学: 高等教育扩张下的异质性收入回报与社会归类机制 [J]. 教育研究, 2020,41(05):86-98.
- [11] 范皑皑, 丁小浩. 谁的文凭贬值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视角下的过度教育问题研究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3,33(17):7-14.

- [12] 吴愈晓.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J]. 社会学研究, 2013, 28(04): 179-202+245-246.
- [13] 鲍威, 金红昊, 肖阳. 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 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05): 39-48.
- [14] 岳昌君, 张沛康, 林涵倩. 就读重点大学对人工智能就业替代压力的缓解作用[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02): 2-15+126.
- [15] [美] 马赛厄斯·德普克 [美] 法布里奇奥·利博蒂. 爱, 金钱和孩子: 育儿经济学 [M]. 格致出版社, 2019: 3.
- [16] Anthony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75, 107-108
- [17] 宁本涛, 邱燕楠. 新高考制度改革如何破解“公平与效率”困局?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0, 38(10): 1-5.
- [18] 陆一. 大道至简: 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 [J]. 中国改革, 2018(3): 76-79.
- [19] 陆一, 朱敏洁. 美国的“少年班”何以成立: 一种高选拔适度竞争的英才教育路径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9).
- [20] 陆一. 先粗筛后细筛效果更好 [N]. 文汇报, 2015.6.29.



学者报道





2022年12月10日至11日，由文研院承办的第十九届北京论坛分论坛“文明的交界面：生态与族群的历史反思”在线召开，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语文学、考古学等不同领域的十余位中外学者共聚云端，就“文明研究的谱系”“欧亚大陆的流动性：人和物”“文明的走廊和腹地”三个主题分别展开研讨与交流。



11月，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新著《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新著《史前文化与社会探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日前，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黄晓春力作《当代中国治理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0月，文研院第二期邀访学者、著名书画理论家@傅申先生多年来聚焦黄公望的重要著述结集《黄公望研究》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文研院第五期邀访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调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近日，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访学者、中研院史语所通信研究员@王明珂调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学者报道 @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0月，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新著《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付梓出版。“本书的重点，是通过案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途径，也讨论如何既把中国史放在亚洲史的大背景中，又从中国角度观察周边，进一步通过中国、东部亚洲海域、整个亚洲，理解历史的交错、联系和融汇。”



10月，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的《西方近代早期政治哲学的起源和形态》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6月，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译著《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举办菊生论坛“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秦汉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6月，研讨会论文集由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主编为《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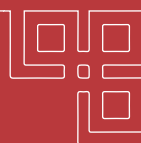


文研院学术委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谢宇荣获“2022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亚洲和亚裔美国人领域贡献奖”。

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程苏东荣获“2022年度霍英东青年科学奖”。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04

2022-10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前往校史馆，参观“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 115 周年学术纪念展”，院长邓小南和院长助理韩笑作讲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生命科学学院、人文学部、社科部、学科办等单位的部分老师共同参观。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虹教授一行到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交流近期关注的学术话题。

文研院举行文研六周年纪念雅聚，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部分工作委员会委员、未名学者参加。

06

2022-10

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到访文研院，与院长助理韩笑商议落实北京市内学术考察的具体路线和安排。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交流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万海松领读俄国著名文学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同期邀访学者孟宪实、王振忠、潘光哲、Enrique Stephanus Dussel、孙卫国、金以林、应星、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张小刚、徐欣、李成晴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咎涛教授、庄宇助理教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交流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主任王奇生教授到访文研院，与邓小南教授交流邓可因女士相关资料清点情况。

07

2022-1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顾涛到访文研院，院长邓小南简要汇报了文研院工作情况。

“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第二讲、“北大文研讲座”259 期“在田野中发

现历史：以南宋墓葬为例”在线上平台举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刘未评议，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正贞主持。

“静园雅集”第30期“苏非诗歌赏析”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沈一鸣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咎涛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映虹教授、王一丹教授、张恣煜助理教授、施越助理教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上海音乐学院徐欣研究员参加活动。

09

2022-10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宪实教授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宋辽金史方向研究生开设读书课，介绍其治学经验。

10

2022-10

“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首讲，“北大文研讲座”第260期“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主持。

11

2022-10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作题为“东亚海域史视野中的徽商与长崎贸易”的报告，同期邀请学者孟宪实、潘光哲、Enrique Stephanus Dussel、孙卫国、金以林、应星、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及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10月11日至11月7日，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文研院组织、参与各项主题学习活动，开展集体学习教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参加教育部直属系统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分别在办公楼礼堂和百周年纪念讲堂观众厅参加北京大学学习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文研院组织全体教职工参观“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北京大学改革发展十年成果图片展”“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

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和“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此外，文研院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随同社会科学部党支部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参观“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北京大学改革发展十年成果图片展”；参加社科部党支部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线上集体观看活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线上集体观看活动、圆明园集体参访党日活动。

12

2022-10

“文研经典阅读”第五期“王权中的正统论与神秘论”第三次活动在静园二院 201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刘寅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若干师生参加。

13

2022-10

“北大文研讲座”第 261 期“中西交汇于澳门：葡萄牙人东来与海上丝绸之路”在线上平台举行，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研究员金国平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本次讲座为文研院“西方知识形态在中国”系列活动第七场。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内部交流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 111 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万海松研究员谈“我为什么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成晴副教授谈“我为什么要研究‘集部之学’”，同期邀请学者孟宪实、王振忠、潘光哲、Enrique Stephanus Dussel、金以林、应星、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张小刚、徐欣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交流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夏红卫、副总编辑张凤珠一行到访文研院，商议“文研书系”出版工作后续安排，文研院院务会全体成员及相关工作团队参加。

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张静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苗润博助理教授到访文研院，与邓小南教授商议邓广铭先生手稿资料捐赠后续工作安排。

14

2022-10

“北大文研讲座”第262期“不列颠想象中的意大利园林”在线上平台举行，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荣休教授 John Dixon Hunt 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张剑葳主持，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教授唐克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晨，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溪参与讨论。

15

2022-10

由文研院支持，武汉各期邀访学者发起的“文研学者论坛”第一期在武汉江夏梁子湖畔举办。文研院第一期邀访学者魏斌，第二期邀访学者吕博，第三期邀访学者胡鸿，第六期邀访学者狄金华、鲁家亮，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刘清华、陈文龙、杜华以及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学者古丽巍、彭剑、吴帆、薛梦潇参加。论坛为期两天，以学术报告和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形式举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分别在线上进行了简短发言。

18

2022-10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院 Enrique Stephanus Dussel 教授作题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为例”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孟宪实、王振忠、潘光哲、金以林、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吕晓宇，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19

2022-10

“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第三讲，北大文研讲座 263 期“寻觅古城址：田野考察的方法与实践”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主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靖国评议，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主持。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支持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91 期“中国与全球发展治理”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陈沐阳主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评议，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归泳涛主持。

20

2022-10

由文研院组织发起的“文研漫谈会”第六场活动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吴靖远，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田天，哲学系助理教授陆俏颖，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闫梦梦、陈瑞翔，法学院研究员吴洪淇，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朱琼，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石凡奇，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章永乐及文研院院务会全体成员参加活动。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唐克扬研究员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作题为“塑造学问之家”的内部讲座，同期邀访学者孟宪实、王振忠、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以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与交流。

21

2022-10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及“知识分子”公众号相关负责人到访文研院，商议本年度合办“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坛的后续工作安排。会前，科技医史系教职工参观了“清流汇聚，沃土深耕：我们的北大文研院”展览。

22

2022-10

由文研院发起组织的北京市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术考察首次活动举行，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访了北顶庙、西顶庙、凤凰咀（金中都城墙遗址）、鱼藻池、中顶庙和辽金城垣博物馆。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鞠熙，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十三期邀访学者 Enrique Stephanus Dussel、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以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同参加了考察。

24

2022-10

“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第二讲，“北大文研讲座”第 264 期“齐家——农耕文明的基础制度和制度基础”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主讲，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主持。

25

2022-10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上海音乐学院徐欣研究员作题为“‘活态的历史’与‘关联的历

史’——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编纂的视角与个案”的报告，同期邀请学者孟宪实、王振忠、潘光哲、Enrique Stephanus Dussel、金以林、应星、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李成晴，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刘彦玲副教授，中国音乐学院齐琨教授、萧璇副教授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编审李凌静到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交流未来在出版工作方面的合作意向。

26
2022-10

“文研经典阅读”第五期“王权中的正统论与神秘论”第四次活动在静园二院 201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第四期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孙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刘寅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若干师生参加。

“北大中国史”筹备小组会议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荣新江教授、王奇生教授，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及三联书店编辑孙晓林、杨乐、冯金红参加。会后，三联书店一行前往校史馆参观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 115 周年学术纪念展”。

27
2022-10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内部交流会（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举行。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唐克扬研究员作题为“我为什么研究空间的历史和实践”的主题分享。同期邀请学者王振忠、潘光哲、Enrique Stephanus Dussel、金以林、应星、赵晓力、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交流会。会后，唐克扬研究员引导邀请学者共同寻访校内古建遗迹，探索百年燕园的过往与未来。

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和文研院共同主办的“北大文科创新讲坛”第六期“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型与创新”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评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章永乐副教授主持。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支持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92 期“法国 18

世纪的‘沙龙’：艺术批评与公共空间”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程小牧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评议，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高冀主持。

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一行前往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与科技医史系相关负责老师商议本年度“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筹备工作。

28

2022-10

文研馆系列（“文研书系”定名）出版首次定期工作会议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夏红卫、副总编辑张凤珠、相关图书负责人徐丹丽、张晗等编辑，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出版工作团队成员参加。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Hans van de Ven，历史学系系主任王奇生到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商议未来举办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等合作计划。Hans van de Ven 教授参观了“清流汇聚，沃土深耕：我们的北大文研院”展览，并与部分在院的第十三期邀请学者进行简短交流。

29

2022-10

“北大文研论坛”第 169 期“多视角看基层社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论坛持续一天半时间，与会学者包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侃理副教授、苗润博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智涛教授、崇明副教授、徐冠勉副教授、毛亦可副教授、王璐副教授、杨坤副教授，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林丽娟副教授、吴靖远副教授、陈莹雪副教授、李文丹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史阳副教授、张宓煜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副教授、凌鹏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新刚教授。

由文研院发起组织的北京市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术考察第二次活动举行，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访了大都路总管府（顺天府大堂）、元太庙（恒亲王府）、万宁桥、万宁寺、白塔寺、砖塔胡同、元社稷坛、天宁寺，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第十三期邀请学者王振忠、应星、唐克扬、万海松、徐欣、李成晴，第三期邀请学者华 ，第九期邀请学者

李鸣飞以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同参加了考察。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并致辞。

31

2022-1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顾涛及历史学系学生党员共同前往校史馆，参观文研院主办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 115 周年学术纪念展”，院长邓小南教授作讲解。

10 月 31—11 月 3 日，院长助理韩笑参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召集的西山永定河流域田野工作坊。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Joseph McDermott 因病逝世。

01

2022-11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作题为“蔡元培学术的日本渊源：以《中国伦理学史》为中心”的报告，同期邀请学者孟宪实、王振忠、Enrique Stephanus Dussel、金以林、应星、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第六期邀请学者熊春文、赵妍杰，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副研究员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参加了报告会。

03

2022-11

由文研院组织发起的“文研漫谈会”第七场活动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王逊佳、成沫，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赖华夏，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张洪谋，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谢雯，教育学院副教授黄晓婷，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莫家伟及文研院院务会全体成员参加活动。

04

2022-11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徐华烽副研究馆员一行到访，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录制视频，并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进行简短交流。之后，徐华烽一行前往校史馆参观了正在举办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 115 周年纪念展”。

05

2022-11

由文研院发起组织的北京市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术考察第三次活动举行，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访了孔水洞万佛堂、金陵遗址、大石窝、琉璃河博物馆

及考古工地。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孟宪实、潘光哲、金以林、赵晓力、张小刚，第三期邀访学者华喆，第九期邀访学者李鸣飞一同参加了考察。

06

2022-11

由文研院联合校内单位共同主办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圆满闭幕。

08

2022-11

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到访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汇报了文研院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一阶段学术出版的工作计划。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应星教授作题为“从‘五湖四海’到‘万流归一’”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孟宪实、王振忠、Enrique Stephanus Dussel、潘光哲、金以林、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圣民到访，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交流近期学术研究心得并参观“清流汇聚，沃土深耕：我们的北大文研院”展览。

09

2022-11

三联书店编辑冯金红、钟韵到访文研院，与院务会商议出版项目后续合作事宜，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和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研究员也参加了交流。

10

2022-11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交流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111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宪实教授谈“我为什么研究敦煌民间结社和武则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研究员谈“我为什么成为‘史料控’——最近十年的工作交代”。同期邀访学者王振忠、潘光哲、



应星、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第六期邀请学者赵妍杰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交流会。

美国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包华石 (Martin Powers) 及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副主任蒋人和 (Katherine Tsiang) 到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商议未来合作举办学术活动的计划，并和正在进行内部交流会的第十三期邀请学者作简短交流。

11

2022-11

文研馆系列出版第二次定期工作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凤珠、相关图书负责人徐丹丽等编辑，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出版工作团队成员参加。

“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活动第 21 期“写刻转换与文集生成”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斐和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成晴主讲，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司聃，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董岑仕，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张学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与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

12

2022-11

“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第四讲、“北大文研讲座”第 265 期“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田野研究——田野与理论的互动”在线上平台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主持，社会学系凌鹏助理教授在理科五号楼会议室组织师生集中观看了讲座。

13

2022-11

“北大中国史”撰稿工作推进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丛书作者朱凤瀚、陈苏镇、陈侃理、胡鸿、邓小南、苗润博、张帆、赵世瑜、尚小明、荣新江、唐晓峰、韩茂莉、郭津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王奇生、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赵冬梅，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及三联书店编辑孙晓林、冯金红参加会议。

14

2022-11

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与第十三期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金以林研究员商议“东厂胡同与北大学人”展览筹备事宜。

15

2022-11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Keith Woodward 教授作题为“Affective Passing: Social Theories of Feeling and (Self) Deception 情动 / 通行：关于感觉与（自我）欺瞒的社会理论”的报告，同期邀请学者孟宪实、王振忠、Enrique Stephanus Dussel、潘光哲、金以林、应星、赵晓力、唐克扬、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文研院第一期邀请学者罗祎楠及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16

2022-11

因校内 1 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自 11 月 16 日 7 时起，学校严格实行“非必要不入校”“非必要不出校”临时管控措施。文研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 24 小时在校值守，保障疫情防控和邀请学者项目相关工作正常展开。

20

2022-11

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相关精神，文研院院长邓小南紧急召开院务会会议，就未来一周及期末前各项学术活动、邀请学者项目和工作团队到岗值守等工作作出初步安排。

22

2022-11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敦煌研究院张小刚研究员作题为“添枝加叶的历史传说——历史政治和宗教传播视野下的刘萨诃故事的演变”的报告，同期邀请学者孟宪实、王振忠、Enrique Stephanus Dussel、潘光哲、金以林、应星、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徐欣、李成晴，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副主任 Katherine Tsiang 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文研院第九期邀请学者通过线上平台雅聚，交流近期学术研究进展，商议河西考察报告出版后续工作，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及河西考察团成员，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黄盈盈参加。

根据全校中层干部大会暨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相关精神，院长邓小南召集院务会会议，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再次 24 小时在校值守，

不进不出，保障防疫工作和邀访学者项目正常展开。

23
2022-11

由文研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北大文研读书”第39期“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在线上平台举行。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王裕华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参与讨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主持。

24
2022-11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交流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院的 Enrique Stephanus Dussel 教授谈“我为什么研究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动”，清华大学法学院赵晓力副教授谈“我为什么要研究家庭法”。同期邀访学者孟宪实、王振忠、潘光哲、金以林、应星、唐克扬、Keith Woodward、万海松、张小刚、徐欣、李成晴，第六期邀访学者赵妍杰，第十期邀访学者余旻，第十二期邀访学者欧树军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交流会。

25
2022-11

“北大文研讲座”第269期第一场“伊斯兰印度的历史”在线上平台举行。瑞士洛桑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南亚伊斯兰研究教授布莱恩·奥尔（Blain Auer）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参与讨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恣煜主持。

“史记的考古学解读”丛书出版工作推进会在线上平台举行，丛书作者魏继印（夏本纪），张渭莲（殷本纪），种建荣（周本纪），谢尧亭（晋世家），段振宏（赵世家），武家璧（历书），游富祥、田天（封禅书），梁云（大宛列传）及文研院院务会全体成员，三联书店编辑冯金红参加会议。各部分作者围绕个人写作思路与计划做了报告和交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王奇生教授、朱玉麒教授、郭津嵩助理教授到访文研院，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和在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雅聚，商议后续共同举办学术活动的相关计划。

北京大学官网首页头条刊发关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的专题报道“邓小南老师的一堂宋史课”。

28

202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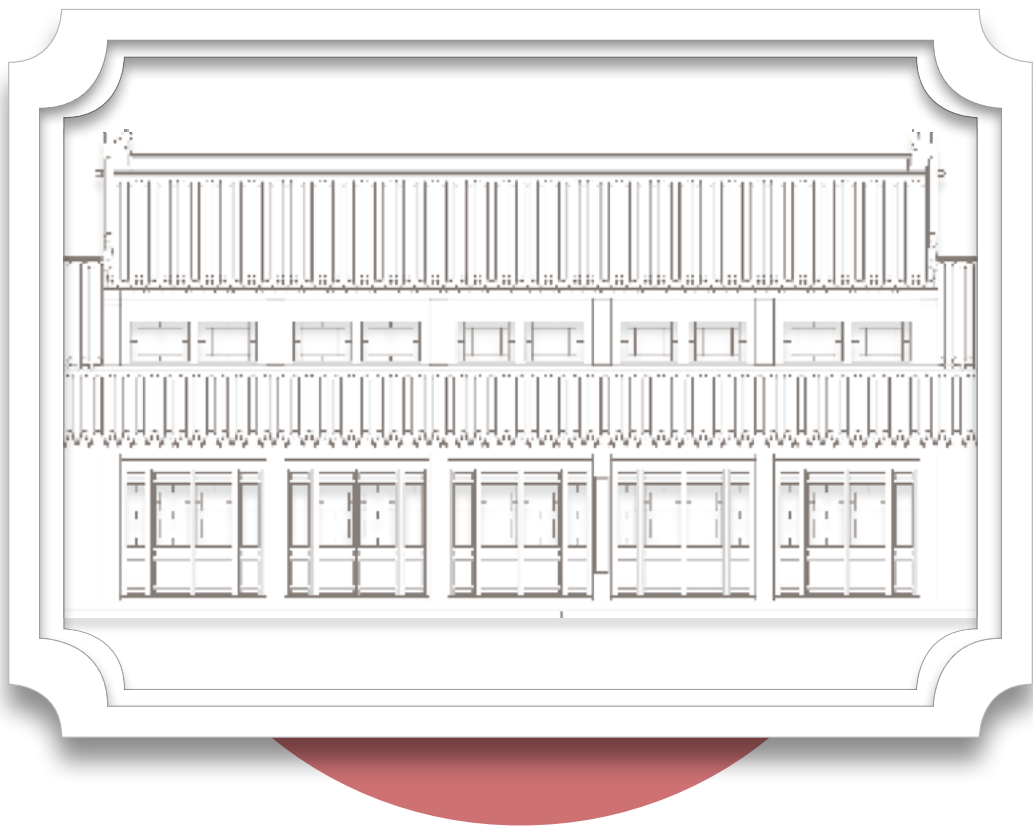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文研院共同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270期“宿白先生与敦煌石窟考古”在线上平台举行，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张小刚研究员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主持。

29

2022-11

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万海松研究员作题为“俄国的‘眼’和‘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创作中的彼得堡”的报告，同期邀请学者孟宪实、王振忠、Enrique Stephanus Dussel、潘光哲、金以林、应星、赵晓力、唐克扬、Keith Woodward、张小刚、徐欣、李成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凌建侯、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庄宇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照片墙



- 1、文研院邀请学者方德万教授（右二）回访文研院，参观“清流汇聚，沃土深耕：我们的北大文研院”展览。
- 2、北京地区文物古迹考察活动中，邓小南教授（左一）在太祖睿陵的墓室内作讲解。
- 3、“文研经典阅读”第五期“王权中的正统论与神秘论”第四次活动现场，文研院邀请学者高波与未名学者田耕、孙明等参加。
- 4、Enrique Stephanus Dussel（左）与 Keith Adam Woodward（右）在内部报告会现场。
- 5、第十三期邀请学者集体参观“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诞辰 115 周年学术纪念展”。

	2
1	3
4	5



1	
2	3
4	

- 1、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小刚（右二）为同期学者讲解二院敦煌壁画。
- 2、潘光哲老师采摘的二院里的山楂。
- 3、北京地区文物古迹考察活动中，全体观看恒亲王府内悬挂的巨幅北京地图。
- 4、疫情封控期间，在院学者饭后打乒乓球休闲。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 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 期：总第二十七期（2022 年 10 月—2022 年 11 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 笑

编 辑：王 瑞 周诗雨

审 校：翁雯婧

编 务：陈天传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